

日本军国主义

〔日〕井上清 著

第 4 册

商务印书馆



日本军国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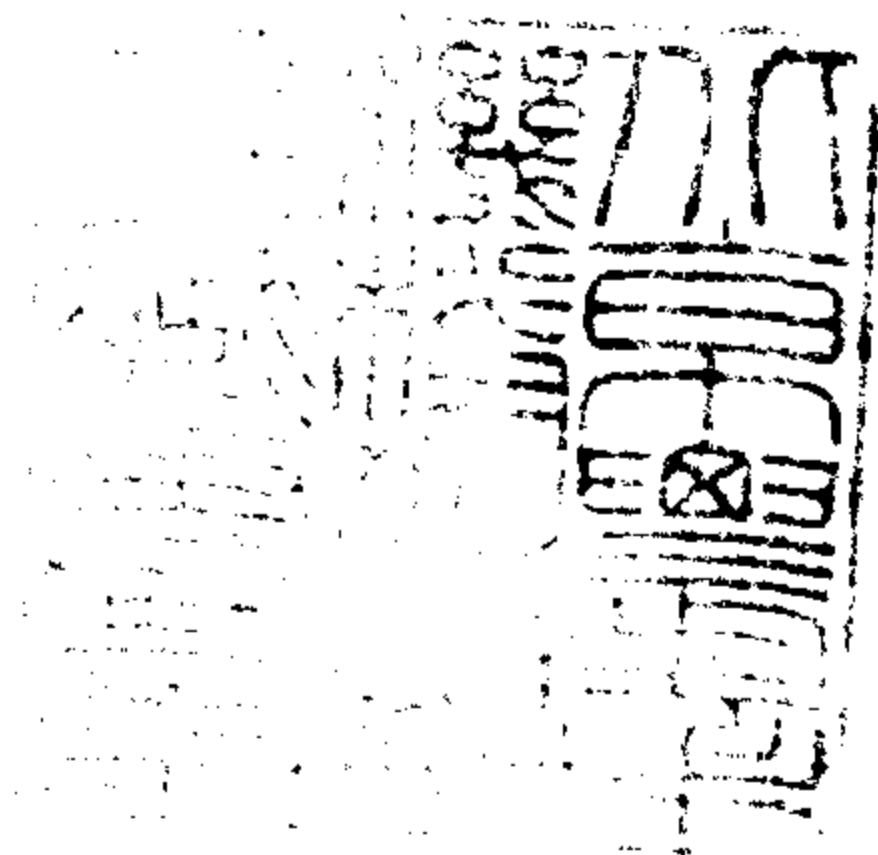
第四册

重整军备与军国主义复活

〔日〕井上清 著

盛继勤 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务印书馆

1985年·北京

目 次

序言	1
----------	---

第 一 部 分

第一篇 现代日本帝国主义与军国主义绪论	3
第一节 帝国主义的概念	3
第二节 被占领与日本帝国主义再起的可能性	10
第三节 媾和与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复兴	16
第四节 “潜在的帝国主义”	24
第五节 重温“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	30
第六节 帝国主义与军国主义	38
结束语——从属帝国主义论	44
第二篇 日本帝国主义复活的若干问题	49
第三篇 重整军备与军国主义复活	69
第一章 重整军备及其政治经济的基础	69
第一节 留下了帝国主义的孽根	69
第二节 重整军备的开始与军国主义思想政策	74
第三节 自卫队的创建及其特点	85
第二章 有计划的扩军与日美军事同盟	98
第一节 “大东亚共荣圈”再版之梦与日美关系	98
第二节 第二次和第三次扩军计划与垄断资本	109
第三节 第四次扩军计划与对日本战斗力的评价	117
第三章 日本军国主义的矛头	127
第一节 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各阶段	127
第二节 “日韩会谈”与日本帝国主义	132
第三节 日本军国主义的矛头	145

结 束 语	160
-------------	-----

第 二 部 分

第一篇 鸠山内阁论	166
第一节 两种力量	166
第二节 所谓“自主的防卫体制”	169
第三节 日苏谈判与松鼠外交	173
第四节 官僚的质变	177
第五节 展望	181
第二篇 从历史上来看岸内阁的性质	184
第三篇 《乙巳保护条约》与“日韩会谈”	198

第 三 部 分

第一篇 最近的日本电影上的军国主义	216
——以《战争和人》为中心——	
第一节 岸内阁和影片《明治天皇与日俄战争》	216
第二节 从《日本最长的一天》到《冲绳决战》	218
第三节 《人的条件》与《战争和人》	222
第四节 《战争和人》的导演的意图	227
第五节 文部省及其《昭和史》观	230
第六节 美化法西斯	236
第七节 反中国和反朝鲜的鼓盍宣传	240
第八节 与亚非人民团结战斗!	246
第二篇 结束了什么?是怎样“结束”的?	251
——评影片《战争和人》的终集——	
第一节 导演山本的借口	251
第二节 终集的梗概	253
第三节 怎样描写了侵略者和抵抗者?	256
第四节 日本人民的痛苦和裸体镜头等问题	258
第五节 修正主义的巧妙的“结束”	260

序 言

新版《日本军国主义》第四册，“重整军备与军国主义复活”，终于能够付印了。这一册收编了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八篇论文。其中第三篇是首次出版，其他七篇都是以前在杂志上发表过的。

各篇论文的编排顺序，既不是所述对象的年代，也不是文章发表的时期。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收录三篇文章，概述了理论问题和整个复活过程，这是本书的主要部分；第二和第三部分，是按文章论述的具体问题进行分类的。

关于战后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重要问题，本书并不是都涉及到了。特别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亚洲形势同日本军国主义的关系，除“日韩”关系外，都没有写到，这是作者本人也感到遗憾的。

美帝国主义在印度支那的全面的、决定性的失败，美国同中国的接近，1972年的日中邦交正常化，美国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争霸世界的激化以及其中苏联的进攻，苏联同中国对立的加深，苏联对日本露骨的帝国主义压迫的逐年加剧，等等，随着亚洲和世界形势的剧变，日美军事同盟（“安全条约”体制），尽管其帝国主义本质没变，但它的意义和作用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有关这方面的具体的、详尽的论述，需要另写一本书。我将在目前正在执笔写的《日本现代史》（1965年现代评论社出版的《战后日本史》的全面修订增补版）中进行此项工作。

这本书尽管有上述不足之处，然而我认为关于战后日本军国

主义的复活过程及其特点，基本上说清楚了。我以《日本军国主义》为题写的这部书暂且以此册结束。

井 上 清

1977年5月9日

第一部分

第一篇 现代日本帝国主义与 军国主义绪论*

第一节 帝国主义的概念

现代日本是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说的帝国主义国家呢？日本共产党及其理论家认为从十多年前起，日本帝国主义就在复活，但尚未完成。同日共尖锐对立的、被社会上称作毛泽东思想派的人们则认为，在任何意义上都决不应把现代日本看作是帝国主义国家，而是一种已经复活了的军国主义。日共则认为军国主义也正在复活，但尚未完成。

是帝国主义还是军国主义？复活了还是正在复活？我认为只钻概念，无论在学问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没有多大意义。然而现在争论的不仅仅是概念正确与否，而是关系到现代日本民族是压迫民族还是被压迫民族？统治日本人民的是日本垄断资产阶级还是美帝国主义？还是两者兼而有之？如果两者兼而有之，双方又是

* 这篇论文载于1971年3月发行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人文学报》第31期。其中的“今年”是指1970年。

我认为，现代日本军国主义是复活了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政治侧面，并非离开帝国主义而建立、而存在的。因此，这篇论文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并就战后日本的历史来阐明二者之间的关系的。我这里大量引用了《人民日报》及其他中国人的评论，这是因为从中国1970年左右的论调来看，中国从来不把日本称作帝国主义，专讲军国主义，把二者明显地区别开来，我非常关心这种区别的根据。中国似乎担心如果把日本当作“帝国主义”国家，会把日本同美国等同起来，所以不说帝国主义。然而我认为尽管日本从属于美国，但明确指出它本身也是帝国主义，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重要的。

处于什么关系？日本垄断资本利用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猛烈地向南朝鲜、台湾和东南亚进行扩张，并在政治上开始具有影响力量，这是日本资本主义本身的内在要求呢？还是仅仅具有辅助美帝国主义的意义？如何评价每年急剧增强的日本军备？以及其它一系列日本现状以及对这些方向的认识问题。

我认为现代日本是一个从属于美帝国主义、其本身也是帝国主义的国家；作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政策和上层建筑的军国主义已经复活。以下根据概括考察战后日本的历史来阐述一下我的这种看法。

首先，我们要专门根据列宁的著作来搞清“帝国主义”的概念。对几乎不讲自明的问题，要反复进行烦琐的引用，这对明确论点大有好处。据我所知，“帝国主义”这个词，列宁有四种提法。

（一）“殖民政策和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最新阶段以前，甚至在资本主义以前就已经有了。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罗马就推行过殖民政策，实行过帝国主义。”（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第 2 版，第 74 页）

从以上引文来看，“帝国主义”与殖民政策几乎是一样的；意思是指某个国家企图将其领土扩张到超越其原来国境的政策体系。这既不是帝国主义的历史概念，也不是经济概念。列宁认为在研究近代（现代）帝国主义问题时，这种超历史的观点是一种愚蠢的空论。在上述引文之后，他紧接着指出：“但是，‘一般地’谈论帝国主义而忘记或忽视社会经济形态的根本区别，这样的议论必然会变成最空洞的废话或吹嘘，就象把《大罗马和大不列颠》拿来相提并论那样。”（前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第 74 页）当论证现代日本帝国主义是否复活时，不消说，所谓“帝国主义”当然不是这种超历史的概念。然而也不是与此决无关系的。

（二）列宁在他的《帝国主义论》中曾给现代帝国主义下过一

个著名的定义,现将它重新引用如下:

“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前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第80页)

“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分割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分割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同上)

《帝国主义论》的第七章,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为题,把以上引用的定义作为前六章对世界经济分析的总结,进行了详尽的阐述。这个定义,尽管列宁预先说明“限于”“基本的、纯经济的概念”,但是列宁写明即使在政治上是被压迫国家而其社会经济结构是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也叫帝国主义。这种例子,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被迫接受凡尔赛和约的德国。

1920年11月,列宁在俄国共产党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指出,当时苏俄能够利用的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三个根本矛盾”是:第一,日本和美国的矛盾;第二,“美国和其余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矛盾”;“第三个纠纷是协约国同德国之间的纠纷”。他说:

“德国战败了,受到凡尔赛条约的压制,但是它拥有极大的经济潜力。按经济发展程度来说,如果美国占世界第一位,那德国就占世界第二位。(中略)凡尔赛条约就是强加在这样一个国家头上的,它当然不能忍受。德国是最强大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它不能忍受凡尔赛条约,德国本身是个帝国主义国家,同时又是一个被征服了的国家,所以它必然寻找同盟者来反对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的演说》,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410页)

列宁在 1921 年 5 月发表的小册子《论粮食税》中又说：

德国“那里有现代大资本主义技术的‘最新成就’，以及服从于容克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有计划的组织。”（列宁：《论粮食税》，载《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508 页）

“若是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获得胜利，那它就能轻而易举地一下子击破任何帝国主义的蛋壳（可惜这种蛋壳是由最好的钢料构成，因此不是任何鸡雏的力量所能击破的）。”（同上，第 509 页）

如果“象卡列林那样断言——向德国帝国主义‘学习’不是我们革命家干的事，那末……革命早就无可挽救地（也完全应该）失败了。”（同上，第 509 页）

列宁领导的 1921 年 6 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论策略提纲》，是这样谈及德国的：

“德国共产党应当通过自己的行动向德国无产阶级说明，不推翻德国资本主义政府，便不可能进行反对协约国资本剥削的斗争，因为德国资本主义政府尽管在大声疾呼地反对协约国，但它仍然充当着协约国资本家的监工和掮客。德国统一共产党只有通过德国政府进行顽强的和无情的斗争，证明它并不是在为破了的德国帝国主义寻找出路，相反地而是在努力摆脱帝国主义，……只有这样，它才能够加强法国无产者群众反对法国帝国主义的斗争意志。”（珍妮·德格拉斯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一册，荒畑寒村译，中文据《共产国际文件汇编 1919—1932 年》中文版第一册，三联书店 1965 年版，第 282 页。）

1919 年 6 月德国政府接受的凡尔赛和约是协约国奴化德国的条约。德国被剥夺了所有殖民地，不只是德国从邻国掠夺、变为本国领土的阿尔萨斯·洛林、西里西亚和波兹南，而且被割去了一部分固有领土；德国须将其现有商船的百分之九十移交给协约

国,而且在未来五年间,每年担负提供二十万吨新船的义务;作为赔款的一部分,首先在两年内要支付二百亿金马克,赔款总额未定,但估计不少于一千亿金马克;德国军队被压缩到十万人以下,禁止制造和使用毒气、坦克和飞机;为使其不违反这个条约,由协约国军事委员会进行监督。

这样一来,德国的统治阶级不管怎样反动和满怀侵略、复仇的野心,无论如何也是无能为力的。协约国拥有监督德国履行条约的权利,这事实上等于统治德国。德国不听从时,协约国可用武力强制它遵守。于是,1921年1月协约国决定德国赔款总额为两千二百六十亿金马克,并通知不积极裁军的德国政府必须立即将军队裁减到十万人。德国政府对这个条约的接受和实行表示踌躇,3月举行的协约国伦敦会议便发出最后通牒,法军竟占领了德国西部要地。德国最后只好在仅同意减少赔款的情况下接受了协约国的要求。

一言以蔽之,“战争的结果签订了凡尔赛条约,这些先进国家^①降到了殖民地从属地位,陷于贫困、破产、饥饿、毫无权利的境地。”(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190页)然而,这个德国是一个在经济结构上具有最先进的生产技术的、高度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的社会和国家。列宁看到这点,如上所述,认为:“德国本身是个帝国主义国家,同时又是一个被征服了的国家”、“破产了的帝国主义”(但还没有完全毁灭——井上)。

(三)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概念的第三种提法,是指具有垄断资本主义这种经济结构及在此之上不可避免地必然成长起来的、对外力图实行压迫和剥削其他国家和其他民族的力量和野心,对内“力图施用暴力和实行反动”的政治体制和政策体系的总和。这种

^① 指德国、奥地利等战败国。

政治和政策与各个具体统治者的好恶无关，它是体制的必然产物，只能在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上产生，此外是不可能存在的。列宁严厉地批判了考茨基把现代帝国主义解释为金融资本“情愿采取”的政策，否定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否定它在政治上必然实行暴力与反动、侵略与兼并的政策。按照考茨基的说法，“经济上的垄断是可以同政治上的非垄断、非暴力、非掠夺的行动方式相容的。”（前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第83页）然而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存在的。

列宁在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强加了凡尔赛和约体制的德国既是被压迫国家、本身又是帝国主义时，指出：德国垄断资本主义只是由于战败而“破产”，只要不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把它“消灭”，就必然存在着总有一天会在政治上复活帝国主义的基础。

（四）一个国家是否是帝国主义取决于这个国家本身是否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阶段。因此即使它没有成为力图实行暴力与反动、侵略与兼并的政治的帝国主义大国，但也有与这样的大国相勾结，掠夺别的国家和别的民族的较小国家。这是列宁使用帝国主义一词的第四种情况。他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瑞士和丹麦就是这样的帝国主义。

现在看一看列宁关于瑞士的文章是怎样写的。

“瑞士社会民主党人要使自己承认国际主义不致成为毫不负责的空话（象“中派”的拥护者和第二国际时代各社会民主党人始终表现的那样），第一、必须彻底地不断地使外国工人同瑞士工人从组织上亲密起来，并且融合在共同的组织中，为他们的完全（公民的和政治的）平等而奋斗。瑞士帝国主义的特点恰恰在于：瑞士资产阶级对毫无权利的外国工人的剥削愈来愈利害，他们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这两部分工人的疏远上。”（列宁：《瑞士社会民主党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的任务》，载《列宁全集》中文版

第 23 卷,第 146 页)

瑞士资产阶级政府“(1)同帝国主义‘大’国的资产阶级有着极其密切的经济联系和财政联系,并且完全依赖他们;(2)它的整个方针早已在国际和国内事务中转而实行反动的政治(中略);(3)它愈来愈变成反动透顶的瑞士军人派和军人集团的傀儡。”

“因此,瑞士社会民主党最迫切的任务就是揭穿向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军阀卑躬屈膝的政府的实质,揭露政府用民主等等词句来欺骗人民的行为,说明这个政府完全可能(在统治瑞士的整个资产阶级的同意下)把瑞士人民的利益出卖给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集团。”(同上,第 137 页)关于丹麦,列宁写道:

“丹麦帝国主义的特点是依靠乳制品和肉制品市场的有利的垄断地位来获得超额利润,把乳制品和肉制品通过运费最低的海路运到伦敦这个世界最大的市场去销售,因此,丹麦资产阶级和富裕农民(不管俄国民粹主义者怎样胡说八道,他们是最纯粹的资产者)就变成了英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走运的”寄食者,变成了特别稳当、特别优厚的利润的分享者。”(列宁:《整整十个‘社会主义的’部长》,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23 卷,第 134 页)

以上列举了在列宁著作中见到的“帝国主义”概念的四种用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日本,当时被盟军——实际上是被美军——占领,失去了一切殖民地,甚至被剥夺了冲绳、小笠原和千岛群岛等一部分固有领土,军队和一切军事机构一兵不留地全部解散,显然在政治上不再是帝国主义。然而在经济方面,尽管由于战败,战时经济解体,生产力下降到战败前最高点的三分之一;以及因解散财阀和实行《垄断禁止法》、《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排除法》等,资本和生产的积聚一时明显地被削弱,但垄断资本主义

的基本结构并未瓦解。

因此,按照帝国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的定义来说,占领下的日本,尽管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的德国更加破产、更加削弱,而且受美帝国主义的统治,但应该说基本上还是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所谓日本帝国主义的“复活”,首先应该是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由破产到复兴,由削弱到加强的发展过程。如果认为帝国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和在此之上所建立的政治结构的总体,那末这种所谓的“复活”就不仅是经济的“复活”,而且应该精心地观察它是否在此基础上在政治上也变成一个压迫和掠夺其他国家和其他民族的国家。同时还应该弄清日本国家及日本民族同美帝国主义之间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关系,弄清今天日本在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地位 and 今后的方向。这是因为尽管不是帝国主义大国,而且在金融方面或者政治方面还“从属”于或者“依赖”于大国,然而却仍然不失为帝国主义国家。

第二节 被占领与日本帝国主义再起的可能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日本接受了同盟国对日本的《波茨坦公告》而投降。在投降的同时,日本丧失了民族主权的独立,被置于同盟军,实际上是美军单独占领和统治之下。而且这种占领直到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约生效为止,长达六年七个月以上。

美国政府1945年9月22日发表声明说,其占领日本的“最终目的”是:(1)“保证日本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2)建立“支持美国的目的的政府”,即把日本变为从属国家。《波茨坦公告》规定被占领国日本和占领国美国都有义务使日本实现非军国主义化和民主化。然而对美国来说,只有当这种政策可用来作为达到上述“最终

目的”的一个手段时才采用。

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回顾从占领开始到一年半以后的1947年2月20日这一时期的占领政策时，向美国国会报告如下：现代战争的胜利，不能只靠在战场上打败敌人，“必须在摧毁战争的物质基础的同时，摧毁那种煽起人们参战意念的人的本能。这种人的本能，只靠一时战败的冲击使其屈服是不够的，还需要在精神方面进行彻底改革。这种改革不应该仅仅支配被战败了的人们，还必须是对后继年代的人们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日本《朝日年鉴》，1948年版）

麦克阿瑟所说的也就是必须使日本人直到子孙后代都要培养起对美国卑躬屈膝的意识。根据这种令人生畏的奴化日本民族的基本方针而采取的摧毁日本可能再次对美发动战争的“物质基础”的方法，就是它的“非军国主义化”和“民主化”。为了对日本人进行直到子孙后代的“精神改革”，实现精神上的对美奴化，麦克阿瑟在上述报告中接着说道：“彻底封锁粮食及其他补给完全依赖从外部供应的部队，是粉碎这个部队的有效武器。……对投降后的日本继续实行并扩大、加强了这种封锁。”（同上）

于是便有计划地毁灭日本经济，有计划地将人民投入饥饿的深渊，接着，麦克阿瑟又对饥饿的日本人摆出一副救世主的面孔，即占领军又扮演了“紧急放粮”和“粮食援助”的角色。这也“不是善心发作”，麦克阿瑟向美国纳税者保证说：“粮食钱将来还是要日本偿还的。这要由美国优先取得日本资产的权利得到保证。”（同上）

1947年6月27日，麦克阿瑟对美国新闻记者团沾沾自喜地谈到自己作法的成功时说：“美国送给日本的粮食，把日本同美国牢固地联结在一起。”（同上）

这种狡黠诡诈、极端专制的军事占领权力，给日本铺下了对美

从属化的轨道。日本共产党把这种占领军说成“解放军”，也对美国政策的成功帮了大忙。

占领下的日本，在政治方面不管怎么说，不可能是帝国主义。但帝国主义的“经济本质”——垄断资本主义，尽管因战败和投降而被大大削弱，但还是保存下来了。不仅如此，由于农地改革和遍及全国的农民斗争，使曾经与资本主义并列、居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寄生地主制受到严重打击，它作为经济制度不久就变为无足轻重的残余，寄生地主作为阶级势力逐渐消灭下去，于是资本主义变为唯一的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变成唯一的统治阶级。还由于制定了新宪法，天皇失掉了专制权力，军部也已不复存在，资产阶级的最上层垄断资产阶级在日本的各阶级、各阶层中的政治地位比战败以前任何时期都相对地提高了。但在他们的头顶上有占领军的权力，过去的天皇制政府和官僚机构成了执行占领军权力的政策的机关，因此，垄断资产阶级也没能掌握日本国家的权力，只能给政府和官僚以一定影响，使其在执行占领政策时，尽可能有利于本阶级的利益。

占领军权力封锁日本经济一直持续到1948年春，解散财阀的指令、《垄断禁止法》、《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排除法》、实物赔偿征收计划等等，一个接一个地抛了出来，推进了削弱日本垄断资本、剥夺其对美竞争能力的政策；另一方面，由于以工农为主力的日本人民迅速转向革命，占领军则又不得不保卫资产阶级的“秩序”；在国际上，在1946年春以后急剧加深的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冷战”中，还不得不把日本当作反苏、反共势力加以利用；在1946年5月19日举行所谓粮食劳动节^①时，对反对组织吉田自由党内阁和要

^① 粮食劳动节：1946年5月19日，在日本东京都人民广场召开的“突破粮食危机国民大会”，又叫粮食劳动节。二十五万人参加，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包围了首相官邸，要求吉田放弃组阁。——译者

求建立人民民主政府的人民攻势，占领军竟出动装甲车部队进行镇压；以第二天成立第一届吉田内阁为转机，开始采取开设复兴金融金库，实行“倾斜生产方式”^①等，以复兴垄断资本为中心的在一定程度上复兴日本经济的政策。

进入 1948 年，美国远东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在此以前，以美国在亚洲夺取了旧日本帝国主义在朝鲜、中国和东南亚的势力；特别是在中国，给蒋介石政权以武器和资金，让它来消灭中国共产党和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力量；把蒋政权变成美国统治和剥削整个中国的傀儡，并把中国当成它进攻苏联的坚不可摧的巨大根据地，作为美国的最高方针，而日本只要变为对美国忠诚、无害和无力的资本主义小国就可以了。然而战后的现实粉碎了美国的这种野心。无论在朝鲜还是在东南亚，反帝民族解放力量发展起来了。尤其是在中国，美国唆使蒋介石发动的反共、反人民的全面内战，反而缩短了蒋政权的寿命，早在 1948 年初就已预见到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同年秋天，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整个东北地区，同时革命在全中国的胜利也很快就要变成现实。于是在美国的亚洲政策中，日本突然被重视起来。

1948 年 1 月，美国陆军部长罗亚尔说，应该改变“原来在广阔范围内使日本非军事化的方针”，要把日本重建为美国的“远东工厂”、“远东的反共壁垒”（攻击基地），“扶植起一个坚强有力的日本政府”。

根据这一新的方针，美国政府和占领军便开始为日本垄断资本的复兴倾注力量。《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排除法》的实施几乎全都停了下来，旨在摧毁日本产业的潜在军事能力的征收赔偿方针也

^① 倾斜生产方式：即 1946 年 12 月，内阁会议根据盟军总司令部的指示决定的《煤炭、钢铁超重点生产计划》，也就是有重点地对钢铁业配给煤炭，对煤矿配给钢材，以促使两大基础产业尽快恢复和扩大生产。——译者

抛弃了，美国的经济“援助”增加了。这与“援助”欧洲资本主义各国复兴、建立全欧反苏包围圈和反革命战线的马歇尔计划几乎是同时出笼的。

日本的垄断资产阶级与一切统治阶层，全面依赖美国这一新的对日政策。美国为使日本变为扼杀亚洲的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的、政治的和军事的据点，不顾一切地大力推行迅速复兴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路线。

1948年底，占领军总司令部强制推行“稳定经济九原则”的指示，即由美国政府特派公使道奇^①来日编制1949年度和1950年度日本国家预算草案；同时美国派来特使休普^②全面改革日本税制，废除复兴金融金库，设立“对日援助美元对等资金特别会计”（这是一种旨在对于占领军认为重要的重化学工业的垄断资本的重建和加强，“直接地、迅速地作出贡献”而设立的美国援助资金的贷款机构）；1949年4月规定一美元兑换三百六十日元的单一汇率，从而把日元束缚在美元上；之后开始了私人贸易，占领军通过日本政府制定和实施了贸易和汇兑管理法，所有这一切都完全是以牺牲劳动人民和中小企业来迅速复兴对美从属的垄断资本主义的。

与此同时，在美国政府和五角大楼早就在1948年底，“为了对付中共军的胜利，美国的战略家和五角大楼开始研究利用日本的重新武装和人力资源的问题。”（日本《朝日新闻》1948年12月2日）

在这期间，1948年9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全朝鲜的独立与统一的斗争飞速发展。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到同年年底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整个中国大陆，蒋介石一伙逃到了台湾。

① 道奇(Joseph M. Dodge):美国国防部顾问(底特律银行董事长)，来日前曾领导西德的币制改革，后来担任过艾森豪威尔政府的预算局长。——译者

② 休普:美国的税制专家。——译者

美国急不可待，于 1950 年 6 月，便以日本为基地发动了侵朝战争。与此同时，恢复和起用日本垄断资本愈加成为燃眉之急，公然开始了重新武装日本。在朝鲜战争开始的第二周内，占领军总司令部就指令日本政府以“警察预备队”的名义创建了七万五千人的美式轻步兵部队。8 月下旬，预备队匆忙成立了。防卫厅编的《自卫队十年史》承认：占领军对队员的募集、教育和训练等，一切都是“全力以赴”的。

毛泽东和斯大林早已估计到日本帝国主义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再起的可能性，并作了防备。即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在 1950 年 2 月缔结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前言中规定：中苏两国“决心以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友好与合作，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再起及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国家之重新侵略，……”为此，决定缔结本条约；其第一条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或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下略）”（1950 年 2 月号《新华月报》）

签订这一条约时，日本的工矿业生产尚未达到战前（1934—1936 年平均的）水平，日本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所占的地位是无足轻重的。日本自己的军事力量当然不存在，主权独立也被占领军剥夺了。尽管如此，毛泽东、斯大林这两位世界人民的领导人之所以作了上述估计可能是因为：第一，存在着美国企图统治和利用日本侵略中国和苏联的形势；第二，从理论上来看，战败的日本帝国主义也存在再起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斯大林在 1952 年 10 月发表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六章中谈到资本主义各国间的矛盾和帝国主义相互间的战争的不可避免性的问题时说：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主要的战败国德国(西德)和日本吧。这两个国家现在在美国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过着可怜的生活。它们的工业和农业,它们的商业,它们的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它们的整个生活,都被美国的占领‘制度’加上了镣铐。要知道,这些国家昨天还是震撼了英国、美国、法国在欧洲和亚洲统治基础的强大帝国主义国家。如果认为这些国家不会设法重新站起来,打破美国的‘制度’,奔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这就等于相信神怪。”(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25 页)

斯大林还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在被打败后经过这么十五年到二十年的工夫”,重新变成强大的国家;同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和日本也必然会“挣脱美国的镣铐,从而过自己的独立生活”(同上第 26 页)。他在缔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当时也许就有这种预见。

那末,日本幸存而再起的垄断资产阶级,在斯大林这样写后十八年的今天,砸碎了美国的占领“制度”的镣铐了吗?很明显还没有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在希特勒政权下割断凡尔赛条约体制的锁链那样砸断了镣铐。那末日本今天是不是基本上同十八年前一样仍处于占领“制度”之下呢。我的结论是,可否认为占领制度在逐渐放宽,被占领情况已变为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从属关系。这个问题将在下文探讨。

第三节 媾和与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复兴

美国以日本为基地发动了侵朝战争,当它在这次战争及其侵略亚洲的一切战争中企图积极利用日本时,便遇到许多对它不利和不便的情况。即日本不仅在国际法上被同盟国占领,受《波茨坦

公告》的约束，禁止日本重新武装和进行军需生产，而且远东委员会^①和对日管制委员会^②还有可能对美国的对日政策进行干与。因而美国五角大楼主张继续占领日本，依靠不受任何限制的占领特权来左右日本；美国政府的实权派则主张在国际法上使日本变为“独立国”，然后让这个独立国日本根据自主意志重新武装，采取让日本“协助”即屈从美国的形式更为有利。

于是 1951 年 9 月召开了旧金山对日媾和会议，日本在美国一手起草和决定的《对日和平条约》上签了字，只同美国阵营各国媾和了。同时在同“媾和条约”不可分割的美国强加给日本的《日美安全条约》上也签了字。接着，又借日美政府间的“行政协定”之名，规定了“安全条约”的实质内容。日本政府进而在美国指使下，把台湾蒋介石集团当作“中华民国政府”，并与其缔结了“和平条约”，公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敌。这些条约和协定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都是 1952 年 4 月 28 日生效的。

日本在国际法上变为独立的主权国家。然而事实上在政治和军事方面仍然是美国的属国。“安全条约”在条文上也只规定美国单方面的权利而不负任何义务，日本只有义务，没有任何权利。根据日美“安全条约”，驻扎在日本的美军原封不动地继承了占领军的全部特权，一切军人、军队文职人员以及他们的家属都享有治外法权。美军甚至可以出兵镇压日本的内乱。同担负占领军费用一样，日本以“防卫分担费”的名义，分担驻日美军的费用。不仅如此，在“和约”生效的同时，法律上取消了一切占领机构。但是，装

^① 远东委员会：1945 年 12 月，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决定的、由美、英、中、苏、菲、印、新西兰、澳、加、法、荷等十一国代表组成的对日占领的决策机关。后因被美国把持破坏，1948 年后失去作用，1952 年被美国非法解散。——译者

^② 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美、英、苏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决定设立的盟国驻日占领军总司令的谘询和劝告机构。由美、英、中、苏四国组成，设在东京。它的主要任务是实现《波茨坦公告》的规定，完全解除日本武装，使其民主化。但其工作一直受美国破坏，1952 年 4 月被美国非法解散。——译者

备、编成、训练和指挥警察预备队的占领军机关——盟军总司令部军政要员驻区 (CASA)^①，仅仅改名为“美国远东军司令部驻日保安顾问”，实际上和以前完全一样，管理和指挥着警察预备队(后发展为保安队)。

那末，媾和之后，日本对美国的地位是不是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呢？那也不是。合法的、没有任何限制的占领权力消失了，这无论对日本统治阶级，还是对日本人民来说，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巨大变化。此后，美国对日本人民提出任何无理要求，都必须通过日本政府和国内法令。例如根据“安全条约”，美国在日本国内可以随便建立基地，但如果为此要从国民手里征用土地，则必须先让日本政府来征收，然后再由政府交给美军，不能再象过去那样，由占领军直接征用土地、直接镇压抵抗征用土地者。于是日本人民的反美斗争和对本国统治阶级的斗争，比在占领情况下容易进行了。

日本的统治阶级及其国家机关，对美国来说，由于签订了“和约”和“安全条约”，并由于美国拥有压倒优势的实力，还由于日本垄断资本依靠被占领下的美帝国主义政策粉碎日本人民的抵抗所决定的复兴方式，在法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都不能不严重地从属于美国。此外，在冲绳县及其他地区还残存着美国对日本民族的直接统治。但除冲绳等以外，日本国内对人民的统治权，由于“和约”的生效和占领权力的消失，又回到日本统治阶级——垄断资产阶级的手中。因此，不能因为他们所统治的日本国家从属于美国，日本民族主权的行使受到限制，就否定日本统治阶级掌握着日本国家机构，直接统治着日本人民。统治阶级一方面掌握着日本国家的权力，统治着人民，另一方面为了本阶级的利益又从属于美国，出卖民族利益。这种从属关系由于战败和长达七年之久的长期占

^① 军政要员驻区：原文为 CASA，系 Civil Affairs Staging Area 的缩写。
——译者

领是不得已的,但除此以外,还有为了他们的阶级利益,主动依赖美帝国主义庇护的一面。

他们的阶级利益是,第一,为了复兴垄断资本主义,要接受美国的“援助”,镇压日本人民的革命斗争,一旦这种斗争发展成为内乱,就企图依靠美军来镇压。1952年签订的“安全条约”的第一条规定:镇压内乱可动用美军。它不仅表明美国害怕日本人民革命,从而在条约上明文规定有镇压革命的权利;而且还表明日本统治阶级也在依赖美军。

第二,所谓日本统治阶级的利益,就是害怕、憎恶并企图阻止朝鲜、中国等亚洲各族人民的反帝民族解放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如有可能还想重新侵略亚洲。因此,他们不得不全面依赖美国,为此不惜出卖民族利益。

日美“和约”、日美“安全条约”和“日蒋条约”刚一生效,1952年5月5日,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就发表了《关于美国宣布非法的单独对日和约生效的声明》,其中讲了下边一段话:

“这(指缔结单独‘和约’和‘日蒋条约’等——作者)就证明日本的反动统治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为期将近七年,仍毫无悔祸之心,现在它更决心追随美帝国主义,妄图继续其甲午战争以来武装侵略中国的阴谋,准备重新进犯大陆,复活它对中国和亚洲人民的帝国主义统治。”^①(《新华月报》1952年5月号,第40页)

这段话同在中苏同盟条约中提到的警惕日本帝国主义再起的可能性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它在对美“和约”和“日蒋条约”中,不仅仅看到美国帝国主义侵略亚洲的政策和使日本成为属国,而

^① 光冈玄:《中国的日本军国主义论》(《中国研究月报》,1970年6月号)所收。以下本书所引用的中国政府声明及《人民日报》社论等中国文件,只要不特别注明,皆引自光冈的资料。

且还看到日本统治阶级的帝国主义意图，并把它同远自甲午战争以来的历代日本统治者侵略中国的一贯政策联系起来，这点使我深受启发。

在这期间，日本垄断资本靠朝鲜战争中美军“特需”采购发了横财，以此为动力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1951年，工矿业生产超过战前水平，接着以百分之十五左右的年增长率发展起来。资本和生产的积累也恢复到并超过了战前水平。钢铁等与美军“特需”直接有关的重化学工业和动力工业首先得到恢复，今天在全世界数一数二的造船业和汽车制造业也是在那时打下基础的。在这一过程中，旧财阀系统的银行，对该系统的企业给以重点贷款，它们相互勾结起来，还使许多中小企业从属于它们的系统，从而确立了金融寡头制的统治。到1953—1954年，日本垄断资本主义在一切领域中都完全恢复了。

至此恢复起来的垄断资本主义，其垄断程度远远超过战前。第一，战前与资本主义并存的还有前资本主义的寄生地主制，但现在没有了，资本主义成了唯一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垄断资本高居其上。即垄断的直接统治已渗透到日本经济的各个角落。第二，战前的日本垄断资本主义，重化学工业尚未占统治地位。1937年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后，由于军需生产需求紧迫，重化学工业这才占了统治地位。三十年代初期，仍以纺纱、缫丝等轻工业为主，现在重化学工业居绝对优势，已成为典型的垄断资本主义。第三，战前的中小企业，尽管通过提供贷款、供给原料和销售产品等，从属于垄断资本，但作为生产单位大都进行独立经营，而现在则多数中小企业已成了垄断资本的承包企业或再承包企业而被纳入它的系统了。

然而这时复兴了的垄断资本主义，是处于占领下近七年之久，在美国根据其亚洲政策的需要而敷设的轨道上扶植起来的，靠朝

朝鲜战争的美军“特需”打下了基础，完全依赖包括“特需”在内的对美贸易。另一方面，在朝鲜战争开始后，朝鲜自不待言，同中国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各国的贸易受到占领军的严格限制，简直如同禁止一般。媾和以后，日本政府在美国指使下仍继续实行限制。因此，日本的贸易结构、进出口都完全依赖美国，技术也是如此。

但是，资金方面的依赖却逐渐减弱。美国的“援助”，1950年以来停止了，因此，在政府财政投资和贷款的资金来源中，对日援助美元对等资金特别账目的比重，以设立该账目的1949年度的百分之三十二点四为最高，之后迅速减少，1953年减为百分之八，同年竟取消了。1952年，日本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开辟了从世界银行接受贷款的渠道。在此之前，美国私人资本已连续不断地流入日本。然而政府高度警惕外国资本控制日本产业的危险，还在占领下的1950年1月，取得占领军的同意，制定了外资法，严格限制了外国资本流入日本。美国资本家在五十年代还没有把日本看成是安全而且特别有利的投资场所，因而他们对日投资很少。但是，最基本的战略产业——石油工业，却完全在美国资本支配之下，这就加强了整个日本经济的对美从属性。

对如此恢复起来的日本垄断资本主义来说，因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达成协议，预计到“特需”将剧减，从而会受到沉重打击。为了减轻这种打击，日本听信美国的劝诱，决定接受美国的《共同安全法》规定的军事和经济援助。

这次谈判是从7月开始的。作为援助的代价，美国要求日本将地面部队一举增加到三十万人。

在此之前，1952年8月，新设了保安厅，警察预备队改编为保安队，增加到十一万人，美国借给坦克及各种重武器，还建立了小型航空部队。海上警备队又从海上保安厅独立出来，与新设保安队一起纳入新设保安厅的管辖，开始成长为一支小型海军。日本

政府企图以此作为“新国军的基础”，逐步建成陆海空三军保持均衡的现代常备军。政府把这种做法叫做“自卫力量渐增”。其武器和装备都是美国借给的，美国的将军以管理这些借给的武器的名义，作为自卫队的“顾问”，合法地高居于保安队之上，美军顾问团和过去一样指挥和训练部队。

美国对日本的“渐进”方式表示不满，尤其是鉴于朝鲜战争的失败、公开主张“用亚洲人打亚洲人”，在总统选举中获胜的艾森豪威尔于1953年1月就任总统以后，美军战略改为以载核弹的战略轰炸机为美国军事力量的核心，地面部队则力图使用其他民族。根据这一战略，一方面尽量把驻日美军地面部队撤回美国，另一方面则企图大力增加和使用日本陆军，要求日本建立一支三十万人的地面部队。

日本政府则执意坚持自己的“渐增”扩军方式。结果使《共同安全法》的谈判拖长，到1954年4月才勉强达成协议。根据协定，日本从美国无偿接受武器援助，并购进美国的剩余农产品，其售款用日元结存，作为发展军事工业的资金。其交换条件是，日本负有如下义务：要在三年内将地面部队增加到十八万人；要划时期地增强军备；要以保护美国提供武器的秘密的名义，制定《刑事特别法》；在日本生产的武器也要符合美国武器的规格（这是把军火工业与技术，用美国规格统一起来，即依附于美国）；要对美国进行经济合作（特别是限制对共产主义国家的贸易）等。

根据《日美共同防御援助协定》，日本政府和执政党在1954年第十九届国会上通过了《防卫厅设置法》和《自卫队法》，建立了陆上、海上、航空三个自卫队、防卫大学等培养干部的机构、三军“联合幕僚会议”^①以及其他一切军事机构。这样一来，日本便正式地进行了全面的重新武装。该自卫队也同过去完全一样，紧紧地从

^① 联合幕僚会议：即“参谋长联席会议”。——译者

属于美国。《日美共同防御援助协定》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这种从属关系。

自卫队的对美从属关系是无可争议的。然而它是日本垄断资本统治日本人民的武装力量，不只是根据美国的要求勉强建立起来的，而是适应日本统治阶级的需要而建立和增强的军队，这一点千万不要忘记。这表现在日本拒绝了美国只让大力增加地面部队的片面要求，坚持了在日本经济力量允许范围内，海陆空三军均衡渐增的方式。

在通过《共同安全法》和《自卫队法》的第十九届国会上，政府以“保持教育的政治中立”为名，通过两项法律，初步确定了政府统制教育和推行军国主义教育的框框。并以此为根据，每年强制推行教育的统制和反动的重新编制。事实上其背景是：在《日美共同防御援助协定》的谈判过程中，美国要求“利用教育和宣传，在日本造成一种能够发扬爱国心和主动自卫精神的空气”；对此，日本表示了同意。

为了镇压人民反对对美从属的重新武装和反动政治的斗争，全面复活了比战前更加强大的中央集权的警察制度。据称，由于在野党的反对，政府和执政党估计到这一警察法案不可能在原定会期通过，便企图延长会期，为此，竟将二百名警察拉进国会，利用实力排除反对派议员的抵抗，通过了延长会期的议长提案。

《日美共同防御援助协定》、正式重新武装、中央集权警察制度、国民教育的反动统制和重新编制，以及为了强行通过这些法案，将警察力量引进国会，这意味着日本统治阶级已经抛弃了战后日本的政治原则——“和平与民主主义”的伪装，公然开始转入反动与暴力的统治，这正是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必然产生的政治形态。

第四节 “潜在的帝国主义”

自 1948 年 11 月以来紧密勾结占领军和美帝国主义，并受其指挥，得到大力庇护，一直掌握政权的吉田首相，于 1954 年底，不仅遭到广大人民的反对，而且被垄断资产阶级——财界抛弃，终于被迫辞职。之后，公然主张修改宪法，以便自主进行重新武装的鸠山一郎，在财界的支持下组成了民主党内阁。

鸠山一旦掌握政权，由于担心人民反对，便不再坚持修改宪法，但却加快了重新武装的步伐。当时政府在同美国谈判，并就应交付美国的防卫分担费将随着日本军费的增加自动减交所增军费的半数取得成功。从而向自主重新武装迈进一步。这届内阁，从 1955 年 1 月到 1956 年 10 月，同苏联不断进行恢复邦交的谈判，不顾美国的反对和明里暗里的干涉，不顾国内垄断资本和执政党的一部分人以及外务官僚等的反对，终于恢复了邦交。日本也因此得以加入联合国。从鸠山内阁的这些作法中可以看到日本垄断资产阶级一部分人企图实现帝国主义的独立自主的愿望与努力。

但是日本资产阶级并不都支持鸠山路线。财界实权派为了实现其参加联合国的愿望，才暂时对鸠山路线作出了让步。于是在实现参加联合国而露了脸之后，便让鸠山从政界引退了。之后，由于自民党内的派系斗争，结果组成石桥湛山内阁。但不到两个月就辞职了，1957 年 2 月，组成了第一届岸内阁。

岸首相是个狂热的扩充军备派，曾在国会明目张胆地说：在自卫的范围内即使拥有原子武器也不违反宪法。他在就职三个月后，又到东南亚进行了两周的访问。其最后日程是在台湾支持和鼓励蒋介石反攻大陆，进攻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企图借助这次旅行让各国政府接受他的利用美国的资金、日本的技术、当地的资源

和劳动力来“开发”东南亚的设想。然而各国都认为这是以美国为
主人、日本当管家、剥削东南亚的新殖民主义而予以拒绝。

岸信介6月回国后，马上又飞往美国，与艾森豪威尔总统、杜
勒斯国务卿进行会谈。日本首相去华盛顿朝拜的惯例是从这时开
始的。他要求美国修改《日美安全条约》，归还冲绳和小笠原的行
政权，设立东南亚开发基金等，美方置之不理。值得一提的只有一
点，就是约定明年美国撤退驻日地面部队。其实这是美国企图把
重点放在核导弹战略上，认为把很多地面部队配备在日本，只能刺
激日本人民的反美斗争，战略价值很小，因而将其撤回，以便让日
本自卫队来接替。并以日本迅速增强军备为条件，从1958年度起
废除防卫分担费。

这时日本已拥有仅次于美、英、西德，与法、意相匹敌的生产能
力，正如在岸信介的东南亚开发设想中所看到的，日本开始暴露出
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野心。岸信介始终紧密勾结美国帝国主
义，是美国在远东的无比忠实的代理人，他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图向东南亚扩张经济和政治势力。利用对菲律宾、缅甸、印尼和
南越的“赔偿”输出资本，也是从这届内阁开始的。发展出口贸易
对日本垄断资本来说是最重要的。钢铁资本等资本家寄希望于日
中贸易。但岸内阁采取露骨的敌视中国政策，在1958年5月，破
坏了不久前经民间人士呕心沥血签订的日中钢铁协定和第四次日
中贸易协定。他认为即使牺牲目前的经济利益，也要贯彻敌视中
国的政策，用以对美表示忠心。从大局来看，这对日本统治阶级是
有利的。

之后不久，在7月7日，即日本发动全面侵略中国战争的二十
一周年纪念日，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中国人
民坚决反对日本潜在的帝国主义》的社论。

“岸信介内阁的对外、对内政策，充分地反映了日本垄断资

本集团潜在的帝国主义野心，严重地说明了日本正在进一步被拖上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老路。”

“岸信介政府力图把日本重新拖上帝国主义的老路，决不是偶然的。日本是一个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虽然遭到了挫败，丧失了殖民地，并且处于美国的控制之下。但是，在日本占统治地位的垄断资本却被美国保存下来。美国的意图是通过日本垄断资本，复活日本军国主义，使日本成为美国在亚洲进行侵略的工具。而日本垄断资本却希望通过为美国侵略政策的服务，得到美国的扶持，从而积累力量，东山再起。在朝鲜战争中，日本起了美国侵朝军队的后勤基地的作用，使日本垄断资本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就不能不加强了日本垄断资本集团企图重新称霸远东的帝国主义欲望。”（1958年7月7日《人民日报》社论）

这篇文章意味着，中国认为“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都是垄断资本主义必然要采取的对外侵略的政策和体制。只不过令人感到：“军国主义”一词的重点是放在政策和思想体系方面，而“帝国主义”一词的重点则是放在多少已经统治着其他国家和其他民族的体制上。因此尽管说日本垄断资本的政治代表岸内阁直言不讳地表现出“企图重新称霸远东的帝国主义野心”，但是还没有实现，所以采用了“潜在的帝国主义”的提法。尽管如此，而“日本正在进一步被拖上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老路”这样的观点，应该看作是从1952年5月，中国认为日本从“妄图准备复活”帝国主义的阶段前进了一步。

在日本国内，从1957年岸首相第一次访问东南亚和朝拜华盛顿时起，就发生过日本帝国主义是否已经复活的议论，从1958年到1960年，日美进行了修改《日美安全条约》的谈判，1960年6月，在新《日美安全条约》生效前后，掀起了一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

是否复活的大争论。其主要论战人物和论点,高内俊一在《现代日本资本主义论争》一书中作过介绍。这次论战与围绕日本共产党纲领草案的争论交织在一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不论哪个参与论战的人都承认这样的事实,即日本垄断资本主义不仅已经恢复,而且有了高度的发展。并且对岸内阁正在推行新殖民主义、即现代帝国主义政策的观点,谁也没有异议。

论战的一方(主要是日共系统的)认为,日本垄断资本主义在经济上“从属”于美国,而且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从属还很严重,日本事实上仍然是被占领国(或者称半占领国),作为帝国主义尚未“独立”,因而不是帝国主义。而论战的另一方则强调日本对美国的经济依附是微不足道的,美国在资金方面的渗透很有限,进出口贸易对美依赖很大,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经济受到美国控制;虽说日本在国际政治方面几乎完全“从属”于美国,在军事方面也“从属”于美国,但这是日本统治阶层为了本阶级的利益而采取的一种政策,并不存在“半占领”,或者“事实上的占领”,日本基本上已经独立。不过,在这两种主张之间,对“从属”或者“独立”的性质及其程度的看法是不一致的。

第一次《日美安全条约》,在条文上也是露骨的不平等条约,日本人民当然要求废除它,统治阶级对它也不满意。在垄断资本主义复兴后的1955年,鸠山内阁的重光外相8月访美,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第一次提出修改“安全条约”,并使其成为日美对等的双边军事同盟条约的要求。杜勒斯回答说:当日本重新武装不断加强,“并且能对西太平洋的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的条件具备时,美国就同意进行修改“安全条约”的谈判。在这里美国表明了这样一条路线,即只有当它认为日本不仅愿意而且有能力忠实地履行艾森豪威尔在1953年竞选总统时所确定的“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美国基本方针时,它才同意进行修改“安全条约”的谈判。

这种重新武装的加强正是鸠山内阁所追求的。岸内阁进一步加速了重新武装的进程，热中于修改宪法，以便能够向海外派兵。为了给修改宪法作准备，1957年8月，在护宪派委员不参加的情况下，成立了宪法调查会。与岸内阁的这种态度相呼应，1958年，美国废除日本的防卫分担费，并开始撤退驻日地面部队。然而1957年美国还没有接受岸信介的修改“安全条约”谈判的提议；直到1958年8月，杜勒斯才痛快地接受藤山外相的要求，10月在东京开始修改《日美安全条约》的谈判。美国之所以改变态度，是因为岸内阁破坏第四次日中贸易协定（5月）；岸任命的“日韩会谈”首席代表泽田廉三发表“把三八线推回到鸭绿江外是日本外交的使命”的演说（6月），对岸内阁和日本统治阶级这种典型的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政策抱有反感。

众所周知，修改《日美安全条约》是不顾日本全国人民的空前反对而硬干的。1960年6月，日本与美国政府签订了《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其主要条文与《北大西洋公约》的相应条款是一样的。臭名昭彰的第二条规定：“缔约国应加强其自由制度……”，“应努力消除其国际经济政策中之冲突，并促进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这与《北大西洋公约》的第二条文字相同；新《日美安全条约》第三条效法《北大西洋公约》第三条，为了照顾日本宪法第九条，在缔约国负有继续增强军备的义务上加了“以根据宪法规定为条件”的限定。

在条文的形式上变成了日美对等的双边军事同盟条约。然而新条约仍规定美军可以毫无限制地驻扎在日本和设置基地。旧条约的内乱条款尽管在文字上不见了，但藤山外相在国会解释说，这包括在第三条“对日本安全……的威胁”中的“间接侵略”里面，即驻日美军可以出动镇压革命内乱，这点同旧条约实质上还是相同的。根据条约第六条（美军驻扎日本和设置基地权）签订的关于驻

日美军《地位协定》是代替旧条约《日美行政协定》的，它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部队的地位协定和关于关税及审判权的规定是相同的，尽管废除了美国军人、军队文职人员及其家属的治外法权。但在北大西洋公约地位协定中没有而在旧行政协定中有的、关于美军可以优先使用铁路、电信等日本政府所有、管理和统辖的公用事业和公共劳务的规定，原封不动地为新地位协定继承了下来。

即新条约原封不动地承认了旧条约中美国享有特权的基本部分，另外新增加了军事同盟的性质，因而日本人民和日本民族被更紧地绑在美帝国主义的战车上，置于比以前更加危险的境地。然而在统治阶级看来，由于缔结了新条约，他们便有了军事挡箭牌，就可以依靠美国的军事力量对美国侵略朝鲜、中国和东南亚更积极地起作用，以便实现它本身的侵略和扩张野心。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日本统治阶级才热切地希望修改“安全条约”，并且终于实现了它们的愿望。

中国始终注视着日美修改“安全条约”的谈判。《人民日报》从1959年4月16日到同年11月27日，发表四篇社论，揭露这次谈判是美国企图利用日本把它当作其侵略亚洲的“马前卒”、“一着棋子”；同时日本统治阶级则企图“利用美国”实现其“潜在的帝国主义”的野心。10月22日社论指出：日美谈判结成了日本对美从属的同盟关系，社论中还使用了“这两个帝国主义的同盟关系”（见世界知识出版社：《日本问题文件汇编》第三集，第82页）一词。条约刚一签订，1960年1月14日中国外交部就发表“声明”，其中有如下一段话：

“中国政府不能不严正指出”，“日美军事同盟的签订，标志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标志着日本已经公然参加美国的侵略性的军事集团。”（载《日本问题文件汇编》第三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16页）

稍后，于4月16日发行的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红旗》杂志发表了编辑部写的、题为《列宁主义万岁！》的长篇论文，严正批判现代修正主义。其中关于日本下列一节值得注意。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各国在十几年来一直在扩军备战，而在第二次大战中被战败的西德日本两国军国主义，在它们原来的敌人美帝国主义者的帮助下又再起了。这两个帝国主义跑出来参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争夺，现在重新在大谈特谈它们的‘传统友谊’，正在进行所谓‘以华盛顿为起点的波恩——东京轴心’的新活动。”^①（《列宁主义万岁》，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页）

我引用这些话并不是想以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有把日本称作“帝国主义”这样的提法为根据，说新《日美安全条约》是日本帝国主义复活的表现，而是想介绍一贯强调日本从属于美国，把日本人民反对“安全条约”的斗争称为“反美爱国”斗争的中国共产党机关报的社论，不仅认为在修改“安全条约”的谈判中贯彻了美国的意图，而且认为也贯彻了日本垄断资本的侵略和扩张的意图。

第五节 重温“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

在岸内阁期间，与修改《日美安全条约》谈判的同时进行了“日韩会谈”。在1951年9月《旧金山和约》签字后不久便在美国的指挥下开始了“日韩谈判”。美国为了让日本协助其侵朝战争，企图让“独立”的日本根据“自发的意志”“援助”南朝鲜。为此，“日韩”

^① 引自日本共产党发行的《世界政治资料》第98号译文《列宁主义万岁！》。光冈著：《中国的日本军国主义论》中也引录了上述一段话，两者译文稍有不同。但“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等词的用法完全相同。

之间必须建立邦交，于是美国便“撮合”双方进行复交谈判。经过1951年10月的预备谈判，1952年2月开始了第一次正式会谈。

然而日方是否真有诚意达成协议是值得怀疑的。1953年10月第三次“日韩会谈”时，日本代表大放厥词，说什么在日本缔结和约之前，南朝鲜擅自独立是非法的；日本统治朝鲜，给朝鲜带来好处，并非掠夺等，完全是一派旧帝国主义意识的高压狂言。南朝鲜方面非常气愤，要求日方撤回发言，日方置之不理，致使进行了两周的会谈决裂。自此“日韩会谈”中断将近五年。

在这五年间，日本垄断资本主义得到恢复和发展，并已超过战前。南朝鲜因1950年到1953年的战争而疲敝，社会和政治严重不稳；而北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复兴和发展十分惊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变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越南人民打败了美国支持的法国帝国主义，在北越发展了社会主义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南越，人民对美国及其傀儡政权的斗争也有了新的发展。对此，美国策划使日本、台湾和南朝鲜勾结起来，同已经建立的东南亚军事同盟联结在一起，以期加强对东亚的统治和对中国的包围圈。因此，美国认为，“日韩”不建立邦交是不行的，而且必须让日本支持南朝鲜的傀儡政权。岸内阁一成立，便大力对它进行工作，让岸内阁赶紧重开“日韩会谈”。梦想重新侵略亚洲的岸内阁紧跟美国的指挥棒，于1957年12月的最后一天，日本和南朝鲜发表共同声明：日本放弃对南朝鲜的财产请求权^①的主张，重开“日韩会谈”。从1958年4月起开始第四次“日韩会谈”。日方首席代表泽田的那个露骨的帝国主义的发言前面已经谈过。这时仍未达成协议，1959年6月谈判再度中断，同年8月，又因美国大力干预而重开。但1960年4月，南朝鲜学生领头的反对李承晚的斗争激化起来，

^① 日本对“韩”财产请求权：即原在南朝鲜的日侨对发还旧有财产的请求权。
——译者

李政权垮台，“日韩会谈”也中断了。

之后不久，1960年6月，岸内阁在人民反对“安全条约”的斗争中倒台，池田内阁组成，10月开始第五次“日韩会谈”，这次于1961年5月也因南朝鲜政变而流产。此后不久，同年6月，池田首相访美，肯尼迪总统迫使日本尽快就“日韩会谈”达成协议。美国发生美元信用危机，不得不削减对南朝鲜的“援助”，因此肯尼迪打算让日本来接替美国。在南朝鲜，在美军支持下利用政变取得政权的朴正熙总统，为了从日本得到美国减少的那部分援助，热切希望“日韩会谈”早日达成协议。而日本垄断资本已经具有满足美国和南朝鲜要求的经济力量，并企图把对南朝鲜的“援助”当作对其进行新殖民主义扩张的第一步。于是从1961年10月起开始了第六次“日韩会谈”。这次日方的首席代表人选不再象前几次那样的职业外交官，而是财界元老杉道助（杉病死后，仍从财界遴选了高杉晋一）。这表明在“日韩会谈”中日本垄断资本的经济扩张要求占了很大分量。

第六次“日韩会谈”进行得很顺利，1962年10月实际上已就最大难题达成协议，但由于南朝鲜人民反对卖国的“日韩会谈”、反对朴政权对日屈从的斗争有了发展，1964年4月再度中断，12月池田首相因病辞职，接替池田的佐藤内阁重开第七次“日韩会谈”（这时美国对两国都施加了压力），1965年6月，全部达成协议，签署了《日韩基本条约》等一系列条约和协定，同年11月生效。

第七次“日韩会谈”与美帝国主义迅速扩大侵越战争、1964年8月制造北部湾事件、1965年2月开始疯狂轰炸北越并开始向南越急剧增加地面部队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为了这次战争，美国于1965年1月让南朝鲜派二千名南朝鲜军前去越南（后来增加到五万人），佐藤内阁给南朝鲜相当于派兵费用的二千万美元的“紧急援助”。随着美国在越南的危机的加深和南朝鲜向越南

派兵速度的增加,加快了“日韩会谈”妥协的进程。

从“日韩会谈”的上述经过可以看出:第一,始终是在美国的指挥下,根据美帝国主义侵略亚洲战争的需要进行的;第二,是随着日本垄断资本向南朝鲜扩张的实力和野心的增强而进展的。

《日韩基本条约》规定:“大韩民国政府”,“如联合国大会第190号(III)决议所表明的,是朝鲜唯一的合法政府”,从而否认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日韩”双方“将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而紧密合作”。南朝鲜方面理解:这是约定当驻南朝鲜“联合国军”(即美国军队)“为维护和平与安全”而进攻以致越过三八线时,日本也将与之合作。南朝鲜驻日大使和南朝鲜外务部长官在签字前后露骨地谈到这一条约的军事性质。日本对南朝鲜的对日请求权所付的款额和有偿、无偿的经济“援助”总额达八亿美元,为日本垄断资本对南朝鲜进行经济侵略开辟了道路。第七次“日韩会谈”的日方首席代表高杉晋一于1965年1月7日在记者招待会上曾坦率地表明:他是为了使日本能够“用这笔钱(请求权款额)进行符合韩国国情的开发合作”,才出任首席代表的。实际上,此后日本垄断资本对南朝鲜的扩张是惊人的。

1964年,日本向台湾的扩张也是划时期的。这年1月,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蒋政权与法国断交,地位更加不稳;2月,池田内阁派遣前首相吉田茂以“个人”名义访问台湾,“改善”日台关系,表明了日本支持蒋政权的态度。接着5月,吉田得到首相谅解,以个人名义给蒋介石写信,保证日本不使用日本进出口银行贷款对中国进行延期付款出口,即池田内阁重新拉紧已经放松了的对中国贸易。无疑这是美国在背后施加了压力。于是日本政府与蒋政权的关系便很快得到改善。

接着,7月,大平外相访台,8月,蒋帮总统府秘书长张群访日,与池田首相以及自民党和财界的领导人商谈增进日台之间的

“友好”关系。

佐藤内阁组成后，1964年底，在台北召开了“日华”协力委员会，日本以前首相岸信介为团长，有垄断资本的代表参加，商谈台湾方面要求日本提供一亿五千万美元的贷款问题，政府于1965年4月正式签订提供贷款协定。美国以保卫美元为理由，从这年起停止了对台湾的“经济援助”，因此便由日本来代替了它。以此为转机，日本的商品和资本迅速向台湾扩张。1965年底，三井银行董事长佐藤喜一郎任团长，石川岛播磨重工业公司总经理等很多垄断资本家代表参加了“日华”协力委员会。

美国侵越战争逐步升级，到1967年底投入美军达五十二万人，南朝鲜派兵五万人，东南亚的傀儡政权被迫也都出了兵。除核武器外，美军使用了所有最新武器，恣意进行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大战争，推行了杀光政策。尽管如此，不仅没有战胜南北越的人民战争，而且日益深陷泥沼，被赶进穷途末路。在这次战争中，日本的冲绳被当作最重要的美军基地，本土也作为美国核潜艇和第七舰队的基地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工业则成为美军补给的重要来源之一。佐藤内阁和垄断资本除了没有派遣日本军队外，在其他一切方面对美国进行了全面合作。

佐藤首相于1967年6月到7月访问了南朝鲜，在汉城同朴总统、美国副总统汉弗莱、蒋政权副总统严家淦进行会谈；9月在台湾同蒋介石等人会谈，之后回国，不久又历访了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老挝傀儡政权；又于10月8日，第二次访问东南亚，其最后日程是访问南越。在学生和青年工人企图用实力阻止这次“佐藤访越”的第一次羽田机场斗争中，京都大学学生山崎博昭被机动队汽车碾死。佐藤首相这一连串访问外交，是为了同从南朝鲜和台湾起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止的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亲美政权一致协助美国的侵越战争，同时企图在美国的总指挥下，为复活

以日本为其亚洲总管的“大东亚共荣圈”铺平道路。结果他 11 月访美，14、15 日两天同约翰逊总统会谈，16 日发表了共同声明。

在声明中明确指出：日本必须加强对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为此日美一致认为，“今后进一步密切协商”，“同意创造一种使亚洲国家不受中共威胁的环境是重要的”（加强敌视和包围中国的政策）；日本对美国侵略越南进行全面合作，“日本准备对亚洲的和平与稳定作出积极贡献”，美国将把冲绳和小笠原的行政权归还日本，这“对保障日美两国的共同安全是有利的”；日本将协助美国保卫美元，推进贸易及其他国际交易的自由化；日美还将为促进宇宙开发、海洋开发、原子能和平利用，进行科技合作。

也就是说，日本将在美国的指挥下，拉拢东南亚各国，对那里进行新殖民主义的扩张，同时加强对美侵越战争的全面支持，进一步推行包围中国的政策，不断加强日美军事同盟，归还冲绳和小笠原的行政权也是作为其一环提出来的，今后还要协助即从属于在危机中挣扎的美国经济政策。这里可以看到，同十年前 1957 年佐藤的亲哥哥岸信介以首相名义两次访问东南亚，要求美国同意和支持日本向东南亚扩张而被拒绝时大不相同，虽然都是对美从属，但是日本在东南亚的实力增强了，对美国的地位提高了。

其根本原因在于：这十年间，日本垄断资本取得惊人的扩大和加强，日本、西德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等的经济有了发展，而相反的是，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相对下降；美国因在全世界到处镇压反帝民族斗争和支持傀儡政权急剧增加了开支，尤其是越南战费的激增，加深了财政困难和美元危机。这些情况体现了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

这里应该简要地概述一下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国民生产总值从 1958 年的十一兆五千一百八十二亿日元增长到 1967 年的四十三兆一千一百六十七亿日元，增加了接近三倍；同期国民

净产值也由九兆四千二百三十五亿日元增加到三十四兆五千九百三十九亿日元，出口额由二十八亿七千六百五十六万美元增加到一百零四亿四千一百五十七万美元。1967年以后由于对美国以及南朝鲜、台湾和东南亚的出口不断激增，到1969年出口总额达一百六十亿美元。现在几乎每天从各方面都能听到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的赞扬声。

日本自1967年以来，以贸易收支的巨额盈余为基础，国际收支固定保持盈余。而且在资本收支方面，自1965年以来，支出超过收入，日本由依赖外资的债务国变为债权国。据1970年7月3日《朝日新闻》载：“我国的国际收支在黄金、外汇储备额达二十亿美元的十年前，即使扣除外汇储备也还有近三十亿美元的赤字”，但到了1969年底变为三十二亿七千万美元（估计数）的盈余。这种资产的增加主要来自短期资产的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出口信贷、日元贷款以及其他长期资产也达六十五亿四千万美元，超过了长期债务（外国人的直接投资、外债、借款、证券投资、延期付款和被占领下美国“援助”资金的未偿还余额的合计）六十亿一千二百万美元。在资本输出中，近年来对南朝鲜和东南亚的比重激增。关于其投资的领域，今川瑛一著：《日本经济在亚洲的扩张》（日本《世界》杂志1970年11月号）一文谈得很详细。

日本近年来出口急剧增加，这是由于包括越战“特需”采购在内的对美出口的激增和对美国的政治、经济势力范围的南朝鲜、台湾、东南亚国家，尤其是参加侵越战争的国家的出口的激增所造成的；进口贸易对上述国家和地区的依赖也是最大的。这些情况表明，日本经济对美依赖程度仍然很深，即仍然继续跑在占领下美国铺设的轨道上。

尤其是日本经济是作为美国侵略亚洲的“远东工厂”，被培植成为高度的重化学工业国。但日本国内几乎没有石油、钢铁等重

化学工业和动力工业的基础资源，在取得原料方面要绝对依赖美国及其势力范围。而且由于美帝国主义及受其指挥的历届日本政府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日本同中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贸易受到严重限制，从而使日本在原料方面要绝对依赖美国及其势力范围。

日本垄断资本向东南亚的扩张，在确保原料资源上并没有达到它的迫切愿望，美国及欧洲垄断资本居压倒优势。日本垄断资本在东南亚也只能在日美合作和对美从属的框框内进行扩张。“如在印度尼西亚，美国主要进行资源开发，日本则进行商品援助及对当地政府的资金援助，再就是向制造业、运输、通信和电力等领域进行扩张。而日本则进口美国开发的原料。即日本只有以这样的形式帮助印度尼西亚的亲美政权，使其‘稳定化’，才能得到印尼的原料”（前引今川瑛一论文）。

这些情况表明日本经济对美国的依赖和从属极其深重。那末，日本经济在世界上的地位，现在受美国剥削的一面依然是主要的呢？还是日本垄断资本向南朝鲜、台湾等东南亚地区扩张，近年来又在加强对非洲的扩张，剥削这些国家的一面是主要的呢？如果这样提出问题，谁都会回答说剥削的一面是主要的。即日本在经济上一方面依赖和从属于美国，同时今天又正是靠这种作法变成世界上第一流的剥削国家。即便极力主张日本经济是从属于美国的中国的看法，1969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的报道也承认：“日本反动派正在加速复活军国主义。”“日本反动派已经挤进世界上最大掠夺者和剥削者的行列。”于是日美垄断资本之间的市场和资源争夺战迅速激化，这直接表现在日美纺织品谈判上。有人说由于“自由化”，日本经济的对美从属愈来愈严重；日本垄断资本弱小时，日本政府一直拒绝“自由化”，那末既然强大了，不就应该接受美国自由化的要求了吗？日本经济弱小时有拒绝“自由化”的力

量,也就是说那时从属程度低,而经济一旦发展,从属程度反而高了,这种说法,我是无法理解的。

第六节 帝国主义与军国主义

最近日本一直在不断增强军备。据今年(1970年)10月政府公布的第四次扩军计划,从1972年度起五年间,将投入五兆八千亿日元的巨资,即大大超过警察预备队建立以来二十年间重整军备的军费总额,努力“保障我国及其周围的海域和空间的制空和制海优势”(《防卫白皮书》),即企图确保超越国境的制海权和制空权。武器、飞机、船舶以及其他装备,几乎都已经不依靠《共同安全法》援助而是靠国产的东西来装备。不过,其生产技术仍绝对依赖美国,并完全按照美国的规格来制造。这与自卫队作为对外战争的军队完全从属于美军和最高指挥权实际上操在美国手中是相适应的。即这种军备对外是在美帝国主义的指挥下的旨在侵略亚洲的军备,但这种侵略也是日本垄断资本所要求的。日本垄断资本的政府,可以不受美国的指挥自由使用作为统治日本人民的武装力量的自卫队,因此,不能忽视自卫队是日本统治阶级的军队的这种性质。

于是依附于美国、并加快了对亚洲进行经济和政治扩张步伐的佐藤首相,1969年11月同美国总统尼克松会谈,约定自动延长1970年6月到期的“安全条约”,同时还说“韩国的安全对日本本身的安全来说是要紧的”;“维护台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对日本的安全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日本将寻求其对印度支那地区的稳定所能起到的作用”;日本将与南朝鲜、台湾和印度支那的傀儡政权共命运。佐藤还就《日美安全条约》第四条关于驻日美军出动的事前协商条款约定,一旦美国提出协商,日本的回答将是“迅速向前

看”。这就是说马上同意美军出动。

中国战后一直注视和批判日本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复活的可能性、征兆及其发展的各个阶段；当1960年修改“安全条约”时便断定日本军国主义已经复活，那时就使用了“日本帝国主义”这种提法，这点前边已经讲过。1965年2月《日韩基本条约》草签以后，中国便更加激烈地谴责日本军国主义。1967年9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谴责佐藤访问台湾说：“日本军国主义在美帝的扶植下，已经死灰复燃。”它企图“重温‘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佐藤的所谓‘共处’，不就是东条英机的‘共存共荣’的同义语吗？不同的是，当年东条实行的是日本帝国主义自己的侵略政策，而现在的佐藤反动政府则是仗美帝之势，进行侵略和扩张，充当美帝在亚洲的一名凶恶的侵略爪牙。”（载1967年9月10日《人民日报》第五版）

从此以后，中国的论调如前引文所见，特别强调日本军国主义受美国扶植、依靠美国、充当美国的爪牙。同时经常明确指出，日本反动派和垄断资本也在追求本身的利益。1968年4月22日《人民日报》的“时事述评”，在论述《日本反动派在亚洲的经济扩张》中谈到：“日本反动派疯狂地对外进行新殖民主义扩张，这是它的帝国主义本性所决定的。”（《日本反动派在亚洲的经济扩张》，载《人民日报》1968年4月22日第6版）

这年11月发表了上述佐藤·尼克松联合声明后，中国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谴责更加严厉。1970年4月，中国和朝鲜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说：“美帝国主义是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是世界各国人民最凶恶的共同敌人”；同时说：“在美帝国主义的积极庇护下，日本军国主义已经复活，成了亚洲危险的侵略势力。它以美帝国主义为靠山，与美帝国主义狼狈为奸，妄图重温‘大东亚共荣圈’的旧梦，公然走上了侵略亚洲的道路。双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

(见 1970 年 4 月 9 日《人民日报》)

在这一“联合公报”的影响下，不论在日本国内，还是在亚洲反帝势力中间，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批判突然高涨起来。而日共等却说：日本没有征兵制；宪法规定不能向海外派兵；在国家预算中军费的比率只占一成左右，以此为理由，认为日本军国主义正在复活，但尚未“完成”。

何谓军国主义？恩格斯 1887 年 2 月在《给巴黎国际友谊节组织委员会的信》中说，欧洲面临着战争的危險，其“真正原因”是什么呢？“是军国主义，是在大陆各大国施行了普鲁士式的军事制度。”各国施行了普鲁士式的全民皆兵义务和征兵制的军事制度，根据这个“由于有弹性所以能大大扩张”的制度，各国全力以赴地相互进行了扩军竞赛。恩格斯称此为“军国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1 卷，第 393—394 页）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第二篇第三章《暴力论(续)》中也说过：普法战争以后，欧洲大陆上的一切大国采用“普鲁士式的后备军制度”，“军队变成了国家的主要目的，变成了目的本身；人民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当兵和养兵。军国主义统治着并且吞噬着欧洲。”（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 1970 年版，第 167—168 页）

日共说全民皆兵和征兵制度在日本尚不存在，所以说军国主义的复活尚未“完成”，这在理论上或许是根据以上引用的论文。然而，尽管没有征兵制度，正如 1963 年揭发出来的《三矢作战计划》所表明，日本统治阶层在美国的指挥下，不是已经准备了设想重新发动侵朝战争，在开战同时马上建立起完整的战时法西斯体制的蓝图吗？1967 年在滋贺县发现他们竟然命令市町村当局秘密制定了适合战时参加自卫队人员的名册。今天由于行政机能高度发达，一旦政府断定实行征兵制时机到来，马上就会施行。应该记

得，连志愿兵制的警察预备队，在接到麦克阿瑟的建队指令后的第四十五天便很快地建立起来了。

还有，尽管日本本身的军事力量还很弱，但日本的对外军备是作为日美“安全条约体制”而存在的。佐藤和尼克松联合声明供认，现在这个体制眼看就要进攻朝鲜和中国。根据“第四次扩军计划”所进行的突飞猛进的扩军工作也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比恩格斯所说的欧洲被军国主义控制着更加危险的情景，不是已经在日本出现了吗？

列宁在谈到二十世纪的军国主义时说：

“现代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结果。它的两种形式是资本主义的‘活生生的表现’：一种是资本主义国家在发生外部冲突时所使用的军事力量（如德国人所说的《Militarismus nach aussen》^①），一种是统治阶级用来镇压无产阶级各种（经济的和政治的）运动的武器（《Militarismus nach innen》^②）。”（列宁：《好战的军国主义和社会民主党反军国主义的策略》，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166页）

根据列宁的这段话，“现代”即二十世纪的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这时是指垄断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是一种好战的反动体制，它有两个侧面，即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战争所使用的军事力量和在国内实行阶级统治的武器。日本已签订了侵略性的《日美安全条约》；建立了迅速增强的并且一味加强镇压国内革命运动训练的自卫队；拥有了自1954年以来逐年得到加强的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的警察机构；在教育各个角落都完成了反动的重新编制；侵略而好战的意识到处泛滥；议会民主主义早已形同空文；所谓司法独立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最后的假面具也毫不吝惜地抛弃了（请看最

① “Militarismus nach aussen”系“对外军国主义”之意。——译者

② “Militarismus nach innen”系“对内军国主义”之意。——译者

近的福岛审判官公诉问题)。在这样的军事和政治体制的基础上，日本既然存在着不断谋求对外扩张、高度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对外怎能不实行军国主义呢？1960年新《日美安全条约》凭暴力镇压全国人民的反对（当时发展到甚至准备出动自卫队）强行通过议会时，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就已经“完成”，之后日益加强，1969年11月佐藤和尼克松联合声明宣布，这个军国主义在美帝国主义的指挥下，现在已经作好随时进攻朝鲜、台湾、越南和东南亚的准备。

尽管如此，日共等还认为日本军国主义没有复活，其最后论据是说日本在军事上和政治上从属于美帝国主义。其前提在于：他们错误地断定，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既然从属于一个比它更强大的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它自己就不可能成为军国主义。但是，在中日甲午战争时期，日本也是从属于欧美强国；众所周知，日俄战争时日本唯有同英帝国主义结成同盟，依靠其财政的和政治的援助来进行那次战争，当英美帝国主义反对日本继续进行战争时，日本就停止了战争，而对俄媾和的条件也只能限定在英美帝国主义同意的范围内。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日成首相在朝鲜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说：“日本军国主义在历史上就惯于投靠大的帝国主义势力而侵略别的国家。”（金日成：《1970年11月2日在朝鲜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作的中央委员会工作总结报告》，载《新华月报》1970年11月号，第209页），这是曾经被日本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当作首要侵略对象，今天仍然被复活了的日本军国主义当作首要侵略对象的朝鲜民族，根据历史的经验得出的正确结论。

1920年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日本垄断资本主义在战争中发了横财，刚由债务国变为债权国，即使在当时，列宁在同年7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中，作为“极少数富强的国家”，就列举了“英、美、日”，同时他谈到下面一段话：

“日本过去虽然能够掠夺东方各国、亚洲各国，但是，现在没有别国的帮助，它无论在财政上或军事上都没有独立行动的能力。”（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198页）

参与论战的人会说，“可是”，今天日本同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以及1920年的情况不同，继长期被占领之后，美帝国主义一直驻扎着军队，不仅凭“安全条约”，而且在军事实力方面也从属于美国，因此日本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发动侵略战争，不仅财政上和军事上力量不足，连单独下定战争决心也是不可能的。

的确，日本统治阶层是不能单独下定发动侵略战争的决心的。他们在世界政治中能够违反美国的意志单独行动的幅度是很窄的。尽管如此，象鸠山内阁还是实现了美国所不喜欢的日苏邦交的恢复，只要想干也是能够做到的。还有，日本统治阶层今天是根据日本垄断资本主义本身的、自主的内在要求拼命向海外扩张的，而不是受美国唆使才去这样干的。

尽管美国实际上掌握着自卫队对外战斗力的指挥权，而且它是根据麦克阿瑟的命令作为警察预备队建立起来的。它向保安队、自卫队的改编和加强也是在美国的“援助”和指导下进行的，但是，日本垄断资本却以占领军的命令为幸运，凭它自己的要求开始重新武装的，是利用了美国的要求和“援助”使军备增强起来的。当时连吉田内阁都坚持“防卫力量渐增”的主张，力争使之适应自己的经济实力和政治目的，并不都是唯美国之命是从。自卫队不只是受美国指挥，也是日本垄断资本统治日本人民和向海外扩张的军事力量。

还有，日本经济的对美依赖，如前所述，在市场和取得原料方面也是绝对的。然而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旧日本帝国主义，1930年美国一国就占日本进口的百分之二十八点七、出口占

百分之三十四点四，其对美的依赖程度毋宁说比现在还高。重化学工业原料，过去日本除燃料煤以外也几乎什么都没有。不过，当时美帝国主义对世界经济的支配能力没有达到现在的程度，因此日本对美国一国的依赖程度比现在低，但石油和废铁是绝对依赖美国的。

当讨论到日本军国主义的经济问题时，与其看它在市场、原料和资金方面对外国依赖程度的高低，莫如区别日本基本上是被剥削国还是被剥削国。在这个问题上，今天日本尽管没有象过去那样的殖民地，但已经说过，它仍然是个剥削国。正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和扩大对其他国家和其他民族的剥削，日本统治阶层才从属于美国，依靠进攻性的“安全条约”，进行扩军备战。

也就是说，对美从属不能成为否定日本垄断资本军国主义复活的论据，它只能规定其军国主义的特点和在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地位。

结束语——从属帝国主义论

我在上节集中谈了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问题。它是以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恢复和发展为基础的，是其必然产物和“活生生的现象”。既然如此，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不应把包括其经济基础在内的现代日本定为帝国主义的理由。不论试取列宁“帝国主义”概念的任何一个例子，都没有不适用于现代日本的。在前面反复引用的中国文件中，也屡称日本为“帝国主义”。

然而在中国，在前面引用过的 1968 年 4 月 22 日的《人民日报》时事述评中写道，日本的“新殖民主义扩张”，是“由它们（日本反动派）的帝国主义本性决定的”（《人民日报》1968 年 4 月 22 日第 6 版。），而在此以后的文件中，则单提日本帝国主义，显然是有

意回避“帝国主义”这一词。今年4月的中朝联合公报和自此以后的中国要人的发言以及《人民日报》等的社论,据我所知,日本帝国主义的提法,只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以前,而谈到今天的日本时,则一定提军国主义,在与美国并列时,则提“美帝国主义与日本军国主义”、“美日反动派”。这种区别是极其严格的。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要人和劳动党机关报,同样称日本为军国主义,一般不提“帝国主义”,但在把美国和日本并提时,有时也称“美日帝国主义”。例如今年4月5日金日成首相在欢迎中国周恩来总理的正式宴会上的讲话中,最后提到“美日帝国主义更加明目张胆地进行侵略和战争阴谋活动”(金日成:《在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的宴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1970年4月6日第二版)。再如1970年11月2日金日成总书记在朝鲜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的国际关系部分中,把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揭露和防备当作一个重点,他说:

“对日本反动统治阶层不能抱有任何幻想和期望。垄断资本在国内膨胀就要走上向海外侵略的道路,这是帝国主义不可改变的规律。日本垄断资本已经大大膨胀,并已再次建立了自己的统治权。正是在日本垄断资本的这种复活及确立其统治体制的基础上,日本军国主义正在推行重新武装和向海外扩张的政策。”(前引《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作的中央委员会工作总结报告》,载《新华月报》1970年11月号,第210页)

就是说,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是基于“帝国主义不可改变的规律”。还有朝鲜驻中国大使玄峻极,同年7月27日在庆祝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十七周年的宴会上,招待中国要人时讲话说:

“最近美帝国主义和朴正熙傀儡集团举行的‘国防部长级会议’,以及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傀儡集团、朴正熙傀儡集团搞的

所谓‘联络委员会’的反共同盟等等，这些都如实地表明美日帝国主义者为了侵略朝鲜、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多么疯狂。”（载《人民日报》1970年7月28日号）

朝鲜国家领导人并提“美日帝国主义”的例子，此外还有一些。

对照之下，中国领导人决不提“美日帝国主义”。究竟什么原因，我不清楚。同年8月，木村禧八郎访问中国，问中国的中日友好协会常务理事徐明，中国为什么不称今天的日本为帝国主义？徐明以“个人意见”回答说：

“帝国主义还是军国主义，在制度上没有多大区别。例如我们……曾把东条的军国主义日本不叫军国主义而叫日本帝国主义。那末，是不是不能把今天的日本叫帝国主义呢？也不妨叫做与过去不同条件下的帝国主义。可是把今天的日本同美国相提并论都叫帝国主义，则恐怕会使人们对其从属于美国的一面的关心淡薄起来，从而削弱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和抗美援朝，并有使斗争后退之虞。”（木村禧八郎：《中国如何看待日本？》，载日本《经济学人》杂志临时增刊，1970年10月号）

徐明同年8月在回答第六次学生访华参观团提出的日本的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有什么不同的问题时，他说：“不应该从定义出发而应该从实际出发”，“主要的问题不是如何区别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而在于美帝是不是（日本人民的）主要敌人，是否把反美当作主要任务。也就是说，是提出反美、反垄断、反日本军国主义的口号，还是放弃反美口号的问题。”（同上）

因此，徐明认为从明确日本从属于美国和日本人民的抗美援朝的决定意义这一“实际出发”，还是不提日本帝国主义复活为好。如果只是提法问题，把日本“不妨叫做与过去不同条件下的帝国主义”，因此在这个范围内，如果明确“与过去不同的条件”即从属于美国之后，不也可以说是认为帝国主义复活了吗？

我为什么要抓住“帝国主义复活”的提法不放呢？因为我考虑重要的是应该首先明确今天日本的侵略主义和军国主义具有日本垄断资本主义这一社会经济结构（其本身列宁就称作帝国主义，对凡尔赛和约体制下的德国就称作帝国主义）的必然产物的一面。站在对美从属的帝国主义（如果愿意叫军国主义也可以）最前列担负领导的是亲美垄断资本家，他们把民族利益出卖给美帝。这种帝国主义或者军国主义的基础是，把日本垄断资本分为亲美和非亲美（包括反美）两类，其中不仅是亲美垄断资本，而是垄断资本主义结构本身就产生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并且有亲美和非亲美（反美）之别，亲美垄断资本掌握着领导权。反美垄断资本“主张从美帝的从属下挣脱出来，独立自主，在亚洲与美帝争夺霸权”（徐明对上述学生参观团的谈话），即已经清楚说明在日本不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希特勒式的独立的帝国主义。但我认为只要日本走帝国主义道路，对美从属是必然的，完全摆脱美国的帝国主义将来也不会有，现在的从属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无疑也是以垄断资本主义为基础的。

今天的日本只要走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道路，对美从属就不可避免，这不只是因为和被占领下的七年间以及由《旧金山和约》和“安全条约体制”铺下了这样的轨道，它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中国及其他革命后的世界，特别是在亚洲的帝国主义势力与反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的力量对比所决定的。这个问题另找机会再谈。

因此，日本人民一方面受本国垄断资产阶级的直接统治和掠夺，受军国主义的驱使，同时又通过垄断资产阶级受美帝国主义的统治和掠夺，受（美国）军国主义的驱使。不仅如此，如果从冲绳县人民的情况来看，则一目了然，日本人民还直接受到美帝国主义的压制。同时，日本统治阶级在美帝国主义指使下，压迫和剥削着南朝鲜、台湾和南越等东南亚民族。因此，具有这样一个统治阶级

的日本民族,也是压迫民族。日本统治阶级的对美从属,听起来似乎矛盾,它使日本民族变成了压迫民族。我把现代日本叫作从属帝国主义的第二个理由是因为我考虑搞清这一现实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篇 日本帝国主义复活的若干问题*

今天(1969年)的日本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是第一流的高度发展了的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对这种观点谁也不会有异议。

然而在这种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上建立的政治结构是否是帝国主义呢?关于这个问题现在仍有几种对立的看法。有人认为日本已经实现了帝国主义的独立;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日本垄断资产阶级正走在帝国主义复活的道路上,但还没有复活,它从属于美帝国主义,是其“从属的同盟国”。而我本人则认为日本的国家权力已经被帝国主义化了的垄断资产阶级掌握着,但其权力却从属于美帝国主义。

我曾经在《中央公论》1955年6月号发表的《鸠山内阁论》中认为:这个内阁正在积极追求已经完全复兴了的日本垄断资本的帝国主义独立;接着又在该杂志1956年12月号上把当时的岸信介内阁看成是企图借助对美从属加速复活日本帝国主义的内阁。

* 这是登在月刊毛泽东思想社编辑发行的《月刊毛泽东思想》杂志1969年12月号上的一篇论文。原题为《围绕日本帝国主义“复活”的若干问题》,在重新收编时将“复活”的引号去掉了。发表这篇论文当时,在日本的毛泽东思想派中间压倒多数的意见是虽然承认日本军国主义已经复活,但不论在什么意义上讲都不承认帝国主义已经复活(即使在今天这种人也占多数)。因为这篇文章主要是写给毛泽东思想派的成员看的,所以原文用了带引号的“复活”。但这本书是面向一般读者的,加了引号反而可能引起误解。

在这篇论文中,我第一次正式发表了“从属帝国主义”的观点。一年多以后,我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人文学报》的论文,即本书的第一篇论文《现代日本帝国主义与军国主义绪论》中,更加详尽地发挥了这一观点。

第二次《日美安全条约》通过议会的两年后，我在1963年7月发行的岩波讲座《日本历史》的《第四册现代部分》中登载的论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与日本》里面谈到：“现代日本不仅是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垄断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了的、金融寡头制统治着的国家，……而且已建立起帝国主义上层建筑。然而这个帝国主义被绑在美帝国主义的战车上。”我也知道这种从属帝国主义的说法遭到了攻击，说它本来是同帝国主义的概念不相容的，是一种称不上什么理论的折衷主义。但至今我仍然认为没有必要改变这种说法。以下我谈谈我的理由，希望大家批评。

—

不言而喻，现代日本的经济是高度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首先想将它同战前作一比较来证实它的特点。

(一) 战前的日本经济，无论根据怎样保守的说法，都会毫不含糊地说，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垄断资本主义就占了统治地位。尽管如此，还广泛存在着寄生地主制，它在农业方面仍然是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显而易见，地主的土地所有形式是资产阶级的私有制，但在这种土地上进行的农业生产则是一种以分散的小农家庭劳动为主的、旨在维持农家生活的经营方式，而不是赚取资本主义利润的经营方式。在这种经营方式下，全部剩余价值作为实物地租被地主掠夺去，农民手中不可能留下利润。然而在富裕中农和富农中，已经产生资本主义经营的萌芽。他们经营的耕地，包括自耕地和佃耕地约在一町五反^①以上。而且一般说来，资本主义和半封建的寄生地主制之间的矛盾逐年扩大，地主制衰亡的历史趋势是摆脱不了的。然而，地主制却在战时国家垄断资

^① 町和反(一作“段”)：是日本的面积单位。一町=0.992公顷；一反=991.7平方米。——译者

本主义下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农业经济制度继续保存下来。尽管垄断资本利用税收、价格剪刀差和战时征购制度等也直接剥削农民，但是农民的主要的直接剥削者是地主阶级。而且地主从农民身上掠夺的高额地租，与资本家强加给工人的低工资是相互补充、相互依赖的。

在战前，日本内地的就业人口将近一半是农林业劳动者，而且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等资本主义产业工人，大部分也是出身于农民家庭。从父亲那辈就是纯粹的工人并不占绝大多数，即多数工人也还没有完全脱离农村和农户。在这种意义上，日本社会的农民的社会因素还很大。在此基础上，以父亲为家长的家族制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仍占统治地位。

今天，寄生地主制作为经济制度已经没有意义。尽管多少还残存着出租少量土地的地主，但作为阶级势力的地主阶级已经消灭。资本家的以及富农的农业经营受到政府的扶植，不过，它并没有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农业生产方式，小农经营仍居压倒优势。广大农民主要受垄断资本及其政府的掠夺。农业人口今天约占就业人口总数的二成。“农家”户数仍然很多，但大部分是政府统计中的第二类兼业农户，他们的生活与其说依靠农业收入，莫如说主要依靠农业以外的劳动工资及其他方面的收入。

（二）今天和过去大不相同了，地主制已不存在；资本主义是唯一的剥削制度，全国人民都在它的控制之下，而且这种资本主义还完全受垄断资本的统治，同时这个垄断资本主义是以发达的重化学工业为中心的。战前的日本资本主义甚至发展到垄断阶段以后，纺纱、缫丝等轻工业仍占统治地位，女工占工人的半数以上。能够用国产工作母机来操作还是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军需生产变成当务之急以后的事。到了战争期间，日本重化学工业才占了统治地位。

《1932年纲领》，即库西宁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和日本革命的性质》的报告指出：“首先就是日本的轻工业在今天仍然占据优越的地位。这一点决不是近代最新财政资本的特征。”“这一点是日本资本结构的最大特征。”（《共产国际关于日本问题方针、决议集》，世界知识出版社，第36页）事实就是如此。

现在已经不能这么说了。但今天仍然存在着“双重结构”的问题，还有无数资本有机构成程度低的中小企业和零散小企业，尽管它们的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一半，其有机构成比垄断资本大企业低，但其机械化的程度决非战前的中小企业和零散小企业所能比拟的。近年来因劳动力不足，这种情况有进一步的发展。而且战前的中小企业虽然在资金和产品销售方面从属于垄断资本，但作为生产单位多数还是独立经营的。而现在的中小企业，多数则是作为垄断资本的承包企业或者该公司的再承包企业而被纳入体系中，变成了垄断组织的附属企业。也就是说，垄断资本的统治达到了战前无法相比的程度，直接贯串到一切行业的全部企业。

（三）现在的贸易结构也和战前显著不同。战前，日本将朝鲜、台湾和库页岛南部变为殖民地，将中国，尤其是中国东北地区（满洲）变为半殖民地，从这些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掠夺粮食和铁矿石、工业用煤以及其他生产原料运回日本，并从美国、欧洲各国及其殖民地进口棉花、机器和石油等，向美国出口生丝类，向朝鲜、中国和东南亚等地出口棉纱、棉布和杂货等轻工业品。即使现在，棉织品和化学纤维仍然是日本的重要出口商品，但生丝已不是出口商品而且必须进口了。

现在，日本的主要出口商品是钢铁、船舶、汽车、电视机等最新的重工业产品和肥料等化学工业产品；在纤维及其制品中，也以合成纤维和人造丝等为主，棉纱、棉布仅占纤维及其制品总出口额的百分之十五左右（1967年数字）。主要进口商品是粮食（包括饲

料)和原油、木材、铁矿石等重化学工业原料。棉花和羊毛加在一起只占进口总额的百分之七、八。也就是说,这种进出口贸易的商品结构表明,日本已变成一个极高度的重化学工业国家。

进出口的对象国家和地区问题下面还要说。同美国的贸易,进出口每年皆占百分之三十左右;1965年以后向南朝鲜和东南亚,尤其是对参加侵越战争的七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口急剧增加,并超过了美国对该地区的出口。同中国的贸易急剧减少,同战前是没法相比的。贸易对象地区结构,与战前相比发生很大变化,总之,这种绝对依赖对美国及其在亚洲的势力范围的贸易结构,在论述日本帝国主义是否“复活”,是否“独立”时,将成为重要论据,这个问题下面再说。

(四)从资本的输入和输出来看,战前日本从美国和英国等输入资本,同时主要向朝鲜、台湾以及中国大陆,尤其是中国东北地区输出资本。战后日本经济借助美国推行新殖民主义的工具——政府间的“援助”,找到了复兴的机会;之后又利用了美国私人资本的直接投资、世界银行的贷款和引进技术等。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半期起,日本资本开始向海外扩张,1965年以后,海外投资以各种“援助”、向帝国主义国际机构提供资金和私人资本投资等多种形式更加活跃起来。据说1968年度末日本的对外债权和债务的平衡情况是资产超过债务约十亿一千一百万美元,日本现在已由债务国变为债权国。(《日本经济新闻》1969年3月15日)

二

现代日本既然经济上的统治阶级只有资产阶级,垄断资产阶级直接支配到国民经济的每一个角落;当然政治上的统治阶级也只有资产阶级,尤其是垄断资产阶级、金融寡头制完全支配了政治和文化。

过去与资产阶级并存的有地主阶级，依靠这两个阶级并对它们保持相对独立的天皇制掌握着国家政权。能不能象《1932年纲领》^①那样把这种天皇制归结为绝对主义，我最近有些怀疑，我认为至少应该看成是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就转向波拿巴主义（本质上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不久就变成法西斯主义了。然而这不是这里要谈的问题。总之，起源于绝对主义、而且甚至到帝国主义阶段仍原封不动地保持其机构的、以天皇为首的军部和官僚机构，掌握国家权力，为了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利益统治着全国人民，资产阶级并没有直接掌握政权。从1925年到1932年，按照惯例是由在众议院占多数的政党组阁，但那也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暂时地、不完全地掌握了国家权力机构的一部分的政府，没能剥夺军部和官僚，尤其是军部的独立性。

战败以后，日本被美帝国主义占领，到1952年4月一直处于占领军的专制统治之下，在那个时期谈不上日本民族独立的国家主权问题。然而从日本社会内部的阶级关系来说，只有资产阶级通过占领下的各种改革变为唯一的统治阶级，天皇变成没有实权的“日本国的象征”，变成日本资产阶级的王冠。过去的天皇的军部解散了；官僚受占领军指挥，变成为占领军和日本资产阶级服务的行政执行者。而且当时日本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尚未恢复到战前水平；垄断资本主义的结构，尽管没有因战败而遭到破坏，但资本的积聚和集中的程度暂时下降；贸易微不足道（可以说被美国封锁了）；经济上也完全从属于美国。

1952年4月《旧金山和约》生效，日本在国际法上变成了独立国。但同时因签订了美帝国主义强加给的第一次《日美安全条约》，过去的占领军改名为驻军仍然继续赖在日本不走。驻军继续

^① 《1932年纲领》：即1932年3月2日库西宁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和日本革命的性质》的报告，又叫《库西宁报告》。——译者

保持占领军所享有的特权；一旦美国提出要求，日本必须无限制地、无期限地提供陆海空军所需基地，而且基地设施费必须由日本负担；并以防卫分担费的名义，按照美国的要求交付驻军费用；日本的铁路、电信电话和气象有关业务，必须让驻军来优先使用。

从这些情况来看，美军根据“安全条约”驻扎日本实际上是占领的继续。但唯有一点是驻军与占领军绝对不同的，这就是它不再象占领军那样享有直接统治日本国家的无限权力。美帝国主义实际上是让日本在军事上完全从属于美国，即使是日美通商航海条约，也是美国强加给日本的不利的、对美从属的不平等条约。对日本的对外政策不消说是要进行干与的，对国内的统治也随心所欲地进行干涉。日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冲绳县仍继续处于全面的、无限制的占领统治之下。但除冲绳以外，美国对日本的统治不是行使占领权力，而是凭借其帝国主义实力，使没有力量的日本统治阶级从属于它。美帝国主义对日本人民的压迫，也不是象过去那样凭不由分说的占领命令形式，而是一切都必须根据日本国内法，通过日本政府来进行。在“和约”生效三天后的5月1日，被占领军命令停止发行的《赤旗报》，并未得到任何人的许可就重新公开复刊，这是三天前那种占领权力已经不复存在的典型表现，是由名义上和实际上的全面占领，变为名义上的独立和实际上的半占领。

旧金山“媾和”并不是日本人民寻求的真正媾和。尽管如此，由于“媾和”，正象上述《赤旗报》复刊那样，人民在解放斗争方面获得了不同于过去的有利条件。而资产阶级可以比人民更自由地活跃起来。在“媾和”问题提上日程的同时，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争，在战争“特需”采购的刺激下，日本垄断资本主义正式开始复兴。产业活动的综合指数，以战前1934年到1936年的平均值为一百时，到朝鲜战争第二年的1951年底为一百十九点四，翌年

1952年为一百三十一.八。从这年开始，钢铁、电力率先从美国等地引进技术，开始了大规模的设备更新；1952年5月参加了美国金融资本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开辟了从这些金融机构接受贷款的渠道。

到1955年，日本政府以重化学工业为中心，重建了拥有最新设备和远比战前、战争期间的资本构成为高的垄断资本主义；并从这年起，强行推进以更新、更大规模的设备投资为中心的所谓的“高速增长”计划。其资金来源已不再是依靠美军“特需”和美国“援助”，而是主要依靠对日本人民的掠夺——重税、“合理化”、缓慢而确定不移的通货膨胀以及牺牲社会福利和所谓的社会资本的充实而进行的、为垄断资本服务的国家财政投资和贷款。由于封建的以父亲为家长的家族制度的瓦解，广大妇女劳动力参加社会生产；由于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后期中等教育（高中）的普及，为这次高速增长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

完成新型垄断资本主义重建的1954年到1955年，也是战后政治结构新阶段的开始。1954年春第十九届国会使用过去的保安队突变为自卫队，走上陆海空三军全有的正式重新武装的轨道。为了给这些军队提供装备，日美缔结了《共同安全法》军事援助协定。并在同一届国会上，以“教育在政治上保持中立”为名，制定了两项法律，实际上是为政府进行教育统制和推行军国主义教育初步打好框架。教育统制和反动的教育改编，都以此为出发点，一个接一个地实现了法制化。同时为了镇压人民反对这种对美从属的重新武装和反动政治的斗争，复活了中央集权的警察制度。据说政府和执政党估计到这一警察法案由于在野党的反对，不可能在国会原定会期内通过，为了延长会期，竟将二百名警察拉进国会，动用暴力排除了反对派议员的阻挠，通过了延长会期的议长提案。在从今年春天到夏天召开的国会上，以强行通过大学法案为开端，

所谓“强行通过”竟进行了二十多次,说什么“议会民主主义已经濒临危机”,其实这类事早在十五年前就已经因将警察拉进国会而被扼杀了。

《日美共同防御援助协定》、正式重新武装、中央集权警察制和国民教育的反动的中央集权统制的制度化以及为了通过这些法案将警察力量拉进国会,这意味着战后日本所标榜的政治原则“和平与民主主义”的招牌已被扔掉,开始明目张胆地转入反动与暴力的统治(这是在垄断资本主义基础上必然要建立的政治形态)。

这年年底,那个自1948年11月以来与占领军和美帝国主义紧密勾结、一直掌握政权的吉田内阁,不仅遭到了广大人民日益高涨的反对,并为垄断资产阶级抛弃而倒台;组成了公开主张重整军备并为此而鼓吹修改宪法的鸠山一郎的日本民主党内阁。鸠山等人一登上政权的宝座,鉴于人民的反对,没有马上提出修改宪法,却加快了重整军备的步伐。当时政府同美国进行谈判,并就应交给美国的防卫分担费将随着日本军费的增加自动减交所增军费的半数达成协议,从而向独立自主地进行重整军备走近了一步。这届内阁从1955年1月起花费了几乎近两年的时间,不顾美国的反对,不顾国内垄断资本和执政党的一部分人员以及外务官僚的反对,响应苏方的倡议,实现了日苏邦交的恢复,从而才实现了参加联合国的愿望。

从鸠山内阁这一系列作法中可以看出,已经完全复兴、正在向新的发展跃进的日本垄断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独立的意愿。有这种意愿和能够实现这种意愿当然是两回事。在国际政治方面,实际上日本是美国掌中的工具,这种情况到鸠山内阁时期基本上没有改变。实现日苏复交,不能忽视它的世界政治结构的背景,即在这一时期,赫鲁晓夫根据修正主义为制定同美帝国主义的“和平共处”路线作了准备(1956年2月,在日苏谈判的过程中,苏联共产

党召开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作了秘密报告，4月解散了共产国际，6月撤销了莫洛托夫的外交部长职务，10月恢复了日苏邦交)。尽管如此，但我仍想着重指出，日本垄断资产阶级适应其经济力量，开始积极地力图从半占领情况下摆脱出来的历史重要性。

鸠山内阁下台以后，借助自民党内派系斗争组成了石桥内阁，似乎要进一步推行鸠山的“独立自主”路线，但因石桥生病，这届内阁不到两个月就垮了。1957年2月组成第一届岸内阁，1958年6月又组成了第二届岸内阁，在这届内阁之下进行了修改《日美安全条约》的谈判，1960年上半年，不顾震撼整个日本全国人民反对“安全条约”的斗争，6月竟使第二次“安全条约”在议会自然通过，岸信介下台。第一次岸内阁组成不久，岸首相以日本首相身分首次在长达两周的时间内，历访了东南亚的美国傀儡政权，回国后马上又去华盛顿朝拜(作为日本首相，这也是第一次)，这次访美的成果是6月21日岸首相和艾森豪威尔总统发表的高唱“日美新时代”的共同声明。

在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政论界中有关日本帝国主义复活的大论战是从这时开始的。1957年5月，岸首相在国会宣称，如果为了自卫，即使拥有核武器也不违反宪法；1957年8月，成立了旨在修改宪法的宪法调查会等，日益加紧强化重新武装(与此相配合，开始撤退驻日美军的地面部队；废除防卫分担费)和建立反动和暴力的统治体制；同时，首相第二次访问东南亚；1957年12月，在新的意义上重开自1953年10月以来中断了的“日韩会谈”；以赔偿的形式对南越的美国傀儡政权进行援助(1958年初开始谈判，1959年5月签订协定)等，表明岸内阁的政策开始露骨地表现出日本统治阶层向南朝鲜和东南亚扩张的野心，并开始暴露出日美垄断资本之间争夺市场的斗争(其基础不消说是因为日本垄断资

本主义有了惊人的发展)。这些情况给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一个问题，今天日本帝国主义是不是已经复活了？这个问题集中在如何评价第二次《日美安全条约》上。

三

第一次“安全条约”，其草案是在占领下强加给日本的，在条文上也是一个露骨的不平等条约，不仅日本人民要求废除它，成长起来的垄断资本对它也不满意。鸠山内阁时，1955年8月，重光外相访美同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会谈，首次提出将“安全条约”修改成日美双边军事同盟条约的建议。杜勒斯回答说：当日本重新武装不断加强，“能对西太平洋的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的条件具备时，美国就同意进行修改“安全条约”的谈判。轰动一时的、重光秘密保证向海外派兵就是这个时候。这种密约不管是否有文件得以确认，但当美国确认日本不仅愿意而且有能力忠实地履行美帝国主义关于“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基本方针时，美国就同意日本统治阶级所期望的修改“安全条约”的要求，这条路线是明显的。而且这条路线也是日本统治阶层本身所希望的。

日本的重新武装最初是根据美国的要求开始的，是接受美国远东军的指导和指挥的。对吉田内阁时期的那种军备适应经济力量的“渐增”方式，美国一再很着急，希望更迅速地扩军，并且在媾和以后，向日本施加压力，要求日本片面增加地面部队，以充当美军的炮灰。但日本统治阶层并没有唯美国之命是从，仍贯彻了吉田方式，保持了陆海空三军必要的、均衡的逐渐增加。杜勒斯向重光提出日本现在就要具备向海外派兵的能力（这必须摆脱宪法的限制）的要求时，无疑也是施加了压力的，但杜勒斯的要求与日本统治阶层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只是日本统治阶层必须压制或者逃避日本人民的强烈反对，必须为达到扩军的目标创造必要的政

治环境,必须考虑经济实力,因此不能按照美国的要求去作。美国迫不急待,日益施加压力。因为只看到压力很大,所以也就显得好象日本重新增强军备都是美国强加给日本的,和日本统治阶级软弱无力、实行对美从属政策的结果。然而日本统治阶级本身也是念念不忘和积极推行重新武装的,这是日本重新武装的基本理由。

岸首相从 1957 年 6 月第一次访美时起,向美方转达了要求修改“安全条约”的愿望,受到与重光同样的冷遇。1958 年夏天,美国对中国的包围以杜勒斯所谓的“战争边缘”政策得到加强;中东的危机激化了;在美国鼻尖下的古巴,革命斗争有了发展(1959 年 1 月取得革命胜利);非洲大陆的民族斗争也爆炸性地高涨起来;在这种形势下,美国经济从美元不稳发展成为美元危机。因此,就美国“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政策来说,接受日本修改“安全条约”的要求,让日本主动升格为军事同盟国,比仅仅规定美军驻日的第一次“安全条约”更为有利。而且岸内阁正象美国所希望的,竭力增强军备,为了能够实现向海外派兵,修改宪法的热情也非常高,岂止根本不想象上届内阁或大上届鸠山内阁那样接近苏联和中国,而且破坏了鸠山内阁时期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日中贸易,并去台湾为蒋介石“反攻大陆”打气。所以它是美国最理想的从属盟友。于是 1958 年 8 月,欢迎藤山外相的杜勒斯明确表示愉快地同意进行日本迫切希望的修改“安全条约”的谈判。

第二次“安全条约”是根据日本要求缔结的、形式上日美对等的军事同盟条约。根据这个条约,驻日美军的特权也同根据《北大西洋公约》驻欧美军相同,在条约上半占领状态不存在了。但对日本人民来说,新条约对日本人民的解放斗争没有任何好处,原条约关于驻日美军可以出动镇压人民革命暴动的规定,改变了说法,暗藏在新条约中。过去的租借基地条约的性质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新增加了军事同盟的规定,因此对人民来说,日本比过去更紧

地被绑在美帝国主义的战车上，陷入更加危险的境地。但从统治阶级来看，日本则可根据新条约依靠美国的军事力量，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包围中起更积极的作用，在向朝鲜和东南亚扩张时，取得了一个军事挡箭牌。对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化或者帝国主义化的人民来说，新“安全条约”比过去更坏，但对力图积极推进修改条约的垄断资产阶级来说，新条约则是一个同过去无法比拟的好条约。

否定日本帝国主义复活的人好象说：新“安全条约”也是美国强加给日本的，它使日本愈益深重地从属于美帝国主义，从而也就妨碍了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化。然而历史的事实是，如前所述，日本统治阶级要求和推进新“安全条约”，美国则是对此响应的，日本垄断资本哪里是被强加给的，简直可以说是争取得来的。在谈到“日本”的时候，要把日本政府和统治阶级同人民加以区别是极其重要的。日本人民是被日美统治阶级的联盟强加了新“安全条约”的，但垄断资产阶级是“争取得来”的。而且对统治阶层来说，新“安全条约”在十年以后的今天，在执行他们的内外政策时，一点也没感到妨碍和牵制，心里想没有再比这更合适、更难得了，说：“日本的繁荣是托福美国核保护伞的”。不过，为粉碎“安全条约”而斗争的人民力量，并不是共产党那样的口头反对派，而是作为真正的反对派发展起来的。因此，为了摆脱人民的反对，陆陆续续有人主张最好改变日美军事同盟的现状。

新日美“安全条约”使那根把日本绑在美帝国主义战车上的绳索变得更加粗大。有人把这种事实解释为日本对美从属的加强和加深，这不是弄错了事实，就是曲解了理论。在法律上来说，新“安全条约”规定日美是对等的、条约是有期限的，仅就这点来看，它就比过去大大增强了日本统治阶级的对美独立性（不是完全独立）。而一个在法律形式上的对等的政治同盟和军事同盟，哪一方面居优势地位、掌握主导权，哪一方处于从属地位，这只能由各个同盟

国的实力来决定。日美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实力对比是绝对悬殊的,即使以美国在远东能够自由动用的实力与日本的实力相比,日本也是望尘莫及的,十年后的今天仍然如此。因此,日本对美国不能不居从属的地位,与在第一次“安全条约”下的情况相比,日本对美国的从属并没有加深和增强,而是由半占领状态上升为从属的盟友,日本垄断资本对美国的地位是提高了。日本统治阶级所以主动地选择了在军事上和政治上从属于美国、“钻进美国的核保护伞”的道路,而不是美国借第二次“安全条约”强加给日本的,这是因为他们要对抗社会主义中国,要向南朝鲜和东南亚进行新的经济和政治扩张(这正是帝国主义政策),不能不同美国军事力量相勾结。即使日本重新武装有了进展,日本垄断资本靠自己无论如何也没有对抗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何况对中国施加压力,那就更谈不到了。日本统治阶级只要想实现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扩张,除了选择建立对美从属同盟的道路没有别的办法。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了败战,经历了事实上被美国单独占领、旧金山媾和及第一次“安全条约体制”的战后整个历史过程,在亚洲除美国外没有结成帝国主义同盟的对象,由于这样的政治地理条件,迫使日本走上了这样的道路。

从日本被迫走上这样的道路这一点来说,尽管第二次“安全条约”的外交谈判是根据日方的主动要求进行的,但在历史上和客观上,日本方面还是有“被强加”的性质。而且虽然说这是日本垄断资本为了自身的利益缔结的或者说不能不缔结的从属同盟,可是既然建立了这种同盟关系,日本要根据自己的意志解除它,美国是不会同意的。美国也根本不是为了日本垄断资本的利益同意第二次“安全条约”的,它始终要把日本攥在自己的掌中,作为它“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政略和战略的重要一环,为了美帝国主义本身的利益,才容纳日本的要求的。如果日本想要背离美国,它是决不会

同意修改“安全条约”的。否定日本垄断资本对美从属的人所持最重要的论据是，在“安全条约体制”中的政治和军事的对美从属是日本方面选择的道路。如上所述，很明显这种论据是站不住脚的。

缔结第二次“安全条约”以后，为了进一步加强这个条约，1961年设立了日美贸易及经济联合委员会、日美科技委员会和日美文化教育联合委员会。这些委员会据说也是美国在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上加强对日侵略，并使其进一步从属化的，但这也同“安全条约”本身一样是日本对美从属同盟的一种补充。日美贸易及经济联合委员会既是一个把美国的要求、诸如贸易和资本自由化，强加给日本垄断资本的场所，反过来也是日本垄断资本抵制这种要求的场所。双方在这里的关系是根据实力（它不仅是经济力量，而且还包括亚洲形势以及其他政治条件纠缠在一起的各种复杂力量的总和）来决定的，并不是单方面的、固定的美国对日统治的工具。

在建立第二次“安全条约体制”的同时，在池田内阁之下“日韩会谈”也开始有了进展。据说1962年8月因为预计到谈判会达成协议，日美安全协商委员会便就“日美韩军事合作大纲”达成协议；同年11月就南朝鲜对日财产请求权问题，双方取得一致意见，“日韩会谈”的最大难题，实际上已经解决。不过“日韩会谈”最后达成协议和《日韩基本条约》等得到批准，是在三年后的1965年11月。这是由于“日韩”双方的国内政治形势（人民的反对和置人民反对于不顾的统治者之间的阶级斗争的激化，统治势力内部的斗争等）而推迟的。

在这期间，美国对越南的侵略，经历了1962年2月在西贡设立美国军事援助司令部；1964年8月美国舰队炮轰和飞机轰炸北越（北部湾事件）；1965年1月南朝鲜向越南派兵；2月美军猛烈轰炸北越，升级为对整个南北越南的大规模战争。与此同时，日本

政府和统治阶级参与侵略也积极起来。1964年9月，政府决定给南朝鲜二千万美元的紧急“援助”，意思是补偿南朝鲜因向越南派兵而造成的财政负担。冲绳作为轰炸越南的美军基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与越战相关联，美国核潜艇不顾日本人民的反对，在佐世保和横须贺一再“停泊”；日本垄断资本借助美军直接和间接的“特需”，又找到了一个跃进的机会。日本这样一个后勤基地，给美军侵略越南帮了大忙。日本除了没派出军队外，在一切方面积极参与美国对越南的侵略，日本垄断资本从同美国的帝国主义同盟那里赚得了最大的利益。

四

同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结成同盟，积极参与其侵略战争，从中分得最大的利益，这样的高度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仅根据这一点就应该把它叫做帝国主义国家。南朝鲜傀儡政权和菲律宾在美国的强制下被迫向越南派兵，用本国人民的生命换来美国的“保护”和“援助”。日本参与越战与这些国家的情况是不同的。而且日本利用“日韩条约”，将南朝鲜纳入它同美国共有的新殖民主义的势力范围，变为剥削和压迫朝鲜民族的国家，明目张胆地敌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立起并加强了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敌的“日美韩军事政治同盟体制”，而这个体制的日方的经济基础是高度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这怎么还能说日本不是帝国主义呢。

日本垄断资本在越南战争“特需”的刺激下，成功地回避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半期的“高速增长政策”所造成的破绽；借助其增长了的经济实力，乘美帝国主义因越战失败而开始的美元危机愈益深化和在政治上侵略亚洲不得不采取迂回战术之机，部分地“代替”了美国，在南朝鲜和东南亚加强了经济和政治扩张。日本

不仅在美国指挥下的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太平洋地区部长会议等国际机构中,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和作用,而且日本资本单独向东南亚的扩张也是惊人的。

就商品输出来说,1967年,“日本对南朝鲜、台湾地区、泰国、印尼、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出口都超过了美国,占了优势地位。特别是南朝鲜,1961年和1965年美国都占其进口的第一位,但到1966年日本变为第一位,1968年(1月到10月)日本为百分之四十四,美国为百分之三十二,同1965年相比,日美调换了位置。”“在整个东南亚地区,美国的出口直线下降,而日本1967年则为1962年的两倍,同美国的差距显著缩小。”^①

日本的资本输出,从1960年起增长很快,其投资地区,1960年以前,北美和中南美占日本国外投资总额的七成,1961到1967年度,北美、东南亚和中近东同样占了七成,“尤其是对东南亚的投资,增长显著,总额增为四点四倍。从1951年度到1967年度的投资行业的情况来看,对北美的资本输出,商业等服务性行业约占百分之五十七;对东南亚则以矿业为最多,约占百分之三十五,其次是纤维、食品、钢铁、金属等。这说明,企图通过开发投资进行原料资源的开发,以便长期地、稳定地保证原料资源,另一方面则企图通过对制造工业的投资,扩大成套设备的出口。”^②

以上可以看出,日本垄断资本对南朝鲜和东南亚进行了猛烈的扩张,对美贸易收支一直保持顺差,国际收支的综合收支近三年来也持续盈余,国民生产总值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并由债务国转为债权国,于是它今年以来竟大声疾呼地宣传起什么“自主防卫”,在第四次防卫计划(正确地说是扩军计划)中,把重点放在海军和空军的扩充上,甚至扬言必须“防卫”马六甲海峡等,他们的

^{①②} 引自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国际贸易》1969年9月号刊登的《日本对东南亚的出口动向》一文,该文对日本向东南亚扩张阐述得很详细。

“大东亚共荣圈”的帝国主义野心是极其露骨的。

佐藤首相之所以向美国提出“归还冲绳行政权”的要求，并不是因为迫于冲绳县民以及本岛人民解放冲绳的斗争，用“归还行政权”来支吾搪塞，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姿态，而是因为对敌视中国、企图加强对东南亚的帝国主义扩张的日本垄断资本来说，为了达到其扩张的目的，不想将军事地理上具有极重要地位的冲绳置于美国单独统治下的美军基地，他们迫切需要挤进去把它变为日美的共同基地。这时已经不是在日本美共同声明中如何处理在美军基地上安装还是拆除核武器的问题，而是日本统治阶层利用“归还”这种国民的民族主义的急切心理，乘机把“安全条约”的事前协商事项扩大为日本对美国侵略朝鲜、中国和越南也事前积极同意，从而进一步积极加强了同美国的军事同盟，这点比上述问题更重要。

日本如今不仅在经济基础方面完全帝国主义化，而且在政治上建成了帝国主义的上层建筑，即在内政方面加强了反动与暴力的统治体制（请看最近在国会搞的二十多次的“强行表决”，今年4月28日、10月10日和10月21日的各次斗争，还有警察对阻止佐藤访美斗争的镇压和自卫队的“治安出动”的万无一失的准备）；在国际上大力进行了一系列的扩张和新殖民主义的侵略。这种反动与暴力的统治、扩张与侵略的政策，并不是佐藤内阁或者别的什么内阁随便选择的政策，而是在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上层建筑，除了这种政治以外不可能再有什么别的政治。因此，日本帝国主义今天已经完成复活，我不认为是“正在复活”。其复活的里程表是：从1954年到1960年为过渡期（如果指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正在复活”），1960年修改“安全条约”奠定了复活的基础，1965年签订“日韩条约”开始了帝国主义扩张，而今天，1969年11月，佐藤访美则是试图获取帝国主义的新的进展。

然而这个帝国主义如本文第三节所述，它从属于美帝国主义。

这是因为第一，在日美实力对比方面，事实上美国强大，居压倒优势；第二，这种从属地位是由败战以来的整个历史过程造成的，而且也是日本垄断资产阶级适应这种客观条件、亲自选择的道路。只要日本走帝国主义的道路（垄断资本从其经济本质来说不可能选择别的道路），就不能避免对美从属。这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形势和世界形势发生了变化，日本单独实行帝国主义，无论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不可能了。今天甚至连美帝国主义也不可能单独地执行帝国主义政策。他们说“集体的安全保障”才是今天的“安全保障”呢！当然，这种“安全保障”并不是防御性的，本质上是帝国主义侵略性的。

这样讲，有人会说从属和帝国主义是不相容的概念。然而，较弱的帝国主义从属于强大的帝国主义过去也有过，就是按照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也能说明。请参考《帝国主义论》第五章和第六章。列宁对战前的日本帝国主义也曾经指出，它在金融方面是从属于英美的。

强调日本对美从属、否定日本是帝国主义的人列举了如下事实，说日本垄断资本在经济上如石油工业所代表的，在战略产业方面大都依赖美国资本，在资金和技术上依赖美国，在贸易方面对美国的依赖程度很高，东南亚也都是美国的势力范围，日本经济隶属于美元区，等等。然而这些都是帝国主义世界关系中司空见惯的事。1917年革命前的俄国帝国主义的银行资本，三分之二由法国资本控制着，俄国在金融方面完全从属于法国，但这毫不妨碍俄国是帝国主义。列宁说俄国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和现代帝国主义的双重帝国主义，作为现代帝国主义的表现，他列举了侵略“满洲”，构成沙皇专制政治经营“满洲”中枢的道胜银行，完全由法国银行控制着。今天日本在金融上对美国的依赖程度远比当时俄国在金融上对法国的依赖、或者当时的日本对美英的依赖程度低得多。

今天日本的新殖民地的扩张地区是美国的势力范围，与其说这是对美从属的证据，莫如说日本开始扩张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独占的地区，正是在这一点上它具有历史的和政治的意义，所以说它是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一种表现。

虽然非常不充分，我仅提出以上论点，到此结束。

第三篇 重整军备与军国主义复活*

第一章 重整军备及其政治经济的基础

第一节 留下了帝国主义的孽根

1945年8月，以天皇为首的日本军国主义向同盟国投降了。盟国对日占领军（实质上是美帝国主义的占领军），在9月中占领了日本全部国土的每一个角落，并解散了大本营^①、陆海军省、陆军参谋本部^②、海军军令部^③等所有军事机构和陆海军队（战败以前，日军中没有独立的空军，航空部队分属于陆军和海军）。在海外的日本陆海军也分别向其所在地的盟国各国军队无条件投降，完全解除了武装。接着，除天皇以外的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领导人，政治家和军人都作为战争犯罪的嫌疑犯而被逮捕。军国主义的各种团体全都被解散了。第二年1946年1月，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军国主义领导人，被从政界、行政机构、经济界、教育界以及各种民间团体清洗出去，并禁止再任公职。被清洗的人数达八万六千人，另外，职业军人约十二万人也全部被从公职清洗出去，并采

* 我从1976年1月到6月，在中国北京大学“日本近现代史短期研究班”讲学。本稿是以当时的部分讲义为基础，稍加修改撰成的。与这个题目相关联，在这之前讲了《战后日本史的分期及各时期的主要矛盾》，又在这之后讲了《现代日本的主要矛盾》。在本书的《序言》中谈到准备就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亚洲形势另写一本书，这另外一本书就是以在北京的这一题目的前后讲义为基础，正在编写中。割裂讲义的整个体系，单独抽出此稿，多少出现有些说不清楚的地方，因此作了简单的补充或改写。它与本书的第一、第二篇论文的基本观点相同，但更具体地、更详细地追述了史实。

① 大本营：战争期间在天皇之下设置的最高统帅机关。——译者

② 陆军参谋本部：即陆军参谋部，是陆军的最高指挥机关。——译者

③ 海军军令部：是海军的最高指挥机关。——译者

取了各种禁止鼓吹军国主义思想的措施，如禁止使用过去那种鼓吹军国主义思想的学校教科书等。主要军事工业的机器等，作为实物赔偿的一部分由盟国接收过去。

总之，占领军的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使日本军国主义不能东山再起。占领军显示出一副象是要彻底执行这项任务的样子。

然而，尽管如此，日本军国主义的根子还是被美帝国主义占领军小心翼翼地保留了下来。

第一，保留了经济基础。

由于战败和其后根据占领军指令进行的各种改革，寄生地主制基本上被废除了，但保留了垄断资本主义。战败以前，军国主义最大和最主要的经济基础是垄断资本主义，而地主制已经变为次要的东西。其最主要的基础垄断资本主义，因战败受到沉重打击，但决没有被打倒、被消灭。地主阶级灭亡了，但资产阶级，尤其是垄断资产阶级并没有灭亡。不但没有灭亡，而且由于地主阶级的灭亡，资产阶级在日本社会变成唯一的剥削阶级、统治阶级，比以前更强大了。他们也被置于占领当局的统治之下，但在日本社会内部的阶级结构中，他们成了唯一的统治阶级。

美帝国主义占领军为了防止日本垄断资本作为美国垄断资本的宿敌而再起，并将其改造成为美国的忠实附庸，推行了种种政策，但它决不想消灭和摧毁日本垄断资本主义。而且占领军对日本人民进行的推翻垄断资本、建立人民政权的革命斗争，从一开始就进行了无情的镇压。

于是日本军国主义最重要的经济基础——垄断资本主义被保留下来；军国主义最主要的阶级基础——垄断资产阶级得以幸存下来。

列宁 1908 年说过：“现代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活生生的表现’”。（参考本书第 128 页）只要还存在垄断资本主义就必然

留下军国主义的根子。

第二，日本军国主义的最高指挥者天皇没有受到任何触动而被保留下来；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尊崇天皇的观念也得以保存下来。根据新宪法，天皇已不再象以前那样，不是日本国唯一的最高统治者，但作为“日本国的象征”和“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依然高居于日本国民之上。为了根除日本的军国主义，盟国远东委员会和美国的舆论都强烈主张必须废除天皇制，建立共和制，但美国政府压制这种意见，将天皇作为“象征”保存下来。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说过，“天皇是胜过二十个师团的战斗力量”。在他迫使日本政府接受的新宪法草案中，定有禁止日本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斗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的条款（现行宪法第九条原案），但麦克阿瑟认为，尽管有这一条款，只要以某种形式将天皇这个巨大战斗力保存下来，在美帝国主义认为必要时，便可随时重建日本的军事力量，为美国来加以利用。

因此麦克阿瑟所代表的美帝国主义丝毫没有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这就妨碍了日本人对日本军国主义根据天皇的命令、在天皇的最高指挥下所进行的那次侵略战争感到责任，妨碍了彻底清算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于是在保留天皇的同时，也就保留了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

虽然不象第一、经济基础，第二、意识形态的核心那样的根本性的因素，但第三、占领军司令部竟为他日重新武装日本秘密保存了人的因素。

麦克阿瑟总司令和他的亲信威洛比少将（占领军总司令部反情报队队长）把以战争期间东条首相的秘书官、参谋本部作战科长服部卓四郎上校为中心的一些旧陆海军参谋收罗到总司令部“太平洋战史编纂室”去了。参加这种编纂工作的旧参谋之一的丸山一太郎（笔名？）在1952年的文章中谈到他们为了收集资料曾同全

国数百名旧军人进行联系,并说了下面一段话:

在知道内情的日本人中间加深了“怀疑,在总司令部的庇护下,十几名作战专家的旧军人集中在一起干‘什么’呢?”威洛比少将,“他的看法是日本早晚必定要重新武装。因此他是为了不断绝火种以备来日之需,深谋远虑地来看待我们旧军人的。”“当朝鲜动乱出现危机时,特定的人员一再从编纂室消失了。这些人肯定在邮船大厦(编纂室所在大楼)的什么地方。但我始终没能打听到他们担负着什么任务,在哪个房间。有一天一个偶然的机,我在一个人的桌子上看到一份正在制定的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和日本的防卫计划的详细方案。”(《中央公论》,1952年5月号)

麦克阿瑟就是这样小心翼翼地有朝一日重新武装日本保留了军队的“火种”。

1946年1月,清洗了超国家主义者,但并没有真正将日本军国主义的领导人一扫而光。最近揭露出洛克希德公司对日本政治家行贿的问题,这次行贿的拉纤人儿玉誉士夫成了瞩目的中心。儿玉是旧日本海军设在上海的特务机关的负责人,日本被打败时,他将其机关在中国非法搜刮的大量金银财宝带回日本,并将它提供给鸠山一郎等人,作为日本自由党的创建和活动的经费。鸠山不久就被清洗了,但吉田茂接替鸠山当了日本自由党总裁,1946年5月组织了内阁。自由党同另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日本民主党同时是战败后连续掌握日本政权的政党,媾和以后便很快热中于重新武装。

第四,在规定日本放弃战争和不保持战斗力的宪法第九条中,日本反动派和占领军总司令部偷偷地准备了通向重新武装的道路。占领军最初向日本政府提出的宪法草案第八条第一款是“废除作为国家主权所发动的战争,永远放弃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

解决同其他国争端的手段”。这是根据2月3日麦克阿瑟指示给部下的关于修改日本国宪法的三大必要条件的第二款，它不仅意味着日本放弃了以解决争端为目的的战争，而且意味着也放弃了以自卫为目的的战争。然而接受这一草案的日本政府，当把它作为政府的宪法草案时，将条文改成下述字样：“永远放弃作为国家主权所发动的战争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由于这样一改写，这个条文就可解释为只放弃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的战争，而没有放弃以自卫为目的的战争。占领军对这样改写表示了同意。

还有，在审议宪法草案的帝国议会上，将司令部原案第八条第二款规定的“将来也不应赋予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之保持权；也不应赋予国家交战权”，改为在前头加上“为达到前项目的”的字句。这样一改，这一款就变成为了达到放弃作为解决国际争端手段的战争的目的，不保持战争力量。于是言外则偷偷地塞进了可以保持以自卫为目的的战争力量的意思。占领军也同意了这种修改（在占领时期，任何法律草案和在议会的修正案，都必须预先得到占领军的同意）。

占领军和日本反动派将占领军原案的第八条第一款和第二款作了上述修改，变为现行宪法的第九条，偷偷地准备了借“以自卫为目的”之名进行侵略战争和为此而重整军备的道路。

在审议宪法草案的议会上，当时的首相吉田茂肯定地说第九条规定了以自卫为目的的战争也放弃。然而那只不过是一种当场的即席表态而已，吉田的真心并不是那么想的。他在议会上这样说，可是没过四年，在1950年1月，他又强调宪法没有放弃日本的自卫权，在“自卫”的名义下，为旨在进行侵略战争而重新武装作了思想准备。

总之，由于战败使天皇制和垄断资本主义受到沉重打击。但他

们并没有被日本人民的革命推翻，而是由美帝国主义占领军进行了部分的改造，作为对美从属物而保存下来，从而保存了军国主义的经济的、阶级的基础和意识形态的核心。随着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复兴，军国主义也就必然要复活。

第二节 重整军备的开始与军国主义思想政策

1948年初，为了对付中国革命带动下的东南亚反帝民族解放革命的发展，美国改变了过去的对日占领政策，决定尽快把日本重建为远东的反共堡垒，把日本垄断资本重建为美国的远东兵工厂。

与此同时，据报纸报道：早在这年年底，美国五角大楼就制定了重新武装日本的具体计划。1948年12月14日，《纽约时报》刊登了著名的军事评论家汉森·鲍德温的一篇评论。他在这篇文章中说：“如果重新评价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地位，迟早要回到利用日本的人的资源问题上。因此必须修改放弃军备和战争的日本宪法。”同一天英国报纸《每日邮报》驻纽约的特派记者报道说：“为了对抗中共军的胜利，美国的战略家和五角大楼正在研究重新武装日本和利用日本的人的资源问题。”

第二天，日本报纸《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报道说：驻日占领军主力第八军前司令艾克尔巴卡中将主张在日本建立一支用轻型武器武装的、最大限度十五万人的警察军是当务之急；“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国防部消息灵通人士”也都提出了同样的看法。艾克尔巴卡早就认为：“日本人可以建成世界上最便宜的步兵，不加以利用是愚蠢的”。十分清楚，报纸上报道的这些消息不是臆测而是事实，因为在一年半以后，根据占领军的命令，日本就建立起同艾克尔巴卡所唆使的“警察军”一样的东西。

1950年6月25日,美国以日本为基地发动了侵朝战争。两周以后,7月8日,麦克阿瑟向吉田首相发出指令,必须马上建立一支七万五千人的国家警察预备队;海上保安厅增编八千人。

这一指令采取了加强陆上和海上警察力量的形式。但无疑是指示建立一支小型陆军和小型海岸警备海军的。为了进行侵朝战争,驻日美军几乎全部开往朝鲜。因而在防备人民革命、保卫占领权力当局和日本反动派的政权的武装力量方面出现空白。为了赶紧填补这个空白,发出了上述指令。指令说创建新兵力的经费由本年度国家预算一般会计项目的公债偿还费中支出。

这年的公债偿还费预算列有五百四十七亿日元,占预算总额的百分之十三。本年度偿还到期的国家债务只有十五亿日元,而列入的预算竟达三十六倍以上。这个预算是美国公使道奇直接指挥日本政府编制的。为什么要列入这么多的公债偿还费呢?在这年年初召开的日本国会上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现在真相大白,这是为了充作重新武装费用的。仅此一点就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占领军以及日本反动政府是预先就准备借警察预备队之名创建日本新军队的。这也是美国作了发动侵朝战争准备的一个证据(政府过去解释说:“列入过多的公债偿还费预算是为了防备通货膨胀”)。

从这笔预算中支出了警察预备队创建费二百亿日元和海上保安厅增编,即新设海上警备队费四十六亿日元。

接到麦克阿瑟指令的吉田内阁8月10日颁布了警察预备队令。它不是根据经国会审议的法律,而是根据政府为执行占领军命令而颁发的政令(通常称波茨坦政令),这是日本新军备诞生的反民族性的重要表现。政令说:“为了维护我国的和平与秩序,保障公共的福利,在必要的限度内”,补充警察力量,建立警察预备队。预备队是作为总理府的直属机关而建立的,在维持治安特别

需要的时候,接受总理大臣的命令而行动。

从颁布预备队令之日起,政府就公然大张旗鼓地招募志愿队员,开始为入队人员准备穿的军服、携带的武器和居住的营房。之后,在第二周的8月23日,全国七千名第一批入队的预备队员穿戴上宛如美国步兵的军服和军帽。这时麦克阿瑟的指令下达后才仅仅过了四十五天。这表明这一部队的创建很早以前连技术事项都作好了准备。正因为美国占领军和日本政府事先充分研究了招募士兵的方法和机构,充分确保了必要人员,很早就准备了士兵必需的服装、鞋和卡宾枪以及他们居住的营房,所以才能够这样很快就完成了部队的编制。从其手法的巧妙来看,日本今后实行征兵制,一举编成一百万、二百万的大军时,也一定会是轻而易举的。实际上,日本实施征兵制,在物质方面和技术方面已经作好充分准备。这个问题以后再谈。

这样迅速编成的警察预备队,到1950年底已建成拥有美国借给的卡宾枪和机关枪的、纯美式的四个轻步兵师。如果弄坏了这些美国借给的武器,日本必须赔偿;而且各级组织的武器都由美军来管理。于是美军通过武器管理也就管理了部队。

师司令部的别称叫“管理本部”。第一管理本部设在东京、第二设在札幌(北海道)、第三设在舞鹤(京都府的日本海方面的要港)、第四设在福冈(北九州,与朝鲜半岛相对);队员以大队^①或者联队^②为单位,在全国设立三十七个兵营(美军用语叫“Camp”,即宿营地)。部队训练是在美军军官和被派到分队的下级军官的指导下,由志愿参加预备队的旧日军军官和下级军官来进行。所使用的操典几乎是从美国步兵操典直接翻译过来的。

海上保安队10月23日根据政令将编制由一万人增为一万八

① 大队,相当于营一级。——译者

② 联队,相当于团一级。——译者

千人(不包括办事员),拥有的船舶由二十五艘激增为二百艘,由五万吨激增为八万吨,担负日本的沿海警备。新建了海上保安大学、海上保安训练所,即培养海军的军官和下级军官的地方。

警察预备队员月薪五千日元,服役二年,退役时发给六万日元的退職金。月薪比普通工人的工资低,当时日本经济还没有从战败的打击中恢复起来,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到处都是失业者,因此志愿报名人数竟有招募人数的好几倍(后来日本经济迅速恢复,并进入成长期,志愿参加预备队的后身——自卫队的人数骤减,变得达不到编制了)。

政府一口咬定硬说警察预备队不是军队,是不折不扣的警察的预备队。因为保持军备违反宪法,所以政府只能这么说,尽管它还极其弱小,但也是军队。这不论占领军还是日本政府都是十分清楚的。麦克阿瑟竟然在国会上洋洋得意地说:“警察预备队与其说是警察力量,毋宁说是警备军。它可以轻而易举地转为强大的保障国际安全的兵力”。

日本的重新武装就是这样开始的。无论从其历史来看,还是从它完全受美国军人统治的部队实际情况来看,这个军队首先是一支为美帝国主义进行殖民统治服务的土著军队。预备队的长官和副长官是日本人,部队的各级首长也是日本人,然而在这些长官和副长官以及各级部队长官的身旁一定都跟着美军顾问,他们是部队的实际指挥者。

但是也不应以此为理由而轻视这一新军备的其次的一面,它又是日本垄断资产阶级(今天在日本是唯一的剥削统治阶级)和反动派对内压迫人民镇压革命、对外为实现其复活帝国主义的野心的暴力机器。他们急切地等待着重建军队之日的到来。如果他们明目张胆地叫嚷重新武装,会遭到人民大众的反,因此他们就宣传什么一切国家都有自卫权呀,日本也必须有独立自主的国家防

御呀。吉田首相总是声称：“不重新武装”。但到1950年正月则强调说，日本国宪法并没有放弃自卫的权利，1950年底又说要“考虑自卫的方法”等。他所谓的“自卫的方法”，就是在媾和后缔结《日美安全条约》，让美军仍驻扎日本，一面依赖美军，一面逐渐加强日本军备。

统治阶级有势力的政治家，他们的说法大体上与吉田首相相同。其中独有前首相芦田均从1950年底就直言不讳地公开主张重整军备。他是1946年审议新宪法草案的国会宪法特别委员会委员长，在第九条第二款开头加上“为达到前项目的”的字句就是他想出来的。他同多方面的人士接触，设想当前建立一支十五个师、二十万人的陆军部队。

在开始重整军备的同时，全部解除了对旧军人的清洗令。接着对一般担任公职的也解除了清洗令。过去的超国家主义者和军国主义分子纷纷出笼，又耀武扬威横行起来。儿玉誉士夫一度也作为战犯嫌疑分子关进巢鸭监狱，1948年出狱了。东条内阁的商工大臣、在此以前曾在伪“满洲国”进行过残暴殖民统治的岸信介，也从1951年开始活动起来。他们两人紧密勾结，儿玉在幕后，岸信介公然在政治舞台上为复活和推进日本军国主义扮演领导的角色。

作为甲级战犯被判处七年重劳役的原外务大臣重光葵也在刑满前的1951年11月出狱了。他与芦田相勾结，很快就成了民主党的后身——改进党的最高干部、总裁，为促进修改宪法和重整军备而大卖力气。

战前的右翼法西斯分子和军国主义集团也一个接一个地复活起来。不仅如此，在工人运动中，“国铁”工会以及其他工会发起了号称“发扬爱国观念的工人运动”的法西斯运动，它们十几个集团于1951年9月联合起来，自称“民主劳工运动研究会”，在“爱国工

人运动”的名义下，扮演分裂日本工会总评议会（产业别工会这时几乎已丧失了实力）、破坏工会的法西斯突击队的角色。

中小学校从 1950 年 9 月左右起，逐渐恢复悬挂太阳旗，并把天皇赞歌《君之代》当作国歌唱了起来（附带说明：太阳旗是国旗，但《君之代》不是国歌）。国家神道开始复活，并且开始实际上强制为伊势神宫捐款，1951 年 9 月，《旧金山和约》签字后，同年 10 月，在靖国神社秋季大祭时，吉田首相竟以“个人”身分去参拜，各报对此大张旗鼓地进行了报道。同时文部大臣天野贞祐自己编写了小册子《国民道德实践要领》，强调天皇是国民道德的中心，并以文部大臣天野贞祐个人的名义将小册子散发给全国中小学校长作“参考”。

复活军国主义的思想准备活动就是这样在一切方面同时开始了（井上清等人合著：《现代日本历史》下卷，1952 年）。

社会主义中国和社会主义苏联的领导人早就预见到日本帝国主义、军国主义与美帝国主义勾结起来东山再起的危险。即日本还实际上完全处于美帝国主义的占领下，在美国尚未发动朝鲜战争（但却稳步地进行着准备），日本垄断资本的复兴刚刚开始的时候，1950 年 2 月，中苏两国政府缔结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众所周知，这是针对日本帝国主义再起而作的事前准备，条约前言说，中苏两国政府“决心以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与合作，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再起及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国家之重新侵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载《新华月报》1950 年 1—3 月号，第 1085 页）并在条约第一条中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或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同上）

这一条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最先预见到日本帝国主

义和军国主义复活的可能的。

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约》与《日美安全条约》生效,同时日本政府和台湾蒋介石集团之间签订了所谓的“和平条约”。几天后于5月5日,中国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就美国宣布非法的单独对日和约生效发表声明。“声明”明确指出,《旧金山和约》与《日蒋和约》是非法的,并进一步讲了下面一段话:

“这就证明日本的反动统治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为期将近七年,仍毫无悔祸之心,现在它更决心追随美帝国主义,妄图继续其甲午战争以来武装侵略中国的阴谋,准备重新进犯大陆,复活它对中国和亚洲人民的帝国主义统治。”(载《新华月报》1952年5月号,第40页)

斯大林在1952年10月发表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六章中,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资本主义各国相互之间的矛盾,并就日本和德国,讲了下述一段话: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主要的战败国德国(西德)和日本吧。这两个国家现在在美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过着可怜的生活。它们的工业和农业,它们的商业,它们的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它们的整个生活,都被美国的占领‘制度’加上了镣铐。要知道,这些国家昨天还是震撼了英国、美国、法国在欧洲和亚洲统治基础的强大帝国主义国家。如果认为这些国家不会设法重新站起来,打破美国的‘制度’,奔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这就等于相信神怪。”(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5页)

在斯大林这样说过后,已经过去二十三年多的今天,日本还没有完全砸烂美帝国主义的镣铐。然而日本的统治者不是从正面与美帝国主义对抗,而是一面从属于美国,一面利用美国的力量,逐渐复活日本本身的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斯大林关于日本帝国主

义必定要复活的理论性的预见基本上是正确的。

正如毛泽东和斯大林所预见的，日本军国主义勾结美帝国主义，得到美帝国主义的援助，媾和以后加快了复活步伐。

《旧金山和约》签订以后，吉田首相与第二任驻日占领军总司令李奇微，就加强日本的军备再次达成协议，并就下述问题取得一致意见：1952年1月，在新年度（1952年4月到1953年3月）的日本国的预算中，将警察预备队于1952年度内增加到十一万人，并用大炮、高射炮和坦克等重武器装备起来，进而于1953年度内跃增到三十一万人。在海军方面，日本还决定改组海上保安厅，接受美国借给的二千吨级的驱逐舰十艘，五百吨级的舰艇五十艘，加强沿岸警备力量。

根据这一方针，日本政府于1952年4月决定把警察预备队和海上保安厅的海上警备队合并起来，新建保安厅，并于“媾和条约”生效后的1952年7月建立起来。同年4月19日，李奇微对美国新闻记者团说：“在军事方面期待日本自己创建以防御为目的的陆军。警察预备队最终应该发展成陆军，这已暗中包括在《日美安全条约》所赋予日本的义务之中。”（《日美安全条约》的前言中规定：美国“希望日本自己能逐渐增加承担其对直接和间接侵略的自卫责任。”）

这里美帝国主义露骨地暴露出促使日本重整军备的真正目的。美帝国主义在此阶段还警惕日本建立正式的陆海空三军。美国的目的在于：不让日本保持海军和空军，而只是想把日本人建成“世界上最便宜的步兵”，用来充当美国侵略亚洲的替死鬼。上述1952年1月迅速增强警察预备队的方针就是日本政府不得已被迫接受李奇微所说的美国方针的结果。

然而以吉田首相为首的执政者们内心反对只片面增加充当美军替死鬼的地面部队。他们企图逐渐均衡重建陆海空三军的现代

军队。吉田首相称此为“自卫力量渐增”。他坚持这一方针，竭力抵制了美国的要求。

吉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是亲美派外交官，战后被美国占领军起用而掌握政权。因而日本进步的人们把他当作追随美国的卖国的当权派不断进行批判。这在本质上是正确的。但不应忽视，他是代表日本垄断资本和反动派要求复活帝国主义的政治家，从这种立场出发，他对重新武装日本尽管表面上服从美帝的指挥，实际上总是以日本经济力量不足为借口，不实行美帝的只片面急剧增加陆军的要求，而是贯彻了吉田的所谓“自卫力量渐增方式”。如果忽视了这一点，就不符合历史的事实，就会看不到日本的重新武装是日本帝国主义复活过程的表现。

1952年7月，政府按照4月计划颁布了《保安厅法》。这时已经是媾和以后，已经不可能以执行占领军命令为理由颁布政令来进行扩军，要把警察预备队改组为保安队，必须根据经日本国会审议的法律来实现。警察预备队在法令上始终只能解释是警察的预备队，但保安队在法令上则与警察完全是两回事。按规定，它是“为了维护我国的和平与秩序，保护人民及财产，在特别必要时采取行动的部队”。其编制定员总数为十一万九千九百四十七人，其中十一万人为保安部队（陆军），七千五百九十人为警备部队（海军）。其余二千三百五十七人为保安厅的内部部局和附属的保安研究所、保安大学（培养军官的机构）以及技术研究所的职员。

8月4日，吉田首相以代理保安厅长官的身份，对保安厅机关以及第一、第二幕僚监部（陆军和海军的参谋部）的干部作了内容如下的训示：

“重整军备现在还不是时候，国力也不允许。然而需要有一个保护国家的组织，所以组织了保安队。将警察预备队改编为保安队的目的是为了建立新的国军。保安队的任务是要成为建

立国军的基础。”

吉田首相又在同一天的全国知事^①会议上讲话说：“要坚决阻止扰乱社会秩序的破坏活动。最近一部分学生叫嚷反对征兵，这种言行令人深感遗憾。我之所以不主张现在实行重整军备，是为了等待时机的到来。”在翌年9月，吉田首相又在执政党自由党的国会议员总会上强调说：“二百亿日元的预备队经费，就说成是重整军备，可付之一笑。现在要紧的是，在教育方面应该利用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历史和美丽的国土等地理和历史教育，培养作为军备基本的爱国心。”

他确实认为警察预备队和保安队算不上什么真正的军备。那只不过是真正的建设军备打基础，企图等待“时机到来”，即在养成军备之本——“爱国心”，完成国民的军国主义思想准备，经济力量得到充实之后，才正式进行重整军备。这是对复活军国主义的步骤所作的巧妙的政治安排。

保安队和警备队于10月15日成立。其装备是由美国借来的，陆军配有重炮、坦克和装甲车等；海军配有护航快舰十八艘，大型登陆艇五十艘以及其他装备。

保安队和警备队都有美军顾问，他们是管理借给日方的武器和弹药的，事实上也就管理和指挥了军队，这与前一时期完全一样。尽管这种顾问在媾和以后失掉了法律上的根据，但实际上今天的作法同占领期间的美军作为警察预备队的顾问对其进行管理和指挥是一样的。

保安队完全为美帝国主义所掌握，这也表现在预算方面。与占领下的警察预备队的预算相同，“独立”后的保安队的预算额也受美帝国主义的指示。1953年，美国在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杜勒斯国务卿的统治下，采取了所谓“新国防政策(New look 战略)”，即对

^① 知事：是日本都道府县一级的行政首长。——译者

苏联和中国实行军事包围的世界新战略。作为这一战略的一环，强烈要求日本迅速加强军备，尤其是地面部队。因此，驻日美军也象占领军当时一样干与日本国家预算的编制。媾和以后，日本还必须分担根据“安全条约”而驻日的美军所需要的经费。当日本编制岁出预算时，必须首先同美军协商决定驻日美军防卫分担费的金额（日本把它叫作防卫支出费）。与此相关联，美军对决定日本军费也大肆干与。

日本本身的军费预算，1950年度为二百亿日元，1951年度为三百一十亿日元，1952年度（媾和后的第一年度）为五百九十一亿日元，1953年度为六百一十一亿日元，1954年度为七百四十二亿日元，年年飞跃增加，1956年度为九百九十九亿日元。各年度的金额完全接受了美军的要求。

此外，在1952年度预算中，以“安全保障费”这样一种暧昧的名目列入五百六十亿日元。这是因为日本不想按照美国的要求很快建成三十一万五千人的地面兵力，所以美军便强制日本政府（这年的预算编制期还在占领中）列入了一笔需要紧急增加兵力时（恐怕是预想到要驱使日本军开往朝鲜战场）的经费。这笔预算结果被用作驻日美军的设施费，到1955年度才算用完了。（朝日新闻社编：《日本的防卫与经济》）

尽管编制了这样巨额的预算，当时日本还没有足以全部花掉这些预算的制造武器和舰船的能力，而且演习场和空军基地等的建设，由于收买建设用地——受到以当地居民为主力的人民反对基地运动的阻挠，其设施的建设大都没能着手进行。结果这笔预算每年在年度内都花不完，1956年度以前转入下年度的金额每年都超过二百亿日元。在1957年度的预算中，转入下年度的金额才降到一百亿日元以下。

三分之一以上的预算花不掉，这不仅由于上述原因，实际上可

以说是日本政府对美军要求片面增加地面部队的一种抵制，是以物资采购困难为借口来拖延实际支出（前引《日本的防卫与经济》第 57 页）。这种看法可能是正确的。上述列入预算的“安全保障费”及其实际使用方式，表面上日本政府屈服于美军的无理要求，但没有按照美军要求去实行，这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第三节 自卫队的创建及其特点

垄断资本家开始积极着手军事工业的建设。1950 年 6 月，美军一发动朝鲜战争，便向日本产业界发出大量为了战争的军需品订货。货物品种最初为车辆、船舶、燃料桶、纺织品、药品等。但 1952 年 3 月，占领军解除了禁止日本制造武器的禁令，4 月底，决定将盟国过去接收和管理的飞机制造设施等八百五十个工厂还给日本。从翌月（即“和约”生效后）起，美军才向日本订购以弹药为主的成品武器。到 1953 年，日本工厂还接受了最新式喷气战斗机的修理业务，这就给战败以来落后于世界发展的日本军火生产技术造成了迅速发展的机会。

1952 年 8 月，日本垄断资产阶级的总司令部——经济团体联合会（简称“经团联”）为了摆脱军火生产依赖美军订货（特需）的不稳定状况，建设和发展日本自己有计划的不扩军所需要的军火工业，决定在“经团联”内部设立防务生产委员会，以便对此进行调查研究，加强军火资本家之间的联系和调整。

防务生产委员会早在 1953 年 2 月就发表了《关于整備防卫力的试行方案》。这就是从 1953 年到 1958 年为期六年的《防卫力整備计划》，即扩军计划。它规定六年间地面兵力增为十五个师三十万人，其装备够三十个师、六十万人的数量；海上兵力为舰艇二十九万吨，兵员七万人；空军为飞机三千七百五十架，兵员十三万人；

其年度平均预算为四千八百亿日元，预算总额为两兆九千亿日元。从当时日本的经济和财政规模来看，是一个惊人的大规模正式的重整军备计划。全年四千八百亿日元，达1953年度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八点五。

这一计划的制定者并没有考虑全部经费由日本自己出，其中四成多即一兆七千亿日元(约三十五亿美元)，指望美国“援助”(前引《日本的防卫与经济》)。

政府和资产阶级政党(自由党和改进党)根据垄断资产阶级的意图，利用美国的援助，制定了正式的重新武装的计划。1953年6月，政府就接受美国的《共同安全法》援助进行协议。8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访日，督促日本政府加强军备，并唆使日本接受美国的《共同安全法》援助。杜勒斯对吉田内阁的“自卫力量渐增”方针表示不满。他强烈要求日本政府迅速增加地面部队，其代价是约定归还媯和后美军仍继续占领的奄美大岛群岛(在冲绳本岛北侧，原属鹿儿岛县的各岛；同年年底归还日本)。

政府以接受杜勒斯要求的形式，决心建立陆海空三军，而不只是地面部队。在当时召开的第十八届国会上，政府不顾社会党等的强烈反对，凭自由党和改进党两党合作，通过了以恢复对旧军人的抚恤金、养老金为目的的《恩给法修正案》。这是为重新武装制造舆论的重要措施。

接着，9月25日，自由党召开了议员总会，决议：“根据自卫力量渐增方针，谋求在国力允许的范围内增强自卫力量，逐渐健全抵抗直接侵略的自卫体制，借以促进驻军的撤退，建立巩固的安全保障态势”。这一决议还决定：“自卫力量的增强，当前应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即在不致形成战斗力的限度内实施之。等到国力充实，将来修改宪法，再创建具备动员、统率、服役(国民征兵)、编制和装备等条件的自卫军”。对自由党的这一方针，改进党(当时重光葵

任总裁)也基本上是赞成的。尽管两党在争夺政权,但在推行重整军备上是密切配合,密切合作的。

在自由党议员总会之后,9月29日,该党政务调查会长池田勇人(前大藏大臣)以吉田首相的特使身份访美,谈判接受《共同安全法》援助和加强日本重整军备以及与此有关的经济问题。池田与美国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罗伯逊一直谈判到10月底。日美双方就日本接受《共同安全法》援助、加强军备的原则很容易就取得了一致意见,但有两点谈判难以取得进展。一点是日方主张当前陆军的增加目标为十八万,并开始建设正式的海军和空军。美国则强烈要求将地面部队增为十个师(三十二万五千人)。另一个争执点是,日本不光要求军事援助,还要求纯经济援助,美国则企图只限于直接军事援助。

池田、罗伯逊会谈10月30日结束,只就原则上取得一致的看法发表了联合声明。在联合声明的最初草案中,还有日本政府负有加强军国主义思想责任的意思的下述条款。

“会谈的当事者一致认为,在日本造成一种使日本国民增强对防御的责任感的空气是最重要的。日本政府的首要责任在于通过教育和宣传,在日本造成一种能够发扬爱国心和主动自卫精神的空气。美利坚合众国对此将予以援助。”

双方可能考虑到这一条款暴露出美国过于露骨地干涉日本内政,所以在公布的联合声明中被删掉了。可是包括这一条款在内的联合声明草案被《朝日新闻》传了出来。

关于《共同安全法》协定的问题,此后日本政府与美国大使馆之间在东京继续进行了协商。另一方面,政府就接受《共同安全法》援助而制定的重整军备计划,与自由党和改进党以及垄断资本家进行了反复协商。

政府为了正式的重整军备,急于作好国内体制的准备。这里

不仅仅是直接与军事有关事项的准备，此外还有两个支柱。一个是，“通过教育和宣传”在日本加强所谓“爱国心”即军国主义思想。其措施首先是统制中小学教育的内容，禁止教师进行政治活动，压制进步思想。其方法大致有三种：第一，通过自由党和改进党对“偏向教育”发动猛烈攻击；第二，由教育委员会和校长对教师的读书倾向进行调查，对有进步思想的人施加种种压迫；第三，以保障教师政治中立为名，制定等于禁止教师进行政治活动的限制法律。

在首先被列为“偏向教育”的例子中，包括教师要按照条文正确地宣讲日本国宪法。如正确地向学生宣讲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放弃战争，不保持战力；告诉学生，宪法如何保障基本人权，这就被说成是“偏向教育”。再如关于日本历史，讲授封建时代的农民怎样遭受残酷的剥削等，就说这是“把祖国的历史讲得黑暗而悲惨”的“偏向教育”。

在对教师的思想调查和镇压中，竟出现了校长调查教师家中书斋里存放的书籍、强制烧毁马克思主义文献等的例子。

禁止教师参加政治活动有两个目的：第一，当时日本教职员工会大多数支持社会党，一部分支持共产党，从这一立场出发，积极开展选举活动，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对此，政府和执政党彻底加以禁止和镇压，以便使自由党和改进党的候选人多当选一些。另外一个目的是，通过禁止教师参加政治活动来削弱并尽可能消除其对政治的关心。禁止教师参加政治活动，这是过去从专制天皇制镇压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自由民权运动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以来，最重视的教育和思想政策之一。

建立旨在加强正式重整军备体制的另一个重要支柱，就是通过修改警察法来复活中央集权警察制度，加强特别暴力部队（警察机动队）以镇压人民群众的革命的斗争和加强政治思想警察（所谓公安警察）。

过去那种专制天皇制的完全的中央集权警察制度，经过战败以后的改革，被分成国家地方警察和自治体^①警察两套人马。自治体警察由市町村公安委员会建立和管理，最终则置于自治体议会及其首长的监督之下。这种制度在《旧金山和约》成立后被修改成自治体可以废除它所设的警察，并将其编入国家地方警察。这样一来，苦于维持警察费用的地方自治体都争先恐后地把警察移交给了国家。因为掌握自治体权力的人也处于自由党和改进党的势力之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必然的。然而政府和统治阶级政党认为这样作还不够，于是强行废止了自治体警察，重建起比战前更强大的中央集权警察制度。与此同时加强了所谓“公安和警备警察”即专门镇压革命运动和一切社会运动的部门及其实力部队的机动队（可称作警察军的部队）。

在从1953年底到1954年春召开的第十九届国会上，为了划时期地重整军备，提出了防卫厅设置法案和自卫队法案、有关接受《共同安全法》援助的四项日美协定案、以“教育在政治上保持中立”为名的两个法案（所谓“教育二法”）以及警察法修正案（这些法案并不是同时提出来的）。

四项议案实际上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不管对哪一个法案，以社会党为主的反对派议员在议会内进行了顽强的反对斗争；教职员工会带头，工会、学生团体、文化团体在议会外展开了激烈的反对斗争。然而自由和改进两党在议会内占绝对多数，因此有关自卫队法案、有关《共同安全法》的四个协定、“教育二法案”，一个接一个地通过了国会。最后只剩下了警察法修正案。

这届国会会期延长两次，直到6月3日才结束。在这一天之前，警察法案已在众议院通过，但参议院还没通过。于是政府和自由、改进两党企图第三次延长会期。社会党以及其它党派对此进

^① 自治体：即地方政府。——译者

行了猛烈反对，在6月3日召开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政府延长会期提案时，议员企图用自己的身体堵住会场入口，阻止开会。于是议长（自由党）就把二百名警察叫进国会，用武力排除了在会场入口阻挡的议员，议长进入会场马上就宣布延长会期提案通过。统治阶级把警察叫进国会，凭警察暴力随心所欲地操纵议会的审议，这还是第一次。当然这种干法是从正面蹂躏了议会民主主义，甚至可以叫作小型法西斯政变。他们竟用这种极端反动的军国主义的方法为划时期地、飞跃地、重整日本军备、复活军国主义，制定了各种法律。

在日本国会上还发生了另外一件极端法西斯的足以刻画出日本政治本质的事件。这就是法务总裁（大臣）对检察官行使指挥权；禁止对执政的自由党干事长佐藤荣作因受贿嫌疑加以逮捕。这一受贿案件本身就与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有关。即历届政府（从自由党的吉田内阁1948年11月以来一直是这样干的）为了迅速发展日本海运造船业（与在朝鲜战争中必须加强军需运输力量有密切关系），每年向造船业界提供巨额补贴。大造船公司为了得到这种补贴，就给自由党的议员很多贿赂。众目昭彰，其中最大的受贿人就是自由党干事长佐藤荣作。而且根据被捕受审的行贿人的供述，也证明佐藤干事长有受贿嫌疑。因此检察官打算逮捕佐藤，但吉田首相叫法务总裁犬养健行使总裁对最高检察长所拥有的指挥权，禁止逮捕佐藤。因此，造船贪污案件的真相终于在暗中不了了之。

这一事件说明，所谓在法律面前国民一律平等该是多么无耻的谎言，所谓司法权的独立只是徒有其名而已。政府对造船贪污案件的处理方式使人民懂得：要使司法权从行政权独立出来对刑事案件进行公正的审判，必须以能够对嫌疑分子进行公正的逮捕为前提。而对政府和统治阶级不利时就不准逮捕，可见司法权独

立也是有名无实的，审判只不过是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而已。

立法机关里竟拉来警察，行政权事实上对司法独立横加侵犯，即行政机关行使法西斯权力，这本身就清楚地表现出军国主义的两个侧面，即对外军国主义和对内军国主义之中的后者。当然无需反复说明，用这种方法制定的上述各种法律的内容是促进军国主义的。

那末，这样正式开始的重新武装日本的内容、性质是什么呢？它将怎样加强呢？这个问题我想在另一章再谈。

1954年7月1日实施了《防卫厅设置法》和《自卫队法》。据此，保安厅改为防卫厅，保安队与警备队变为陆上和海上自卫队，又新建立了航空自卫队。

新军备的主要特点是：

第一，警察预备队和保安队在法制上只规定了警察的任务，对其是军队这点，还在进行掩饰，但防卫厅和自卫队则明确规定它是抵御外来敌人、镇压国内革命运动的军队。即规定自卫队的“主要任务是保卫我国的和平与独立，保障国家的安全，抵抗直接侵略和间接侵略，保卫我们的国家。另外，根据需要负责维持公共秩序”。这里所说的“直接侵略”指的是外国对日本的侵略；所谓“间接侵略”是指国内的革命斗争；还有所谓“维持公共秩序”当然是指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所谓“间接侵略”的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不论在日本还是在外国都不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帝国主义为了给它出兵镇压资本主义各国国内的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寻找借口，制造谎言说这些革命运动、民族解放运动都是受社会主义国家的宣传、煽动、唆使和支持进行的，即受到社会主义国家的间接侵略。这种“间接侵略”的概念，是经1951年第一次《日美安全条约》引进日本的。在第一

次《日美安全条约》的前言中写道：美利坚合众国“希望日本自己能逐渐增加承担其对直接和间接侵略的自卫责任”（《国际条约集》1950年到1952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393页）。而且条约本文第一条规定，“为镇压由于一个或几个外国之煽动和干涉而在日本引起的大规模暴动和骚乱”（同上，第394页）可以使用驻日美军。自卫队也还有镇压这种所谓“间接侵略”即国内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的任务。

第二，建立了过去没有的空军（航空自卫队）。于是陆上、海上、航空各自卫队即海陆空三军全有了。各军都设有各自的指挥机关——“幕僚监部”^①，另外还设有统管它们的联合幕僚会议^②，即总参谋部。还建立了联合幕僚学校（培养参谋军官的机关）、陆海空各军干部学校、防卫大学以及其他培养军官和下级军官的机构。

管理和主持陆海空三军的机关是防卫厅。它是直属总理府的外厅，但事实上是国防省（国防部），其长官由国务大臣（部长级）充任。长官在制定作战计划、指挥部队以及教育和训练部队方面接受联合幕僚会议以及各军幕僚监部的辅佐。另外设有不超过十人的参事官（必须是文官），协助长官制定有关防卫厅管辖事务的基本方针。

关于军需物资的采购与管理、军事设施的建设业务，由防卫设施本部来进行。这一机构也在防卫厅长官的指挥和监督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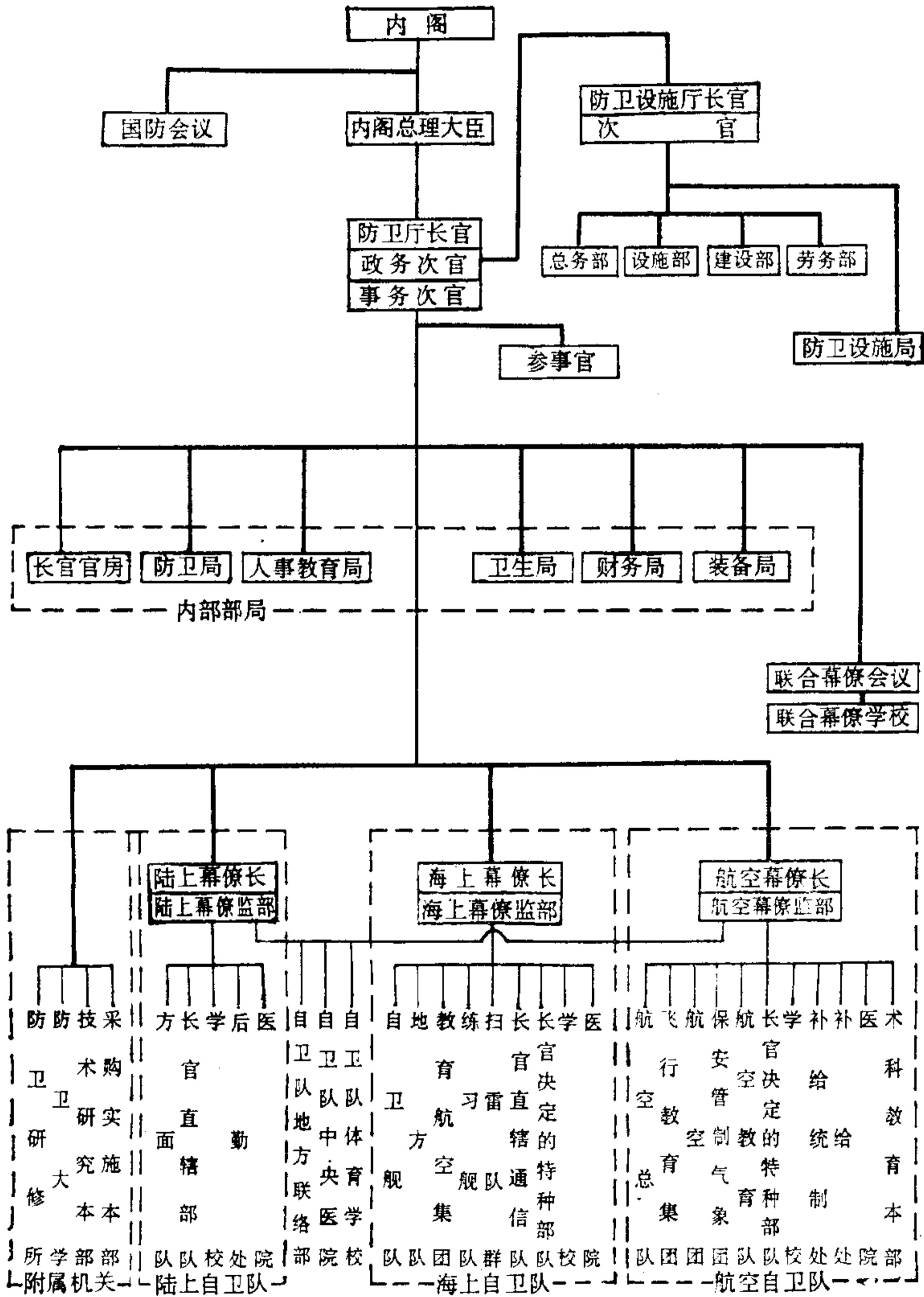
防卫厅和自卫队的组织如图1。

在防卫厅之外，1956年7月设置了以总理大臣为主席，以副总理的国务大臣、防卫厅长官、外务大臣、大藏大臣以及经济企划厅长官为成员的“国防会议”。这一机构是根据1954年防卫厅设

① 幕僚监部：即参谋部。——译者

② 联合幕僚会议：即参谋长联席会议。——译者

(图1) 防卫厅和自卫队组织



资料来源：朝日新闻社编：《自卫队》第254页。

置法设置的。关于其成员要不要“民间人士”(这里所说的“民间人士”事实上是指旧陆海军将领)参加,政府与自由党和改进党之间意见分歧,最后决定“民间人士”不参加。1956年7月,制定并实施了《关于国防会议组成等法律》。

国防会议是审议《国防基本方针》、《防卫计划大纲》、“可否出动防卫部队”以及其他有关国防的重大事项的机关。

如上所述,新军备与保安队相比,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得到飞跃加强和充实,它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是第一流的军队和军事机构。

第三,新军备与旧日本陆海军相比,有两个最重要的不同点:一点是在制度上贯彻了关于军事的非现役军人统制(civilian control);另一点是志愿兵役制。

旧日本军,军队的统帅大权属于天皇,作为统帅机关的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直属天皇,对政府和议会是完全独立的。作为军政机关的陆军省和海军省是内阁的一部分,陆海军大臣同其他各省(相当于部)大臣一样也在总理大臣的统辖之下。陆海军大臣分别根据陆海军部内意见从现役陆海军的上将或中将从中任免之。首相不能随意任免。而且陆海军大臣还掌管有关实施军令的业务。其范围不受总理大臣的指挥和监督,直接接受天皇的命令,并向天皇报告。此外还有几个法令。总之,陆海军独立于政府和议会之外,政府不能指挥军,军则能牵制政府。政府对决定国防的最高方针不能加以任何干与,而且对天皇和军部决定的国防最高方针,政府必须服从。

新军备体制与此相反,在制度上内阁总理大臣是军的最高指挥者,在总理大臣的最高指挥之下,防卫厅长官统帅三军。这样,防卫厅长官关于纯军事方面,接受由现役军人陆海空各军幕僚长和三军幕僚长组成的联合幕僚会议的辅佐,而部队的指挥则通过

各幕僚长来进行。

总理大臣和防卫厅长官都必须是文职人员(civilian)。国防会议也只能由文官大臣组成。而且辅佐长官策划和制定有关防卫厅所管事务的基本方针的参事官也必须是文官。

这样,新军备在法制上是受文官的总理大臣、防卫厅长官和参事官的统辖的。而且总理大臣是根据国会提名从国会议员中选任。说到底,是国会统辖军。这种彻底的文官统制,换句话说就是政府统帅军,防止象过去日本那样军拖着政府走、军部为所欲为地推行军国主义。这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应该说垄断资产阶级对军队拥有支配权。

在建立这种文官统制制度方面,估计美国政府可能施加了压力。例如强烈主张国防会议成员要加上旧军人的是处于在野党时的改进党和自由党的鸠山派。1954年底,鸠山与改进党合并组成日本民主党,终于取得政权,这时政府和执政党,一反他们处于在野党时期的主张,制定了阻止旧军人参加国防会议的道路的现行法令。只能认为他们态度的改变,与其说是由于日本国内在野党的动向,莫如说是受到美国政府的压力。

第四,自卫队与旧军队相比另一个重要的不同点是,自卫队也同保安队和警察预备队一样,是志愿兵役制。但是,自卫队内有预备自卫官制度。自卫队的士兵(陆、海、空军的士兵)、下级军官(陆、海、空军的上士、中士、下士)以及军官(中将、少将,上校、中校、少校,上尉、中尉、少尉),所定服役年限届满后,根据本人志愿,并经政府考试,可当预备自卫官。预备自卫官任期三年;但根据自愿可续任三年。拥有预备役制度也表明自卫队是正式的军备。但是到现在为止,志愿当预备自卫官者,与政府的要求相反,是极少的。

第五,自卫队是借助美国的《共同安全法》援助建立起来的,

这对分析自卫队性质是最重要的。

在给日本的《共同安全法》援助中，有无偿援助（Military Assistance Program, MAP）和有偿援助（Military Assistance Sale, MAS）两种。

无偿援助中包括由美军供给和借给其现有的武器和舰艇等。日本的情况是供给的占大部分。借给的只有根据舰艇租借协定租借的旧式驱逐舰（自卫队称护卫舰）和沿岸警戒艇。另外，在无偿供给中，有一种称作“域外采购的方式”。即美军向日本军火工业界订货，让它们制造武器，然后买过来无偿供给日本。用这种形式，日本可以无偿地加强军队装备，而且还有助于加强和发展国内军火工业，同时还可以赚得美元，真是一举三得。日本政府希望尽可能多给“域外采购”援助，但只有两艘驱逐舰的建造和车辆的新旧更换这两件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

有偿援助有三种方式：第一，美军把现在使用的武器卖给日本。这种办法的好处是可以买到靠通常的商业交易买不到的武器。第二，美国手头没有武器，政府另向美国军火制造商订货，将其产品卖给日本。第三种方法是，日本引进美军新型武器的生产技术，在国内生产，作为日军的武器。采用这种方法时，使用技术的专利费和部件的价款以及其他生产费用的一部分，由美国政府负担。这种方法对发展日本军火生产技术非常有利。现在自卫队的空军超音速练习机 T 33 和喷气式战斗机 F 86 F 等，就是以这种方法在日本生产的。

《共同安全法》援助是从美国 1954 会计年度（1954 年 7 月—1955 年 6 月）开始的。其中无偿援助一直给到美国 1964 会计年度（1964 年 7 月—1965 年 6 月）。在这期间的无偿援助总额达五千六百亿日元；有偿援助四百亿日元，不到援助总额的百分之十。

从 1951 年度到 1957 年度，美军无偿供给和借给的武器弹药

合计折价（但它是以半新的当新的计价）三千四百五十五亿多日元。尤其是《共同安全法》协定刚成立后的1954年和1955年，都近一千亿日元，超过了这两个年度的防卫厅预算（1954年度七百四十三亿日元，1955年度八百六十八亿日元）。从1958年度起施行第一次防卫力整备计划，有计划地扩大武器国产化。在此以前，即自卫队的创建期，其装备可以说完全依赖美国的援助。

美国声称为了把这些援助武器交给日方，教给使用方法和和管理这些租借的武器等等，即为了实施《共同安全法》协定，在东京设立了对日军事援助顾问团（MAAG—J）。保安队的美军顾问没有法律根据，而对日军事援助顾问团才算有了法律根据。这个顾问团当初以美军的将领为首，有军官二百一十二人、下级军官和士兵二百五十三人。与保安队时期一样，美军顾问团掌握有关自卫队的编制和训练的实权。此后，一方面随着自卫队和日本国内军火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共同安全法》无偿援助被取消了，加上本来就很少的有偿援助变得可有可无，美军顾问团人数减少了，到1967年剩有军官陆军二十五人，海军十人，空军十二人，合计四十七人，下级军官和士兵仅十六人；1968年进一步减少，剩有军官十八人，下级军官和士兵八人。这时顾问团已经不再领导自卫队，变成有偿援助（这也不是成品销售，而主要是利用日美两国分担的经费进行专利生产）的事务机关。

《共同安全法》援助，如上所述，在自卫队的创建期与初期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之后十年多几乎完全失掉它的意义。然而从警察预备队以来，日本重整军备的基础，是根据美国的要求和指导与事实上的指挥来进行的，其部队的编制、训练是效法美军的，其装备几乎完全依赖美国，这就使自卫队在军事技术方面（在政治和战略方面不消说）也完全从属于美军了。

这种在军事技术方面的完全对美从属，不只是日本军，南朝鲜

军和台湾蒋介石集团的军队也是一样的。美军内心是想在必要时组织起美、日、韩、蒋联合军，因而对这些部队进行了统一的编制、训练和装备。

对日《共同安全法》援助是为了使日本的军备从属于美国。1963年4月，美国参议员丘奇在参议院提出停止对日无偿援助的建议的讲话中露骨地谈到了这一点。据此，美国国防部说明援助意义如下：“美国通过给日本援助资金让它采购某种武器，这样便对日本保持的军队有了影响力；在西太平洋的防御（指侵略战争）方面，就能使日本适应美国的综合战略。”

关于自卫队在政治上和战略上严重地从属于美国的问题，将在后面叙述。

第二章 有计划的扩军与日美军事同盟

第一节 “大东亚共荣圈”再版之梦与日美关系

1954年是日本垄断资本结束复兴阶段、开始新的高速增长的一年。重化学工业率先积极进行了技术革新和设备投资。与这一新经济阶段相适应，这年成立了防卫厅和自卫队。此后，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日本的军备也得到迅速扩大。

这年年底，自由党的吉田内阁垮台，由改进党与鸠山自由党合并的日本民主党的总裁鸠山一郎组成内阁。吉田内阁自1948年11月组成以来，依靠美帝国主义的大力支持，把持政权直到1954年底。执政党的自由党严重腐败，因造船贪污案件被揭发，受到致命打击。垄断资产阶级担心继续让吉田和自由党执政会加剧人民大众对整个统治阶级的不满，从而使阶级斗争激化起来。于是便迫令吉田内阁总辞职，换成鸠山内阁。在现代日本政治史上，垄断

资本家公然积极干与政局，这还是第一次。

鸠山内阁及其执政党对重整军备最积极。在取得政权以前，他们曾主张修改规定放弃战争的宪法；但在取得政权以后，他们发现鼓吹改宪论就不可能在选举中取胜，便把这一主张隐蔽起来。他们又说起什么即使不修改宪法也可以拥有以自卫为目的的军备。为了使建立自卫队合法化，前内阁在当时就宣扬过此类论调。

鸠山内阁组成后的第二个月，1955年1月解散了众议院，2月举行大选。选举结果，民主党获一百八十五席，变为第一大党；自由党获一百一十二席。当时社会党分裂成左右两派，左派获八十九席，右派获六十七席，合计为一百五十六席。此外劳农党获四席，共产党获两席，从右派社会党到共产党加在一起为一百六十二席，即超过众议院议员定额（四百六十六席）的三分之一，这些党都反对修改宪法。根据日本国宪法的规定，要修改宪法必须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取得议员定额三分之二以上的议员的同意。现在反对修改宪法派超过众议院议员定额的三分之一，因此目前不可能合法地修改宪法。

然而，鸠山内阁和民主党对修改宪法并未死心。自由党也热衷于修改宪法。为了制定宪法修改草案，两党都分别在党内设立了宪法调查会，其制定的宪法修改草案都明确规定天皇为国家元首；实行征兵制，规定国民有保卫国家的义务；在“自卫”的名义下，可以无限制地扩军，也可以对外进行战争。民主党和自由党两党的宪法修改草案，另外还有不同的地方，但上述三点是共通的。

垄断资产阶级对社会党以及比它更左的政党在议会占三分之一以上的势力感到威胁，为了加强资产阶级政党，强烈要求自由党与民主党两党合并和统一。结果，1955年11月，两党合并组成一个“自由民主党”。在这个党的成立大会上所通过的政策中规定有这样的条项：“自主地修改宪法，修改和废除不符合国情的占领

法规。”

因组成自民党，改组了内阁，于是组成了第三届鸠山内阁。新内阁的“三大目标”的第一项就是修改宪法。第二年即1956年，在第二十四届通常国会上，政府和自民党操纵会议使其通过了在内阁设立宪法调查会的法案，并于6月公布了该项法案。但社会党（在此以前于1955年10月左右两派合并）及其它党派拒绝向调查会派出委员，所以调查会没有马上成立。

鸠山内阁为了获得修改宪法所需国会两院议员定额的三分之二以上的议席，企图修改选举法，将现行的中选举区制改为小选举区制，采用新选举区比例。修改选举法严重影响到现职议员的直接利益，因此即使在自民党内也强烈反对对鸠山派特别有利的修改草案，再加上议会外人民大众的反运动也高涨起来，结果选举法的修改没能实现。

鸠山内阁之所以这样一味地竭力追求通过修改宪法和实行征兵制划时期地增强军备，是因为它代表进入高速增长时期的日本垄断资产阶级希望提高对美帝国主义的地位和拥有足够将来独立所需要的军事力量的愿望。从同样的愿望出发，鸠山内阁还极力恢复日苏邦交，借此实现日本参加联合国。鸠山不顾美国政府和部分日本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对，1956年10月，实现了日苏复交；从而在同年12月的联合国大会上，日本实现了加入联合国的愿望（以前因苏联反对，日本加入联合国受到阻挠）。

鸠山乘机从政界引退了。之后石桥湛山当了自民党总裁，组成内阁。石桥在任三个月，因有病于1957年2月实行内阁总辞职，岸信介接任自民党总裁，当上了首相。

战争期间东条内阁的商工大臣、甲级战犯岸信介的政府，露骨地推行了军国主义政策。

岸信介刚一上任马上就在国会明目张胆地叫嚷什么如果为了

自卫而袭击敌人进攻日本的基地也不违反宪法；为了自卫拥有非进攻性的核武器，宪法是允许的等，借“自卫”之名，为疯狂扩军而奔命。

岸内阁第一次召开了国防会议，1957年5月20日决定了《国防基本方针》。这一方针直到今天即1976年，从来没有修改过。该方针规定，国防的目的在于保卫日本的独立与和平，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该“基本方针”规定下述四项内容：第一，支持联合国的活动；第二，安定民生和发扬爱国精神；第三，“根据国力和国情，在必要的自卫限度内，逐步发展防卫力量”；第四，“对来自外部的侵略，则根据同美国的安全保障体制对抗之。”

第三项的“在必要的自卫限度内”，对以岸内阁为首的日本资产阶级政权来说，实际上是没有限制的。第四项是依赖美帝国主义。然而当时的《日美安全条约》规定：驻日美军得用来帮助“日本免受外来武装进攻之安全”（《国际条约集 1950—1952年》，世界知识出版社，第394页），这是一种美国对日本的防御不负任何义务的东西。起草该条约的美国国务院顾问（主管对日媾和问题）杜勒斯在1951年2月26日提给美国议会的报告书中说，他在同月月初与吉田首相会谈时，“强调在目前，美国不承担日本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义务”，对此，吉田表示谅解（《朝日年鉴》1952年版）。

既然《日美安全条约》是这样一种条约，那末为什么岸首相等人可以把根据“安全条约体制”作为日本防御外来侵略的“基本方针”呢？

他们接受美国的《共同安全法》援助，是期望迅速扩大和加强日本自身的军备，从而把日本纳入美国的世界战略体制，尤其是侵略亚洲的体制之中，把“安全条约”改成形式上日美对等的双边军事同盟条约。

他们这样期待是有根据的。即 1955 年 8 月，在鸠山内阁时期，外相重光葵去华盛顿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议将《日美安全条约》改成双边军事同盟条约，对此，杜勒斯原则上表示同意。然而却附有以下重要条件：“日本能够尽快地承担起防御本国国土的第一阶段的防务，并且能够对维护西太平洋的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的各项条件具备了并能够实行时，将随时站在合作的基础上作出努力”。就是说这些条件一旦具备，美国将满足日本的希望，同意修改“安全条约”。重光约定将满足这些条件。

这种约定是说日本要协助美国侵略西太平洋（东亚），创建能够向海外派兵的军备和政治条件。在报道重光和杜勒斯会谈的联合公报时，不仅日本的反军国主义势力，而且美国的多数评论家都一致理解为这是日本约定向海外派兵的。因为暴露出真实意图，日本政府便慌了神，出来支吾其词地掩盖，说联合公报中的“并且”是英文原文“and”的误译，真正的意思是“其结果”或者“于是”。

鸠山内阁以这个联合声明的目标为努力方向，积极扩张军备和培植军国主义思想。而接替鸠山内阁的岸内阁，对此更是倍加努力。如果根据这样的历史背景来理解《国防基本方针》的第四项，那末可以清楚地看出，它不是消极地要求美国来防卫日本，而是与美国称霸东亚体制相勾结来确立日本“国防”的地位的。这一点，通过后来岸内阁的所作所为就看得更清楚了。

在决定国防方针的那一天，岸首相出国旅行，历访了缅甸、印度、巴基斯坦、锡兰、泰国等各国政府以及台湾蒋介石一伙。日本在职首相访问东南亚各国，不论战前还是战后，这是第一次。这次旅行的目的有两个：首先是想就利用美国的资金、日本的技术、当地的资源和劳动力“开发”东南亚的设想征得各国政府的同意。但各国政府一眼就看穿了，这个设想是以美国为主人，日本充当其当地的老板，剥削东南亚的新殖民主义，从而拒绝了岸的提议。“大

东亚战争”的战犯岸信介不了解：现在已经不是“大东亚共荣圈”再版之梦通行无阻的时代。旅行的第二个目的是视察东南亚的实际情况，探索日本在这一地区协助美国的道路，并将它带到美国作为访美的礼物。为此目的，岸信介同其旅行的最后访问对象蒋介石进行了会谈，对蒋说：“日本保守党决不采取容共或者中立的立场”。对蒋介石“恢复大陆自由表示赞同”的日本人，“在对付来自俄国的共产主义渗透很坚强，但对付来自中共的渗透却软弱无力。这一点自己感到很可怕。因此，如果解放大陆有了进展，对日本来说也是值得高兴的。”（井上清著《从历史上来看岸内阁的性质》，载《中央公论》1957年12月号，参考本书第184页）

岸信介的这些话不仅是对蒋介石的恭维和鼓励，不仅是对美国说的，也是他的真心实意的大暴露。

6月4日从东南亚回国的岸信介，14日决定了很早以前就在国防会议上研究过的1958到1960年的扩军计划（内容后述），16日便带上这个计划飞往美国。日本的在职首相去华盛顿朝拜，同去东南亚旅行一样也是从岸首相开始的。岸信介在华盛顿同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杜勒斯国务卿进行了会谈，他说日本正在努力增强军备，在东南亚政策方面愿意积极地协助美国；他要求修改《日美安全条约》，要求美国归还冲绳和小笠原岛的行政权，希望美国设立东南亚开发基金，然而美国一项也没有接受。这次会谈大概与1955年重光 and 杜勒斯会谈的结果相同，但在公布的联合声明中，没有象过去那样流露出真心话的词句。联合声明只说日美关系“正进入一个利益一致、互相信赖和基础牢固的新时代”。

岸信介所取得的具体成果是，美国欢迎日本扩军，信赖日本的军备，因而约定在明年度（1958年度）内撤走美驻日地面部队。这是因为美国的军事战略改为所谓的“大规模报复战略”，也就是说美国把重点放到飞速增强核导弹，借此对敌国中枢地区一举给

(表1) 日本政府从1950到1975年的军费支出

年 度	防卫本厅费 (亿日元)①	防卫支出费 等(亿日元)②	合计 (亿日元)	占国民收入 的比例(%)	备 考
1950	200	1,112	1,312	3.88	此外还有“安全保障” 费 560 亿日元(1955 年度以前用完)
51	310	956	1,266	2.94	
52	591	1,234	1,825	3.50	
53	611	643	1,254	2.14	
54	742	607	1,350	2.08	
55	866	482	1,348	1.88	
56	999	429	1,428	1.79	
57	1,006	428	1,435	1.57	
58	1,197	287	1,484	1.57	
59	1,352	204	1,556	1.45	
60	1,509	90	1,600	1.23	从这年起停交防卫分 担费(交付美军的费 用)。为美军修建设 施也包括在防卫设施 厅费内。
61	1,738	96	1,835	1.19	
62	2,025	112	2,137	1.24	第二次防卫力整備 计划
63	2,232	142	2,475	1.24	
64	2,654	153	2,807	1.24	
65	2,869	184	3,053	1.22	
66	3,239	211	3,450	1.20	第三次防卫力整備计 划。《共同安全法》的 无偿援助停止(从1955 到1963美国会计年度 对日无偿援助总额为 5,600亿日元)。
67	3,575	233	3,809	1.17	
68	3,967	169	4,236	0.8	
69	4,537	326	4,863	0.8	
70	—	—	5,695	—	第四次防卫力整備计 划(到1976年为止)
71	6,512	461	6,973	0.9	
72	7,495	775	8,270	0.9	
73	8,978	879	9,857	0.9	
74	9,854	1,166	11,020	0.8	
75	—	—	13,273	—	

资料来源: 1950到1967年数字根据朝日新闻社编:《日本的防卫与经济》; 1968到1975年数字根据矢野恒太纪念会编:《日本国势图会》1970和1975年版以及《朝日年鉴》1971和1976年版。

① 防卫本厅费, 包括警察预备队费和保安厅费; ② 防卫支出金, 包括驻日美军设施费、交付美军顾问团的费用、自卫队设施费和国防会议费。

(表2) 1950—1971年重整军备进度表

	警察预备队 1950— 51年度	保安队 1952 年度	自卫队 1954 年度	第一次扩军计划的 第一年 1958 年度	第二次扩军计划的 第一年 1962年度	第三次扩军计划的 第一年 1967年度	第三次扩军计划的 最后一年 1971年度
自卫队 队员	75,000 人	110,000 人	130,000 人	170,000 人	171,500 人	173,000 人	179,000 人
自卫队 预备队员				11,000 人	19,000 人	30,000 人	36,000 人
基干 部队	4管区队	1方面队 4管区队	2方面队 6管区队	2方面队 6管区队 3混成团	5方面队 13个师团	5方面队 13个师团	5方面队 13个师团
舰艇		26,900 吨	58,300 吨	82,500 吨	109,900 吨	118,300 吨	135,000 吨
护卫舰		13,100 吨	29,400 吨	50,600 吨	69,300 吨	68,600 吨	74,000 吨
潜水艇		—	—	1,500 吨	4,100 吨	7,400 吨	14,000 吨
其他		13,800 吨	28,900 吨	30,400 吨	36,500 吨	42,300 吨	47,000 吨
飞机		—	57架	200架	248架	235架	270架
飞行部队			1队	9队	18队	22队	21队
全天候战 斗机队			—	2队	5队	11队	10队
昼间战 斗机队			—	5队	10队	8队	8队
侦察机队			—	—	1队	1队	1队
运输机队			1队	2队	2队	2队	2队
飞机			147架	969架	1,157架	1,097架	970架
航空警 戒部队			—	10队	24队	24队	24队

以大规模打击上面，因而不重视日本基地上的地面部队。况且地面部队不断同日本人民发生摩擦和对立，加剧日本人民的反美斗争，在政治上给美国带来很大的不利，而且其战略价值已经减少。因此将其撤回，让日本自卫队去接替它。这是撤走美驻日地面部队的真正意图。

还有，在此以前，在鸠山内阁时期，经重光和杜勒斯会谈，日美已商定从1956年度起，随着日本军事预算的增加，日本付给美军的防卫分担费，将减少相当于军事预算增加部分的半数，这样一来，日本的军事预算愈增加则交付美国的防卫分担费就愈少，最后直至完全废除。这件事再加上这次约定撤退美军地面部队的保证，尽管很有限，但可以看成这是日本军备在摆脱对美依赖，并向自主的军备发展。

岸首相亲自带到美国去的1958到1960年度的三年扩军计划，正式叫做“防卫力整備计划”，这是第一次扩军计划。从完成这一计划两年后的1962年度起到1966年度止的五年计划是第二次扩军计划；从1967年度到1971年度是第三次扩军计划；从1972年度到1976年度是第四次扩军计划，即所谓“第四次防卫力整備计划”。这种计划一般简称为“一次防”、“二次防”、“三次防”、“四次防”。从1977年度开始的计划方案，正在由现政府拟订中。

“一次防”声称：“建立与国力和国情相适应的、必要的、最小限度的自卫力量”，三年间计划陆上自卫队达到十八万人，海上自卫队舰艇约达十二万四千吨，航空自卫队飞机达一千三百架。其经费总额为四千五百三十亿日元左右，它将根据各年度的财政情况来分配，并按照各年度计划来订购装备，招募和训练必要人员。

这里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借此向美国证明日本是履行《共同安全法》中所保证的日本增强防卫力量的义务的，并正在为把《日美安全条约》修改成双边军事同盟创造条件；另一个目的是保证军火

工业资本家能够安心地进行军需品生产，以使军火工业得到有计划的发展。这一目的在“一次防”的书面计划中是这样写的：“结合防卫力的整備，应对军事工业的整備采取必要措施”。经团联防卫生产委员会和军火工业资本家团体——日本兵器工业会早就强烈要求政府进行这种有计划的扩军。

战前，日本陆海军部要求扩军时，政府根据财政情况，接受或不接受军部的要求。如果政府不接受军部的要求，军部就叫陆海军大臣辞职，借此打倒内阁，这种事例也曾有过。内阁对决定军备的发言权是极小的；更何况资本家，他们对决定军备计划没有任何发言权。战后至今不是军方自己提出扩军要求，而是一直保持垄断资本组织提出扩军要求，政党和政府响应，制定扩军方针，由军方拟订具体计划草案，经国防会议（即没有一个军人参加的政府内的军事委员会）认可，并征得议会同意的形式。这就是说，是垄断资本控制军备计划。

“一次防”大体上按计划实行了。因此美国政府对日本政府的这种政策抱有好感。1958年9月，第二届岸内阁的外相藤山爱一郎访美，向杜勒斯国务卿提出举行修改“安全条约”谈判的建议时，出乎藤山和日本政府的预料，杜勒斯很快就答应了，他说：“现在日本与订立现行安全条约时不同，自卫力量增强了，从这点来看，安全条约可以重新研究。”

结果从1958年10月初，日美在东京开始举行修改“安全条约”的谈判。

这时岸首相肆无忌惮地暴露出极端的军国主义本性。例如1958年5月4日在长崎市举行的世界邮票展览会的会场上，法西斯青年把悬挂在许多国家的国旗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拉下来撕碎了。中国政府对日本政府容许如此侮辱中国的行动一事提出严重抗议。对此岸首相若无其事地说，日本没有承认“中共”，因

此那个所谓的国旗在日本政府来看,只不过是一块布,弄坏一块布这点事,在刑法上顶多算是犯了损坏器物罪,不能构成对外国国旗的侮辱。民间人士呕心沥血发展起来的日中民间贸易和友好往来的狭小渠道,就这样由岸首相给破坏了。

这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为惩罚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妄想“反攻大陆”的蒋介石,开始向金门、马祖的美蒋军基地打炮。岸信介热情支持蒋介石,10月15日,他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广播记者说:“为防止台湾和韩国被共产主义者征服,日本应该尽可能地作好一切准备。台湾海峡的形势不是中国的内乱,那是反对共产主义侵略的国际战。日本已经到了应该修改宪法第九条、以便能够向海外派兵的时期。”岸信介的发言被播放到美国全国。

岸内阁任命的“日韩会谈”(日本和南朝鲜为实现邦交正常化,双方代表举行会谈一事,将在第三章详述)日方首席代表泽田廉三(外交界元老),1958年6月在原来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朝鲜总督府有关人员的集会上讲话说:

“日清和日俄两次战争都是为了把威胁日本、入侵朝鲜半岛的势力推回到鸭绿江那边而进行的战争。如果我们不能第三次奋起将三十八度线推回到鸭绿江那边,就对不起我们的祖先,就对不起前辈。这是日本外交的使命。三十八度线是韩国的命运线,同时也是日本的命运线。”

岸内阁如此疯狂地反对人民中国和人民朝鲜,在美国的指使下对中国和朝鲜竟然采取不惜进行反革命侵略战争的态度,为此企图有计划地增强军备,有计划地扶植军火工业,以及修改日本国宪法,所有这些都博得了美国政府的欢迎,因此为把《日美安全条约》修改成形式上的日美双边军事同盟而举行的日美会谈,进行得很顺利。而日本人民反对修改“安全条约”的斗争,也是史无前例地高涨起来。可是结果反动势力和军国主义势力竟不顾人民的反

对，于1960年6月20日使第二次《日美安全条约》自然通过了议会。

根据新“安全条约体制”，日本变成美国侵略亚洲体制的积极而重要的力量。质和量都已超过战前的、高度发展起来的日本垄断资产阶级，正如前引岸信介的发言所看到的，已经燃烧起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欲火。而实现他们的这种欲望的武器，就是从日本方面估计的新的“日美安全保障体制”。

从美国方面来看，这是把复活的日本垄断资本捆在美国战略体制上而加以利用的体制。然而这个体制并不是美国强加给日本的，而是日方要求的，是日美双方统治阶级在政治和军事利害一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第二节 第二次和第三次扩军计划与垄断资本

岸内阁在新《日美安全条约》通过后引退，1960年7月，大藏省官僚出身的池田勇人当了自民党总裁和首相。池田内阁全力以赴地推行众所周知的高速经济增长政策，即牺牲工人、中小资本家以及农业和农民利益的垄断资本的超高速增长，并以高速增长为经济基础，以新安全保障体制即对美从属的日美军事同盟为主要支柱，全力以赴地复活和加强日本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

为此，在教育、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推行了一系列政策。这方面的情况就不详述了。这里仅着重提一提池田一再散布的日本大国论。他夸耀日本经济的惊人发展和有高度教育水平的上亿的国民，挺起胸膛地说：日本已经是一个大国。他一有机会就向国民灌输：大国日本义不容辞地要承担与其地位相称的国际责任；“中立主义”只不过是“小国的保身术”，对大国日本来说，中立主义是幻想；日本应该自始至终作为“自由主义国家”的一员，尽其国际责

任,成为“中共”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所“敬畏”的国家。

池田的日本大国论是掩盖日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对美从属的蛊惑宣传。从经济和资产阶级教育水平来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除外,在这一时期日本已经接近西德和英国,成为与法国和意大利并驾齐驱的“先进大国”。因此池田的大国论对煽动日本国民的帝国主义思想意识,对从思想上和心理上加强军国主义,具有极大的持续效果。

池田内阁组成两个月后,1960年9月,日本政府向美国提议在东京召开第一次日美安全协商委员会。该会是根据缔结新“安全条约”时岸首相和美国国务卿赫脱的来往信件,为实施新“安全条约”随时进行协商而设立的,日美任何一方提出要求就可召开。日方由外相主持,防卫厅长官参加,美方代表由美驻日大使及其最高军事顾问美国太平洋部队总司令组成。据各报报道,在第一次协商委员会上,日方说明了自卫队的现有势力以及1961年度的军备计划,要求美国提供军事援助。美国就国际形势现状,对整个军事、政治和经济,相当详尽地阐明了自己的意见。然而日美任何一方都一点也没有透露其具体内容。这种协商会,尽管日美形式上是对等的,实质上是日本接受美国要求的场所。这样看恐怕是不会错的。

1961年7月,以池田首相为主席的国防会议决定并公布了1962到1966年度的长达五年的“第二次防卫力整備计划”。该计划规定日本军备的目标是:“在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下能够有效地对付使用常规武器的局部战争以下的侵略”。

在“一次防”里所规定的军备目标为:“建立适应国力和国情的最小限度的自卫力量”;在“二次防”里,如上所述,进一步具体化了。“二次防”的目标,从字面上来看,变成防御来自外国的侵略。可是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不是防御而是侵略性的,上述所谓的“防

御”实际上是美军发动侵略朝鲜战争，而自卫队同它联合作战，主要担负日本本土的防御。这一点由后来揭露出来的《昭和三十八(1963)年度共同防御作战图上研究》，又名《三矢作战计划研究》得到证明。这个问题容在下面稍微详细地加以叙述。

“二次防”规定到 1966 年度末所达之兵力为：(一)陆军十三个师，十八万人，预备自卫官三万人。在这些兵员当中，将建立奈基和隼式地对空导弹大队各两个；一个地对地导弹实验部队。坦克、机枪和步枪由美军提供或使用国产品，都换成最新式的装备；直升飞机增加一百零二架，以加强部队的机动能力。(二)海军，在计划年度内新造舰艇四万七千三百六十吨，取代陈旧舰艇两万五千六百五十五吨，总吨数将增为十四万吨以上。新造舰种包括三千吨级的护卫舰(驱逐舰)四艘、两千吨级护卫舰七艘、三千五百吨级练习舰一艘，此外为了加强海上警戒能力，新造一千五百吨级的潜艇五艘、布雷舰一艘以及其它舰艇。新造大型反潜侦察机(P₂V)七架，反潜直升飞机五十四架，到 1966 年度末，拥有海上飞机二百三十五架。并将大凑(津轻海峡)、舞鹤(京都府日本海方面)、小松岛(德岛县，鸣门海峡)、大村(佐贺县，面临对马海峡)等地区建成反潜直升飞机基地。(三)空军拥有的飞机数量将增加到一千零三十六架，计划培养的驾驶员数为飞机数的一点八倍。建立用喷气战斗机(机种名称从略)装备的全天候截击部队十一个队，其中有二百五十架飞机装备有空对空导弹。建立昼间截击部队八个队和侦察机部队一个队，用大型飞机装备的运输部队和电子侦察部队各两个飞行队。还计划建立半自动化防空警戒管制组织。此外为在 1967 年度编成鲍马克远程导弹防空部队，计划让必要人员在计划期内赴美留学。

“二次防”的预算总额约为一兆四千亿日元。每一年度的平均额为两千八百亿日元，接近“一次防”平均每一年度一千五百亿日

元的两倍。

“二次防”的奋斗目标重新编成地面部队，这项工作在“二次防”的前一年 1961 年就已经开始。过去的六个管区队和三个混成团，从 1962 年度起统一编成五个方面队十三个师。新师编制的特点是，各师兵员人数减少，车辆增加，机动能力为过去的四倍，火力配备为过去的两倍。这是效仿美国准备打原子战争的师团编制，平时尽可能分散配置，必要时能够迅速集中。十三个师分成北部（四个师、北海道）、东北（两个师、奥羽地区）、东部（两个师、关东和中部地区）、中部（两个师、近畿和中国地区）、西部（三个师、九州地区）等五个方面队进行配置。最重视北海道方面，这表明这种军备首先是假想对苏作战的，而东北方面军则是北部方面军的支援部队。其次，九州方面所重视的是监视朝鲜，由中部方面军为其援军。东部方面军主要承担东京及其附近地区的警备，其主要任务是镇压国内人民的革命运动。据说 1960 年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时，岸首相曾强烈希望出动驻东京的师团，后因防卫厅长官谏阻，他才打消了这个念头。然而那时驻东京的师团已经完全作好出动的准备。

海军的重点开始把过去的沿岸警备队转向海上护航和反潜作战。

空军的主要目标是通过装备最新式战斗机和导弹来提高截击能力。它开始拥有大型运输机部队，这同海军用大型最新式驱逐舰编成护航舰队一样，表明它不单是为在国内作战时运送地面兵力，已经着手准备向朝鲜出兵。

“二次防”的另一个特点是，陆海空三军都正式开始装备导弹。这些导弹中有的可以安装核弹头。尽管政府强调绝对不可能安装核弹头，但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人们，不论谁都认为在技术上这是可能的，一旦美国认为有必要让日本拥有核弹头，日本无疑是会接

受的。

“二次防”还特别注意扶植日本军火工业。从这一时期起，防卫厅决定对军需品采取长期一揽子订货方式。这样一来，接受订货的公司就可以有计划地稳定地进行生产，也就可以制定更新和扩大生产设备的计划。政府想在整个“二次防”时期，使百分之二十的装备实现国产化。所谓百分之二十的国产化，意思就是装备所需要的经费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付给国内军火资本家，百分之八十付给美国政府和美国军火资本家。不过，尽管说是国产，而战斗机、原子武器、导弹等，也是一种有偿援助的专利生产。

1967年开始的“三次防”表现出业已明显存在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新阶段，即依然以日美军事同盟为主要支柱，因而在国际政治上和战略上是从属于美国的日本军国主义的新阶段。

“三次防”扩军计划，其大纲是1966年11月在以佐藤首相为主席的国防会议上决定的；1967年3月公布了主要项目和所需经费。

“三次防”的目标与“二次防”一样，旨在建立“能够最有效地应付常规武器的局部战争以下的侵略事态的高效率的军备”。但它又说：“根据国内外形势、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等情况，力求充实和加强陆海空自卫队的内容”，与“二次防”当时相比，在这里流露出“国力增强了”、“国际地位提高了”的帝国主义的自信。

当时日本在经济方面已经超过了英国，达到同西德并肩争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的阶段。据海关统计，1965年贸易收支以对美贸易和对南朝鲜、台湾以及东南亚贸易的大幅度出超为主，出现十九亿多美元的盈余。在资本收支方面，长期资本收支有四亿一千五百万美元，短期资本收支有六千一百万美元，合计有四亿七千六百万美元的出超（即日本的外汇收支出现赤字）。贸易收支的出超刨去资本收支和贸易外收支等方面的赤字，结果国际收支的综

合项目有四亿五千万美元的盈余。自此以后，日本遂由资本输入国变为资本输出国，由债务国变为债权国。贸易收支连续保持大幅度的顺差。这种情况在整个日本近代史上，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那几年（1915—1918年）有过。然而这种大幅度的贸易顺差，是1965年起美国扩大侵越战争、日本充当其后勤基地的结果，估计美军的直接特需采购部分和美军花在南朝鲜和东南亚各国的美元被日本通过贸易吸收的部分所占的比重是很大的。因此贸易收支盈余以1972年为最高，而从直接和间接越战特需采购剧减的1973年（这年1月签订越南和平协定）起，突然急剧减少。可是贸易的规模，进口和出口都连续激增（请参照表3）。

经济大国日本当然要力争成为政治大国，其实统治阶级已经以政治大国自居了。这种自负表现在“三次防”计划中的“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高”之类的提法上。而政治大国的奋斗目标又必然是军事大国。“三次防”没有写明兵力和装备的具体奋斗目标。“三次防”与其说是追求兵员、舰艇、飞机的数量的增加，莫如说是旨在飞速加强整个装备的质量。计划规定的师团数目同过去一样仍为十三个，但其中一个师计划装备成机械化师，其他各师的机动能力和火力都将得到进一步加强，换成新型坦克，并将增强新的地对空导弹部队；海军计划加强反潜能力；空军全面提高质量，加强运输机部队。

“三次防”的经费预算总额为两兆三千四百亿日元，为“二次防”实际支出一兆一千六百三十五亿日元的两倍多。

如上所述，“三次防”的主要目标不是增加数量而是提高质量，实现装备新型化。装备的国产化比重计划达到百分之六十到八十。《共同安全法》协定的无偿援助在“三次防”期间全部停止了，资本家反而把它看成是好事。尽管新型飞机和电子武器进口成品比有偿援助的专利生产或纯国产的产品，价格便宜得多，但日本资

(表3) 日本国际收支的变迁(1965—1974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方式单位:百万美元)

	1965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一)经常收支	932	1,254	△ 190	1,048	2,185	1,970	5,797	6,624	△ 136	△ 4,549
1. 贸易收支	1,901	2,275	1,160	2,529	3,752	3,963	7,787	8,971	3,688	1,628
出口	8,332	9,641	10,231	12,751	15,728	18,969	23,566	28,032	36,264	54,506
进口	6,431	7,366	9,071	10,222	11,976	15,006	15,779	19,061	32,576	52,878
2. 贸易外收支①	△ 884	△ 886	△ 1,172	△ 1,306	△ 1,382	△ 1,785	△ 1,738	△ 1,883	△ 3,510	△ 5,888
收入	1,563	1,931	2,182	2,607	3,262	4,009	4,840	6,238	8,493	11,992
支出	2,447	2,817	3,354	3,913	4,644	5,794	6,578	8,121	12,003	17,880
3. 转移收支②	△ 85	△ 135	△ 178	△ 175	△ 185	△ 208	△ 252	△ 464	△ 314	△ 289
收入	63	69	74	83	82	98	127	138	149	186
支出	148	204	252	258	267	306	379	602	463	475
(二)资本收支	△ 476	△ 872	△ 305	△ 30	14	△ 867	1,353	△ 2,521	△ 7,343	△ 2,534
1. 长期资本	△ 415	△ 808	△ 812	△ 239	△ 165	△ 1,591	△ 1,082	△ 4,487	△ 9,750	
2. 短期资本	△ 61	△ 64	506	209	179	724	2,435	1,966	2,407	1,419
(三)错误和遗漏	△ 51	△ 45	△ 75	84	84	271	527	638	△ 2,595	244
(四)综合收支[(一)+(二)+(三)]	405	337	△ 571	1,102	2,283	1,374	7,677	4,741	△ 10,074	△ 6,839
金融结算	405	337	△ 571	1,102	2,283	1,374	7,677	4,741	△ 10,074	△ 6,839
外汇储备增减额	108	△ 33	△ 69	886	605	903	10,836	3,130	△ 6,119	1,272
其他	297	370	△ 502	216	1,678	593	△ 3,031	1,611	△ 3,955	△ 8,111

资料来源:《日本国势图会》1970年版和1975年版。

① 贸易外收支:又称无形贸易收支,其中包括运输、保险、旅行、和投资利润等方面的收支。△:表示支出超过收入。——译者
 ② 转移收支:包括私人“赠与”、来自海外移民的汇款、赔偿、政府援助等有去无回的单方支出的收支。——译者

本家不光考虑自己攫取直接利润，而且还考虑到军火工业能促进机械工业和电子工业发展最新技术的利益，因而他们提出大义名分来说，军火生产的独立对加强国防非常重要，便强烈要求武器要国产化，并基本上实现了。

然而美国政府和军火资本家推销军火成品的运动也很猛烈，美国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如在出售战斗机方面，洛克希德公司和格拉曼公司之间的对立)也很激烈。因此，是国产还是进口？如果进口，那末选择美国哪家公司的哪种产品？在这方面国内外资本家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而且政府和执政党也参与了这种竞争，于是行贿和受贿事件层出不穷。震撼今天日本政界的洛克希德行贿事件，不是孤立的偶然现象。

在“一次防”计划时期，围绕战斗机是用格拉曼公司的？还是用洛克希德公司的？发生过激烈的对立。在1958年4月的第四次国防会议上，一度内定用格拉曼公司的飞机。可是当时的自民党总务会长河野一郎(现在的中曾根干事长是河野的部下，河野死后，中曾根继承了该派)，与儿玉誉士夫勾结起来，为推销洛克希德公司的飞机而奔走，在1959年6月的第五次国防会议上，推翻了上次的决定，在同年11月的第六次国防会议上决定用洛克希德公司的飞机。“三次防”在选定战斗机时，也发生过道格拉斯公司和洛克希德公司的推销竞争，结果道格拉斯公司获胜。在“四次防”计划时期，T₂超音速练习机是用国产的(三菱重工业公司制造)？还是进口(诺斯罗普公司产品)？在1972年10月召开的国防会议上发生了激烈争执，结果三菱重工业公司获胜。在这些推销竞争当中，进行了巨额贿赂竞争，所谓的“黑雾”笼罩着日本，成了当时的重要话题，只是其证据没有被揭露出来罢了。1968年3月7日，《朝日新闻》列举了防卫厅长官频繁更换的事实，从任命第一任警察预备队长官的1950年8月起到1967年12月止，长官更换了

二十三人，平均每人任期仅九个月——这暴露出防卫厅长官这个宝座成了自民党内各派争权夺利的目标。

话有些离题了。“三次防”的武器国产化率达到了百分之八十的目标。剩下的百分之二十，主要是《共同安全法》的有偿援助（主要是专利生产），处理与此有关事务的美军顾问也只剩下二十几名。而且他们已经不再干与自卫队的编制或训练了。

第三节 第四次扩军计划与对日本战斗力的评价

关于制定“四次防”计划，1971年4月当时的防卫厅长官中曾根康弘公布了所谓中曾根方案。在该方案正式决定之前，方案中预定购买的T₂教练机（二十架）、RF_{4E}鬼怪式侦察机（十四架）以及CI运输机（十一架）等这些“四次防”的最重要的新型装备的经费，就已经列入1972年度预算。对此，各在野党认为“四次防”的这种先斩后奏的作法太不象话，于是在1972年2月的国会上，对政府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因此“四次防”的正式通过大大推迟，在1972年10月的国防会议上通过大纲，而详细的具体方案一直悬到1973年2月，即1972年度末。

“四次防”的决定所以如此推迟，其背景是国内外的政治形势起了很大作用。1971年7月，美国政府发表了尼克松总统将在翌年5月前访问中国的新闻公报；1972年2月尼克松访问中国；中美发表了上海联合公报，发生了这个使东亚、太平洋地区的紧张形势大大缓和的事件。并且美国在越南的失败眼看就要成为定局，因美国背信弃义而拖延下来的和平会议，大有达成协议的可能。也就是说，日本为实现真正防御不得不加紧增强军备的形势完全不存在了，尽管如此，中曾根的预算方案竟超过从“一次防”到“三次防”十四年间预算总额的一倍，这种大幅度扩军的企图，遭到日

本人民大众的激烈反对。自 1969 年 11 月佐藤和尼克松发表联合声明以来,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带头,东南亚各国对日本军国主义进行了严厉批判(这点将在下章再谈)。反映这种国内外形势,社会党及各在野党反对扩军的力量增强了。而且从 1971 年夏天开始,所谓财界即垄断资本集团对佐藤内阁表示强烈不满,说佐藤首相没有能力应付激变的亚洲形势;在对美出口纺织品问题以及其他同美国在经济方面的对立加剧,没能满足日本垄断资本的要求,一味对美屈从,等等,开始要求佐藤下台,内阁于是不稳。1972 年 7 月,佐藤内阁总辞职,田中内阁组成,9 月,实现了日中邦交正常化,使政局暂告稳定。这时才开始进行确定“四次防”的工作,在年度内的最后几天刚刚决定下来。

“四次防”的确定如此棘手,这说明日本急剧扩军和加强军国主义,同日本人民和亚洲人民之间的矛盾加剧了,因此军国主义势力随心所欲地进行扩军困难起来。“四次防”在本年度(1976 年度)就要结束,从 1977 年度起就该进入“五次防”,可是防卫厅尚未拿出方案。恐怕它将受到人民的抵抗比“四次防”时期还要大。洛克希德行贿事件使今天的日本政局陷入混乱的深渊,它将使“五次防”的决定更加困难起来。

叙述稍微讲到前面去了。“四次防”是把 1969 年 11 月佐藤和尼克松联合公报中所表现出来的帝国主义的野心,在扩军计划中具体化了。

在 1972 年 10 月的国防会议上通过的“四次防”,计划将 1972 年度到 1976 年度五年间的总经费定为五兆一千亿日元左右,企图进一步加强陆海空三军的装备。陆军大力增强坦克、装甲车和自行炮,试图把在“三次防”时期仅有的一个机械化师,实际上扩大到一切师,都实现机械化。并建立三个用新型地对空导弹装备的部队。在海军则作为提高对周围海域的防御能力和确保海上交通安

全能力的措施，计划一举扩大海军的行动范围。为此计划新造可载反潜直升飞机，或装备有舰对空、舰对舰导弹的新型驱逐舰十三艘，潜艇五艘，以及其他舰艇五十四艘，约七万吨；还计划新添反潜巡逻机七架以及其他作战飞机九十二架。空军则计划增强地对空奈基导弹部队两个飞行群，新增 F₄EJ 鬼怪式战斗截击机四十六架，RF₄E 鬼怪式侦察机十四架，国产 T₂ 超音速教练机五十九架，国产 CI 喷气式运输机二十四架，以及其它飞机。（通过“四次防”日本陆海空三军将拥有多大实力，这个问题小山内宏所著1974年出版的《这就是自卫队》一书作了详细介绍。）

陆海空三军的兵员数均未增加多少。因此这笔巨额预算比以前增多的部分几乎全都是拨充购置新装备的款项。借此将使武器国产化率的目标超过百分之九十。

“四次防”比“三次防”更具有攻击性。它规定“提高确保海上交通安全的能力”；“在对付空间入侵方面，进一步加强防空、截击和攻击能力，建成能在相当期间确保空中优势的体制”。在“三次防”以前，防卫计划在字面上还坚持海军和空军在领海和领空范围内行动的原则（实际上这决不可能）。可是今天的计划目标甚至在字面上也公然提出以在远离领海的远洋能够行动为前提的“确保海上交通”；不是在领空等候敌机，而是在“相当期间”（即到美空军全面来援以前）能够依靠日本空军自己的力量来维持日本周围空间的“空中优势”，即制空权。这一目标在以上略述的海军和空军的新装备计划中已具体化了。如果把这样的体制也称作“防御”，那不过是军事学上所说的“进攻防御”。

本来就在宣扬什么“以自卫为目的的军备和战力”也可以装备核武器啦，“为了自卫，攻击海外敌人的导弹基地也不违反宪法啦”，持续不断地大肆扩军。因此这种情况发展到“四次防”，连公海和公空的制海权和制空权，以及对外国的进攻都变成了奋斗目标

标,也就不足为怪了。

这种事情并不是职业军人想出来、推动政治家去干的,而是垄断资本家最先提出来的。1969年4月,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简称“日经联”)代表理事樱田武,在“日经联”大会上发表了令人吃惊的讲话,说“日本的安全是由美国和韩国的纳税人来维持的。因此不管日本怎样夸耀自己的经济繁荣,它也只是半个国家。我们必须提高认识,增强防卫力量,现在就成为一个完整的国家。”同年5月在日本兵器工业会大会上,会长大久保谦(接受陆海空军的电子设备订货最多的三菱电机公司总经理)在发表要求“把防卫预算提高到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四,准许向东南亚出口武器”的讲话时,博得会员的热烈掌声。当时的军事预算为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零点八,这就是说大久保要求一下子增加到五倍。即便是百分之零点八,日本1970年的实际军费额在资本主义各国中也仅次于美国、西德、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加拿大,居第七位。而在亚洲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日本的军备之大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是别的国家望尘莫及的,而且是唯一具有足以保持这种军备的工业能力的国家。尽管如此,垄断资本家还不满足。仅次于“经团联”的垄断资本的团体——经济同友会(该会是公认的“具有明知卓见”的团体)的代表干事木川田一隆(东京电力公司董事长),1969年5月发表讲话说,中东石油占日本能源的大部分,日本应该亲自保卫居于中东石油运输线上的马六甲海峡的安全。这一讲话使东南亚各国受到很大震惊,引起高度警惕。

在政治上代表资本家这种意向的是据说防卫厅长官中曾根康弘1970年秋亲自写成的所谓《防卫白皮书》原案。在方案里面第一次提出确保空中优势和海上交通安全的军备要求。

1975年8月28日各报报道:由于1973年秋发生了经济危机,很难完全达到“四次防”的目标。根据这种情况,政府预定将

“四次防”最终年度 1976 年度的预算，比 1975 年度增加百分之十五。尽管如此，估计海上自卫队约七万吨的新舰建造计划的近四分之一，即一万六千吨也不能完成；空军和陆军估计能完成计划。

如前所述，日本以世界最高的军费增长率、世界最快的扩军速度重整军备，在它的面前出现日益增大的政治困难，与此同时开始出现新的经济困难。然而日本统治阶级对这样的困难并不介意，将依然不肯放慢扩军的步伐。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军国主义是今天日本垄断资本的“活生生的表现”。尽管美国已经不想更加积极地进攻亚洲，然而日本统治阶级会又发现一种可以扩军的理由，即亚洲的形势和过去不同了，即他们无疑会拿所谓苏联的威胁来作为理由。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日本的威胁确实在迅速增加。然而也不能因此就拿来作为必须象过去那样继续扩军的借口。我认为排除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威胁是另有他路可循的。可是讨论这个问题不是本文的主题。

他们也许想通过进一步扩大和加强军火生产，以及向海外出口军火来摆脱部分经济困难。毫无疑问，其主要意图不仅想通过废除现行的志愿兵役制实行征兵制来解决经济困难，而且想拥有庞大的预备役部队，在军备方面一跃超过西德。实行征兵制的准备，甚至连技术方面的细节都已经完成。关于这个问题，在林茂夫著《征兵准备的现阶段》（1973 年三一书房版）一书，根据确凿的资料，作了非常详尽的、明确的阐述。

如此不断地进行扩充的自卫队究竟拥有多大的战斗力呢？进步的军事评论家小山内宏是这样评价的：在“三次防”完成阶段，陆上自卫队已超过旧大日本帝国陆军的实力；海上自卫队尽管舰艇总吨数还少，但已拥有不次于旧联合舰队的战斗力；航空自卫队已拥有可与世界第一流空军媲美的力量。小山内宏还根据“四次防”按兵种进行了说明，他说兵员人数虽未增加，但战斗力将变为“三

次防”阶段的两倍。自卫队已经拥有能够发射装有核弹头的炮弹、炸弹和鱼雷的装备。据说在“四次防”以后会拥有大型巡洋舰和核潜艇,甚至连拥有生物化学武器的准备都作好了(小山内宏著:《这就是自卫队》)。

进步军事评论家藤井治夫著的《自卫队——这种战力——》(1970年三一书房版)一书,也对自卫队的装备和编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明确指出它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军队。

在政府方面,外务大臣爱知揆一在美国的外交专刊《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1969年10月号上,写文章夸耀自卫队的战斗力说:

“日本的自卫能力是相当大的。日本的三个自卫队,宪法上规定它们不能向海外派兵。然而这个拥有二十八万五千多人的军队,业已拥有比帝国陆海军战争期间最高峰时的火力还强大的常规武器火力,已经形成非常有效的本土防御力量。本会计年度的防卫费为十三亿四千万美元,每年以百分之十四到百分之十五的比率增长着。据某非官方人士估计,大约在十年以后,日本的防卫费,大概可与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防费(包括常规武器经费和代价高得惊人的核武器开发经费)相匹敌。”

如上所述,进步的军事评论家为激发人民对日本军国主义危险的警惕性;反动的外务大臣为提高日本对美国的身价,都强调了日本自卫队的战斗力,但也有相反的说法。有一个从1952年到1972年一直在防卫厅工作的官员,后来当了防卫局长,并在1967年到1972年担任国防会议事务局长的海原治则强调说,日本军备的现状是,一旦苏联发动进攻,日本完全没有单独防御的力量。他的目的在于坚持和加强今天的日美安全保障体制,把整个日本象刺猬一样武装起来,使日本经常处于临战状态,把全体国民都组成军队(海原治著:《我的国防白皮书》1975年)。

究竟哪种意见正确呢？从唯武器论的立场来说，美苏除外，自卫队显而易见是今天世界上第一流的战斗力，将来还可能进行核武装。现在，技术上正在一步步地作好准备。日本在原子能发电方面仅次于美苏，居世界第三位。原子能发电时产生的大量的铀是制造原子弹的材料。政府佯称是发电用的，并全力以赴地独自开发浓缩铀技术，浓缩铀是制造氢弹的材料。而且日本已成功地发射了人造卫星。这种技术与装上核弹头的远程导弹的生产、发射和控制的技术是共通的。不过，由于日本人民不容许日本帝国主义实行核武装，美帝国主义也警惕日本单独搞核武装，因此还没有公开进行核武装的准备。

不管日本想怎样加强武器和装备，其军备有它致命的弱点。这就是日本的军备是没有灵魂的。日本的重整军备，首先是根据美帝国主义的要求、“援助”和“指挥”而开始和加强起来的。日本垄断资本是通过满足美国的这种要求而建立起自己的帝国主义军备的。它不是为了保卫日本民族独立、防御民族国家的军备，而是从属于美帝国主义称霸亚洲的战略的军备。这是在日本尽人皆知的，日美统治阶级怎么隐瞒也隐瞒不住的。

其次，这种重整军备，一直是凭欺骗国民、混淆黑白的方法建设和加强起来的。今天的军备违反宪法，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历届政府和执政党、垄断资本集团总是想要修改宪法，然而这用合法的手段是不可能的。因为要合法地修改宪法必须在国会众参两院拥有三分之二以上的议席，而日本人民不给他们那么多修改宪法的势力。将来修改宪法派占三分之二以上议席的可能性也只会越来越少。因此，历届政府和执政党都恣意篡改对宪法的“解释”，把违宪的东西说成符合宪法，进行欺骗。

最初说警察预备队和保安队是一种警察，不是军队。一改成自卫队便不能把它再说不是军队了，便说军队是军队，但不是“战

斗力”，是没有战斗力的军队。到了“一次防”阶段已不能再说不
是战斗力了，于是便说尽管是战斗力，但是一种以自卫为目的的斗
力，是不违反宪法的。

这样解释下去是没有止境的，还能够说“如果为了自卫”也可
以拥有核武器；攻击海外敌人的基地也是容许的；为了自卫向海
外派兵也是容许的。一方面佯称日本贯彻“单纯防御”，一方面又
叫嚣为了自卫必须在公海和公空击退敌人，进而竟然讲出如下
的话：

“当朝鲜半岛发生武装冲突而联合国又来不及处理时，作为
一种自卫措施去排除这种冲突，这样的任务是容许的”（1970年
2月24日，爱知外相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的发言）；“在台湾
海峡发生的武力冲突，可以构成动用自卫力量的对象”（爱知外
相1971年3月27日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的讲话）；“自卫权
的行使不是在受到武力进攻以后（就是说也可以先发制人地发
动进攻）”（1970年3月18日，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发表的政
府统一见解）。

政府所以作出这样的发言，是因为社会党和日本共产党的议
员提出了质询。可是质询者只是听了政府这样的发言，并没有进
行反驳，迫使政府承认这是违反宪法的。因而结果就等于质询者
让政府利用国会这个地方把这种军国主义给“合法化”了。从这里
也不难看出资产阶级议会主义的本质。

政府一直是这么混淆黑白进行欺骗的。政府难道以为用这种
办法就巧妙地击退了议会主义者的追究了吗？一个国家的军备建
立在如此荒唐的骗局上，又怎么能成为一个有灵魂的军队呢。

自卫队是一个没有得到国民真正承认的军队。它是美帝国主
义和日本垄断资本的私生子。因此，自卫队的军官想以这样的身
份到普通大学上学时，学校的广大学生就要掀起拒绝他们入学的

运动。驻冲绳的自卫队队员想在营房外居住，就曾发生过拒绝他们在市町村居住的事件。志愿参加自卫队的青少年是很少的。于是负责招募队员的人就跑到汽车教练所去，对在那里为取得汽车司机驾驶证而学习开汽车的青年说，参加自卫队既可以领工资又可以领驾驶证。此外，在日后的找工作上还有很多有利的地方，用花言巧语劝诱他们入队。自卫队入队考试三十分满分，有一个时期(1956年)得了三分以上就算合格。

尽管如此，自卫队的士兵仍然不能满编。固然根据经济情况的好坏，多少有些变化。士兵只能达到编制的百分之八十五左右。而战斗部队和战斗支援部队的编制达成率尤其低。据1969年统计，前者为百分之七十四，后者为百分之六十九点七(藤井治夫著：《自卫队》)，其他年分也没有太大差别。

志愿参加自卫队的人如此少，这是它得不到国民支持的最有力的证明。

旧大日本帝国军队的军纪的根源来自对天皇的无条件的绝对忠诚，而自卫队的军纪观念来自哪里呢？今天的自卫队也在挖空心思企图把消除共产主义威胁、保卫自由国家日本和尊崇天皇作为树立军纪的根源。然而前者根本没有成功，而且从理论上说也决不会成功。

即便鼓动对天皇的忠诚，要想作得象旧大日本帝国军队那样，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然而除此之外，并没有拿来作为军纪观念根源的东西。因此在自卫队的教育中，千方百计地灌输对天皇的崇拜。在培养军官和下级军官的机构中，原封不动地讲授大日本帝国时代的皇国史观(日本是神的子孙、万世一系的天皇所统治的国家，国民永远效忠天皇，才使日本国得以发展的历史观)。

政府和自卫队的干部想让天皇重新当大元帅。而且天皇本身也摆出一副大元帅的架子。这里暴露得最彻底的事例是，1973年

5月26日，防卫厅长官增原惠吉向天皇报告最近的日本军事情况，受到天皇勉励的事件。天皇向增原说：

“日本的自卫力量与近邻各国相比不算多。既然如此，为什么国会要把自卫队当成问题呢？太奇怪了。”“保卫国家非常重要。因此，希望不学旧军队的坏处，吸收它的优点，切实把军队搞好。”

由于增原的得意忘形的谈话，这件事就传出去了，于是社会党和共产党马上攻击政府，说政府在政治上利用了天皇。尽管他们谴责政府，但对天皇以大元帅自居一事本身，决不批评。在这种喧嚣声中又暴露出显示天皇和自卫队关系的另一个严重事件。自1965年以来，每年正月都要举行一次天皇勉励自卫队干部的仪式。在这个月召开自卫队的“高级干部会”。出席者有联合幕僚会议主席，陆海空各军幕僚长等六十多人。会议期间，他们在皇宫“拜谒”天皇，聆听天皇勉励他们的话。天皇说：“自卫队的官兵，平素励精其职，非常辛苦。希望认识到职责的重要性，更加励精于职务”。对此，联合幕僚会议主席代表大家回答说：“愿重下决心，为保卫我国的和平与独立而肝脑涂地，以符合圣意。”（1973年5月3日《朝日新闻》）

这也表明自卫队在尊奉天皇为大元帅，而天皇也在以大元帅自居了。

然而他们不敢公开这么干，只能不让国民知道，偷偷摸摸地干。这样干决不可能把对天皇的忠诚拿来作为军纪观念的根源。一些极端的军国主义者和反动派，说不定会通过政变的办法，或者近似政变的非法手段来修改宪法，使军备得到公认，实行征兵制，使天皇变为名符其实的大元帅。然而即使他们这样干，也不可能改变自卫队的历史，更不可能给自卫队注入灵魂。

第三章 日本军国主义的矛头

第一节 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各阶段

在此之前，我并没有就所谓军国主义是什么下任何定义，就用了这个词。可是，现在必须给它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我认为现在日本军国主义已经复活。资产阶级“舆论”，大多数认为日本决不是军国主义国家，而日本共产党宫本修正主义集团则认为日本军国主义正在复活，但是尚未完成。为了批判这些观点，给军国主义下一个定义，这在讨论它是复活了还是没有复活的问题时，可以避免无益的争论和混乱。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第二篇第三章《暴力论(续)》中说过，1871年的普法战争以后，欧洲大陆上的一切国家，都采用普鲁士式的全民皆兵的征兵制度，热中于扩军竞赛。接着又说：“军队变成了国家的主要目的，变成了目的本身；人民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当兵和养兵。军国主义统治着并且吞噬着欧洲。”（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167—168页）

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并没有给军国主义下定义，而是阐明十九世纪末的欧洲大陆各国的军国主义的重要特点。现在的世界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激烈地展开了史无前例的扩军竞赛。拿超级大国来说，恰恰是军国主义吞噬着国家，并企图吞噬世界。日本虽说今天是以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世界最高的年增长率进行扩军，但与美、苏超级大国的军备吞噬着它们的国家相比，根本不在话下。统治阶级说日本不是军国主义，这种骗人的说法只是单纯根据日本的军事预算只占国家岁出预算总额的百分之十左右，或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

但是，第一，日本军费的绝对额已经达到世界第一流的数额；第二，它是以世界最高的比率按几何级数增长着；第三，日本的军备是通过日美“安全条约”与超级大国美国的军备勾结在一起。如果考虑到这三条，日本在疯狂扩军的问题上也已经具备了军国主义的特征。

一个国家是不是军国主义，并不仅仅是由军备的程度来决定的。1908年列宁讲过下面一段话：

“现代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结果。它的两种形式是资本主义的‘活生生的表现’：一种是资本主义国家在发生外部冲突时所使用的军事力量（如德国人所说的《Militarismus nach aussen》），一种是统治阶级用来镇压无产阶级各种（经济的和政治的）运动的武器（《Militarismus nach innen》）。”（列宁：《好战的军国主义和社会民主党反军国主义的策略》，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166页）

根据列宁的这段话，“现代（二十世纪初）的军国主义”则是现代资本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是一种好战的、反动的政策体系，它有两个侧面，即资本主义国家对外争夺霸权所使用的军事力量和在国内实行阶级统治的武器。列宁在其后期著作：《帝国主义论》中强调指出：在垄断资本主义这种经济体制之上，其政治必然是，对外力图实行侵略和扩张，对内则力图施用暴力和实行反动。上面引用的列宁在1908年所使用的军国主义的概念，与后来在《帝国主义论》中所阐明的帝国主义的政治特征和根本性质的概念是相同的，是用不同的措词表现了相同的概念。

如果给军国主义下这样一个定义，那末战后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过程就一目了然了。

从1945年8月战败投降到1952年4月“和约”和“安全条约”生效，是军国主义复活的准备时期。由于日本人民没能通过革命

彻底拔掉过去大日本帝国战败后的军国主义孽根，它便在美帝国主义的保存下潜伏下来，不久便为了改造成为美帝国主义效劳而做好了复活的准备。这种准备集中表现在警察预备队的创建上。当占领日本的美军全去参加侵朝战争时，预备队是作为留守部队和日本统治阶级协助美帝的实力部队而被建立起来的。这件事意味着日本统治阶级协助美帝参与了对外侵略。而且预备队还是以镇压日本人民的革命运动为己任的对内军国主义的武器。

接着，从1952年4月到1960年新“安全保障体制”建成，这是军国主义复活的第一阶段。《日美共同防御援助协定》的签订；自卫队的创建；比战前集中程度更高、更强大的中央集权警察制度的复活；对教育的反动统制的复活；加强和鼓吹军国主义思想的各种政策的开始；对议会民主主义的蹂躏；在掩盖造船贪污案件上暴露出来的行政权对司法权独立的事实上的侵犯；这些都集中出现在1954年。这表明对内军国主义的复活已经完成，对外军国主义的复活已经开始。

自卫队是对内军国主义的武器，同时它又作为对外军国主义的战斗力而迅速成长。而且日本政府的对外政策，一面从属于美帝国主义，一面又利用美帝的力量，力求重温“大东亚共荣圈”的旧梦。1960年的新“安全条约”，就日方来说是结成日美军事同盟，实现帝国主义野心的武器。

从1960年6月新日美“安全保障体制”建立起，到1965年6月《日韩基本条约》签订止，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第二阶段。

垄断资本在统治国内方面的反动和暴力的体制逐渐得到加强。1960年6月，自卫队待机镇压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的斗争。形势还没有发展到自卫队实际出动的地步，人民的斗争就被警察机动队镇压下去。但从这时起，自卫队便作为镇压人民斗争的部队加强了组织和训练。为了对这种所谓的“治安出动”及其训练拿

出一个可资遵循的准则，1960年11月制定了《治安行动教范草案》。它从单纯威吓和压制人民大众的阶段起到出动坦克、装甲车、航空部队和伞兵部队止，设想了一切阶段的行动。而且为了镇压人民，规定了自卫队同警察、公安调查厅等治安机关、一般行政机关、国营铁路、日本红十字会、日本广播协会(NHK)等之间平素如何联络与合作的形式。根据这个“草案”，自卫队平素就对其管区内的政治、社会、经济、交通、通讯等的状况，尤其是政党、工会以及其他团体、外国人(主要指在日朝鲜人和中国人)的团体等的组织、势力、活动的历史状况和现状、主要人物的姓名、经历和能力等，秘密进行尽量详尽的系统调查(调查所需人员已经有计划地培养出来)。甚至精密地制出出动镇压人民时必要的《警备地志》。

这些事并不是由这个《教范》才开始的，而是总结了自警察预备队时代起长达十年的镇压人民训练的经验编成的教范。这个草案由于1961年3月在参议院被揭露出来，政府和防卫厅便表面上停止了对这个草案的研究，但里面所规定的训练、调查以及同其他机关之间的联络与合作，实际上并没有停止。从1965年起，又着手制定新的教范，并在1968年以《指挥官须知》的名义，实施了新的教范。

在对内军国主义方面，不仅要研究旨在镇压人民运动的军队和警察等暴力机器的加强，而且还要研究在教育、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政策方面的军国主义的加强。诸如规定“建国纪念日”；在历史教育上加强对天皇的崇拜并为过去的侵略战争唱赞歌；对无线电广播、电视、报纸和电影等群众性宣传工具加强统制，借此鼓吹军国主义，压制反战、和平、民主思想；对在日朝鲜人和中国人加强歧视和压迫，煽动民族排外主义，等等，此外还有诸多方面的事实，具体叙述从略。

在对外军国主义方面，自卫队早在1963年就已经研究假设美

国再次发动侵朝战争,届时自卫队将怎样协助美军、承担什么样的任务的问题。不仅如此,甚至还研究了怎样建立国内的战时总动员体制,这就是《三矢作战计划研究》。这时还处在实施“二次防”中,自卫队装备的战斗目标还只限于日本的领土、领海和领空以内,但在这一阶段已经研究了包括协助美军、向朝鲜派兵的作战计划。三矢作战研究和1965年《日韩基本条约》等的签订表明日本军国主义,在对外方面也已经结束了复活的过程。

缔结《日韩条约》以后,日本军国主义得到更迅速的加强,并日益成为近邻各民族的威胁。“三次防”和“四次防”就是以完成其军国主义为目的扩军。

复活了的日本军国主义的矛头,首先指向国内人民,这是不待赘述的。1969年10月,自卫队在富士山麓公开进行了甚至包括出动坦克和用直升飞机降落部队的大规模的“治安出动训练”。这是自卫队预想到1970年6月“安全条约”很快就要到期,会再次出现十年前那样的大规模的反对“安全条约”的斗争而对人民进行的大示威。这年12月25日,陆上幕僚长在记者招待会上说:“通过今年一年的训练,树立了一个治安出动的典范,对队员也彻底进行了训练。今后将以反游击战训练为主,治安训练的时间可能减少。”

在这以前的11月,防卫厅和警察厅就自卫队对警察的治安警备的支援形式达成协议。根据这个协议,即使在首相对自卫队发出治安出动命令以前的阶段,自卫队也可以承担警察机动队员的运输任务,并可把自卫队拥有的催泪弹等镇压用的武器借给警察方面。据自卫队法第七十八到八十一条关于治安出动的规定,这是非法的,实际上是篡改了自卫队法。

于是自卫队作为支援警察的力量就经常发挥其镇压人民的职能(藤井治夫著:《自卫队》)。

自卫队还对政变进行研究。据说陆上自卫队干部学校编的《兵学研究会记事》第六号(1971年4月20日号)登载一篇论文,有以下内容:

自卫队是保卫现行宪法体制,即自由主义体制的部队。因此,即使合法地建立了革新政权,当这个政权还软弱时,就一声不响地等待它垮台,而当它一旦强大,就采取“保卫宪法体制的行动”。……

这是1975年2月4日在众议院被社会党议员揭露出来的,而还没有揭露出来的这类研究,可能多得很。

日本军国主义对外的锋芒指向哪里呢?据上面所述已很清楚,它是日本帝国主义作为美帝国主义的从属同盟者,协助美帝称霸亚洲的武器;同时又是日本帝国主义本身借以对朝鲜、台湾和东南亚进行经济侵略和扶植政治势力的武器。不能说,日本的军队配备在作战方面是以防御苏联进攻日本为主,就认为这个军队是自卫的而不是侵略的。因为若是有必要这样来防御国土,那是因为日本担当着美国对苏争霸战的一翼,同时日本自己也力图进行帝国主义的势力扩张所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的本土防御就是整个帝国主义战争一部分的防御战。整个战争的性质并不是防御战。

一般理论就谈这么多,现在再具体地看一看日本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对朝鲜、台湾和东南亚采取的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政策。

第二节 “日韩会谈”与日本帝国主义

日本垄断资本和反动势力在战败后最早注目、最重视的是朝鲜。

近代日本的天皇制和资本主义从其建成的最初阶段就是靠侵

略朝鲜，饮朝鲜民族的血，茹朝鲜民族的肉壮大起来的。战败后的日本垄断资本仍靠鱼肉朝鲜民族，得到了复兴的机会。即当1950年到1953年，美帝国主义发动和进行侵略朝鲜战争的时候，日本便成了美军的根据地，日本垄断资本便成了美军的军需工厂。美军的“特需”采购1951年约为五亿九千万美元，1952年为八亿两千四百万美元，1953年为八亿一千万美元，1954年为六亿美元，1955年为五亿六千万美元，分别占各年外汇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六点四、百分之三十六点八、百分之三十八点二、百分之二十五点八和百分之二十点九（经济企划厅统计科主编：《日本经济统计》上，1964年版）。可见在日本垄断资本及其政府所获得的美元当中，浸着朝鲜民族的血，粘满朝鲜民族的肉。日本垄断资本主义以这些美元为本钱实现了复兴，并以超过战前的速度开始了高速增长。与此同时，日本统治阶级又力图在朝鲜重新扶植帝国主义势力。

旧金山“和约”签订后不久，1951年10月，日本政府在美国的强烈要求（在占领当时，这实际上是命令）下，同南朝鲜开始进行恢复邦交的预备会谈。在日本“独立”的同时，美国企图让日本根据它自发的意志，通过给战争中的南朝鲜大量生活物资来协助美国的侵略战争。要作到这一点，“日韩”两国必须有正常的国交，因此便命令“日韩”双方的政府，举行两国会议。

1952年2月，开始了第一次“日韩会谈”。当时南朝鲜方面希望日本对其过去在朝鲜的殖民统治进行彻底反省，树立“日韩”两国对等的新关系，可是日方根本不想这样作。在正式会谈开始的前夕，南朝鲜李承晚政权在南朝鲜周围的海域划了一条“和平线”（李承晚线），禁止日本渔船进入这条线以内。在“日韩会谈”当中，日方只是一个劲地反对李承晚线，不想谈起会谈的主题。因此会谈历经两个月而中断。

自此以后过了一年，1953年4月，举行了第二次会谈。南朝

鲜方面以新的平等国交为前提，要求日本宣布 1909 年的“日韩合并条约”无效。日本不接受，仍然只主张撤销李承晚线。因此，第二次会谈也历经三个月而中止。这时在日本国内，政府和执政党大肆宣传日本渔船进入李承晚线被南朝鲜方面捕获的事件，说什么“日本要是有过去那样的海军就不会让朝鲜人这样为所欲为，可是……”竭力煽动重整军备和蔑视朝鲜的民族排外主义。

同年 9 月，日本政府为了在李承晚线内外确立日本的渔业权，向南朝鲜政府提议举行会谈。南朝鲜表示同意，遂于 10 月 6 日举行第三次会谈。当时日方的首席代表久保田贯一郎说什么“在日本缔结媾和条约以前，南朝鲜擅自独立是非法的”，无视《波茨坦公告》，蛮不讲理；还说什么“日本统治朝鲜、铺铁路，开港口，开垦农地等，对朝鲜作了有益的事，丝毫没有剥削和压迫朝鲜。”狂妄已极，令人吃惊。南朝鲜方面当然非常愤怒，要求久保田撤回发言，久保田不接受，会谈仅历两周就决裂了。久保田的狂妄发言并不是他一个人的话，而是日本统治阶级始终也没改变的帝国主义的真心的流露。

自此以后，“日韩会谈”中断了将近五年。第三次以前的会谈，日本尽管是在美国的强烈要求下不得已进行的，但日本根本不想给南朝鲜生活物资以及其它方面的援助，而且当时它也没有那样的经济实力，因此从一开始就不想使会谈成功。

1953 年 7 月，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失败，不得不签订停战协定。之后社会主义中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飞速发展，而南朝鲜却没有摆脱战争的打击，经济没有复兴起来，李承晚政权极不稳定。在东南亚，美帝国主义践踏 1954 年的日内瓦协定，阻挠南北越南的统一，在南方扶植傀儡政权；而北部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却在顺利稳步地发展着；柬埔寨不顾美帝的压力坚持中立。在印尼，在其他东南亚国家，民族解放斗争正在发展。

美帝国主义在日内瓦协定成立两个月后的1954年9月，搜罗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以及澳大利亚的反动政权，拼凑了反动的军事同盟——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但它也没有成为能够对抗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的力量。美国始终没有放弃它称霸东亚之梦，撮合日本、南朝鲜、台湾的蒋介石一伙，拼凑了以美国为首的东北亚军事同盟(NEATO)，并企图把它同东南亚条约组织联结起来，控制东亚，建立中国包围圈。因此，日本和南朝鲜必须建立正常国交。美国为了改善南朝鲜的经济状况和实现政治稳定，想让日本给南朝鲜经济“援助”。因此，从1957年秋，美国又强烈要求两国重开“日韩会谈”。

这时，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远远超过战前，如岸首相的“开发东南亚”设想所表现出来的，力图实行新的帝国主义势力扩张。于是岸内阁便接受美国的要求，企图把“日韩会谈”当成日本在南朝鲜扶植势力的第一步。

1957年12月31日，以日方正式撤回过去的久保田发言，撤回日本在朝鲜进行殖民统治时日本人在朝鲜拥有的财产的赔偿请求权的主张(日本竟然提出这样的主张)等等为前提，发表了将于1958年3月1日举行第四次“日韩会谈”的“日韩联合声明”。在“声明”里面说，日本对南朝鲜的财产请求权的主张，“以1957年12月31日美利坚合众国声明为基础”，予以撤销。由此可以看出，第四次会谈是美国说服日本使其接受会谈的。

前面已经说过，第四次“日韩会谈”的日方代表泽田廉三发表了日本必须把三十八度线推回到鸭绿江那边，即必须消灭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让“韩国”统治整个朝鲜的演说。

在1958年4月开始的第四次会谈当中，南朝鲜提出在日本统治下南朝鲜人被夺去的财产请求权的主张，日方予以拒绝。在李承晚线问题上也发生了对立，会谈没有进展。在这期间，1960年4

月，由南朝鲜人民在学生带头下把李承晚赶下台，因此第四次会谈也流产了。

在南朝鲜李承晚被打倒以后，张勉当了总统。1960年10月，张勉政权与日本池田内阁之间举行了第五次“日韩会谈”。由于张勉政权极不稳定，会谈没有进展。1961年5月，张勉政权被朴正熙用军事政变推翻。于是第五次会谈没有任何成果也流产了。

之后不久，6月，池田首相访美与肯尼迪总统会谈。肯尼迪强烈要求池田就“日韩会谈”早日达成协议。池田回国以后，朴正熙来东京与池田首相会谈，双方就“早日使日韩国交正常化”，原则上达成协议。朴正熙急于使“日韩会谈”尽快达成协议，因为南朝鲜经济危机日益严重，而美国为了保卫美元削减了对南朝鲜的“援助”，因此朴正熙希望同日本恢复邦交正常化，从日本搞到钱。肯尼迪也对池田提出这种要求，希望日本代替美国对南朝鲜进行“援助”。池田也把这件事看成是日本在南朝鲜扶植帝国主义势力的好机会。

1961年10月，开始了第六次“日韩会谈”。日方遴选了大阪商工会议所会长杉道助为首席代表。杉不久病死，其后任是三菱电机公司的董事长高杉晋一。这是一种以日本商品独占南朝鲜市场为背景的人事安排。

日本同南朝鲜之间的贸易，是在美军占领日本期间由美军居间斡旋而开始的。贸易额不大，而且是日本商品的单方面的输出。1959年日本经济空前繁荣，生产力迅速上升。从这年起至1961年，南朝鲜政局虽然动荡不安，三井物产、三菱商事、日绵实业、江商^①、住友商事(都是日本有代表性的贸易垄断资本)，都在汉城设了常驻代表。尽管“日韩”邦交尚未正常化，官方还不允许日本贸易公司在南朝鲜进行合法活动，然而大贸易公司已经在积极地推

^① 江商：原文为“红商”，系“江商”之误。——译者

销日本商品。’结果，1964年，日本占南朝鲜出口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二点九(约三千八百万美元)，占进口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七点二(约一亿一千万美元)。南朝鲜几乎以三比一的比例对日入超。从1962年到1964年的三年间，南朝鲜对日入超额合计为两亿九千二百一十五万美元，超过了这期间南朝鲜的出口总额两亿六千零六十七万美元^①。日本几乎独占了南朝鲜市场，很快就掌握了南朝鲜的经济命脉。

为了对这种经济活动给与法律保障，日本垄断资本希望“日韩”国交尽快实现正常化。他们在1960年底就已经同有实力的在日南朝鲜资本家(尽管这么说，但与日本资本家相比，只不过是资本家)一起，“为了促进日韩邦交的恢复”，设立了“日韩经济协会”，对政府进行工作。该会顾问是日本商工会议所会长足立正，会长是“经团联”副会长植村甲午郎(“日韩”关系研究会编：《日韩关系基础知识》，1975年，田畑书店版)。杉道助和高杉晋一被遴选为第六次“日韩会谈”的首席代表，就代表了日本垄断资本的这种动向。

自此以后，“日韩会谈”进展得很顺利。促进“日韩会谈”的不只是日本垄断资本的经济动机，还有美帝国主义对远东的军事动机。据说1962年10月，日美安全协商委员会预想到不久的将来“日韩会谈”将达成协议，而且中国将进行核试验，为了适应这种形势，决定“美日韩”进行军事合作。据当时的《东京新闻》和《每日新闻》报道，其内容有：(一)美国把过去由美国一国承担的远东对共产党国家的“防御”，委托给“日韩两国”；(二)两国在其领土内设立美国核潜艇基地；(三)南朝鲜军的装备在日本生产。美国把对共产党国家的防御“委托”给“日韩两国”一事，是很难理解的，这一报道的准确程度不无疑问，不过，曾经研究过建立“日美韩军事合作体

^① 美元：原文为“日元”，根据原文第164页表4判断，系“美元”之误。——译者

制”一事，恐怕是事实。

在这次协商会议前夕，10月1日，防卫厅宣布：“正在研究当‘日韩’邦交正常化后，在汉城设驻韩武官，把日本、韩国、冲绳、台湾的防空警戒组织联结起来，以便在这些地区能够进行空军联合作战的设想。”因为美国的第五空军司令部（驻东京都府中）统一掌管日本空军、冲绳基地的美国空军和南朝鲜空军，并同台湾的美蒋空军有联系。由此可见，日本在美军的总指挥下，研究与“美、韩、蒋”空军联合作战一事，是很可能的。

1963年1月，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吉尔帕特里克访日，与池田首相、志贺防卫厅长官、林联合幕僚会议主席进行了会谈。会上协商了什么，完全保密，但它确实同建立“美、日、韩”军事合作体制有关。吉尔帕特里克后来视察了南朝鲜和南越（这时美国已经准备发动侵略越南的战争），然后回国。4月17日，他在华盛顿外国记者俱乐部发表了如下的讲话：

“美国期望日本在太平洋西北部比过去承担更多的防御责任。（中略）最后，美国期望日本拥有足够的海空军力量（不是攻击力量而是监视力量）来保卫包括朝鲜半岛一部分在内的地区。这样当南朝鲜发生新的危机时，也许可以不必期待美国再向韩国增派兵力。”（共同通讯社：《世界周报》1963年5月7日号）

吉尔帕特里克来日后不久，从2月到6月，防卫厅已经进行了一再公布过名称的《三矢作战计划研究》，该计划假定出现这样一种事态，即“昭和三十×年（1960年到1969年）7月19日傍晚，中国和北朝鲜的联合战斗机和轰炸机大编队突袭南朝鲜，北朝鲜军越过三十八度线”，对此美军以联合国军的名义进行反击。这个计划就是研究日军在这次战争中怎样进行联合作战和届时怎样处理国内政治经济体制的。后者甚至研究了建立战时国家总动员体制

的程序问题，如向国会紧急提出，并使其在两周内通过《有关整備国防中央机构等事项》、《各种战时法案和预算补充修正案》等八十七项议案的问题、战时经济统制、劳动力和其他必要人员的确保措施等等。

根据这个设想说，战争是在7月19日以北朝鲜和中国方面的突然袭击开始的；而上述向国会提出的八十七项法案、预算案以及其他议案的准备工作，是在5月31日以前就完成了。也就是说，尽管说是来自北方的突然袭击，实际上美国和日本方面在开战的两个多月以前，已完全作好转向战争体制的准备。这里，他们自己就暴露出所谓来自北方的突然袭击，并非突然袭击，而是美日方面预谋的战争。

根据这一计划，自卫队的主要任务是防御日本本土和承担美军的后方支援。不过它还规定部分自卫队将协助并参加美军对北朝鲜、千岛和库页岛的进攻战，还将参加“联合国”军，即美军占领地区的警备。

《三矢作战计划研究》还研究了当南朝鲜军内发生部分叛乱，影响到日本国内治安情况的时候，“共产党方面”支持南朝鲜军叛乱，最后导致同美军和南朝鲜军的战争等各阶段的自卫队的行动计划。另外，这个计划还研究了：(1)在日本发生天灾地祸，根本没有外国干涉时；(2)对日本发动间接侵略时；(3)发生威胁到日本的安全或者威胁到远东的和平与安全时；(4)在日本施政区域内，对日美任何一方实行武力进攻时，这四种“紧急时期”的自卫队的行动以及自卫队和驻日美军的“作战调整”。关于这些这里从略（详见藤井治夫的《自卫队》一书）。

当《三矢作战计划》在国会上被社会党议员冈田春夫揭发出来的时候，政府说这件事政府全然不知，自卫队设想各种万一发生的情况，研究相应的对策，这是理所当然的。可是统管这次三矢作战

计划研究的负责人陆将^①田中义雄，在札幌地方法院审理惠庭事件^②时的证言中说：“三矢研究决不是什么假定的东西，也不是什么大学里的课堂研究。它始终是一种以实战为目的作战计划”（日本共产党出版部编：《复活的日本军国主义》，1966年）。内容这样重要、且以实战^③为目的的作战计划，身居自卫队最高指挥官的防卫厅长官和首相，如果完全不知道，那就是他们严重的玩忽职守，不然就是自卫队早就象过去的军部那样已经脱离政府，独立行动，二者必居其一。总之，日本统治阶层早在1963年“二次防”实施阶段，已经就在制定当美军发动侵略朝鲜战争时，怎样进行联合作战的计划，甚至计划同美军一起到北朝鲜、千岛和库页岛去协同作战，竟然还研究和计划用实际上近乎政变的方式，建立战时总动员体制（届时成立军事独裁或者近似军事独裁的政权）的程序。如果这还不算最极端的军国主义，那末它又叫什么呢？

《三矢作战计划》研究了部分日军出兵朝鲜的问题。为了能够合法地、顺利地向朝鲜出兵，日本和南朝鲜必须实现邦交正常化。这个作战计划也是以尽快实现日本同南朝鲜邦交正常化为前提的。

因此，为了建立促进日本垄断资本对南朝鲜实行经济统治的法律前提，另一方面为了创造日军能够向南朝鲜出兵作战的前提，日本垄断资本、政府及其军事部门等一切统治阶层便急于实现日本同南朝鲜的邦交正常化。

从南朝鲜方面来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当过日本皇军中尉冈本某的朴正熙总统，不仅不象李承晚那样反日，而且同冈本中尉

① 陆将是陆上自卫队的最高军衔，相当于中将。——译者

② 惠庭事件：1962年12月，陆上自卫队在北海道练兵场演习，惠庭地区的当地农民对演习影响农业生产非常愤怒，切断了自卫队的电话线的事件。检查官以违犯《自卫队法》罪，对该农民进行起诉。在审判中，被告争辩说自卫队违反宪法。

③ 实战：原文是“实践”，疑为“实战”之误。——译者

时代一样是媚日的，他为了利用日本的“援助”来弥补减少了的那部分美国“援助”，以加强其卖国政权，急于使“日韩会谈”早日达成协议。作为日本和南朝鲜双方的指挥者——美国总统，为了维持朴政权，为了把维持这个政权的部分负担让日本来代替，也敦促双方就“日韩会谈”达成协议。

这些条件都已具备，所以会谈进行得很顺利，1962年底，实质上已就基本各点达成协议。然而南朝鲜人民大众反对这种卖国会谈，不顾朴正熙军事政权的镇压，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这一斗争进入1964年发展到四年前打倒李承晚时期的规模。因此，朴正熙也不得不在同年3月将1962年10月以来派到东京去与日本政府直接进行谈判的心腹金钟泌召回南朝鲜。这样一来，第六次会谈也中断了。如果这时日本人民与南朝鲜人民相配合，象南朝鲜人民那样，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不断地开展强有力的反对斗争，也许就埋葬了“日韩会谈”。在日本，反对“日韩会谈”的口号也在所有民主的群众大会上提了出来。1962年10月21日，在日本全国（冲绳除外）二十个主要美军基地周围，召开了要求撤销基地和粉碎“日韩会谈”的大规模集会。以后斗争逐渐发展。然而这种斗争只不过是一种从属于一般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的、在街头集会上和游行示威时的口号宣传，没有发展成为集中粉碎“日韩会谈”、深入到工厂车间、能够组织罢工及其他决定性行动的持续斗争。日共已经从修正主义的斜坡上直线地堕落下来，害怕群众起来闹革命；而社会党根本就没有能力，也不愿意组织和领导群众斗争。以学生为主力的新左翼各派是有斗争性的，但几乎没有同工人、同劳动人民大众结合起来，所以没能发展成为同南朝鲜人民相呼应的斗争。

从理论上来看，反对“日韩会谈”的斗争，本来是反对复活了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斗争，可是日本共产党却没有明

确把握这一点，使它从属于反美斗争。“日韩会谈”一直是在美帝国主义的指挥下进行的，这一点我们看得很清楚，但也不应因此就使反对“日韩会谈”的斗争从属于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粉碎“日韩会谈”的斗争本身就具有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意义，而不是相反。

第六次“日韩会谈”中断后不久，1964年8月，美国对越南南方和北方发动了新的侵略战争。美国的舰队和空军在北部湾一再非法进攻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领土。8月20日，越南人民军鱼雷艇为了进行反击，攻打美国驱逐舰。美国政府迅即发表声明，说美舰遭到北越军的非法攻击，对此美国将进行合法的报复，于是对北越开始了舰炮射击和飞机轰炸。一切都是按照这年一月以来美国周密制定的计划进行的。8月4日，美国大举炮轰北越沿海地区。接着，按照预定的计划，在年底把侵略战争全面扩大到南北越南。（《美国防部秘密报告》，载日本《朝日杂志》1971年7月9日特辑号）

美国希望日本和南朝鲜对这场战争进行全面合作。日本和南朝鲜两国政府也都高兴地进行了合作。这时，为了使南朝鲜易于派兵参加越南战争，日本有必要“援助”南朝鲜。为此，必须加紧实现日本同南朝鲜的邦交正常化。于是美国副国务卿邦迪便奔走于东京和汉城之间，12月10日，让它们在东京举行了第七次“日韩会谈”。

1965年1月7日，日方首席代表高杉晋一在接见记者谈到日本为了正式出面“开发”南朝鲜必须早日恢复邦交时说：

“日本统治三十六年，并没有剥削朝鲜，是出于善意的，日本是想作好事的。据说现在韩国的山上一棵树也没有了，这是由于朝鲜脱离了日本的缘故，如果再和日本同处二十年，恐怕是不会变成这种样子。我们的努力由于战败前功尽弃了。如果再拥

有朝鲜二十年,可能不至于变成这种样子。日本把工厂、房屋和山林都留给朝鲜了。创姓改名(强制朝鲜人改成日本式的姓名)也很好。那是为了同化朝鲜人,为了让朝鲜人受到和日本人同等的对待而采取的措施,并不是什么剥削或者压迫。”

这套话远远超过了先前的久保田的狂妄发言,是帝国主义思想的大暴露。南朝鲜人民听到后非常愤怒,可是朴正熙政权并没有生气。12月11日,朴政权竟向南越派遣了二千名的军队。第二天12日,日本政府(1964年11月,池田首相因病辞职,佐藤荣作当了首相)作为“对韩紧急援助”,对南朝鲜无偿地提供二千万美元的原材料和机器零件,从而使过去同南朝鲜进行的谈判达成了协议。据说这笔钱相当于派往南越的两千名南朝鲜兵所需要的装备及其他费用。

以“日韩”双方对美国侵越战争进行合作为媒介,“日韩会谈”进展得非常迅速。1965年2月17日,椎名外相访问南朝鲜,20日在汉城草签了《日韩基本条约》。4月3日,双方就南朝鲜对日请求权,日本对南朝鲜的渔业合作,在日南朝鲜人的法律地位等三个问题的谈判,也达成协议,进行了草签。并就归还日本从朝鲜抢去的文物问题和今后的文化合作问题,也取得了一致意见。6月22日,正式签订了《日韩基本条约》及其他一切协定。

到了这一阶段,社会党和共产党以及所谓“文化人”所领导的反对“日韩条约”的游行和集会,非常频繁,但为时已经太晚了。接着到了在国会审议和批准该条约的阶段,与五年前审批新《日美安全条约》时相似,向国会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请愿和游行,但终究是大势已去,无力挽回了。

11月12日,议长在众议院大会上宣布以《日韩条约》案为议题,紧接着只用了三十五秒钟又宣布全部通过;12月11日,参议院在只有自民党和民社党(社会党、公明党和共产党的议员进行抵

制,拒绝参加审议)参加的情况下召开大会,一揽子地通过了《日韩条约》的全部议案。于是,堪称日本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复活的国际登记证的“日韩关系诸条约”,和它的内容很适称地用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方法强行通过了。

通观“日韩会谈”,从其达成协议、签署条约和审议批准的整个过程可以看出,《日韩条约》是美帝国主义敌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和侵略东南亚的政策,是它让“日韩”两国政府为它服务的政策;对日本统治者来说,这个条约则是高度发展了的垄断资本,在“援助”和“开发”的美名下,企图把南朝鲜变为日本的商品出口市场和资本输出场所,变为日本的殖民地势力范围的条约,而且是旨在把南朝鲜变为对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的和军事的立脚点的条约。这只要分析一下《日韩基本条约》的条款,就看得一清二楚。

根据这个条约,日本间接地承认南朝鲜是“朝鲜半岛上的唯一合法政府”。这就等于日本同南朝鲜站在同样立场上,认为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是非法的,与南朝鲜否认和敌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唱的是一个调子。这个条约还规定:两国“认为为了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两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密切合作是重要的”。这就成了两国事实上结成军事同盟。所谓“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在《日美安全条约》和《韩美安全条约》中都用过,是美帝国主义惯用的词句。其真正意思是说美帝国主义为了进行反共、反民族解放运动和反革命运动将发动战争。《日韩条约》上的这句话也是同样的意思。在东京签订这一条约后归国的南朝鲜外务部长官李东元明目张胆地说:“韩日条约的主要目的是针对以中共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集体安全保障”。

《日韩基本条约》体系中的南朝鲜对日请求权及两国经济合作有关协定规定,日本政府对南朝鲜提供无偿政府援助二亿美元、有

偿政府援助三亿美元和私人资本援助三亿美元。这意味着日本对南朝鲜实行经济侵略；意味着已经垄断南朝鲜对外贸易百分之三十的日本又开辟了进一步垄断南朝鲜市场，将其变为资本输出的场所，置南朝鲜于日本的殖民剥削之下的新的道路。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日韩条约》的签订宣告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复活，它还意味着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也已经完成了复活。这种军国主义在对外方面紧密地从属于美国的亚洲战略。但不应因此就说日本不是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从属于强大的帝国主义是世界史上帝国主义时代的特征。如果站在朝鲜人民的立场来看，马上就会看出日本毫无疑问是最凶恶的军国主义，他们决不能说日本从属于美帝国主义就不是军国主义。只能认为日本是假美国大虎之威的一只小虎，因此它是格外凶暴的军国主义。

第三节 日本军国主义的矛头

以签订《日韩条约》为跳板，日本对南朝鲜的商品出口和资本的输出飞跃增加。日本对南朝鲜的出口贸易，1965年以前大致为一亿多美元，但《日韩条约》签订后的第二年1966年，与上年相比激增百分之七十六，接近三亿美元，之后每年飞速增加，1972年超过了十亿美元，1973年超过了十七亿美元。来自南朝鲜的进口，在这期间也激增一倍多。在“日韩”贸易方面，日本的出口一向为进口的四倍左右，因此即使在1973年，南朝鲜对日贸易依然入超四亿八千四百多万美元。在南朝鲜的进口总额中，来自日本的进口比重，1965年为百分之三十六，从第二年起达百分之四十大关，1973年竟占百分之四十九点九。在南朝鲜的出口中，对日出口比重，1965年以后最低的一年（1969年）为百分之二十一点四，最高的一年（1973年）达百分之三十八点五。自1966年以来，在南朝鲜对

外贸易逆差总额中，日本占百分之四十八到百分之六十九。历年数字请看(表4)。

(表4) 南朝鲜对日进出口贸易比重

(单位: 千美元)

年度	出 口			进 口			对日出口 进口比率 ①	逆差总 额中对 日逆差 所占的 比重%
	总 额	对日 出口额	%	总 额	自日本 进口额	%		
1962	54,813	24,483	44.7	421,782	109,171	25.9	1:4.46	23.1
1963	86,802	24,841	28.6	560,273	159,345	28.4	1:6.45	28.4
1964	119,058	38,158	32.0	404,351	110,117	27.2	1:2.89	25.2
1965	175,083	43,974	25.1	463,442	166,628	36.0	1:3.79	42.5
1966	250,334	66,293	26.5	716,441	293,794	41.0	1:4.43	48.8
1967	320,229	84,726	26.5	996,246	443,051	44.5	1:5.23	53.0
1968	455,401	99,744	21.9	1,462,873	623,998	42.5	1:6.26	52.0
1969	622,516	133,326	21.4	1,823,612	753,817	41.3	1:5.65	51.7
1970	835,185	234,329	28.0	1,983,973	809,283	40.8	1:3.45	50.0
1971	1,067,607	261,988	24.5	2,344,320	953,778	39.8	1:3.64	54.2
1972	1,624,088	407,876	25.1	2,522,002	1,031,085	40.9	1:2.53	69.4
1973	3,220,614	1,239,701	38.5	4,218,531	1,723,723	40.9	1:1.39	48.5

资料来源:“日韩”关系研究会编:《日韩关系基础知识》,1975年,田畑书店版,第31页。

南朝鲜事实上处在美国的占领下,美国在其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也很高,但日本占的比重比美国还大。尤其是在进口方面,1965年以前,来自美国的进口比日本多,但1966年以后,日本的比重远远超过美国。在出口方面,1965年以前,对日出口比对美出口多,但1966年以后情况倒转,对美出口一直比对日出口多,到1973

① 对日出口进口比率:是以对日出口为1的自日进口的比率。——译者

年又发生了逆转。南朝鲜的对日、对美贸易构成比的演变，请看（表5）。

（表5） 南朝鲜对日美贸易构成比的演变

（单位：%）

		1961年到 1965年平均	1966年到 1970年平均	1971年	1972年	1973年
出 口	总 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日 本	35.2	24.9	24.5	25.1	38.5
	美 国	26.3	46.2	49.8	46.7	31.7
进 口	总 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日 本	27.4	42.1	39.8	40.9	40.7
	美 国	46.2	31.1	28.3	25.7	28.3

资料来源：前引《日韩关系基础知识》，第32页。

总之，从贸易额来看，南朝鲜可以说是日美两国的独占市场，但其中日本的比重更高，而且与年俱增。

不仅如此，而且在南朝鲜进出口贸易的经办额中，日本大贸易公司所经办的比重都很高。前面已经说过，在签订《日韩条约》以前，日本的贸易公司就非公开地到南朝鲜去活动，条约签订以后便可以公开地进行活动了。从1967年起，大贸易公司在南朝鲜设立正式的分公司。这些分公司不仅作为总公司的代理，以自己的名义搞进出口贸易，而且还替南朝鲜的贸易公司招揽进出口生意，从中赚取佣金，利用这种形式使南朝鲜的进出口商实际上从属于自己。南朝鲜的进出口商，从国际范围来看，是一种小本经营，在海外广泛开辟销路的力量极小。所以不得不依赖日本大贸易公司所掌握的交易渠道。日本贸易公司的分公司开始活动以来，经其招揽的南朝鲜出口贸易额，每年以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七十的比率增长。1972年在南朝鲜的日本贸易公司的经办额在南朝鲜出口贸易中的比重，占出口总额的百分之十九点四，占向日本出口的百

分之二十八点八。而在日本贸易公司的经办额中，输往日本的比率占百分之三十三点一，输往日本以外地区的部分占百分之六十六点九。也就是说，在南朝鲜的日本贸易公司的分公司，不仅从事日本和南朝鲜之间的贸易，而且还把充当南朝鲜整个对外贸易的中间人和经纪人作为主要活动。在南朝鲜的外国贸易公司在南朝鲜进口中的销售额，1973年占一般进口总额的百分之二十四。此外加上政府购进的部分以及其他部分，进口金额达十三亿多美元。其中百分之九十二点三是由日本贸易公司经办的。日本的大贸易公司依靠其在全世界建立的交易网和情报网以及南朝鲜贸易公司与之无法相比的巨大资本力量，逐渐把南朝鲜的企业纳入自己控制的体系中。

南朝鲜的进出口贸易，自1966年以来，连年激增，这是因为南朝鲜的工业迅速发展的缘故。南朝鲜是从哪里弄到这些工业建设资金的呢？主要依靠来自外国的政府间的贷款和“援助”与私人资本的商业贷款以及外国资本对南朝鲜的直接投资。到1969年为止，在资本输入的累计额（实际达到的数字）中，美国为六亿七千五百万美元，占总额的百分之四十四以上，日本为三亿六千六百万美元，占百分之二十四点三。不过美国政府对南朝鲜政府的“援助”，1965年以来逐渐减少，私人资本的商业贷款和直接投资也在减少，反之，日本政府提供的贷款以及日本私人资本的贷款和直接投资急剧增加。尤其是直接投资，如（表6）所列，1967年还仅仅为一百五十万美元，1969年达到一千七百七十万美元，超过了美国的直接投资额，1973年进一步飞跃增加，接近三亿美元，约为美国的二十四倍（以批准额为基准）。到1974年6月底，南朝鲜自日本引进的资本额和余额及其比率，见（表7）。在南朝鲜引进的外资余额中，日本的比重是，贷款占百分之二十四点七，直接投资占百分之六十八点七，两项合计为百分之二十九点八。美国提供的贷

款和投资合计的累计余额仍比日本多，然而它所占的比重与年俱减，而日本则与年俱增。

(表 6) 南朝鲜历年引进外资的演变*

(单位: 百万美元)

年次	引进外资的形式 (以实际达到数为基准)				各国投资情况 (以批准额为基准)			
	合计	政府贷款	商业贷款	外国私人投资	合计	日本	美国	其他
1959— 1966	350.4	140.8	184.1	25.5	30.5	—	29.9	0.6
1967	237.2	105.6	124.0	7.7	20.1	1.5	18.0	0.6
1968	357.8	70.2	268.4	19.2	25.6	4.5	14.6	6.5
1969	560.3	138.9	408.7	12.7	30.4	17.7	6.0	6.7
1970	548.1	115.3	366.7	66.1	65.4	15.8	41.8	7.8
1971	691.4	303.4	345.2	42.8	50.9	24.7	21.7	4.5
1972	729.6	324.4	326.4	78.8	113.3	77.6	29.7	6.0
1973	856.2	368.5	344.4	143.3	314.1	295.2	12.6	6.3

* 南朝鲜引进外资的数字,有的以批准额为基准,有的以确实到达数额为基准,因此不仅各自有很大的不同,而且即使在同一基准中,由于发表的时间不同,也不相同。所以上表只能列出大体的倾向,不能看作是准确的数字。

资料来源:前引《日韩关系基础知识》第71页。

而且日本垄断资本控制着南朝鲜的重化学工业。例如日本对南朝鲜重工业建设的关键项目浦项制铁所提供建设贷款的合同于1967年签订,到1973年竣工为止,日本提供政府资金和私人资金合计为一亿六千八百零五万美元。然而日本对南朝鲜的重工业建设的合作条件是,南朝鲜的工业建设项目必须以“有效利用”浦项制铁所为前提条件。

关于日本和南朝鲜的经济关系的详细情况,请参考“日韩关系研究会”编:《日韩关系基础知识》。

日本控制南朝鲜经济的意图,1970年4月在汉城召开的第二次“日韩”协力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969年2月成立,会长为岸

信介,在顾问和常务委员中网罗了日本主要垄断资本家)上,由理事矢次一夫提出的《日韩长期经济合作试行方案》中暴露得最清楚。其基本要点如下:

(一)、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十年为目标,建立“日韩经济合作圈”,并使其发展成为“亚洲的‘欧洲经济共同体’”;

(二)、“日韩经济合作圈”把浦项以南的南朝鲜沿海工业地区,同鸟取、山口、北九州等日本关西经济圈联结起来;

(三)、日本希望把钢铁、炼铝、石油、石油化学、造船、电子工业、塑料等因厂址选择困难和公害等原因在国内发展达到限度的工业,转移到南朝鲜去;

(表7) 南朝鲜引进日本资本的情况

(1974年6月底)

(单位:百万美元)

	借 款			投 资	合 计
	财 政	商 业	小 计		
以批准额为基准	548.4	691.5	1,239.9	467.6	1,707.5
比 率%	21.4	19.5	20.3	67.4	25.1
以到达额为基准	384.0	646.8	1,030.8	295.3	1,326.1
比 率%	22.9	24.7	24.0	65.0	27.9
偿 还 额	5.7	215.6	221.3	1.1	222.4
比 率%	6.4	23.1	21.6	4.2	21.2
余 额	378.3	431.2	809.5	294.2	1,103.7
比 率%	23.9	25.5	24.7	68.7	29.8

资料来源:前引《日韩关系基础知识》第73页。

(四)、日本经济界为了通过合办的形式谋求长期合作,建立“日韩合办与加工贸易振兴公社”,希望南朝鲜政府采取措施,严禁在合办公司内搞工人斗争;

(五)、日本方面从劳动力不足的现状出发,考虑将劳动密集产业转移到南朝鲜。对“日韩合办与加工贸易振兴公社”,日本方面百分之百由私人出资,把原材料和机器设备交付南朝鲜,南朝鲜方面,政府出资百分之七十,私人出资百分之三十,接受委托加工;

(六)、希望南朝鲜进一步采取更加灵活的措施,大力扩大保税地区^①和自由港地区^②,以便承担日本企业的制造和加工。

对这个试行方案,无须多加解释。这是一个企图把南朝鲜经济变为日本经济的承包殖民地、把日本的多公害企业和劳动密集产业转移到南朝鲜、彻底掠夺南朝鲜人民的方案。

一个包罗日本垄断资本家的团体,竟公然如此露骨地写出南朝鲜殖民地化的计划,这件事本身就表明他们已经完全把南朝鲜看成是日本的殖民地了。而且日本对南朝鲜的经济政策基本上是根据这一战略执行的。

日本在“对外经济合作”的名义下,搞了各种形式的资本输出,其中从1967年到1971年实际累计额的百分之十五点四是向南朝鲜输出的。这一比率作为对一个国家的比率来说是最高的;其次是对香港。然而对香港的资本输出,没有日本支配香港经济的性质。而输往南朝鲜的,如前所述,则控制了南朝鲜经济,而且日本还控制了南朝鲜的进出口贸易。在日本的出口总额中,对南朝鲜的出口,自1969年以来大体占百分之四点八,尽管与对美出口的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二十三没法相比,但它却居第二位。这样一来,南朝鲜的经济便完全从属于日本,同时日本经济如果不使南朝鲜经济从属于它,也就维持不下去了。就是说,南朝鲜成了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生命线。

因此,日本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就不能不同南朝鲜的朴正熙政

^①和^② 保税地区:即一个国家在指定的地区,在一定期间内,对进口的商品暂不征关税的地区。自由港则是限定一定地区,对通过该地区的外国货物不征关税,因而也是一种保税地区。——译者

权这样一个买办法西斯政权紧密勾结起来。对日本统治阶级来说，千方百计地支持朴政权就成了至高无上的原则。永远阻碍南北朝鲜的民主统一，镇压南朝鲜人民的革命运动，一有机会就唆使朴政权北进，让它统治整个朝鲜，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愿望。这也是美帝国主义一贯采取的对朝鲜的政策。美国企图将其执行朝鲜政策的重负，尽可能让日本多分担一些，日本政府又高兴地接受了美国的要求。而朴政权也只有以美、日两帝国主义为靠山，才能维持其法西斯统治。美、日、朴之间的这种一致是1965年缔结《日韩条约》以及此后日美朴关系的基础。从这点出发，在军事方面，日本便把假定在美军的指挥下对朝鲜发动反革命的侵略战争这一点作为军备的依据。

前面谈到的《三矢作战计划》的研究说明了这一点。《三矢作战计划》规定，在军事上日军是以美军的后方支援为主要任务的。但自1964年3月起，在日美联合制定的1964到1965年度的实战计划《飞龙(Flying Dragon)作战计划》里面，日本军的任务进一步扩大了，即在同朝鲜和中国发生战争时，日本空军将置于美国太平洋方面空军最高司令的指挥下，与驻日美第五空军联合作战。陆军将根据“联合国军”的要求，进驻南北朝鲜和中国。这个计划1965年10月在众议院“日韩特别委员会”上被社会党议员揭露出来。

接着《周刊现代》杂志1966年9月29日号，揭露了美国远东方面的陆海空军参谋和情报部工作人员，在日本联合幕僚会议的协助下，从1965年9月开始制定了1966年度作战计划，即《奔牛(Bull Run)作战计划》。据说这个作战计划是以前的《飞龙作战计划》的延长，已经确认了的日美两军义务要继续下去。

这个作战计划是假定朝鲜发生战争，美军进入临战体制，同时美国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合作，日本政府接受美国的要求。计划规定进入战争状态以后，日美最高司令部共同协商日后的作战，但指

挥权在美国方面；日本的海空两军在被指定的空域和水域保护自日本出击的美军轰炸机；美军和自卫队共同担负自日本本土向朝鲜、冲绳和台湾的军事运输。在作战的初期阶段，日本陆上自卫队总兵力的五分之三集结在对马海峡面向朝鲜的海岸线上，五分之一向东京周围和北海道展开。在美方认为自卫队有必要参加对朝鲜和中国本土的进攻时，将会得到日方的同意。作战成功后，希望自卫队作为联合国警察军参加对占领地区的占领。

“飞龙作战计划”与“奔牛作战计划”是以美军为主制定的，但它们与自卫队的“三矢作战计划”有明显的联系。总之，自卫队和美军把同朝鲜和中国之间的战争计划，逐步地具体化了。在这些作战计划中，自卫队主要承担美军的后方支援和本土防御，这也是以进攻作战为目的的基地防御，而不是对侵略日本国的“非法的侵略者”进行的正当防御。

此后，还没有揭露出诸如此类的作战计划，但恐怕会更加周密、更加具体化了。

日本政府一方面制定这样的作战计划，另一方面除派军队外，在其它一切方面都积极地协助了美国侵略越南、侵略印度支那的战争。根据《日美安全条约》第四条，政府把这种合作说成是理所当然的。第四条规定：缔约国“在日本的安全或远东的国际和平和安全受到威胁时，应任何一方的请求进行协商”（《日本问题文件汇编》第三集，世界知识出版社，第42页）。政府在审议新“安全条约”的国会上，言明这一条款的“远东”范围“不包括越南”。可是当民社党议员1965年2月12日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质问美国侵越战争适用第四条的根据在在哪里的时候，椎名外相回答说，说不包括越南，这是原则上讲的。即使原则上讲不包括在第四条的远东范围，可是当发生危及远东和平与安全的事件的时候，美军的行动范围是不受限制的。如果照这样推论下去，美军在亚洲任何地方

发动战争，美国都可以说这威胁了远东的和平与安全，就把日本当成作战基地，日本就要对它给以协助。日本统治者在法律上可以信口雌黄，总之只要他们决心想协助美军进行战争，就会那样作的。

1965年12月23日，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社会党议员指出日本的飞机公司修理参加越战的美军飞机这种事实，并批评说这是非法的。对此，佐藤首相回答说，这是私人企业与美军直接签订的合同，政府不介入。

日本政府和资本家们如此诡辩，全面协助美军的侵越战争。假如没有日本的合作，美国进行那次战争是不可能的。当然，日本垄断资本协助这次战争不仅仅是为了美国。日本垄断资本在这次战争当中直接间接地赚了数十亿美元。

佐藤内阁竭力加强日本对东南亚的政治影响，并且全力以赴地与美国共同建立和巩固美国侵越战争的后方体制。1966年4月，参加了第一次开发东南亚部长会议（之后每年定期召开）；同年6月参加了亚洲和太平洋地区部长协商会议（之后每年定期召开）；同年12月举行的亚洲开发银行成立大会决定由日本出任总裁。佐藤首相还于1967年6月到7月访问了南朝鲜，在汉城与朴总统、美国副总统汉弗莱、蒋介石集团的所谓副总统严家淦达成加强日、美、蒋、朴合作体制的协议。接着他在9月访问台湾，会见了蒋介石，10月第二次访问东南亚，其最后日程是在西贡同越南傀儡政权会谈，誓对侵越战争进行合作。

历经这一系列活动之后，同年11月，佐藤访美，与约翰逊总统会谈，发表了包括以下条款的共同声明。

(1) 日本加强对东南亚各国的“援助”。为此，日美将进一步紧密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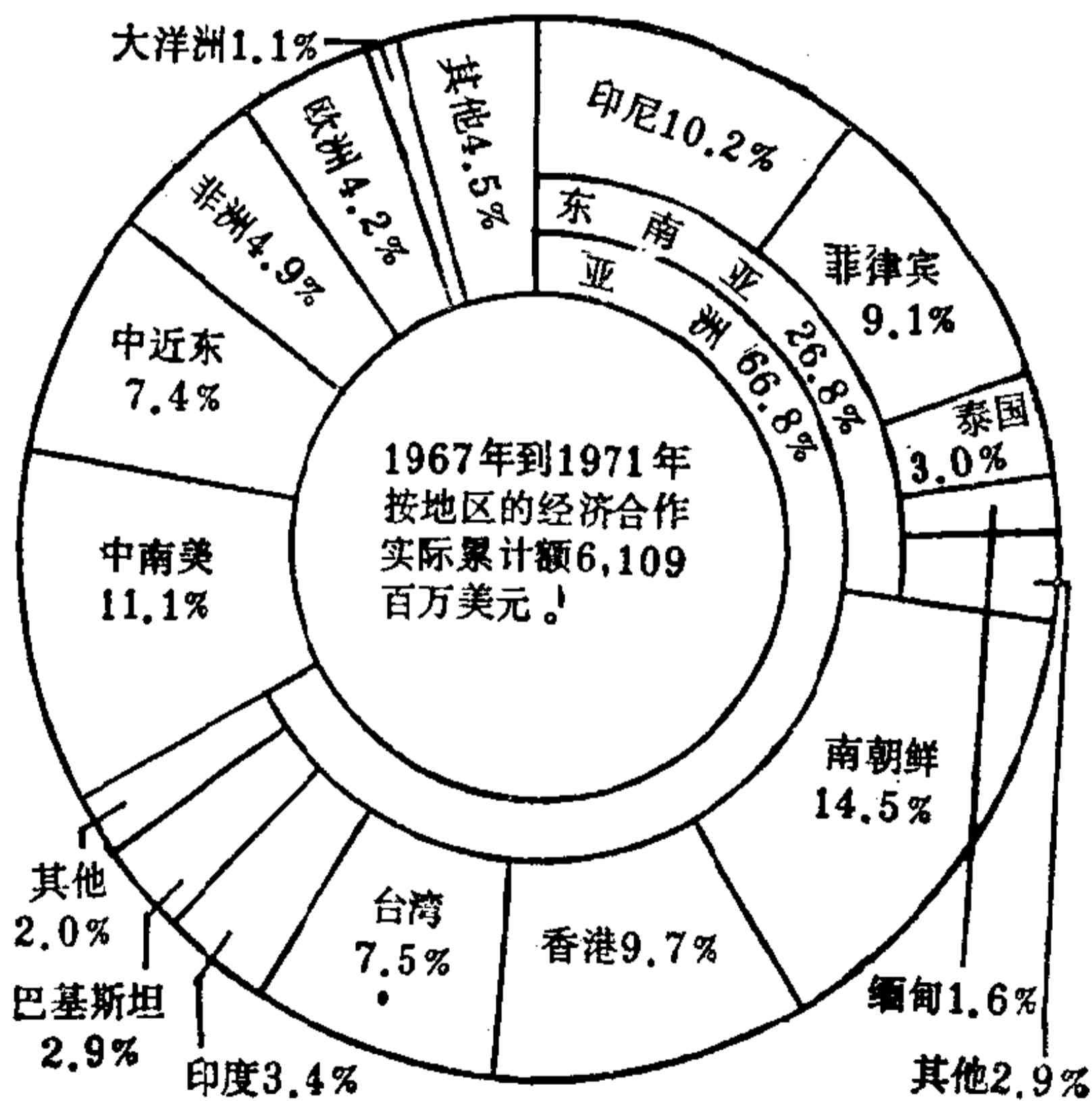
(2) 为了使亚洲各国不受来自“中共”威胁的影响，日美要共

同合作(日美企图共同封锁中国);

(3) 日本“准备对亚洲的和平与安全作出积极贡献”。也就是说,日本将对美国侵略越南的战争以及其他称霸亚洲的政策进行积极合作,以增强日本本身在亚洲的帝国主义势力(以下省略)。

如果将这个共同声明与十年前佐藤的亲哥哥岸信介首相访美,要求美国对以日本为主“开发”东南亚提供资金合作而遭到拒绝的情景相比,可以看出日本帝国主义地位提高的情形。它的基础就在于日本资本主义在这十年当中有了飞跃的发展,国民生产总值仅次于美国,为了今后的生存和进一步的发展,迫切需要借“开发”之名,掠夺东南亚的资源,而且已经拥有这方面所需的资本输出能力;从“二次防”到“三次防”期间,军备年年都有很大的扩充。

(图2) 日本双边“经济合作”的地区分布
(1967年到1971年累计)



资料来源:通产省编:《经济合作的现状与问题》,各年版。

通过前面列举的从 1965 年到 1974 年的历年国际收支的统计(本章表 3), 可以看出日本经济发展的一斑。日本以“经济合作”为名, 从 1961 年到 1973 年实际资本输出的演变情况, 请参阅(表 8)。(图 2)表明日本自 1967 年到 1971 年双边“经济合作”的实际累计额按地区或国别的份额情况。1972 年以后的情况, 一看通产省编《经济合作的现状与问题》的 1973 年以后的各年版就清楚了。这里不再引用。

今天, 过于膨胀了的日本垄断资本, 为了寻找消化这种巨大生产力(为战前大日本帝国最高期的十倍以上)的商品出口市场, 跑遍全世界。其中, 美国为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场, 占日本出口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没有这个市场, 日本资本主义就活不下去。其次, 南朝鲜和东南亚市场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在国内, 重化学工业所需的能源和原料、材料极端贫乏, 因此, 日本垄断资本为了寻求这些资源, 不得不拚命向东南亚、中近东、大洋洲、拉丁美洲、非洲等资源丰富的第三世界输出资本, 以便掠夺那里的资源。他们尤其重视朝鲜和台湾。这是因为在日本国内, 重化学工业造成的严重的环境污染(所谓公害), 已成为全国人民的怨府。于是垄断资本便企图在他们认为居民的抵抗较小的第三世界寻求重化学工业的建设场所。南朝鲜是日本最近的邻邦, 拥有符合现代工业要求的、素质好的丰富劳动力, 而且有美国的傀儡政权。因此, 南朝鲜和在美国的庇护下为蒋介石一伙所非法盘踞的台湾, 对日本垄断资本格外具有魅力。日本垄断资本主义渴望事实上重新控制曾经是大日本帝国殖民地的朝鲜和台湾, 他们已经无法控制这种冲动。

然而, 台湾本来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 中国必将解放台湾。朝鲜民族是一个具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为民族独立而不懈斗争的光荣传统的伟大民族, 在北方, 社会主义的朝鲜民主主义人

(表 8) 日本历年经济合作实际金额的演变

(从 1961 年到 1973 年)

(以净支付额为基准,单位:百万美元)

项 目	历 年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1967
一、政府开发援助		106.9	86.8	140.3	115.9	243.8	285.3	385.3
1. 两国间的赠与		67.8	74.6	76.7	68.7	82.2	104.7	138.4
赔偿		65.1	66.8	62.1	57.8	62.8	55.6	81.7
无偿资金合作		0.3	4.2	10.1	5.1	13.4	41.6	45.7
技术合作		2.4	3.6	4.5	5.8	6.0	7.6	11.0
2. 政府贷款		27.7	5.0	51.5	37.5	144.1	130.0	202.2
直接贷款		26.8	12.5	60.3	49.1	83.2	114.8	161.9
再贷款		—	—	—	—	31.7	29.9	41.2
清理信贷		0.9	△7.5	△8.8	△11.6	29.2	△14.7	△0.9
3. 对国际机构的赠与、出资等		11.4	7.2	12.1	9.7	17.5	50.6	44.7
二、其他政府资金合作								
4. 一年以上的出口信贷								
5. 直接投资金融								
6. 对国际机构的贷款等								
政府资金合作(一加二)		106.9	86.8	140.3	115.9	243.8	285.3	385.3
三、私人资本合作		274.5	199.4	127.3	175.3	242.1	339.8	412.2
7. 一年以上的出口信贷		180.7	130.4	50.6	135.7	154.7	243.1	327.7
8. 直接投资		98.4	68.4	76.7	39.3	87.4	97.1	84.6
9. 对国际机构的贷款等		△4.6	0.7	—	0.3	—	△0.4	△0.1
10. 私人非营利团体的赠与		—	—	—	—	—	—	—
合计(一加二加三)		381.4	286.2	267.6	291.2	485.9	625.1	797.5
经济合作总额	日 本	*0.71	0.49	0.40	0.36	0.55	0.62	0.67
占国民生产总	开发援助							
值的比率(%)	委员会成	0.95	0.80	0.76	0.79	0.77	0.71	0.74
	员国平均							

续 表

项 目	历 年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1967
	政府开发援助 额占国民生产 总值的比率 (%)	日 本	0.20	0.15	0.20	0.15	0.28	0.28
开发援助 委员会成 员国平均		0.53	0.52	0.51	0.49	0.44	0.41	0.42
国民生产总值 (GNP, 亿美元)		531.3	588.9	679.6	801.1	883.1	1,015.5	1,195.5

项 目	历 年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一、政府开发援助		356.2	435.6	458.0	510.7	611.1	1,011.0
1. 两国间的赠与 赔 偿		117.0	123.4	121.2	125.4	170.6	220.1
无偿资金合作		46.4	41.3	18.2	21.8	34.6	66.9
技术合作		56.9	63.2	81.4	75.9	100.4	96.0
2. 政府贷款		13.7	19.0	21.6	27.7	35.6	57.2
直接贷款		190.5	216.2	250.3	306.7		
再 贷 款		178.1	221.4	236.4	302.9	307.2	545.1
清理信贷		3.9	△ 10.0	△ 7.7	△ 7.2		
3. 对国际机构的 赠与、出资等		8.5	4.8	21.6	11.0		
二、其他政府资金合作		48.8	96.0	86.5	78.7	133.3	245.8
4. 一年以上的出 口信贷			375.8	693.6	651.1	856.4	1,178.9
5. 直接投资金融			309.9	349.5	271.7	266.3	254.0
6. 对国际机构的 贷款等			55.9	143.1	136.3	264.7	569.8
政府资金合作(一加二)			10.0	201.0	243.1	325.4	355.1
三、私人资本合作		356.2	811.4	1,151.6	1,161.8	1,467.5	2,189.9
7. 一年以上的出 口信贷		693.1	451.7	672.3	978.7	1,257.9	3,654.3
8. 直 接 投 资		570.5	299.6	386.9	494.0	190.6	440.1
9. 对国际机构的 贷款等		122.6	144.1	265.0	356.2	844.3	3,072.1
10. 私人非营利团 体的赠与		—	8.0	17.5	125.4	217.4	135.3
合计(一加二加三)		—	—	2.9	3.1	5.6	6.8
合计(一加二加三)		1,049.3	1,263.1	1,823.9	2,140.5	2,725.4	5,844.2

续 表

项 目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经济合作总额 占国民生产 总值的比率 (%)	日 本	0.74	0.76	0.93	0.96	0.93	1.44
	开发援助 委员会成 员国平均	0.80	0.75	0.80	0.83		
政府开发援助 额占国民生产 总值的比率 (%)	日 本	0.25	0.26	0.23	0.23	0.21	0.25
	开发援助 委员会成 员国平均	0.38	0.36	0.34	0.35		
国民生产总值 (GNP, 亿美元)		1,418.8	1,658.9	1,961.6	2,253.0	2,944.6	4,069.6

资料来源：通产省：《经济合作的现状与问题》历年版。

注：1. ——号表示没有实际数；△号表示收回超过付出；

2. “私人资本合作”中的“非营利团体的赠与”，从1970年起决定列入开发援助委员会统计项目中；

3. 1970年以前，按1美元等于360日元，1971年按1美元等于350.83日元换算；

4. “其他政府资金合作”是开发援助委员会从1969年起新引进的统计项目，1968年以前的统计数字包括在“私人资本合作”项目里。

* 战前为 3.3%

民共和国在日益发展。而且南北方的朝鲜民族都在谋求祖国的统一。因此，日本的统治者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怀有强烈的敌意。中国和朝鲜的社会主义的发展，对日本人民的革命运动本来就是极大的鼓舞。唯其如此，日本统治者才非常害怕和敌视社会主义的中国和朝鲜。这种敌视由于上述情况倍加强烈。佐藤首相在政治上是代表日本垄断资本的这种立场的。

另一方面，美帝国主义在侵略越南和印度支那方面投入的兵力和财力越多，它所遭受的失败和打击就会越大。因此1969年1月就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于同年7月历访了东南亚各国，途中在关岛发表了“尼克松主义”，其实际内容是：把侵略和干涉亚洲的政策的重担，更多地让亚洲的美国傀儡政权和日本来承担。

佐藤首相为了建立与美国这个新的亚洲政策相适应的日美关

系，1969年11月访美，与尼克松进行会谈。21日发表的佐藤和尼克松联合声明申明延长并继续坚持将于1970年到期的《日美安全条约》；关于两国的远东政策和安全条约的实施，两国政府之间互相保持密切联系。佐藤首相的一段话尤其重要，他说：“高度评价联合国为维持朝鲜半岛的和平所作的努力，韩国的安全对日本本身的安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说，他把南朝鲜的安全看成是对日本安全不可缺少的，因此为了维护“韩国的安全”，日本就要对美军统治南朝鲜和敌视、侵略北朝鲜的政策进行全面合作，并比过去承受了更多的负担。佐藤首相在这个联合声明中还说：“维护台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对日本的安全来说也是极其重要的因素”；“日本正在探索对印度支那地区的安全所能起到的作用”。在这里露骨地表现出日本军国主义当前的矛头是指向朝鲜、中国和越南的。而且对于朝鲜，如前所述，日美两国竟然联合制定了进攻作战计划，对美国的侵越战争，实际上正在进行全面合作；同台湾蒋介石集团也在进行密切合作。

在佐藤和尼克松发表联合声明的同一天11月21日，在台北，“日华”协力委员会（以岸信介为首的日本最反动的政治家和垄断资本的代表同蒋介石集团的代表建立的团体）的第十四次大会也发表了联合声明。这个声明宣称：日本和蒋介石集团（僭称“中华民国政府”）“为了迅速改变其国际姿态，为了维护亚洲的自由与安全，将转为采取积极承担政治责任的态度”，“为了完成中华民国政府收复本土的最大课题，亚洲各国应一致努力创造一种使本土上的共产党政权土崩瓦解的环境”。

结 束 语

日本军国主义这样露骨地表明其对朝鲜和中国的积极进攻方

针，当然要受到朝鲜和中国方面的严厉反击。1970年4月7日，中朝两国政府发表的联合公报“强烈谴责”，“在美帝国主义的积极庇护下，日本军国主义已经复活，成了亚洲危险的侵略势力。”公报指出：“日本军国主义者直接为美帝国主义的侵越战争效劳，积极参预美帝国主义在朝鲜的新战争阴谋，并且妄想把中国人民的神圣领土台湾纳入他们的势力范围。”申明：“世界上一切革命人民必须采取一致行动，制止和粉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公报进一步说：中朝“双方认为，当前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是反美斗争的一部分，也是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斗争。双方表示决心，在进行反美斗争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共同斗争。”（1970年4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联合公报》，载《人民日报》1970年4月9日第1版）

中朝联合公报使广大日本人民和亚洲人民加深了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认识，提高了警惕。于是日本共产党修正主义集团马上跳出来叫嚷：尽管日本军国主义正在复活，但还没有完成。关于这个问题，1970年7月，他们在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中央委员会报告中说：

“自卫队在战斗力方面已经成为居世界第十位的军队，这本身就是明显的军国主义复活。……我们丝毫不应把这样一个军队已经复活的事实，同它同时又是军国主义一定本质性的复活混淆起来。……而且这个军队根据安全条约已成为美国侵略亚洲战略的补充部队，这一点也有重大意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在今天就已经成为亚洲各国人民的威胁。”

光看这一点，他们也象是承认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了。可是，上述报告紧接上文又说：

“不过，当我们议论军国主义是否已经全面复活的时候，不能抛开是否建成能够公开进行对外侵略的政治和军事体制的问

题。蹂躏宪法第九条关于放弃战力的规定而产生的军队——自卫队，它今天仍然没有建立起可以公然施行征兵制和向海外派兵的体制。今后容不容许它建立起能够实现这一目的的政治体制，这不仅对日本的前进道路而且对亚洲的和平，都确是极其严重的问题。”

日本共产党如此强调日本军国主义还没有完成复活，这就使军国主义已经复活的事实模糊起来。

他们还摆出一副象是认为日本军国主义已经成为亚洲人民的现实威胁的样子，但那只是说因日本军队是美帝国主义的补充性的军队才给亚洲造成了威胁。这样就掩盖了日本军国主义是日本垄断资本对南朝鲜和东南亚进行经济侵略的、政治和军事的表现这样一种事实。他们还把日本没有派出军队参加美帝侵略越南的战争，说成是日本军国主义没有完成复活的证据。这也是企图尽可能缩小日本统治阶级无条件地、全面地协助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这一事实的。

日本共产党竟然用日本宪法上规定不能向海外派兵、不能实行征兵制来作为军国主义没有完成复活的根据，这完全是赤裸裸的资产阶级的法律至上主义。尽管宪法上规定禁止重新武装，日本反动派不是已经拥有侵略性的军队了吗？对反动派来说，宪法上的规定对他们搞军国主义几乎是没有什么约束力的。他们在技术上已经完全作好征兵制的准备但还没有实行，并不是为了维护宪法，只是因为他们还没能造成一种把青年征去当兵也能够放心的政治思想状况。关于向海外派兵，1969年4月以来，政府再三说明“以自卫为目的”向海外派兵宪法上是允许的。这一点前边已经讲过。这里想就政府类似的发言再补充一个例子。1970年3月3日，内阁法制局长官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说：“为了保护在南朝鲜的日本人的生命和财产，为了保护日本的权益，把自卫队派往南朝鲜，

宪法上是允许的。”(《东京新闻》)

佐藤和尼克松发表联合声明后,进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得到更快的发展。日本对南朝鲜、台湾和东南亚的商品出口和资本输出,按几何级数与年俱增。而且正如过去日本垄断资本对南朝鲜扩张的方式所看到的,目的不是为了发展当地的民族经济和共存共荣,而是破坏民族经济,无孔不入地剥削朝鲜工人,掠夺朝鲜的资源。例如在印度尼西亚,日本资本很快把一个地区的山林掠夺了个精光。在新加坡,不管当地多么小的事业,日本资本都进行掠夺,并企图压倒新加坡的中小资本。泰国人批评说:日本人乘日本的飞机来到泰国,坐上日本的汽车,到日本资本家开设的旅馆住下,向泰国工业投资,残酷地剥削泰国工人而回国;日本是经济动物,是赚钱的野兽。日本资本的经济侵略和掠夺越厉害,遭受侵略的民族的抵抗就必然越激烈。为了压制这种抵抗,日本政府就支持当地的反动卖国政府,让它对本国人民采取法西斯镇压政策。这种典型例子同在经济侵略方面的例子一样,从南朝鲜的朴正熙政府同日本政府的关系上也可以看得出来。

在南朝鲜,1965年签订“日韩条约”以前,人民群众反对卖国法西斯政权的斗争,就同反对日本重新侵略南朝鲜的斗争结成不可分割的整体。进入七十年代,朴政权的法西斯统治,在日本政府和资本家的援助下,得到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人民的反法西斯和反日帝的斗争也日益高涨起来。对朴政权的法西斯统治,就连一直扶植它的美帝国主义对它也束手无策。可是日本政府和资本家却经常地、一贯地支持朴政权,每年都给它巨额贷款。

南朝鲜政治家金大中,在1971年总统选举中与朴正熙对抗。1973年8月,发生了在东京的旅馆被南朝鲜情报部(KCIA)拐骗的事件。这时连美国政府都对金大中的生命安全表示重大关心,谴责朴政权,但日本政府竟对蹂躏日本国家主权的这一事件,不

仅没有对朴提出抗议，反而“信任”南朝鲜政府发表的所谓它与事件完全没有关系的胡说八道的声明。日本警察发现的指纹证实南朝鲜驻东京大使馆馆员是拐骗金大中的犯人的同谋者。尽管如此，日本政府并没有向南朝鲜政府提出抗议。不仅如此，反而在同年12月召开第七次日本南朝鲜定期部长会议，决定在1974年度向南朝鲜提供四千五百四十万美元的贷款。

发生金大中事件的当初，日本政府装出一付有可能中断日本同南朝鲜经济合作的样子。然而我认为资本家是不会那样改变政策的，因为如果那样作，日本迄今对南朝鲜的投资就会前功尽弃，日本就不能控制南朝鲜经济了，事实就是如此。

1974年8月15日，在汉城发生了一起侨居日本的南朝鲜的一个青年狙击朴总统而失败的事件。从各种证据来看，这一事件很明显是南朝鲜情报部导演的一出戏。可是日本政府并不要求南朝鲜方面查明事件真相，却派缔结“日韩条约”当时的外相椎名悦三郎(自由民主党副总裁)作为首相特使前赴南朝鲜，就侨居日本的朝鲜人发动这一事件表示遗憾，并约定加强镇压住日南朝鲜人的反朴运动。

这些事件表明，日本对南朝鲜的经济控制越厉害，它就越同南朝鲜卖国法西斯政权结成一体。在这种情况下，表面上好象日本政府屈服于朴政权的无理主张，实际上正因为日本把朴政权看作是它的代理人，所以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拥护它。拥护朴政权，也就是日本要把自己的政治统治力量扩展到南朝鲜。因此，一旦南朝鲜人民的革命斗争进一步发展起来，打倒卖国法西斯政权，同时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南朝鲜进行反击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势必要以某种形式贸然进行军事干涉。

南朝鲜的情况是复杂的。还要看美国帝国主义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这对南朝鲜的影响也很大。因此，朴政权在被人民用革命推

翻以前,也许由美、日两帝国主义另换一个,也许朴政权为了延长自己的生命,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动战争,由美、日帝国主义事后加以追认。不管发生哪一种情况,日本的统治者为了保护其在南朝鲜的帝国主义利益,在必要的时候,将会毫无顾忌地进行军事干涉。日本军国主义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

第二部分

第一篇 鸠山内阁论*

第一节 两种力量

1954年12月，连续执政六年零两个月、从属于美国、恣意独裁的吉田内阁垮台了，组成了鸠山民主党内阁。这件事有什么意义呢？

吉田内阁是在两种对立的力量相互作用下被打倒的。一种是为实现独立与和平的日本而斗争的国民的力量，它得到国际的和平力量与独立力量的发展的支援。另一种力量，其反动性和军国主义野心并不亚于吉田等人，而且同吉田内阁一样是美国的附庸，假如先从结论来说，它是一股已经复兴起来并企图向帝国主义独立的道路前进的垄断资产阶级势力。这股势力纠集了反对吉田飞扬跋扈与独裁的人、看到吉田势力衰退而企图另找靠山的人，以及其他保守派内部所有反对吉田派的人。

国民对吉田内阁过分地屈从于美国和推行反民主的暴政非常愤怒，从而在《旧金山和约》生效后不久导致了流血的“五一节”。有人批判这次“五一节事件”，说是上了敌人挑拨圈套而采取的极

* 《鸠山内阁论》：是登载在《中央公论》1956年6月号的一篇文章，离现在已经二十一年了。文章发表前两年，1954年底组成的鸠山内阁，不论它的组成方式还是它的政策，都与过去占领下的历届内阁有相当重要的区别。这里我发现日本垄断资本的恢复已经超过战前，正在重新迅速成长，它力图实现帝国主义的独立。当时日本还处于美帝国主义的半占领下，看到占领下的政府有帝国主义独立的意图，这是一种相当大胆的看法。即使今天看来，我认为也没有错。所以才敢将这篇旧的论文重新收编进来。——作者

左的冒险行动。纵令这是领导者的错误，上了敌人的圈套，然而数万群众在没有出口的广场上，同数千名用手枪和催泪瓦斯进攻的警察进行殊死的斗争，这也非同小可。

此后不久，在号称占议会绝对多数的自由党内部，发生了鸠山一郎、三木武吉、河野一郎、石桥湛山等所谓“民同派”的分裂。他们对1952年4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经济会议寄予深切关心，要求同中国贸易，批判吉田内阁向美一边倒。他们还反对吉田的“自卫力量渐增”论，主张公然重整军备。鸠山内阁现行政策的最初雏型就是这时确立的。

在保守政党之间，也互相揭露对方是向美一边倒的反民族党派。1953年1月，在众议院通过对吉田内阁的不信任案时，在野党各派提出的不信任的主要理由是说吉田内阁“没有建设独立日本的抱负”。吉田一伙则反唇相讥，说在野党才是仰赖美国的支持，“严重背弃独立日本的民主政治的”。

从1953年到1954年，以反对内滩基地斗争、反对比基尼岛氢弹试验的怒火为开端，国民争取独立与和平的斗争高涨起来。另一方面，自由党出现了造船贪污案件，法务大臣动用指挥权阻止逮捕收贿的首犯佐藤干事长，这件事反倒使民心完全背离了吉田内阁，把它赶入穷途。

在国际方面，留在中国的日本人归国问题，由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红十字会的和平、友好与人道主义的精神，得到解决，三万多日本人从新中国回到祖国，传播了人民中国的明朗、和平和日新月异的发展形象。接着，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越南人民独立战争的胜利，中、苏、美、英、法五国在日内瓦召开和平解决远东问题会议的成功，周恩来·尼赫鲁和平五项原则声明的发表，亚非民族解放斗争暴风雨般的发展，这些对日本国民该是多大的鼓舞，给日本国民带来多大的希望啊！

国民的这种力量越强大，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就越严重。在野党千方百计地想要取代已经完全失掉人心的吉田内阁。1954年11月，在野党联合提出的对内阁的不信任案眼看就要通过议会，于是吉田企图解散议会。可是，经济团体联合会、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日本商工会议所、经济同友会，所有大资产阶级团体，即所谓“财界”，一致要求吉田辞职。垄断资本家们第一，担心一旦吉田蛮横地解散国会，自由党不消说，连资产阶级第二政党民主党（鸠山任该党总裁）也要在选举中失败，那末左右两派社会党会有很大发展。因此，他们希望让它平平稳稳地将政权移交给民主党。第二，当时垄断资本主义逐渐恢复，不仅已经没有必要讨好吉田，而且希望偷偷地或者公开地采取不同于吉田内阁的积极重整军备的政策，稍微修正向美一边倒的政策，特别是希望同中国进行贸易（这个问题将在第四节详述）。在这种情况下，自民党内定为吉田的接班人绪方竹虎表示反对解散国会，要求内阁总辞职，最后，傲慢的吉田也就不得不辞职了。

于是组成了鸠山民主党内阁。

鸠山首相鉴于民众对吉田“一人”独裁、官僚秘密主义和封建老爷作风，非常厌烦，便摆出一副完全相反的姿态。取消大臣官邸，废除了总理大臣汽车警笛和大臣警卫，说话也跟老百姓一样直爽，等等，借此来收买人心。

非常明显，鸠山内阁仅仅靠这样一些小动作来收买人心，是维持不下去的。它必须满足打倒吉田内阁的民众的要求。它企图通过高喊同中苏调整邦交、促进贸易来满足这种要求。另外，鸠山内阁还必须满足打倒吉田内阁的另一个势力，即其真正的主人“财界”的要求。为此，在人事方面，把坚持紧缩政策的日本银行总裁一万田尚登安排在大藏大臣职位上，压制通货膨胀派的石桥湛山（鸠山的忠实盟友）猎取藏相交椅的强烈要求，让他当上通产大臣。

在政策方面,除了坚持紧缩政策外,还采取了积极推进重整军备的政策以及保证重整军备的产业政策。

1955年2月27日,举行了鸠山内阁组成时所约定的大选。面对选举战,政府和民主党大肆宣传同中苏调整邦交,扩大贸易,使社会党失去攻击的借口。在重整军备方面,则宣传建立“与国力相适应的自主防御体制,以便逐渐使美军撤退成为可能”,“减少防卫分担费,用这笔钱建筑国民住宅”。避免使用“重整军备”一语;征兵制一事,只字不提;说不修改宪法,即一味大肆宣扬改变向美一边倒,讨好国民;和吉田一样,企图掩饰重整军备。他们没有忘记在上次大选时,民主党的前身改进党高唱重整军备和修改宪法,遭到惨败的教训。

选举结果:民主党当选一百八十五席,成为第一大党;自由党由一百八十席一举降到一百一十二席。社会党,尤其是一直坚持拥护和平宪法和反对重整军备的左派社会党有很大跃进,由七十四席增为八十九席,右派社会党也由六十一席增为六十七席。此外加上劳农党四席,共产党两席,反对修改宪法派合计为一百六十二席,取得了议员定额四百六十六席的三分之一以上的议席,能够在议会上阻止修改宪法。

第二届鸠山内阁于3月18日组成。一万田藏相、石桥通产相和河野一郎农相等是掌管经济方面的内阁大臣,重光外相留任,防卫厅长官改为鸠山的亲信杉原荒太。

第二节 所谓“自主的防卫体制”

鸠山内阁许下的诺言究竟实现了多少呢?所谓减税和建设住宅,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真正实行,因此,现在也就不去管它,而把问题集中到重整军备和与中苏调整邦交上。

民主党的候选人，连党的口号都强调自主的防御体制。不消说，纵令是“自主的”，军备也违反宪法。鸠山处于在野党的时候，认为自卫队违反宪法，因此主张尽快修改宪法，可是取得政权以后，则又花言巧语地说，自卫的军备并不违反宪法，对此现在也不必去重复了。

这里值得注意的问题是，鸠山内阁企图拥有“自主的”军备，它同吉田内阁的“自卫力量渐增”有没有区别呢？据我看是有微妙的差别的。鸠山内阁想尽快实行征兵制。这一点只要一看他为此而急于修改宪法就清楚了。虽然吉田内阁也作了不久要施行征兵制的准备，但没有把它当成当务之急的课题。吉田在回答在野党质询的时候，他总是用一种鄙弃的口吻回答说：“不实行重整军备。”这是因为尽管他想实行征兵制，希望拥有现役和预备役，马上就能动员一百万人甚至二百万人，希望建立拥有第一流装备的军队，可是他认为现在还不具备足够的经济实力，国民也还没有充分受到军国主义思想的训练，因此为时尚早。

吉田的“自卫力量渐增”方式有三个目的：第一，为将来通过征兵正式实行重整军备建立骨干队伍；第二，建立镇压国内革命运动的兵力；第三，以自卫队为诱饵，换句话说，就是以日本年轻人的生命来换取由美国加强给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共同安全法》之类的“援助”。因此，尽管在吉田时代重整军备的奋斗目标是陆海空三军均衡发展，但并没有努力（或不能）推进三军的均衡发展。美国施加强大压力，要求日本将陆军增加到三十五万人。对此，日本竭力设法讨价还价，使其保持在十九万人的限度以内，但对美国没有提出要求的空军的增强也不热心。不消说，地面部队畸型发展的军队只能是美国的雇佣兵。美国只要求日本提供“人的资源”，不愿让日本拥有空军和海军。

鸠山内阁重整军备的目的，眼下与吉田的那三点是相同的。其

中上述第三点已不象吉田时代那样重要了。而代之以新的第四个目的，即它确想拥有“自主的”军备。他希望尽快施行征兵制的最有力的理由是，因为“自主的军备”需要庞大的资金，要是还象现在这样士兵拿工资，在财政上无论如何也是负担不起的。鸠山内阁组成以后，与吉田时代不同，在重整军备上热中于三军均衡发展，力求实现喷气机国产化，甚至推进了火箭武器的研究。1955年3月决定的六年防卫计划，预定最终年度陆军达十八万人、海军舰艇达十二万三千吨、空军飞机达一千四百架。说是这一目标实现时，就要求美军地面部队全部撤退。据说民主党内有人要求沿袭旧改进党1953年6月制定的陆军十二万人、海军十五万吨、空军一千五百架的方案，但如果要求美国撤退地面部队，陆军最低要有十八万人，否则美国就不同意，无奈决定为十八万人（《朝日新闻》1955年3月12日）。即便是鸠山内阁的“自主的”重整军备，而这样的日本陆军也只能是美国陆军的代用品；国产喷气式飞机，其实也不过是把从美国买来的部件加以装配而已。本来，受日美“安全条约”和《日美共同防御援助协定》束缚的日本，是不可能拥有自主的军备的（请参阅《文艺春秋》1956年5月号文章：《没有比“自来”的自卫队代价更高的军队》）。不过，鸠山内阁确实希望拥有独立自主的军事工业体系和靠这种军事工业体系装备起独立的陆海空三军，并为此而付出了努力。吉田的“自卫力量渐增”和鸠山内阁的重整军备，在其向往和努力的强烈程度上是不同的。

鸠山内阁要求美国减少日本每年必须向美国缴纳的“防卫分担费”，结果决定每年按日方防卫厅费增加额的半数减交防卫分担费（用减交的分担费来建设住宅，那是不可想象的）。这只能促进和加强重整军备。尽管同样是军费，却把全部交给美国的钱，变成日本能够自由使用的钱，仅就这一点来说，也是为“自主的”重整军备所作努力的一种表现。

鸠山内阁如果真想保持“自主的”防御军备，那末首先它就应该拒绝美军把“诚实的约翰”导弹运进日本，拒绝美军关于大规模扩大载原子弹飞机起落用的机场和为此而征用国民的土地等要求，积极主动地尽最大努力去减少美军基地，至少不应该采取镇压国民反对基地斗争的方针。这些原子弹氢弹战争基地是进攻用的，决不是“防御用的”。而且保持这些基地不仅仅是为了进攻苏联和中国，也是为了威胁和镇压日本人民走独立自主的道路。假如原子战争基地、大小空军、海军基地压制着整个日本，那末即使日本建成了十八万人的陆军，美国地面部队全部撤退，日本军队也不可能是真正“自主的”。今天的日本，“重整军备”和“自主性”是不能结合起来的。

鸠山等人不是减少和缩小而是增加和扩大美军基地，并为此而强制征用国民的土地和住房；正象扩大砂川基地时所看到的，造成日本警察为美军而无动于衷地枪杀日本人民的民族悲剧。这样一来，所谓“自主的”重整军备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那只能是从属于美国，伙同美军发动帝国主义战争的、日本独自の帝国主义军备。就是说，鸠山内阁企图从吉田时代的殖民地土著军队向从属帝国主义军队飞跃而迈出了第一步。也就是说，鸠山一派把国民要求祖国独立自主的强烈愿望，歪曲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帝国主义的东西。实际上，重光外相于1955年8月在华盛顿同美国协商“防御”问题时，甚至作出了向海外派兵的保证。鸠山首相1956年在国会答辩时“失言”说，如果为了自卫，可以“侵略”海外敌人的基地（2月29日）。当有人问道“你不认为太平洋战争是侵略战争吗？”的时候，他竟很少见地大动肝火，拒绝回答（3月8日），大喊大叫地说：自卫权优先于宪法（3月10日）。这一切都不过是为复活帝国主义铺平道路罢了。

第三节 日苏谈判与松鼠外交

一般在谈到鸠山内阁的两面性的时候，是说鸠山内阁一面举行日苏会谈，另一面实行从属于美国的重整军备。据我看来，这两方面在鸠山派来说并不是完全矛盾的，可能应该看成一部分有矛盾吧。这是因为鸠山内阁的重整军备，既然是在从属于美国的情况下谋求帝国主义独立，那末他们进行日苏会谈也还是谋求帝国主义国家的独立的。最热中于正式重整军备的鸠山、河野一郎和杉原荒太等一派人，又是最热中于日苏会谈的一派人，这并不奇怪。在争取独立自主这一点上，两方面是不矛盾的，可是重整军备不能算是真正独立自主，因此不是防御性的，而是侵略性的，这同恢复日苏邦交、和平共处是矛盾的。

鸠山等人希望恢复日苏邦交，是相当认真的，不能认为仅仅是为应付选举的一种姿态。前面已经说过，从他们还是旧自由党民同派的时候起，就热中于日苏和日中贸易。1954年12月10日，第一次组阁后举行初次记者招待会时，鸠山首相讲了下面一段话：

“现在最可怕的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也就是美苏战争。为了避免这次战争，最好的办法是彼此大力开展贸易。我认为自由主义各国，以苏联、中共为敌，不同他们交往和进行贸易，这样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还是相互搞好关系，努力维持和平，大力开展贸易为好。美国也会理解这个方针，不会招来误解。”

如果完全听信这些话，那是相当漂亮的和平共处论。鸠山又在12月15日的无线电广播中大胆地说：“蒋介石政权也好，毛泽东政权也好，都是杰出的独立国政权，日本同双方大力发展贸易交往关系也是当然的。”作为处于统治地位的人来说，说这些话还是第一次。

为了响应鸠山的这种态度，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发表声明说，如果日本有意，苏联准备就日苏关系正常化，研究实际措施。接着在1955年1月，苏联驻日代表部道穆尼茨基秘密会见鸠山，提交了本国政府提议开始日苏会谈的文件。鸠山没有把同道穆尼茨基的接触马上告知重光外相，与心腹杉原等人商谈，决定同意谈判，并且是在把这件事委婉地透露给新闻记者以后才告诉重光的。也许因为已经知道重光不同意日苏谈判，所以暂时对他保守了秘密。这证明鸠山一派是认真想搞日苏谈判的。

批准前去中国和苏联进行学术、文化交流，和商谈遣返日本人归国及贸易关系的人士，与前内阁时代相比，大幅度增加了。准许中国的贸易代表入境，也可以在东京和大阪举办中国商品展览会。日中和日苏的实际贸易额尽管还是微不足道的（鸠山政府不断受到美国的压制，因此，好不容易签订了民间贸易协定，还限制实行），但门缝虽小却在逐渐扩大。

恢复日苏邦交谈判，日方要求归还南千岛和齿舞、色丹诸岛，苏联不同意；陷入无限期休会，政府和执政党内有人主张就此打住。可是鸠山一派仍想找机会重开日苏谈判。政府派遣河野农相前去谈判渔业问题，目的大概也是为了创造恢复邦交的机会。因此，我估计可能是重光外相故意没有把必要的新情报告诉河野全权代表，发出了模棱两可的训令；这样恐怕连渔业谈判也不能圆满达成协议；但绝对不要使谈判决裂，部分采用暂定办法处理，要为以后谈判留有余地。

那末，为什么鸠山一派热衷于恢复日苏邦交了呢？虽然纯属推测，但我认为恢复日苏邦交的直接目的，在经济上是为了稳定北洋渔业，为进口库页岛和西伯利亚的木材和石油开辟道路，有利于减少日本资本主义对美国的依赖；在政治上是为了给日本参加联合国扫清障碍（以前苏联一直反对），加强日本的独立性。与此

同时，恢复日苏邦交实际上可能想建立通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走廊。日本在吉田政府时期在条约上写明承认台湾政府是唯一的正统的中国政府，今天它要接近中华人民共和国，走建立日苏正常邦交的迂回道路，看来是远，实际上是最近的道路。鸠山一派和日本垄断资产阶级尽管是从帝国主义的立场出发，但如果希望独立，就必须同这个邻国建立正确的关系。其实，这年2月22日，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石坂泰三会见记者时就说：“中共是离日本最近的巨大市场，解决中共问题对日本经济来说是重要的。”这是他们调整日中、日苏邦交的真正原因。

然而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说并不是没有顾虑的。一经建立邦交，日本人民对苏联和中国社会的发展及其人民的幸福生活知道得越多，就会越羡慕，无疑会产生倾向社会主义的思想，这一点确实是非常值得他们担心的。前面引用的经团联会长石坂的谈话中也说：“在我国尚未恢复应有的国民精神的情况下，同苏联恢复邦交不危险吗？”这也许是他们尚不能摆脱美国的压迫，马上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大原因。为了眼前也顾不了别的。在重整军备方面，他们利用国民正当的民族独立自主的要求来建立从属帝国主义军队；同中苏恢复邦交和发展贸易的问题，本来是他们从帝国主义独立的需要出发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行动，但它又不能不使他们担心会增强人民的国际主义。

现在在全世界最担心这一点的是美帝国主义者。他们在日本的代理人是外务大臣和外务省，是旧自由党的吉田派。重光外相把他在首次组阁后不久的一次谈话(1954年12月11日)，发表了两种版本：一种是对国内的；一种是用英文对国外的。在对国内的版本中简单地谈到在同美国协调的基础上，在其允许的范围内希望实现同苏联的关系正常化，发展日中贸易。与鸠山谈话没有什么根本不同，共产党国家侵略的威胁之类的谎言一句也没说。可

是用英文发表的谈话与对国内的谈话几乎完全相反。其要点如下：

（一）最近共产主义国家发动了和平攻势，但仍然难以预测。针对亚洲的现状，采取“凭实力的和平”政策，是最妥当的。因为将来共产主义对不稳定的亚洲的压力，恐怕会愈来愈强大。

（二）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要充分认识日本列岛的战略重要性，在日本经济力量容许的范围内，做好防卫力量的准备。

（三）对同中苏的贸易，虽然不能抱很大希望，不过现在的贸易额太小，如有增加的机会是欢迎的（《朝日新闻》12月12日）。

对美国的这种媚态胜过吉田前首相。第二段是说充分认识到日本对美国在战略上的重要性而进行扩军，连吉田也没有公开说过这样的话。1955年8月，重光去华盛顿朝拜的时候，在全美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说。他引证白宫前面公园里跳跃在树间的一只松鼠说，自己与其作一只金丝笼中扬扬得意的孔雀，“莫如作一只在林间耍懒、贪玩、羞怯的松鼠”。他绘影绘声地描述公园里的松鼠时常从妇女手中得到饵食的情景，然后结束了他的演说：“这也许是因为妇女对这个小小的动物充满了友好的情谊，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眼睛看不到的和平共处的和谐的缘故。……这种情况象征着理想的外交图景。请大家象妇女给松鼠饵食那样，温情地来对待我吧！”

一想到这竟是自己国家的外务大臣的演说，在气愤之前，首先觉得脸上发烧。重光松鼠大臣如此低三下四地献媚，不知从白宫妇女那里领到什么饵食呢。他什么也没领到，反倒只是日本被迫作出“为了西太平洋的国际和平与安全”而出兵的保证。

重光个人只不过是企图靠追随美国保持其在日本政界的地位的小人物而已。因为这样的人物被安排在副首相、外相的地位，日本才被美国利用“媾和”与“安全保障”两个条约、共同防御援助和

其他“援助”以及美国私人投资等等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控制起来。连让重光下台都作不到，这就可以看出鸠山外交“自主性”的局限性了。

上述观点不是被鸠山等人的日苏谈判的姿态欺骗了吗？我认为重光、鸠山的二元外交，实际上不过是日本外交史上经常采用的一种手法，即“两面外交”(Double play)的伎俩罢了，也就是说，两个人为了欺骗热望和平共处的日本国民，不是分别表演得够精彩的了吗？假如情况如此，国民就应该利用其两面性的一面，迫使鸠山内阁必须在实行和平共处，还是继续实行卖国政策之间进行抉择。这样做是进步政治家的才能，把鸠山定为卖国贼算不了什么本事。鸠山内阁二者择其一，如果明确选定卖国政策，那时鸠山内阁以及类似的内阁，就会被国民大众打倒，使它不能再次重新出现在政界。

第四节 官僚的质变

国内基本政治问题的重整军备(修改宪法、修改公职选举法和实行小选举区制的问题是当前国内政治的决定性问题，这些也都是与重整军备问题交织在一起发生的)方面也好，对外政策方面也好，都共同贯穿着鸠山内阁的两面性，即帝国主义的独立的意向和对美从属性这样两个方面。这种两面性是在日本垄断资本主义已经逐渐恢复并发展到企图独立的阶段，但这种恢复一直依赖、现在仍然不得不依赖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援助”的政治表现。

战败后的日本垄断资本主义是怎样被迫从属于美帝国主义的，这个问题是不消论证的。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尽管日本资本主义从属于美国，然而它却已经明显地复活，而且已经发展起来，并超过了战前。

产业活动指数，以1934到1936年为100，战败后的第二年1946年仅为39.2，可是1951年就已超过战前水平，达到119.4，1955年跃进到186.7。尤其是电力、煤气、自来水等公共事业，1946年就达到109.1，1952年达201.2，已达战前的两倍，1955年为254.7(尽管如此，在国民日常生活方面，电和煤气的供应仍不如战前充裕，尤其是1951年，停电非常严重，这是因为增产的部分被美国占领军以及为其服务的军事工业用掉了)。就工矿业来说，除了纺织和印刷，到1951年全部突破战前水平，尤其是机械工业，达197.1，几乎为战前的两倍。特别是1952年到1955年生产增加的速度，比西德都快，在资本主义世界居第一位。

这种产业活动的复兴，同时也是大垄断资本的生产和本金的积累和集中的飞跃发展，也是以旧四大财阀系统的银行为主力的金融资本的复兴。

然而这种复兴，首先是通过臭名昭彰的复兴金融金库和后来的开发银行的贷款，由国库对所谓“重点生产”、“集中生产”的基础产业(即财阀系统的垄断企业)，有重点地、集中地发给补贴和补助金及其他等等，即都是通过政府的资金援助实现的。而且这些财政投资和贷款大都依靠美国的“对日援助”美元对等资金。在公开的占领制度情况下，预算、贸易都要受占领军的干涉，实际上是控制。因此，日本的产业和贸易完全从属于美帝国主义，作为占领军的承包执行机关的日本政府官僚，尤其是外务省、大藏省和通产省的大臣和官员对经济界的发言权是极大的。企业的借款远远超过自己的资本，唯其如此，企业受到银行控制。这些银行从属于日本银行、官僚和占领军。

产业复兴的第二个时机是1950年6月美国发动的朝鲜战争。日本产业因为有了这一天，作为“远东工厂”而复兴起来；战争一打起来，日本简直变成了美军的后勤部一样，赚取了巨额“特需”收

人。特需采购受到凶狠的压价，“牺牲血本接受订货”并不新鲜，不过，大企业则是牺牲工人和承包业者，让他们出血而自己赚钱，积累资本。直接或间接严重依赖特需的日本垄断资本，当然不会产生对美国的独立性，也不会动摇官僚统治权。

1953年7月朝鲜停战，特需采购减少，使资本家再度陷入严重困难之中。在这种困难处境之中，大垄断资本已经充分地积累了资本，反倒兼并了弱小企业而膨胀起来。1954年，在吉田内阁末期，萧条非常严重，产业每月的活动指数很快下降（从1954年3月到8月，由一百七十九点三下降到一百六十二点四，从9月开始回升）。我认为这一困难时期是垄断资本摆脱对“特需”的依赖而寻求出路的时期，并且在设备资金等方面是摆脱依赖与美国“援助”相结合政府资金的转折点。

对日本经济和鸠山内阁来说，幸运的是，从吉田内阁向鸠山内阁过渡起，在国际经济好转的影响下，日本出口突飞猛进地增长。以战前1934年到1936年平均为一百，出口金额指数，1953年为一百三十五点六，1954年平均为一百七十三点三。同年10月增长到二百零六点六，12月增长到二百四十二点六。1955年与1954年相比又增加二点三成。以出口旺盛为杠杆，工矿业生产也迅速上升。

大企业有充足的自己资金偿还银行贷款，银行资金因而也变得充裕了，能够向日本银行偿还贷款。于是在战后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所谓的“金融正常化”。在供给资金方面，尽管财政投资的作用仍然很大，但在1956年度的预算中，实际上是显著减少了。美国附带条件的援助资金，即购买剩余农产品的贷款，也已经不再具有1950年以前那样的外资的威力了。

这些情况表明，日本资本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正由从属于美帝国主义逐渐走向独立自主。同时，尽管日本垄断资本正在摆脱从

属美国恢复独立性,但从整体来看,日本在军事上和政治上仍然从属于美国,在经济上还要依赖庞大的美国资本(战败以来的各种“援助”资金、世界银行的贷款、美国贸易公司的直接投资和技术合作,等等)。因此,还远没有完成帝国主义的独立,不过,已经出现这样的趋势,还会逐渐得到很快的发展。

垄断资本对美国的这种独立性,也只不过是个萌芽,在国内方面,它是万能的统治者。官僚也不再象过去可承受美国占领军赐给的权力,掌握“援助”资金款项时期那样有威力了。吉田内阁在末期已经不能行使独裁首相的威令,他的宠儿池田勇人(大藏官僚出身)在党内的势力也已经减弱,这同他们原来的基础——占领权力执行机关的官僚制开始失去威力有关。

一般认为,在编制本年度预算时,“政党(保守势力联合后的自由民主党)的力量自始至终起很大作用,这是从来没有的现象”(东洋经济新报社:《日本经济年报》第90集)。不仅如此,作为行政机构改革的一环,“内阁最大的实力人物”河野农相甚至提出撤销大藏省主计局,在内阁设立“预算局”,企图将预算编制权置于政党控制之下的方案。河野原来是个新闻记者,现在与北洋渔业垄断资本有牵连,在经历上没有当过有力的官僚。他一直在政党出身的鸠山首相之下,成了“第一名有实力人物”。这同在纯外务官僚出身的吉田首相之下,最有实力的人物、出身于大藏官僚的池田勇人相对照,就会看出这两届内阁的不同性质。

大藏官僚还不至于软弱无力得连预算编制权也被夺走,河野方案没能实现。但自明治以来,具体提出这样的设想,这还是第一次。

而这个政党是听命于垄断资本家的。在从吉田到鸠山的政权交替中,“财界”起到了积极作用,在保守党合并中,财界也施加了强大压力。从今年(1956年)2月22日经团联会长石坂的谈话,4

月 26 日在日经联大会上几个人的发言,可以预想到这种情况今后会愈来愈利害。

第五节 展望

垄断资本的统治,还明显地表现在鸠山内阁的农业政策,即所谓河野农政上。1955 年 8 月,农相在农林渔业调查会上致辞说:“现在以增产米麦为中心的农业政策,不过是沿袭了军国主义下的农业政策。应该把日本农业同世界农业的动向联系起来考虑,根据这种观点,从根本上重新研究农业政策。”(《日本经济年报》,第 90 集)

这个想法的具体化,就是他的废除统制的方针和购买美国的剩余农产品的政策。这是企图在世界农产品过剩、农业危机的情况下,从外国买进廉价大米和小麦,政府停止收购(或者大幅度减少)国产大米和小麦,以便减少财政负担,竭力维持低米价,借此保障低工资的。这无非是一种利用国际农业危机,为垄断资本的利益服务,无视日本农民的利益甚至包括中农以及少数富农的利益的 policy。

这的确是“从根本上重新研究农业政策”。因为从前的农业政策是,在考虑垄断资本的利害的同时,要首先考虑地主阶级的利害,也考虑到中农阶层的利害。可是,河野的农业政策只考虑保障低工资等垄断资本的利害和大农业资本家的经营(用廉价进口饲料大量饲养家畜,或者经营不能进口的水果和蔬菜)的利害,而对于主要靠自己劳动、生产米麦的农民大众则全然不顾。

这种农政设想,可能是根据这样的事实,即在农村已经不存在以前那样的贩卖米麦的寄生地主这种社会阶层。在农村里,半封建的地头蛇势力还很强大,在山村里还广泛存在着半封建的土地

所有制，正是这种半封建的地头蛇势力，同垄断资本紧密勾结，支撑着它的统治，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主要在山林、原野、用水权方面所保留的封建所有制关系还有很大力量。然而作为一个阶级，象以前那样与资产阶级并列的·独·自·的·政治·势·力，即半封建地主阶级（他们也是大米的贩卖者）已不存在了。这种情况反映在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河野的农政上。

我以前重视在农业或者农村广泛保留着的半封建的土地关系；飞扬跋扈的封建地头蛇势力；根深蒂固的封建残余——社会习惯（如男女不平等、家长制、身分差别等），一句话，重视这种既广且深的封建残余制度，是可以的。但是，从这里直接得出存在着作为·阶·级·的·半·封·建·地·主·阶·级·的·结·论，则是错误的。从这种错误的观点出发，便错误地认为战后的天皇制官僚——它同占领权力的关系另当别论——，在国内阶级关系中仍然是绝对主义，即建立在半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两股势力之上的。尽管今天的官僚与官僚制中，仍保留着一些封建因素，但应该说在基本阶级关系上它是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机关。

支配着官僚、政党以及日本一切统治机构的垄断资产阶级，暂且把所有资产阶级势力纠集起来，结成统一战线的就是通过“保守合并”组成的自由民主党。他们企图靠这个统一的力量，借“自主的防御态势”之名，强制推行对美从属的、侵略性的、正式的重整军备，恢复日苏邦交与和平共处并不是这个统一战线的真正一致的目的。它只是得到了鸠山派的积极支持。

尽管自民党占据议会的绝对多数，但并没有超过三分之二。因此它不能通过修改宪法案。于是鸠山等人就企图修改公职选举法，施行小选举区制。它的目的是，首先想一下子消灭社会党、劳农党和共产党；第二，他们想借此消除党内的各种派别，确立主流派的领导权，加强团结。在一区一人的选举区内，除了党公认

的候选人以外，禁止使用党的名义，这样，党的干部就可以通过决定公认候选人来巩固势力；第三，企图禁止政党的联合选举和共同选举，并且使不能提出五十名以上的候选人的政党不能进行选举活动，剥夺国民政治活动的自由，尤其是想使社会党、劳农党和共产党不能进行统一选举。

也就是说，修改选举法就是加强反动和重新武装的势力的统一和团结，阻碍进步与和平势力的统一，是企图为修改宪法、重整军备和帝国主义的独立敞开大门。

第二篇 从历史上来看 岸内阁的性质*

一

凭我国的保守势力，——保守固然是保守——，难道就不能实行捍卫民主和民族独立的政治了吗？现在提出这样的问题是愚蠢的吗？看一看岸信介和自民党（合并为一个党，在众议院占绝对多数的保守党）的动向，不禁令人感到他们想走的道路不仅是保守而且是反动，不仅是反动而且只能是一条法西斯化和对美从属的道路。

然而，回顾岸内阁以前的内阁，并非只是这样一条道路。实行拙笨的、独裁的、完全独断专横的政治和对美从属的政策达数年之久的吉田政权于1954年底倒台，组成了鸠山内阁。这时，在国民中间出现一种象是在长期梅雨之后看到一线云隙的气氛，竟形成了所谓的“鸠山热”。鸠山一党早就主张公开重整军备，为此还主张修改宪法。鸠山在战前当政友会领袖时的活动也称不起是个民主政治家。尽管如此，他压根儿就是搞政党活动和议会活动的人，因此，当他和其同伙接替了全身浸透秘密外交的官僚出身的吉田及其集团的时候，便出现一种明朗的气氛，被认为固然保守还是向民主政治前进了一步。而且鸠山内阁不顾国内垄断资本一派的反

* 这篇文章应该说是前面的《鸠山内阁论》的续篇，登在《中央公论》1957年12月号上。鸠山内阁表现出来的帝国主义复活的倾向，到岸内阁变得更加明显了，并且加快了步伐。鸠山内阁还表现出独立的意向，而岸内阁并不想去探索独立的道路，它是在加强对美从属同盟的同时，追求自己的帝国主义目的。从那时以来，它便成了复活日本帝国主义的路线。我认为作为这样一个历史阶段来分析，这篇文章今天还是有用的。——作者

对,不顾美国不悦,首相终于抱病亲赴莫斯科,实现了日苏复交。日本并以此为跳板参加了联合国。这次与《旧金山媾和条约》不同。那个条约是根据美国单方面的安排,从时期、形式到内容都是美国强加的。这次与那次媾和有本质的区别,是国与国之间对等的复交活动,是积极地向民族独立前进的。尽管鸠山内阁试图非法划小选举区,极其露骨地强制推行小选举区制,试图复活和加强“大日本帝国”教育和实行其他若干反动政策,然而这届内阁与过去的吉田内阁有些不同。与吉田内阁相比,具有民主性和民族性的倾向,这是不容否认的。我当时认为鸠山内阁的这种倾向是代表以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复兴为基础,统治阶级积极谋求帝国主义独立的动向的(本书《鸠山内阁论》)。这一论断即使在今天来看也没有错。

鸠山引退后,自民党多半是由于派系势力均衡的结果,不得已实行总裁公选。这种作法除了远在1881年(明治14年)的革命的自由党外,后来在日本资产阶级政党史上,还是第一次。一旦弄清了种种内幕,也许会有人认为,本质上这不过是一出粉饰民主主义的滑稽戏而已。不过,保守政党为了对付进步势力迅速发展的倾向,不是也想要把自己打扮得带上一点清新的气氛吗?

公选的结果,石桥湛山当选总裁,于是组成了石桥内阁。虽说石桥内阁也不得不谋求党内的派系势力均衡,没能满足人们实现清新保守内阁的期望,可是,这届内阁却借助当时的经济繁荣,提出了他们可能实现的政策——一千亿日元的减税、一千亿日元的刺激经济措施,以及经济的扩大均衡政策。这些政策尽管都同样反映了垄断资本的利益,但它更强烈地反映了产业资本的利益而不是银行资本的利益(当然这种减税,无产阶级劳苦大众是得不到好处的);另外他们没有从一开始就敌视中国,当他们把扩大贸易作为实行扩大均衡政策的保证,从而表现出希望同中国扩大和加强

经济关系的姿态时，人们便对石桥这样一个很久以来有骨气的自由主义者抱有好感，期望石桥内阁沿着前内阁迈出的方向，更加大踏步地前进。

鸠山、石桥这两届接连的内阁，从政党和官僚关系的角度来看，也是我国政治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这是因为在我国尽管说是政党政治、政党内阁，而战前的保守政党除了只有一次犬养毅的政友会内阁外，压根儿就没有过政党出身的人当上党的总裁从而当上首相的，都是官僚、军人或者华族^①出身的人。而且犬养也仅仅当了六个月的首相，就被法西斯军人杀害，结束了战败前的政党内阁时代。后来，原来是政党出身或者财界出身的人当政党领袖，暂且保全了余生，但那些官僚和军人连看都不消看他们一眼，政党逐渐完全从政权被排斥出去，终于发展到政党本身也解体了。

战后，议会政治、政党政治变成一个原则。在有占领军总司令部期间，它同议会的关系，宛如战败前天皇同议会的关系，占领军总司令部拥有绝对权力，不能说是真正的议会政治。而且战后的历代首相，最初是皇族东久迩宫，接着是币原、吉田等所谓战前的英美派外交官，之后，热烈庆祝国民主权与和平主义的新宪法的诞生，并根据新宪法进行了第一次大选，社会党变成国会第一大党，组成了片山内阁。然而不久还是被外交官出身的民主党总裁芦田均取而代之，当了首相。接着成立了第二届吉田内阁，此后吉田内阁整整蝉联了六年之久。在这期间，保守政党几经离合聚散，除了比较弱小、不久被消灭的协同党（国民协同党）外，自由、进步两党以及它们的后身，都推选外交官出身的吉田、芦田、重光为总裁。这只能令人感到：因为保守党只有推选与占领军总司令部或者美国关系密切的人当总裁才对它们有利，它们才有力量。然而，在恰如占领军总司令部赐予的吉田内阁的末期（这时已经是媾和以后，占

^① 华族：日本有爵位的贵族。——译者

领军和占领军总司令部这样的形式已不存在，美国对日本的压力在制度上比过去缓和了)，在鸠山一郎当上与吉田自由党对立的民主党的总裁之后，自由党也把总裁和首相分开了^①，新闻记者出身的绪方竹虎当上自由党总裁，于是政党才在官僚以外拥立自己的总裁。接着吉田内阁倒台，继鸠山之后组成了石桥内阁。

非官僚出身的人当政党的总裁，而且在党内也不是依靠官僚派而主要依靠非官僚派的势力取得政权，这一点是政党政治的一个进步，在我国政治史上可以说是划时期的。这种进步不仅仅是在形式上，不论在战前的天皇制下，还是在战后的占领军总司令部的统治下，在议会政治实际上受到很大限制的时期，这是不可能的。而这样的事似乎终于实现了，从这一点来看，也是有进步意义的。如果能按这个方向坚持下去，那末由保守政党实行保守的民主政治也许是可能的。

然而这个方向没有确立起来。石桥首相组阁后很快就病了，由于出现这样一个偶然情况，事态很快就开始逆转了。石桥派在总裁公选中的胜利，并不是靠压倒优势的实力，而是由于竞争对手在策略上的错误帮了他的忙，是侥幸拣到的，在他因病辞职后，由该派占据总裁位子就不可能了。于是战前天皇制法西斯的推行者“新官僚”的领导人登场了。曾经担任过东条战争内阁大臣的岸信介，当上了首相兼外相。岸是1952年才解除了清洗令的，他最初的政治活动是组织了一个称为“日本重建联盟”，渗透着战前法西斯意识形态的团体，搞起什么“爱乡”运动、重新武装运动，根本就没有得到国民的支持，这一点也可以想见他的为人。可是现在这个赫赫有名的、具有法西斯主义者和战犯经历的旧天皇制官僚，再次当上保守政党(而且现在只有一个)的总裁，当上了首相。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同上述政党政治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的。这种情

^① 总裁和首相分开，即总裁不担任首相。——译者

况,在8月10日的改组内阁而建成的“岸体制”的内阁人选上更加鲜明地表现出来。

在岸内阁中,有副首相石井光次郎等旧内务官僚系的头子四人。其中唐泽俊树在东条内阁时担任过内务次官,与岸信介一个鼻孔出气;而且在此以前担任过警保局长,他不仅镇压左翼而且以彻底镇压一切自由、民主、和平的运动与思想闻名;他只当选过一次众议员。具有这样历史的唐泽这次竟当上了法务大臣,指挥检察厅和公安调查厅,这怎能不令人惊讶。新设立的内阁总务长官今松治郎也是内务官僚出身,担任官房长官的爱知揆一是大藏省出身,在他手下的副长官冈崎英城也是内务省出身,是地地道道的特高警察。从这些情况来看,不能不说他是企图事实上恢复战前的特高警察系统的。从大臣到长官,官僚出身的十二人,非官僚出身的仅七人。曾经被清洗过的有岸首相、石井副首相、藤山外相、河野经济企划厅长官、唐泽法相等有实力的阁员,共十人,达到过半数。此外还有堪称岸信介的经济问题顾问的贺屋兴宣。如果我们想起作为战犯押在鸭巢监狱而刚刚出来的、东条内阁的藏相贺屋,那末我们只把兴趣仅仅集中到党内派系,看哪一派有几名,他们处于什么样的复杂关系,就会把真正要紧的问题看错了。所谓岸体制,从人事方面来说,首先是以首相为首的旧官僚,尤其是旧内务官僚和战犯的全面复活的体制。

第二,这届内阁人事上的另一个特点是,天生就是大资本家、领导着一百八十到二百个公司和资本家团体的藤山爱一郎,因为他与首相有多年的交情,这次当上了外相;还通过藤山让前开发银行总裁小林中出任东南亚巡回大使,让涩泽财阀的头子、前日本银行总裁、国际电信电话公司总经理涩泽敬三出任南美巡回大使,这种第一流的资本家相继得到任命。在我国政治史上,身为大资本家在政府担任要职,仅在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的1937年后的

战时统制经济时期有过。现在岸内阁起用财界人士担任外务大臣,这也许是为了直接开展所谓的“经济外交”,也就是为垄断资本开辟市场,进而同美国相勾结,扩大对东南亚的资本输出。这与反苏、反华政策是互为表里的,并与促进军火生产的体系化和重整军备是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在这里可以非常具体地看出站在岸信介背后的垄断资本是些什么样的集团。这是一些在垄断资本家当中与国家资本紧密勾结,并通过它直接与美国资本相勾结的大金融资本家。

二

从人事方面所推断的岸内阁的性质,再从它的政策和行动来看,就更加具体、更加明确了。石桥辞职后,刚刚接替石桥的最初的岸内阁一方面处在国会会期中,另一方面在党内的地位还没有巩固,因而内政方面的主要政策,只好原封不动地沿袭石桥内阁的方针。于是当时的第二十六届国会,在“正常运营”的名义下,象上届国会一样,执政党和社会党没有发生激烈冲突就结束了。这种所谓的“正常化”的条件,一半在于社会党幻想在保守和革新“两大政党的时代”,如果不受工会等议会外势力的束缚,始终凭议会内交易“成长”起来,就能吸引中间阶层,扩大党的势力,与保守党相互交替执政。而主要的条件在于,政府和执政党方面暂时避免拿出象废止人事院法案、秘密保护法案和劳动关系法的修正案等预想到进步势力会猛烈反对的法案,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显得比较明智些。这种明智的根基,政治上是前内阁的政策遗留下来的;经济上则由于“神武景气”,垄断资本的姿态显得大方了。

然而在这次国会开会期间,不得不从上届内阁继承的“扩大均衡”政策的前提条件——经济繁荣,因外汇收支恶化而开始受到威胁。当然需要“调整”经济和金融政策。“调整”就得承认上届内阁

经济估计的错误，因而就不能不意味着追究它的直接责任者石桥派(在这种情况下具体说来，是以在反岸时与石桥联合的大藏大臣池田勇人为代表的)的责任。而解决外汇危机的办法，只提出抑制进口和紧缩金融。正好这时，5月底，英国不遵守美国强加给它的对中国贸易的特殊限制，宣布放松这种限制，西德等西欧国家一齐响应，而岸内阁却按兵不动，没有表现出要借机积极发展日中贸易，以利摆脱预想到的经济危机的意向。岸信介并不止此，还想把同共产党国家发展贸易为前提的扩大均衡政策的崩溃，用来作为建立岸体制的绝好机会。

当要建立“岸体制”时，岸首相首先访问了东南亚，接着又去华盛顿朝拜。他去印度时，同尼赫鲁总理一起赞扬强调和平共处，赞扬反对一切殖民主义的万隆决议十项原则；在共同声明中倡议：“紧迫而热切地呼吁，立即停止核武器和热核武器的试验”；在中国问题上，他对尼赫鲁首相说：“日本在同国民政府缔结和平条约的同时，也不能无视中共在大陆上已经成为稳定政权的事实，可是促进同它的贸易与承认中共政府是两码事。”关于美军在日本的基地，他说：“日本感到共产主义的威胁，不能完全没有防御力量，因此日本同意美军驻日，不过不是无限期地驻下去。”（《朝日新闻》1957年5月25日）仅凭这一点，如果说真心话，也并不是不能对现在日本保守党对国际和平与民族主权的诚意作出评价的。他在锡兰也谈到了“维护万隆精神”。

可是他一到台湾，就唆使蒋介石“收复大陆”。他说：“中国大陆现在由共产主义统治着，对中华民国(台湾蒋政权)的困难处境不胜同情。不过，由于这种情况，在某种意义上，日华两国就应该越发加深合作。”“日本保守党决不采取容共或者中立的立场。不过在实行政策的手段和方法方面，日本有日本的情况。”“日本赞同在大陆恢复自由。不过，要想理解日本对中国的政策，就必须了解日

本人对中国的感情。一般说来，日本人对苏联有一种敌对心理或者冷冰冰的感情，有时甚至怀有一种类似愤怒的情绪。与此相反，对中国人则抱有亲近感，这与是不是共产主义没有关系。就某种意义来说，在共产主义对日本的渗透上，可以说来自中国比来自苏联更可怕。因此，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如果收复大陆，我是非常赞成的。”（《朝日新闻》1957年5月4日）既然是这样，那末北京政府谴责岸首相敌视中国是理所当然的。

《世界周报》8月17日号在《东与西》栏内，一个用笔名S的人攻击周总理说：周恩来总理只凭《朝日新闻》一家报纸的报道材料就攻击日本政府，这种态度“没有一点气魄”。说是“这位作者本人手头上有可信赖的岸信介在岸蒋会谈结束后的谈话记录。”而在记录中，岸首相是这样说的：

“日本保守党不采取容共和中立的立场。不过，在谈到它的手段和方法时，日本也有日本国内的情况，从外部来看可能给人一种软弱的印象。蒋总统希望解放中国大陆的心情和信念，我非常理解。日本对俄国怀有长时期的历史的反感。但对中国，不分中共或台湾，都怀有一种亲近感。因此，对来自苏联的共产主义渗透，抵抗力强；对来自中共的渗透，抵抗力弱。这一点我感到很可怕。因此，如果解放大陆，对日本来说也是值得高兴的。”

这同上述《朝日新闻》的消息，内容也好，气氛也好，究竟哪里不同呢？

岸首相在台湾一句也没提到万隆精神。关于禁止原子弹氢弹问题，只是说极左派曾把日本人的特殊体验所产生的国民感情用来反美，但是“现在政府和国民形成一体，站在人道的立场上来进行反对”。（这是进行禁止核试验运动的意思吗？）蒋介石对此也说：“我总认为尼赫鲁总理反对原子弹氢弹和日本的立场是不同

的。”在印度和锡兰的岸信介和在台湾的岸信介，我简直看不出是同一个人。这样一个“两面讨好”、“八面玲珑的岸信介”，他又怎么能得到亚洲人，哪怕是蒋介石一派的真正信任呢？

岸信介东南亚之行的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让美国提供“开发东南亚的基金”，日本给它当掌柜的，提供技术，榨取当地的资源和劳动力，开辟发财致富的道路。东南亚人民立即看穿这是帝国主义的新形式。美国也不说对这样的事要拿出钱来，因此，这个设想今天完全失败了，这一点这里毋庸重新赘述了。不过要注意的是，岸内阁的这种“经济外交”，一方面仍然依靠引进美国资本，另一方面经过“神武景气”，迅速成长起来，竟企图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资本。这正是迅速恢复帝国主义性质的垄断资本的要求。

在吉田自由党时代的 1950 年前后，政府及其支持者就大力主张，不应把将来日本经济发展的任何希望，寄托在同中国和苏联等“共产化了的国家”进行平等互惠的贸易上，而应该向东南亚扩张。当时还认为这是要出口日本工业品，进口东南亚原料。而今天已经到了提出资本输出问题的阶段了。这么一来，对政府和支持政府的资本家来说，按照“平等互惠”原则同共产党国家进行麻烦的商品交易，远不如在东南亚赚取帝国主义超额利润的吸引力大。而且因为它“既不容共也不中立”，当然有理由期待美国的援助。不仅如此，为了走充当美国代理人的帝国主义道路，就不能不越来越强调“既不容共也不中立”。

不过，如果始终光强调这一点，就会在“万隆精神”指引下的亚非各国人民当中日益孤立。于是就需要“两岸”^①政策、“两面外交”。在印度就必须同尼赫鲁总理完全一致，“紧迫而热切地呼吁立即停止”原子弹氢弹试验。可是，在联合国，在美国的眼前，光强调这一点又怕得罪美国，于是一方面支持美国提出的核试验与一

^① 两岸：即两种面孔的岸信介之意。——译者

般裁军是不可分割的原则,另一方面又说可以不管一般裁军协定,要求暂时停止核试验,提出了一个内容完全矛盾的议案(1957年9月23日)。尽管如此,而当苏联回电答复岸信介,表示同意日本将一般裁军与停止核试验分开的方案时,政府又厚着脸皮说:那是苏联的曲解。实际上日本想搞什么,怎么搞,也许连岸首相、藤山外相自己也不清楚。

三

这种“两面手法”,不仅对亚洲各国,就是对我们日本国民,岸政府也是常常喜欢采用的。岸信介在飞往美国之前,同日本经济新闻评论委员菲泽嘉康对谈(《赴美之前》、《中央公论》1957年5月号)时说:“当日美两国互相站在独立的和对等的立场上,相互考虑事情的时候,我确实感到旧金山体制有必须纠正的地方。拿‘安全条约’和‘行政协定’来说,这种地方是很多的,除此以外还有不少。”“年青人反对旧金山体制,就某种意义来说,这是摆脱战后一个时期的虚脱状态,正在产生民族自觉的证据。保守党正确地抓住这一点,理解这种民族自觉,对美国进行必要的谈判,或者实际表示要沿着这条线走向解决的方向。与此同时通过广泛的宣传,我想青年人也好,一般国民也好,都会理解的。”

这是一种非常卓越的见解。如果岸信介真的体会到民族的自觉,对美国进行必要的谈判,那我也想当岸派。“不过”,岸信介接着说:“不过,为了表示要对美国进行这样的谈判,不先进行协商、打好基础是不行的。……日美之间要就国际形势的认识和日美未来关系的展望,在基本看法上取得一致。关于这一点,尤其要坦率地告诉美国首脑,日本国民是这样想的,让他们很好地理解。应该先作这样的事,说现在马上就叫它进行修改‘和平条约’和‘安全条约’的谈判,也办不到,事情总得有个顺序。”

这么说来，开始举行修改不平等条约谈判的时机无论如何还没有到来。这样把一件前后矛盾的事，用一种表面上非常象样的措辞统一起来，听的人怎么理解都可以；如果理解得对自己不利，就说那是误解或者曲解，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在绝对主义官僚和诡辩家的世界，尽管在“圆滑周到”的有才华者那里可以通得过，但这决非有经世济民之志的诚实的政治家之谈。

实际上首相朝拜华盛顿，在让美国首脑理解日本民族自觉方面作出多少努力呢？1957年6月21日，他在记者俱乐部演说时说：“报纸上报导说最近日美关系正在恶化啦，反美主义在日本人中间扩大啦，这种报道固然没有必要过分认真地去提它，但同时也不能无视它”，略微流露出一点日本人的民族感情。然而他在这里一点也没能表明日本人对一些迫切而具体的问题的要求和希望；却净说了些日本是美国在亚洲的忠实盟友、是容共和中立主义的坚定敌人之类的话。例如关于冲绳行政权问题，这一天他在会见日本记者时坦白地说：“也不能要求归还部分行政权，把军政分开；也不能满有信心地断言，归还了日本，就会变得非常好起来。”（《朝日新闻》1957年6月22日）他这是在说，即便把那些在比任何帝国主义都残暴的美军的压制下受苦受难的冲绳县民放到岸信介自己施政之下，也没有信心会比今天幸福得多。这样的人，在日本的民族利益方面，在维护和平方面，又怎能向美国总统和国务卿诉说些什么、让他们“理解”些什么呢？日美联合声明只是让美国取得使日本今后仍然充当攻击远东共产党国家的基地的保证，日本只不过是重新发出忠于美国的誓言，这一点连吉田前首相时期都为之逊色。日本人的禁止核试验的要求被拒绝了；日中贸易只字没提；关于冲绳只是重复日本拥有潜在主权这样一些过去说过多次的、毫无意义的话。“安全条约”岂止没有提出修改的方向，反而决定设立讨论有关实施这个条约的各种问题的委员会。根据美

国战略变更的既定方针，撤退驻日地面部队，这一点被说得仿佛是会谈的成果，可是作为答谢的条件，日本要进一步加速重整军备。连这样的东西也竟然空话连篇地吹嘘说：“确信日美关系正进入一个以利益一致、坚决信赖为基础的新时代”。

就对美屈从这一点来说，这根本不是什么两国关系的“新时代”。然而在屈从的作法上确实有“新”的地方。这个“新”就是，日本同苏联也恢复了邦交，加入了联合国，与过去相比相应地提高了国际地位；而且经济上也得到了恢复。只要打算和平生存下去，日本已经有条件可以不接受条件不利、完全强加的对美依赖；在国际关系方面，一般说来，尽管进展缓慢，但并没有改变缓和的趋势，尤其是亚非各国的和平主义与民族独立的力量日益强大；也就是说，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日本对美国采取自主立场的步子都可以比过去迈得更大；在这种客观条件增强了的时候，而这时的政府却比过去没有这些条件、对美国抬不起头来的任何时期的政府，更积极、更具体、一项不漏地去承认美国的立场，这就是所谓的新东西、“新时代”。看起来，岸首相等人也许确实相信这样作是一条复活日本帝国主义的最好的道路。不是违心地而是主动地屈从于对方，尽管旁观者认为那是屈从，而他却很容易认为这是因为本人有同美国共通的反苏反中国的根本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而互相“合作”，不仅如此，说不定是让美国张牙舞爪地干，其实是自己想要利用它。岸内阁不仅仅是出于资产阶级政府的本性，彻底厌恶共产主义，而且积极敌视中国和苏联，一有机会就想恢复过去的帝国主义特权和势力，为此在军备方面便想装备核武器，火箭、导弹等远距离进攻武器。美国以“集体防御”为名的新战略，正是把用这类武器武装日本军队说成是“援助”的。岸首相企图同它结合起来，把日本变成名符其实的当代第一流的国家。岸信介等人不是开始抱有这样的野心吗？尽管这些还属于根据收集到的片断材料

而作出的推测的范畴，然而我认为这种野心已经成为使岸首相之流确信“日美新时代”的基础。

这样想才能理解首相充满信心从美回国，极其蛮干地强行改组内阁，组成具有上述内阁成员的“岸体制”的意义。7月10日，这个体制一建成，同月30日，悍然不顾社会党和反对修改宪法的学者拒绝参加，竟由自民党议员、赞成修改宪法的学者、大资本家代表以及其他委员组成了一直是悬案的“宪法调查会”。戒能通孝在《对宪法调查会的疑问》（《中央公论》1957年10月号）一文中透彻地指出这件事的深刻的反动意义。以此为开端，第二届岸内阁尤其是在文教政策和劳动政策方面，集中力量继续强制推行了最反动的法西斯政策。其具体情况不想一一累述。剥夺组织起来的工人、尤其是国营企业等基干产业的工人的战斗力，在“爱国精神”和“道德教育”的名义下，向青少年灌输军国主义、反民主的奴隶服从精神和反共主义，在这方面一旦成功，对反动统治来说，那些可怕的东西不就消失了吗？

岸内阁为什么恰恰在今天这样强制推行反动政策呢？大资本家的利润也没有濒临危机，工人也没有起来要发动革命，岂止如此，最近由于“神武景气”的影响和共产党腐败的自我暴露，工人运动和革命政治斗争与过去相比，近一两年明显地衰微了。而且连杜勒斯都非常清楚，苏联和中国会进攻日本是莫须有的事，根本不必担心。既然如此，为什么岸内阁还要如此强制推行反动政策呢？也许确实有这样的意图，即在自己把战线统一起来、加强了统治力量的今天，在经济方面虽有危险征候、但还没有太大问题的今天，在革命力量或者进步势力衰弱的时刻，对它进行彻底追击。因为如果不这样作，在国民投票修改宪法的时候，就可能遭到意想不到的失败；一旦发生经济危机，就说不定会爆发什么样的革命运动。然而，今天的反动并不只是垄断资本那种先发制人的攻击，还必须

看到前述向美一边倒、露骨地敌视中苏的外交和复活帝国主义的政策的一面。

岸内阁好象企图通过向美国表忠心，以便从美国得到比吉田内阁更多的支持，从而建立象吉田内阁那样的“长期稳定政权”。然而这条道路不仅对日本人民来说是一条非常不幸的、严重违反人民利益的道路，即使对统治阶级来说，也未必能说是一条明智的道路。如前所述，现在日本的垄断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对外关系上都不存在严重危机。他们按照他们那一套民主的方法进行统治，是有可赚钱的余地和方法的，今天在日本垄断资本主义所走的通往从属、战争和法西斯的道路以外，即在岸信介之流已经体验过的那条以惨败而告终的道路以外，并不是没有生存的道路的。可是为什么他们要走现在这样的道路呢？是日本没有能指出不同于他们的道路的保守政治家吗？

有一位叫麦克马洪·鲍尔的澳大利亚学者。不管在任何意义上讲，这位学者既不是容共主义者，也不是反美主义者，只希望亚洲和平与繁荣。他忠告日本人说：

“也许有这样一种议论：如果发生了世界大战，只要美国战胜，无疑对日本是有利的。可是，我们必须极其认真地分析一下，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我先说下，象日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形暴露，容易受到攻击的国家，所谓安全一词在将来不是对战败的安全，而是应该意味着对战争的安全。因此我想说，日本的政治家们如果离开意识形态和观念论来认真考虑本国的问题与现实，那末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日本最大的国民利益就是和平。”（《日美安全条约应该修改吗？》，《中央公论》1957年6月号）

第三篇 《乙巳保护条约》与 “日韩会谈”^{*}

××：“日韩会谈”，在2月20日草签了“基本条约”，4月3日又就请求权、渔业问题、法律地位等三项悬案草签完毕，现在已经到了企图强行批准这项条约的阶段。南朝鲜人民把“日韩会谈”叫作“第二个乙巳保护条约”，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重新侵略”的口号下，顽强地开展了反对运动。这件事有什么意义呢？当“日韩会谈”到了决定性阶段之际，日本人民应该考虑些什么，作些什么呢？在回顾近代日朝关系的同时，请先生从历史学者的角度谈一谈过去对朝鲜的侵略和“日韩会谈”的特点（提出质问的是《朝鲜研究》编辑部）。

井上：过去日本侵略朝鲜时，最初有充当欧美侵略朝鲜的开路先锋的味道。1876年（明治9年）把江华条约强加给朝鲜的时候，事前也完全取得了欧美各国的谅解和支持才搞的。那时主要是英国，当时英国和帝俄在全世界对立，尤其是在远东。当时英国对日本的基本政策，是企图使日本成为它在远东对抗俄国的前哨基地。因此，英国公开支持日本1873年以后的“征韩论”。虽然有这种因

* 自1951年以来断续进行了长达十四年的“日韩会谈”（详见本书的第三篇论文），终于在1965年6月达成协议，签订了《日韩基本条约》及其他一系列条约。这年的干支是乙巳。在干支的上一个乙巳年，1905年，日本强迫韩国签订了事实上把大韩帝国完全变成日本殖民地的“协约”。一般把这个条约叫做《乙巳保护条约》。从那时起六十年后的《日韩条约》，是在新的世界历史条件下的《乙巳保护条约》的再版。在这个条约签订前夕，为了回答日本朝鲜问题研究所编辑部提出的问题，就“日韩会谈”以及其他日本和朝鲜的关系问题写了这篇文章，刊登在日本朝鲜研究所的机关刊物《朝鲜研究》1965年6月号上。——作者

素，但在当时英国的支持不是主要的。日本的天皇制还是没有成熟的资本主义，尽管如此，不，正因为是没有成熟的资本主义，反而更加急于对朝鲜进行纯军事性的扩张。

日本侵略朝鲜的目的之一，就是确保朝鲜成为日本天皇制的大米和大豆的粮食资源基地。其次，在中塚明的论文中明确指出：是为了掠夺朝鲜的黄金。在经济上，这两点是主要目的。与其说是为了输出日本商品，不如说是为了掠夺粮食和黄金。在政治上日本受欧美各国压迫，为了补偿这方面的损失，便对朝鲜或者清朝也采取相当的高压态度。也就是说，企图用侵略朝鲜，在朝鲜炫耀皇威来作为对欧美屈从的一种补偿。其次，我认为还有相当严重的封建性的领土扩张主义的因素。日本本身的这种侵略性是主要方面。

现在“日韩会谈”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是，从会谈一开始到这次迅速达成协议，在一切阶段都可以看到美国的指挥。尤其是在第四次会谈，我认为日本放弃当初对南朝鲜提出的请求权的主张，是“日韩会谈”当初的一个转折点。日本对南朝鲜提出对其在殖民地统治时代在南朝鲜拥有财产的请求权主张，而南朝鲜方面则认为根本不能成为对日会谈的问题，由于日本放弃了请求权，“日韩会谈”这才走上轨道。而日本放弃请求权是因为美国政府写信指示日本放弃的。^①信上公然写道：“根据美利坚合众国的见解，……”从此以后“日韩会谈”正式走上轨道。

在谈判的紧要关头，总是美国的指挥起了作用。就拿这一次来说，也是佐藤首相赴美，同约翰逊总统会谈回来以后，才迅速达成协议的。

由此可见，“日韩会谈”有这样一种因素，即日本体会美国的意思

^① 美利坚合众国国务院在1957年12月31日给日本政府的书信说：“根据合众国的见解：对有关这些资产利益的有效请求权的主张，是不能成立的。”

图而同南朝鲜恢复正常关系，它企图今后在某种程度上代替美国统治南朝鲜。也就是说，当美国的代理人，代替美国对南朝鲜的部分统治。最高主人是美国，以美国为主人，日本当掌柜的，然后代行主人的一些拙劣作法。这次“日韩会谈”有这样一种因素，而且这种因素非常大，这也许可以说是这次“日韩会谈”的特点。

日本垄断资本本身的野心

那末，是不是日本只根据美国的命令行事呢？也不能那样说。恢复起来的日本垄断资本自己也有想向南朝鲜扩张的帝国主义野心，因此，在经济上资本输出可能比商品输出变得更主要了。日本的财界人士络绎不绝地到南朝鲜去。因为他们想以各种各样的合办事业或者向南朝鲜产业投资的形式，向南朝鲜输出日本的资本，把南朝鲜人民当成非常便宜的劳动力来驱使。

在渔业问题上表现得非常明显。日本企图靠在技术和资金方面援助南朝鲜渔业的办法，最后日本大渔业资本与南朝鲜买办资本勾结起来垄断南朝鲜的渔业。因此，不仅南朝鲜一般渔民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了，就是日本中小渔业者也是无力对抗的。我认为日本大渔业资本把那一带垄断起来，这是渔业条约和渔业问题的本质。

借“援助”之名进行新殖民主义的经济侵略

我认为当然会出现从南朝鲜掠夺大米和黄金这样的因素。不过，现在南朝鲜还没有这样的生产力。因此，我认为现在的主要目的，是反映日本发展了的资本主义要求的资本输出，这恰恰是典型的垄断阶段的经济侵略。它采取一种所谓的“援助”的形式。以前曾经采取过相当露骨的掠夺形式。今天的新特点是通过“援助”使南朝鲜的官僚和同官僚勾结的南朝鲜买办资本同日本资本结合

起来。

以前日本统治朝鲜是从朝鲜地主手里夺取土地，对朝鲜资本的成长则以《工业令》、《公司令》等法令进行压制，抑制朝鲜民族资本的发展，这种露骨的、赤裸裸的暴力的压制是很明显的。就是这回也根本没有发展南朝鲜民族资本或者发展南朝鲜的农业和渔业的意思，事实上也并非如此，而是把南朝鲜完全置于日本垄断资本的统治之下。这时就把当地的买办势力当成走卒，采取姑且同他们合作的形式，装出一副仿佛力求南朝鲜繁荣的样子。这是一种所谓的新殖民主义，因为以前那种赤裸裸的暴力掠夺，在世界上已经行不通了，用来欺骗和镇压朝鲜人民也办不到了，所以只能采取一种欺骗的手段和方法。这就是今天的特点。

“日韩会谈”的军事性质

另一点是，“日韩会谈”同美国的整个亚洲政策相结合、具有很强的政治的和军事的性质。它不只是日本垄断资本掠夺南朝鲜的问题，首先美国的亚洲政策本身就是始终阻止朝鲜统一和南朝鲜社会主义化，把它作为美国的殖民地来保持下去。不仅在南方，一旦有机会，还想把北方也置于美国的统治之下，而且不仅是北朝鲜，还想向中国进行扩张。在这种情况下，南朝鲜在地理上也就变成更重要的据点，在南朝鲜维持日美的傀儡政权，以此为根据地进攻北朝鲜，遏制中国。为了贯彻美国的这种政策，美国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日本垄断资本，因为日本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处于由“安全条约”，不仅由“安全条约”，还由被占领的历史状况确立起来的对美从属的地位。另一方面只要日本垄断资本企图进行帝国主义扩张，那末它无论如何也得象以前那样，在远东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然而日本今天没有这种力量。因此当日本企图对已经觉醒了的朝鲜民族和中国，乃至对亚洲各民族进行帝国

主义扩张的时候，它无论如何必须依赖美帝国主义。这是前提条件。

本来，日本帝国主义过去也是这样，如果它不同欧美某个强国勾结起来，在财政方面就没有实行帝国主义政策的足够的实力，现在更是如此。军事上也好，经济上也好，如果日本作为和平民主的国家，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同亚洲各民族共生存，那就完全没有必要依赖外国的力量。然而只要想进行帝国主义的扩张，就必须排除现在亚洲各民族的抵抗，因此，日本无论如何必须依赖美帝国主义。由于日本存在这样一种情况，于是两者便互相结合起来，即美帝国主义统治亚洲的要求与日本垄断资本企图依靠美国进行自身的帝国主义扩张的立场互相结合起来，日本企图充当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并使南朝鲜从属于它。

对日本人来说，这样把“日韩会谈”推进到批准所签定的条约的阶段，简言之，这就是日本充当美国的代理人，让南朝鲜从属于它。这自然意味着马上建立以美帝国主义为盟主的事实上的东北亚军事同盟。

在“三矢作战计划”中也预想到日本同美国勾结在一起向朝鲜扩张的情形，“日韩会谈”有很强的军事性质。不仅仅是垄断资本的经济扩张，还有军事性质。已经去镇压南越的民族解放运动，美国连日对北越进行轰炸，发动侵略战争，亚洲的形势非常危险。处在这样的形势下，建立起事实上的东北亚军事同盟，对日本人民来说，甚至明天就有被拖进战争的危险。现实发生了从横田基地起飞的美国飞机在北朝鲜进行间谍活动，被北朝鲜飞机赶走的情况，亚洲的战云逐渐接近日本。日本的天空逐渐遮上战云。这种形势同今天美国施加强大压力迫使“日韩会谈”迅速达成协议是分不开的。日本政府与南朝鲜傀儡政权之间结成同盟关系，支持傀儡政权。“韩国”向南越派遣了陆军，还会发生增员的事态，这时傀儡政

权当然会日益动荡不安。因此，日方对傀儡政权的支持，对美国来说就变得更加紧迫、更加必要。这是“日韩会谈”急于达成协议的最根本原因。唯其如此，对人民来说，这正是危险所在。

日本人的民族观与“日韩会谈”

过去日本在亚洲曾经是唯一的压迫民族，战后被置于美国的统治之下，至今日本民族仍然算是受美帝国主义压迫的被压迫民族。我认为由于再也不充当压迫民族，日本人才有可能在亚洲建立起正确的平等互惠的民族关系，才有可能作为同朝鲜人、中国人和东南亚人的对等的民族伙伴，建立相互平等的关系，并在战后逐渐建立起日本人的正确的民族观。

我认为日本人对朝鲜人的不正当的民族差别感，至今还不能说已经消除了，不过这种东西正在迅速消逝。这是因为战后，特别是最近数年间，当日本人充分了解到北朝鲜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的时候，才感到朝鲜民族了不起；然后日本人才能够公正地看待南朝鲜的学生和一般人民反对“日韩会谈”或者打倒李承晚政权的斗争及其力量。

由于这种原因，过去对朝鲜的那种不正当的优越意识，正在迅速消逝。然而今天的情况是，日本资本重新长驱直入地向南朝鲜扩张。一旦朝鲜人在日本资本之下，以非常低廉的工资，象奴隶一般地被驱使，那末好容易快消失的日本人的错误的民族观念和思想，又可能恢复，并得到加强。

可是另一方面，日本从属于美国，一提到美国人就认为是了不起的民族。也就是说，对美国人卑躬屈膝，对朝鲜人则趾高气扬，态度截然不同。我认为我们对朝鲜人有了正确的民族观，才是能够对美保持正当的独立、自尊的民族荣誉的基础。

好不容易到了这种地步，又要走回头路，这对日本人来说是非

常不幸的事。

“不可能成功的”再度侵略南朝鲜的梦想

因此，如果日本照现在这样充当美国的代理人，向南朝鲜进行帝国主义扩张，那末首先就会很快遇到非常大的军事危险；日本直接同美国、同南朝鲜的买办官僚和买办资本勾结起来发动战争的危险是非常大的；其次，在思想上也会妨碍正确的民族意识和民族间相互关系的正确认识的产生和成长；第三，对工人来说，它将成为支撑日本工人的低工资的条件。如果在南朝鲜，以非常低廉的工资驱使朝鲜工人，并从那里不断地赚钱发财，这样对日本国内的工人群众来说，一方面会起不断压低工资的作用，另一方面会成为造成少数工人贵族的部分基础。在渔业方面，九州和中国（日本的一个地区）的沿岸渔民以及零散的中小渔民，也必然会因此受到严重打击。

当南北朝朝鲜和平统一，建立起统一的自由民主的朝鲜，民族工业在那里得到发展的时候，如果那时日本与繁荣的朝鲜结成平等互惠的关系，那末它对日本工人来说，为日本人民自身建立起一个自由的、民主的和繁荣的日本也是非常有利的，就是对渔民来说，日本和朝鲜签订平等互惠的渔业协定，即可保护渔业资源，又能使双方都得到好处。

如果照现在这样下去，一切都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因此，所谓朝鲜问题，日本好象又考虑召回昔日那种“大日本帝国的荣光”的亡魂，或者想从朝鲜捕捞朝鲜近海的鱼，让我国国民能够大量吃到价廉而味美的鱼等，总之是考虑日本人民的繁荣，如果这样想那就大错特错了，并且会走向它的反面。

因此，我们不要当政府和资本家所散布的幻想的俘虏，进一步说，尽管这取决于日本人民的抵抗和斗争，不过，从世界的一般情

况,尤其是亚洲的情况来看,即使日本垄断资本想进行那种帝国主义扩张,也不会象以前那样简单。尽管美帝国主义用了那么多的军事力量,花了那么多的钱,也没能把南朝鲜建成一个为他们服务的、能够使他们放心的殖民地。正因为没有成功,所以现在才让日本来帮助它弥补美国的失败。

从美国没有成功这一点可以看出今天朝鲜民众的民族觉悟之高和抵抗力之强。

尽管日本想代替美国进行扩张,而日本帝国主义曾经残酷地压迫过朝鲜,这是朝鲜人怎么也忘记不了的,因此,朝鲜人的抵抗,只会比对朴政权和美国更利害。

若是美国的话,它还可能有条件使朝鲜人民这样想:就某种意义来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从而给朝鲜带来了独立的机会。可是日本的情况就不同了,对日本怀有好感的朝鲜人一个也没有。因此,向南朝鲜进行扩张,象以前那样干“便宜事”在那里赚钱回来等等,即使暂时能作到,长期这样干是不可能的。所以,我甚至想请资本家也最好撒手别干。

《乙巳保护条约》和“日韩会谈”

今年是巳年,同迫使签订所谓《乙巳保护条约》的1905年,正好是干支相同的一年。朝鲜人今天一再说:“这是乙巳保护条约的再版”,我有同感。六十年前的1905年,日俄战争后的《乙巳保护条约》,是使朝鲜完全殖民地化的第一步,比使朝鲜半殖民地化还进了一步,实际上是殖民地化的条约,此后五年,便吞并了朝鲜。我想今天南朝鲜人提起《乙巳保护条约》,恐怕是想强调今天的“日韩会谈”最后签订的《日韩基本条约》和渔业协定等等,是日本使南朝鲜殖民地化的第一阶段。从朝鲜人来说,当然只能这样看,而且事实也只能是这样。

在签订《乙巳保护条约》的时候情况也是这样，在那以前先签订了桂太郎—塔夫脱密约，日本同意美国统治菲律宾，交换条件是美国同意日本统治朝鲜，这就是美国陆军部长塔夫脱与日本首相桂太郎的密约。另一件事是第二次“日英同盟”。这个《日英同盟条约》是英国在它对其印度的统治受到威胁时，用结成“日英同盟”来对抗这种威胁的，也就是说，当英国对其印度的统治逐渐困难起来时，让日本来增强英国对其印度的统治，交换条件是英国承认日本对其朝鲜的统治。这是日美、日英两帝国主义间的交易。所谓《乙巳保护条约》就是这类东西，结果日本使朝鲜殖民地化，一般也是通过充当欧美帝国主义侵略亚洲的帮凶得以实现的。

尽管形式不同，这次也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企图借助充当美国统治亚洲的帮凶，建立起日本在南朝鲜的帝国主义地位。

与六十年前相比，今天的世界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情况，因此，表现形式也不同了。然而日本还是同样想与其他帝国主义相勾结，通过充当其侵略亚洲的帮凶来实现日本自身的帝国主义扩张。就这样的历史结构来说，六十年前也好，今天也好，都是一样的。

因此，当我们说这是六十年前的“乙巳条约”再版的时候，从朝鲜人来说，便会认为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使朝鲜殖民地化的第一步；从我们方面来说，就不仅是第一步，而应该看成它具有加强日益困难的美帝国主义在亚洲的统治的意义。

日本人民的历史课题

谈一点与朝鲜问题没有直接关系的情况。自从林房雄发表《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以来，一般说那种认为自明治以来的日本是对抗欧美侵略亚洲、解放亚洲的、抵抗侵略的中心，是站在抵抗的最前边的观点，尽管象林房雄那样以露骨的形式来说的人很少，然而恐怕在整个日本统治阶级里都有。其次在所谓比较进步的、有

良心的人们当中,也有这样的观点,认为明治以来,不管怎么说,正是日本站在亚洲进步的最前列,无论朝鲜、中国还是东南亚,它们的近代化是日本帮助和推进的。我认为有这种想法的人是比较多的。然而这根本是错误的,如前所述,试看一下缔结《乙巳保护条约》前后的国际关系就清楚了。

象“高杉发言”,还有以前的“久保田发言”,这些发言当然是不成问题的。然而这种想法却出乎意料地在一些公认的“有识之士”当中广泛存在。如果对此不作根本的反省,那末日本民族的真正独立,日本民族的真正繁荣,是不堪设想的。

因此,我们坚决反对“日韩会谈”,作为日本人,我们要尽可能地协助建成一个自由、统一和繁荣的朝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不让日本再充当美国侵略亚洲的据点。越南战争也好,在此之前的朝鲜战争也好,如果日本不充当美国的基地,美国是作不到的。如果日本在军事和经济上都不充当美国的帮凶,美国在亚洲进行侵略战争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希望协助建立一个自由的、统一的朝鲜,那末当然要同日本本身摆脱军事和经济上的对美基地化和从属化的状态、解放日本人民结合起来,要同争取我们自身的解放斗争不可分割地结合起来。如果不去结合,那他就是口头派。

××:我想问一个问题。关于明治时代对朝鲜的侵略,一般日本民众除极少数进步人士以外,事实上压倒多数的人都被组织进去并参加了的。这是为什么?我认为分析这个问题,取得教训,对今天的运动是有益的。

我认为世界史的发展阶段是不同的,也就是说与殖民地解放和殖民地崩溃的时代不同,出现所谓帝国主义完成期,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日本的“跃进期”。请谈一谈这个时期的情况,以及这一时期的侵略方式是不是巧妙了?

还希望结合起来谈一下最近常常演成问题的日本人的朝鲜观

问题。

错误的朝鲜观的形成过程

井上：当我们追溯日本人和朝鲜人的历史关系的时候，就势必要提到丰臣秀吉。丰臣秀吉去侵略朝鲜遭到惨重失败，从而加速了丰臣家的没落。与其说加速没落，不如说如果不侵略朝鲜，丰臣家可能不会没落。

在德川幕府时代，每当将军世家改换将军，朝鲜都派人来祝贺。但这决不是按属国来对待，而是受到非常郑重礼遇的。就封建时代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来说，确实是结成相互对等的关系的。

因此，日本人不论统治者也好，民众也好，对朝鲜形成明显的差别观是在明治以后。因为无论怎么说，明治以后的日本迅速发展了资本主义工业，有了军事力量。而朝鲜还没有作到这一点。

缔结《江华条约》后，第一银行首先在釜山设立分行，三井资本侵入朝鲜，用日本纸币收购朝鲜黄金。然后一般商业资本侵入。日本商人在那里的所作所为，正同在横滨一带欧美商人对待他们的情况一样，而把地位颠倒过来了。拥有治外法权的欧美人在横滨同日本商人进行交易时，强词夺理，违反合同，无恶不做。即使提起民事诉讼，日本方面也绝对打不赢官司，因而只好饮泣吞声。举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如日本商人从欧美商人（主要是英国人）那里借钱，到期去还钱的时候，对方假装不在家，无奈只好第二天再去还，说是已经过期，便没收抵押品。还有更突出的例子，如日本人去偿还借款，就嗾使狗出来咬人，叫你进不得门。这样一来就说过期了，没收抵押品。在1890年以前，英国商人净干这种事。日本商人到朝鲜去的时候，也完全是这么干的。也许是效仿英国人在横滨对他们的作法，不过，这是一般商业高利贷资本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会想到的干法。

通过这样一些干法，日本在朝鲜进行了非常残酷的掠夺。这种掠夺是受治外法权保护的，于是日本人就慢慢形成一些诸如朝鲜人文化程度低啦，生活水平低啦之类的看法，对他们不管怎么强词夺理都会行得通。

不过，日本一般国民对朝鲜人有一种非常不正当的差别感，真正作为帝国主义压迫民族，当了压迫者，那无论怎么说还是在日朝合并以后。

与侵略结合的优越感

吞并了朝鲜，日本人便姿意榨取朝鲜。朝鲜人在祖国生活不下去，便四出流浪，其中相当一部分来到日本。这些人完全两手攥空拳，可以说身上只穿着一件衣服来到日本。因为他们没有接受过作为近代产业工人的技术训练，所以只好当土木工程的工人或者煤矿工人，不得不到日本工人中条件最差的地方去作工。这样便把朝鲜人推进了苦难的深渊。日本人在这里看到的朝鲜人是从朝鲜流浪来的，从事艰苦的劳动，受低工资驱使的一些人。日本国民对他们便产生了一种优越感。也就是说，帝国主义对朝鲜人进行殖民地奴化是它的前提，而对遭受殖民地奴化的朝鲜人民便持有一种优越感。我认为根源就在这里。

其次，它还同崇拜西洋有关。日本人好象感到西洋人、白人比自己更了不起。这同对日本部落民的差别观是一样的。其实日本人民本身是不自由的，是受上面压制的，因为受上面的压制，自己也就想去压制别人。我认为这是帝国主义者企图制造民族压迫，而民众对此接受了民族差别感。这是它的基础。

因此，为了对朝鲜能够采取一种正确的态度，我们必须使造成这种错误观点的基础的日本人本身，作为一个民族真正得到解放，确立民族自尊心，而且即便作为个人也一定要从被压得抬不起头

的状态中把自己解放出来，拥有民族的和作为一个人的荣誉。如果能够这样作，那末即使看到朝鲜人陷入不幸的困境，也不会产生优越感，而且正因为他们处于不幸境地，反而会产生一种愿意同这样的人们共同争取解放的心情。

因此，恩格斯说：“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恩格斯：《论波兰》，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第4卷，第1910页）我认为实际上在心理方面也与恩格斯的话是一致的。

××：明白了。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在前面请教过的。在明治时代，对其他民族的侵略、把其他国家变成殖民地，这件事一般怎么看？认为那是一个不怎么坏的时代吗？

帝国主义确立时期的民族意识

井上：是啊。不只是日本，所谓帝国主义确立期的理论，毋宁说那是一种认为优胜劣败乃世之常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也就是一种使帝国主义合理化的理论。不管是欧洲人，还是日本人，也不管在什么地方，在1900年左右，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都认为强者征服弱者是理所当然的。即使在象英国那样工人运动发达的国家也出现过众所周知的塞西尔·罗兹^①的《所谓帝国主义就是填饱肚子的问题》的著名论断。即当他听到英国失业者大会上“给我面包！”“给我面包！”的喊叫声，他就想怎么办才能给他们面包呢？除非实行帝国主义；实行帝国主义对工人来说也是幸运的。他公然说能填饱工人肚子的只有帝国主义（1895年）。

象今天这样，任何帝国主义者都不能公开地搞帝国主义，这种事态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即俄国革命以后的事。俄

^① 塞西尔·罗兹，即 Cecil John Rhodes (1853—1902)，英国南非好望角殖民地的总督（1890）。——译者

国革命在思想史上的巨大意义就在于它把“帝国主义可不行”这点给常识化了。并不光是俄国革命，俄国革命以及社会主义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各国的阶级斗争发展起来了，一反过去那种认为工人是下等人的思想以及帝国主义的强者理所当然地要使弱者从属于它的思想，现在普遍认为帝国主义不行了，并认为工人并不是什么下等人，工人毋宁说是值得自豪的阶级，一般人的工人观改变了，工人本身也提高了对自己的认识，这些思想完全是在同一时期发展起来的。我认为这种思想变化的根源在于俄国革命后民族解放运动和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

××：这么说，明治政府本身在迫使国民侵略朝鲜上，与其说采取了特别巧妙、特别高明的手法，莫如说时代的背景基本上就是那样一个时代，并不是特意捏造了什么巧妙的口实进行欺骗的。

把对不平等条约的不满引向侵略朝鲜

井上：侵略朝鲜之所以比较成功，这与其说是由于作法高明，莫如说在此之前搞垮了自由民权运动。因为搞垮了自由民权运动，才有了条件，所以才能作得到。另外一个原因是，当时日本受欧美压迫，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日本人的民族意识非常高涨。当然有摆脱欧美争取彻底解放的民族的和国民的要求。他们利用这种摆脱欧美争取彻底解放和完全独立的正当的民族要求，去充当欧美的打手，结成日英同盟等，同世界最富强的欧洲国家结成对等的同盟，从而大大提高了日本的身价，给人一种象是同英国对等之感，并且日本也想和欧美各国一样地侵略朝鲜和中国，总希望尽快赶上欧美，希望独立，希望确立对等地位，我认为这是能够取得国民支持的条件。

一些相当进步人士被卷了进去。当然，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很快会同侵略主义结合起来，因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本身就具有同

侵略主义勾结的因素。当欧美各国接二连三地侵略清朝，侵略朝鲜的时候，在日本国民中间也相当广泛地存在一种对抗欧美侵略的情绪。我认为他们充分利用了这一点。

××：例如象利用“一进会”^①，用这种方法装得简直就象《乙巳保护条约》和《日韩合并条约》是由朝鲜国内提出要求似的，那种认为如果不采用这种方法，就很难顺利地把日本国内的舆论统一起来的想法是不怎么多的吧。

井上：是的，不怎么多。与其说不装成是朝鲜人的要求就不能牵着国民鼻子走，莫如说用来压制和削弱朝鲜人的抵抗是主要的。

××：试看签订“保护条约”当时的报纸，其中有国民感激伊藤博文拿出的明治天皇亲笔信之类的消息。这种事与其说是针对日本的舆论，莫如把它看成是压制朝鲜的一种手段更确切些吧。

井上：可能是这样。另外，还出现一种“日朝同祖论”的说法。说什么日本人和朝鲜人本来就是在一起的，这次又合并到一起了。这主要是对朝鲜人进行工作，不过，这在引导日本舆论和民众上，会使人们觉得这样作并没有罪，而且是作了一件好事。在使人们不太意识到罪恶的情况下就干了出来。我认为确实有这种情况。

另外一种理论是福泽谕吉经常讲的。由于邻居不小心发生了火灾。于是就担心火要着到自己这里。因此便去忠告邻居要小心谨慎，以免发生火灾。可是不管怎么对他说，对方也听不进去。而且也没有那种能力，那末没有办法只好自己闯进去，管理对方的家政，以免发生火灾。我认为这种理论是为了让一般国民能够接受侵略朝鲜而想出来的谬论。日本总想站在亚洲前头充当老大哥，说是要帮助朝鲜以及其他落后地区好好地管理一下，把它们提拔起来。我想这不仅是日本统治者为了侵略朝鲜而制造出来的借口，

^① 一进会：系部分朝鲜亲日势力在日军支持下于1904年成立的一个亲日政治团体，主张朝鲜在政治上由日本来保护。——译者

而且也确实企图借此赢得日本国民的支持。

最近又说日本的情况是一方面在受欧洲的压迫，所以让朝鲜近代化，人们就轻易相信这套话，并成了被它牵着走的条件。

日本曾经靠日英同盟当上帝国主义列强的远东宪兵，从而使日本自己也变成了帝国主义。今天，日本又同美国结成同盟，代替美国进行所谓的“经济援助”，看上去仿佛日本已变成了大国。所谓“日本大国论”，实际是因为日本人受着压迫，所以一被说成是大国就高兴。

××：那末说，除了所说的时代基本上不同以外，其中还有另外一面，即不让人们感到这样作是罪恶，而想使人们感到日本不是作了坏事，而是作了好事。

井上：是啊。尽管说是处在那个时代，可是去偷窃人家的东西，打着想侵略人家的旗号，也还是不容易作到的。尤其若是欧美各国的话，有充足的经济力量，因而可以靠资本输出或是商品输出，即使不搞太露骨的政治压迫和军事压迫，只靠经济力量就可以使之从属于它。而且军事力量这种东西，应该是确保经济从属的一种力量。可是日本没有经济力量，因而必须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垄断这些地方。为了进行侵略，就必须千方百计地使这种侵略合理化。

在形式上缔结对等的条约，进行贸易，实际上是使其从属于自己。在这种情况下，说是根据优胜劣败的法则，能够讲得通。但是如果通过军事上和政治上的统治和占领来进行垄断，即使在帝国主义时代，也不能不考虑合理化的借口。

而且因为朝鲜人进行了激烈的抵抗，所以对此也费尽了心机。

××：换一个话题。“日韩会谈”已经达成协议，今后很快就要进入正式向南朝鲜扩张的阶段。南朝鲜人民现在就掀起了大规模的斗争，今后这种斗争会日益激烈，会正式发展起来。过去日本人

蔑视和敌视朝鲜人的一种手法，就是把朝鲜人民的反日解放斗争说得象是给日本人民带来危害，也就是把加害者同被害者颠倒过来，在群众当中灌输这种思想，制造出一种“要狠狠整他们一顿”的空气。我想这次也会进行这样的宣传。当然今天时代变了，而且我认为日本人民也不会就那样简单地被煽动起来。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想听听先生的意见。

互相鼓励的日朝两国人民的斗争

井上：一旦日本国内阶级斗争有了很大发展，而且民族斗争也有了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统治阶级把朝鲜人民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说成象是给日本带来什么损失似的，企图借此操纵日本大众，我想也是不可能的。毋宁说，朝鲜的民族斗争，必然会鼓励日本人民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他们会在内心树立起对朝鲜人的正确认识，或者对朝鲜人的尊敬。因为现在的条件和以前完全不同了。

例如在过去，一提到朝鲜的“三·一暴动”^①，还是宣传日本人被杀害了（尽管实际上完全相反），日本的权益受到侵犯等等，我想那时这么说有容易接受的条件。可是现在值得庆幸的是，因为还没有什么权益，所以也就没有可具体受侵犯的权益。还有，贸易公司今后会到朝鲜去，有时根据日本贸易公司的作法，也许会发生朝鲜人的游行队伍拥向那里，打烂玻璃窗等的情况，然而即使在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今天的国民也不会认为日本的权益在那里受到威胁了吧。反而会认为“因为作得太过分了”，“朝鲜人都生气了”。

^① 三·一暴动：1918年，朝鲜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成立了独立运动本部。1919年3月1日，在为前皇帝李太王举行葬礼那天，民众在汉城高呼：“朝鲜独立万岁！”举行了游行示威，运动波及全国百分之九十七的郡，参加暴动的民众达二百万人。日本对此进行了武装镇压。但日本被迫更换了总督，并将过去的武政改为文政。——译者

世界史的现阶段

今天南朝鲜学生不断焚烧日本国旗。日本政府对此提出了抗议。可是国民并不认为这是朝鲜的“排日”和“侮日”，倒显出一种“理所当然”的情绪。实际上连日本人也想烧一烧美国的国旗，但是没能烧。我认为这一点表现得非常明显的是在反对“安全条约”的时候，1960年4月的李承晚倒台是激励日本反对“安全条约”斗争的非常强大的力量。那个时期，在朝鲜李承晚倒台；土耳其发生政变，旧政权倒台。我认为它作为激发日本反对“安全条约”斗争的国际条件是有很大大意义的。

我想今后会这样发展下去。也就是说，各国的民族运动不是相互反目，而是相互鼓励，相互促进。世界史已经发展到了这种地步。

第三部分

第一篇 最近的日本电影 上的军国主义

——以《战争和人》为中心——

第一节 岸内阁和影片《明治天皇与日俄战争》*

十四年前的 1957 年 4 月，渡边邦男导演的、新东宝电影制片公司摄制的影片《明治天皇与日俄战争》，空前叫座。正如从片名马上就会联想到，影片是以确立旧大日本帝国转折点的日俄战争的“巨大胜利”为主题，颂扬“指挥”这次战争的明治天皇的。过去那种军国主义教育的最重要的题材充斥银幕，如乃木将军指挥的第三军攻克旅顺，东乡舰队司令率领的联合舰队进行的日本海大海战，等等。

这年 2 月组成了大战犯岸信介内阁，它以已经恢复和成长起来、并超过战前的日本垄断资本主义为背景，极其露骨地推行复活军国主义的政策。而影片竟毅然决然与这种情况紧密配合，从正

* 这是 1971 年 12 月亚非作家协会日本委员会丛书第一册收编的一篇文章。我在这篇文章中，以当时非常叫座的山本萨夫导演的影片《战争和人》的第一集和第二集为中心，批判了几部军国主义电影。我对文艺是门外汉，因此我不是从艺术上，而是专门揭露作品的思想和政治效果的。这篇文章原登在河原崎长十郎编辑和发行的戏剧创作研究杂志《舞曲扇林》第 4 号（1970 年 12 月）和第 8 号（1971 年 8 月）上的，是对影片《战争和人》第一集和第二集的批判。有人对我的这篇文章进行了诽谤和中伤，说因为中国批判了《战争和人》，我才随声附和。不过，我在《舞曲扇林》第 4 号上发表这篇文章时，中国人和其他外国人对这部影片还一言未发呢。——作者

面为军国主义和侵略战争唱赞歌。

岸首相在组阁后的第一次国会上，扬言日本为了自卫即使进行核武装也不违反宪法。接着他作为日本现任首相第一次出访东南亚各国，公然提出利用美国的资本，日本的经营以及当地的资源和劳动力“开发”东南亚的设想，企图在对美从属下重温“大东亚共荣圈”旧梦。这完全是岸信介的如意算盘，哪个国家也没有理睬。

然而岸所代表的日本反动派并没有放弃它的迷梦。岸内阁一方面根据美帝国主义的要求加速扩军，以换取美国同意在1958年开始进行所谓修改日美“安全条约”的谈判，以便使它发展成为对美从属的日美军事同盟。另一方面，岸信介强制推行露骨的敌视中国的政策，破坏旨在促进日中贸易的各项民间协定，与此同时，以“赔偿”的形式，开辟向东南亚输出资本的道路，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对美国的南越傀儡政权开始进行“援助”。

在岸内阁的这些动向中，当时中国报纸《人民日报》曾经指出日本的“潜在帝国主义”，并表明中国人民对此表示反对（1958年7月7日社论）。

影片《明治天皇和日俄战争》，把日本的这种潜在帝国主义公开地搬上银幕，回想旧大日本帝国的辉煌胜利，企图把它当作复活新军国主义的肥料。然而这种过于旧式的帝国主义影片，只此一部，后来没再继续出。这部电影上映后所以大叫其座，是因为它以天皇为影片主人公，构思新颖，这是过去所不敢想的；而且扮演主角的岚宽寿郎很象照片上的明治天皇，影片巧妙地抓住中年以上的人，尤其是明治时期出生的人的怀古心情。新东宝电影制片公司因而尝到了甜头，第二年又摄制了《天皇皇后与甲午战争》，但结果是守株待兔，希望落空。

日本电影业正好从这时候起，观众一般开始下降。其中独立的中小制片公司系统的小市民的“和平与民主主义”的影片，如从

1959年到1961年小林正树导演的五部一套的影片《人的条件》(关于这部电影下边再谈)等,还保持了一定吸引力。而统治电影业的五大电影制片公司却逐渐向以摄制流氓片和色情片为主的方向发展下去。这是为了适应“经济高速增长”、“昭和元禄”时期,诱导群众脱离政治,为使群众接受军国主义与反动统治扫清障碍的。

在这期间,岸内阁血腥镇压了近代史上空前的、全国人民反对修改《日美安全条约》的斗争,强行修改“安全条约”;垄断资本高唱高速发展经济。1965年,与美帝国主义的侵越战争升级紧密配合,缔结了“日韩条约”。以此为转机,日本垄断资本向南朝鲜、台湾、东南亚的入侵是非常惊人的。尽管依然从属于美帝国主义,但反动派好象觉得复活“大东亚共荣圈”的旧梦有可能实现似的。同时他们也变得比过去多少聪明了。不再象岸信介那样露骨地采取帝国主义的过分自私的作法,而采取一种在形式上“尊重”“韩国”和东南亚各国的独立,给他们“经济援助”,实际上是剥削它们,使其从属于日本的新殖民主义的手法。

与这种政治和经济的情况相适应,电影上的军国主义也不再象1957年的《明治天皇与日俄战争》那样,把旧帝国主义赤裸裸地再现于银幕,而是给它披上祈求和平的伪装而登场的。从《明治天皇和日俄战争》上映到1967年8月,冈本喜八导演的、东宝电影制片公司摄制的《日本最长的一天》首次上映,正好过了十年。《日本最长的一天》是这种新军国主义影片的最初的代表作。

第二节 从《日本最长的一天》到《冲绳决战》

《日本最长的一天》是以天皇和陆海军部的首脑、军官们、政府以及官僚们围绕是否投降而产生的对立和苦恼为主题,到1945年8月15日,旧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之日达到了最高潮。电影把天皇

塑造成一个一心一意祈求国民幸福和世界和平的、令人诚惶诚恐、感激涕零的圣君。电影美化投降派的将领和大臣自不待言，竟把陆军大臣阿南惟几(最大主角)为首的焦土决战派也描绘成精诚爱国、忠于职守的悲剧英雄。

《日本最长的一天》与十年前的《明治天皇与日俄战争》不同，它不是以日本帝国主义的胜利，而是以其战败为背景，不是从正面赞美军国主义，而是通过美化军国主义的元凶来麻痹人民批判军国主义的力量，培养接受军国主义的思想感情。

尽管日本电影一般都严重不上座，但这部电影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非常叫座。而且观众的年龄情况，从壮年到青年，面是很宽的。从那以后，东宝公司每年基本上把用同样的构思和手法摄制的“超级巨篇”在8月15日以前开始上映，如1968年的《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1969年的《日本海大海战》(此片是从上年的《山本五十六》联想到的主题，是个例外，赞扬胜利了的军国主义，但影院上座不佳)；1970年的《军阀》以及今年的《冲绳决战》。

影片《山本五十六》是描写一个虽然明知对美战争最后没有胜利希望，却英勇地服从国家决定，鞠躬尽瘁的悲剧英雄的故事。影片把山本反对对美战争，描绘得简直象是一个和平主义者，而对他主张集中全力侵略中国，一点不加批判地给以肯定。

《军阀》强调天皇和东条英机等“大东亚战争”的元凶们，是怎样千方百计地想避免日美战争的，同上一年的《山本五十六》一样，主张“完成中国事变”，也就是说主张集中全力只进行侵略中国的战争。这部电影把天皇描写成一个始终一贯的和平主义者，甚至把军阀的代表东条也都描写成一个为天皇、为国家而肝脑涂地，想避开日美战争，但迫于形势竟义不容辞地被推上战争最高负责人地位的悲剧人物。今天自民党的最年长的元老、现代日本军国主义的最大促进者贺屋兴宣，在日美开战时担任藏相，曾向东条首相

等人略微提出一点疑问：在对美战争中，日本究竟能否取胜？而电影却十分强调这点，极力美化贺屋。

在这部电影中还反复出现战败部队的悲惨场面，但它只是使观众感到可千万不能打败仗，而决不是培养批判帝国主义战争的力量。

今年上映的《冲绳决战》，整个影片大部分用来描绘战败的极其悲惨的情景，一方面使观众沉溺于伤感主义，另一方面对军司令官不消说，对参谋们和部队长^①们极尽美化之能事，诱使观众要对中学生、师范学校学生编成的突击队、女学生编成的护士部队、学生出身的敢死队员等等流下眼泪。不仅如此，影片使人感到那些伟大的司令官、高明的参谋、勇敢的部队长、天真的年轻人，他们那种极其崇高的尽忠报国的殊死搏斗，终于在敌人压倒优势的物质力量面前无可奈何地败退下来，把整个战争描绘得无限悲壮、无限壮丽。

配备在冲绳的第三十二军和东京大本营简直不把冲绳人民看成是日本人，象对待临时占领的敌区居民那样残暴无道，把当时冲绳县人民的三分之一、十五万多人赶进无限悲惨的死地。但是，对于“皇军”这种反人民性，这部影片却一个镜头也没有揭露。

军队无故枪杀县民的场面出现过两次，但却把它描绘成出于误解。例如渡嘉敷岛居民四百多人集体自杀，却被描写成岛民自己选择了与其活着当敌人的俘虏、莫如自杀的道路。事实是驻在这个岛上的陆军海上挺进队队长赤松大尉欺骗岛民，把他们赶入绝境，强迫他们集体自杀的。而赤松及其上司们却躲在安全地方，始终避免同美军战斗，最后竟从容不迫地投降了美军。这一事实在银幕上连一点暗示也没有。不过，赤松本人最近却辩解说，他自己决没有命令岛民集体自杀。但命令者是“赤松大尉”也好，“黑松少

^① 部队长，即师长。——译者

尉”也好，事情的本质是一点也改变不了的。

这部电影还通过美化第三十二军司令牛岛和冲绳县知事岛田等人，掩饰“皇军”的本质，这里可以举一个典型例子。

尽管第三十二军已经折兵大半，却仍让残余部队向岛尻地区转移集结，试图尽量延长抵抗美军的时间。参谋们正在为此开作战会议，岛田知事神情悲壮，未经传达便径直步入会场。他说县民相信岛尻地区不会变成战场，有三十万人集聚在那里，为了拯救这些县民，他请求尽量设法避免把岛尻变为战场。

可是作战主任参谋八原博通上校，冷酷无情地拒绝了知事的请求说：“我们至死必须完成军队的使命。”知事垂头丧气地走出会场。这时牛岛司令官把他叫住，用温情的、安慰的目光注视着他，说道：“岛田先生，请你谅解，我们军人是必须战斗到最后的。”知事带着一副很受感动的神情回答说：“我作为知事要竭尽全力拯救县民。”两人悲凄地会心一笑而别。

这种场面哪怕要在参谋们冷酷地拒绝知事的地方打住，也会给观众留下自己思考问题的余地：后来的凄惨战斗究竟是为了谁？是为了什么？还不只是为了第三十二军将军们的面子而牺牲冲绳县三十万县民吗？可是影片并没有就此打住，而让一个温情脉脉的司令官登场，同知事相互谅解对方的立场和心情，互相安慰，把最重要的问题淹没在感伤主义之中，从而扼杀了观众对“皇军”的批判。

更令人吃惊的是这部电影的结尾。牛岛司令官和少将参谋长自杀前，在给其他参谋布置游击战和地下工作等任务，让他们离去之后，特意命令八原作战主任说：“唯独你‘好歹也要设法’活下去！”为什么要让他活下去呢？没有明确交代给他的任务。但暗示他“要担负起重建皇军”的任务。八原在旧陆军高级军官中是少有的到美国留过学的人，在作战会议上经常提出现代合理主义的主

张,但(实在的人物)他化装成老百姓,在从岛尻地区逃跑的时候,碰上了一队扫荡残敌的美国兵,马上用英语喊:“请饶命!”

在这一瞬间,镜头换了,没有说明他是否被杀了,只是暗示他活了下来。事实是他没有被杀,而是当了俘虏。也就是按照牛岛司令官的最后命令“好歹设法”活下来了。电影没有照出他举起双手投降的场面,其用心显而易见,是为了不损伤“皇军”高级军官的形象。

这样幸存下来的旧日本军的参谋军官们,后来便在占领日本的美军司令部偷偷保护之下,同美军参谋们一起制订对美从属的日本重整军备计划。这是隐藏在日本重整军备历史背后的事实。影片《冲绳决战》的最后部分竟肆无忌惮地暗示并美化了这条道路。

如果我们系统地分析以上介绍过的东宝制片公司自1967年以来一系列的“超级巨作”影片,就可以看出最初没有的战争的悲惨(其实是战败的悲惨)场面,越往后越突出,使人感到好象的确大大增强了非战或反战的姿态;其实完全相反,是企图使观众沉溺在感伤主义之中,遮住他们批判帝国主义及其军队的视线;十分清楚,它逐渐强烈地表现出这样一种思想,就是说日本军队是很了不起的,但同美国作战是太愚蠢了,今后应该和美国一道去进行“合理的”胜利战争。这不正是今天对美从属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思想吗?

第三节 《人的条件》与《战争和人》

这些电影制片公司属于三井财阀系统的电影垄断资本,导演们也从来不是以诸如“进步性”为招牌的,因此他们摄制这样的影片也并不奇怪。但是,过去曾与电影垄断资本相对抗,坚持独立制

片，一直以“进步性”为招牌(现在还是这样)的日本共产党系统的电影导演，竟然同五大电影制片公司中最反动的日活资本^①合伙炮制了比上述几部更加精湛的军国主义影片。我这样说，人们会以为：“这怎么可能！”有这种想法的人，特别希望你看一看山本萨夫导演的、日活电影制片公司摄制的“超级巨作”《战争和人》吧。

影片《战争和人》，是根据五味川纯平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

五味川很久以前，写了一部叫《人的条件》的超长篇小说。前边已略提到，这部小说在1959年到1961年由独立制片公司“胡萝卜俱乐部”和松竹电影制片公司联合拍成电影，受到好评。这部电影相当忠实于原著，从第一集到最后一集第五集，全部上映约需十个小时。

《人的条件》，是以一个有能力、有良心的原左翼青年梶为主人公的，中日战争后期，他在中国东北(旧“满洲”)地区的一家日本军需公司经营的铁矿山现场当劳务主任。这个公司从一些并非战场的村庄随便抓来非士兵的中国人，当作“俘虏”，名之曰“特殊工人”，对他们进行了比古代奴隶还甚的奴役。梶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主张应该稍微人道一些来对待这些工人，竭力对抗公司当局和军部，以期尽量体现人的良心。这种斗争是前半部的主题。

影片的后半部是描写这个反抗军部的主人公遭到惩罚而被征召入伍，在军队里仍然同上司的非人性干法进行斗争。战败后当了苏军俘虏，又在集中营同苏联当局的官僚主义以及对其拍马、继续虐待士兵的原日本军官进行斗争。最后从集中营逃走，彷徨在茫茫雪原，想念美丽妻子的幻影，最后气力消磨殆尽而死去。

在这个很长的故事中，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说，主人公梶在学生时代参加过左翼运动，被捕变节，来到日本帝国主义的第一线“满洲”的军需公司工作。但这件事情本身并没有形成梶在良心上

^① 日活资本：日本电影制片垄断资本之一，即日活电影制片公司。——译者

的创伤，作者对此也未加批判。不仅如此，棍在眼看要同爱人结婚时，心想与其被抓去当兵同爱人分开，莫如选择去矿山现场当劳务主任，这样可避免应召当兵，同妻子一起生活。主人公和作者都肯定这件事，认为作为一个人是不得已的，并且认为生为一个日本人，命里注定是要当帝国主义日本的爪牙的。

如果认为这个大前提没有疑问，那末后来的一切就成了一个为了追求有良心的生活而尽量苦斗一生的人的动人的英雄故事了。这样还不如说影片竟把一个为了自己逃避兵役、选择充当奴隶监督的人物，塑造成不论在多么惨无人道的帝国主义的残酷压制下，仍然力图为维护最低限度的“人的条件”而殊死奋斗的英雄。这样一来，原作也好；影片也好，就都是在肯定作者任意捏造的前提，即日本人不管你的心地多么善良，由于你生在帝国主义日本，就不能变成革命者，命中注定要当帝国主义的爪牙。

在这些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人的条件》当然不是革命性的作品，连进步作品都说不上，毋宁应该说本质上是反动的作品。不过，原作也好，影片也好，大体上还是暴露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正如本多记者最近在《朝日新闻》晚报上连续评论的，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残暴，实际上远比这部电影所描写的严重，而这里至少没有美化日本帝国主义，而且既没有侮蔑中国人的描述，也没有潜藏着反中国的宣传。

对中国人的描写反倒有很好的部分。第二集的“特殊工人”们的总反抗是革命的，他们的领导人尖锐地指出，主人公的善意和人道主义，本质上是伪善的，是在为帝国主义效劳的。这些地方是相当动人的（但是紧接着主人公就叹息说，难道我生为一个日本人是罪恶吗？于是又出现了肯定前述大前提的根本缺点）。

《人的条件》到第二集为止还看得过去。可是第三集以后，则可以说是一个“秉性温和而有力”的超人的人物去征服坏蛋而遭到

失败的故事,也可以说是古代评词的现代版,完全是虚构的情节。尽管如此,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到1960年反对“安全条约”斗争时期,在资产阶级宪法的“和平与民主主义”的框框内,这部影片总算还有号召人民起来反对复活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斗争的因素,与同时期的《明治天皇与日俄战争》等影片,所处地位是相反的。

从第二集上映起,经过十年,到1970年,以同一个五味川的小说为原作,摄制了山本导演的《战争和人》的第一集,其第二集在今年几乎是和上述《冲绳决战》同时首次上映的。

在这十年间,日本的潜在帝国主义尽管依然从属于美帝,却变得明显起来,军国主义完全复活了。与此相适应,一方面,以1960年反对“安全条约”的革命学生斗争为先驱,冲破了过去那种小市民的“和平与民主主义”的框框,革命的人民斗争,尽管还有许多缺点和错误,却逐渐成长起来。另一方面,在五十年代末期已经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日本共产党,竟完全变成了修正主义的政党。它对日本人民革命势力的憎恶超过了军国主义统治者;在国际方面,对同修正主义寸步不让进行斗争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思想也燃烧起疯狂的敌意,为不断激起反对中国的运动而拼命奔走。

五味川纯平是一位对时代气息很敏感的大众作家,他可能考虑到了这种情况。在《战争和人》里面,尽管这次也附有《人的条件》那样的、错误的大前提,但他没有提出怎样对待自己的良心同被强制充当帝国主义奴隶监工的任务之间的矛盾问题。而且他既没有暴露日本帝国主义,也没有颂扬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他美化日本帝国主义的鸽派人物,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写成是鹰派的谋略,还歪曲了中国人和朝鲜人的抗日革命斗争。还有,不管哪一集都随便胡乱写了一些肮脏的性关系(连色情描写都谈不上),以迎合当时色情片的流行。这部新作变成一部东拉西扯的

情节松散的庸俗小说。

山本导演说，根据这样的小说，摄制了一部“反战电影”，日本共产党对这部电影的摄制和普及给予全面支援。新片上映后影业取得相当成就，“日活资本”很高兴。那么电影的内容怎样呢？

影片的第一集大体相当于原著的第一篇《命运的序曲》，与原著一样，在1928年初，日本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国民党政府进行的打倒北方军阀的内战，即北伐战争，出兵山东省济南，发动了“济南事变”，这时在同军部关系很深并已扩张到“满洲”的新兴财阀伍代家的客厅里，正在为长子英介留美举行欢送会，第一集就是从这一场面开始到炮制出伪“满洲国”时期结束的。第二集相当于原著的第二篇，题为：《骷髅的舞蹈》，影片名叫：《爱和悲的山河》，接第一集，故事情节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的扩大而展开，到1937年7月开始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时结束。原著预定在这之后写到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的战败和投降，已经发行到1939年底日本叫汪兆铭组织伪“国民政府”，并与这个政府缔结了《日华基本条约》。电影也预定继续出第三集、第四集。如果影片全部拍完，上映时间可能超过十五个小时。

主要上场人物：伍代财阀的主人由介，是一个冷静沉着的绅士；由介的弟弟乔介，在“满洲”经营运输公司，为了侵略“满洲”和繁荣伍代财阀，他与关东军的军官串通一气，不管什么阴谋与恐怖都满不在乎地干下去；由介的长子英介是与叔父乔介沆瀣一气、目中无人的资本家；伍代家的长女由纪子，天生一副美貌，富于才智，她的生活方式是非常现代的而且惯于激情，在整个第一集和第二集里是最主要的女主人公；次子俊介在第一集里是个中学生，他喜好绘画，接受了贫穷的进步画家灰山浩一的影响，在第二集里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反对父亲和哥哥，却依仗伍代家的财富和势力；最小的孩子顺子，在第一集里是个小学生，只稍微露了露面，

在第二集里变成一个天真烂漫的女学生，与俊介的朋友一个贫穷的革命青年标耕平相爱。

以伍代家族六人为中心，与他们有各种各样关系的无数人物登场，战争、谋略、各式各样的恋爱以及中国人和朝鲜人的抗日斗争交织在一起，舞台横跨东京和中国东北。

由纪子的曲折的恋爱对象、正义派的陆军军官柘植进太郎；俊介的情人有夫之妇狩野温子，她的丈夫狩野市郎是个“满洲”浪人，怀恨伍代家夺去了他的财产，企图进行阴险的报复；顺子的恋人标耕平，其兄只在第一集露过面，是个革命家，变节后被抓去当兵，在“满洲”战死；被英介凭暴力奸污而参加抗日地下活动的中国富豪的姑娘赵瑞芳及其一家，与赵家亲近、倾慕瑞芳的年轻的日本医学者服部；“满洲伍代”乔介的部下、心地善良的公司职员高畠正典；替乔介出谋划策的冷酷无情的鸭田；和由他作为恐怖主义者培养起来的青年大盐；在与乔介交换情报时与乔介发生肉体关系而满不在乎的、面目不清的美人谍报员鸿珊子；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中共党员、游击队的政治指导员白永祥；抗日游击队朝鲜革命家徐在林及其同志和爱人全明福；拼命反对关东军侵略“满洲”谋略的年轻领事馆馆员篠崎；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还有其他军人、政治家、银行家、工程师、画家、小说家等等，一一接连不断地登场。

光从这些丰富多彩的人物，就会想象出这部电影和原著的宏大场面。介绍其情节的梗概，会占很多篇幅，这里只好从略。我准备介绍山本导演通过这部影片想向观众灌输些什么，并以此为线索，展开评论。

第四节 《战争和人》的导演的意图

今年夏天，这部电影的第二集上映后，中国批判它是军国主义

电影,消息传来,山本导演对此表示愤慨,利用各种场所进行反驳。其中之一是《周刊朝日》7月23日号登了他的一次谈话。那是一篇最能表明导演意图的文章。根据这篇文章,山本导演首先在前言里说,中国方面的攻击,与其说是对电影本身的批判,莫如说“可能是对日本共产党称赞过这一点的反驳,然后就作品的意图作了如下的说明:

“第一,始终想简略地阐明昭和史上的事件(侵略‘满洲’的历史),让年轻人学习昭和史。

同时,《战争和人》不单是昭和史的重现,就拿司法这一问题来说,今天的日本简直同当时完全一样,我想告诉人们,日本今天又正在走和当时相同的道路。

第二,看到越南便切身感到所谓的防御战争。在那里得到的实际感受是‘这里很象满洲’。因为我深深感到在老挝看到的美军和关东军完全一样;这是一种同日中侵略战争(这是一种奇怪的词。——井上)一样的手法。

第三,想让那些认为战争就是战场的年轻人知道:事实上‘所谓战争是这样发生的’。”

如果是用这样一种崇高的目的摄制了这部影片,山本导演当然“完全不会料到”中国方面的批判。而对影片“完全看不到群众”的具体批评,导演则是这样反驳的:

“我知道对人民大众的描写确实不够。然而当时是人民大众被蒙蔽的时代。虽然作过调查,可是很多问题怎么也弄不清楚。”(这么说来,难道影片所表现的全都是山本导演进行过认真调查的真实情况吗?——井上)

“还有受太长需要压缩的制约和虚构的局限,所以在描写人民大众的生活和痛苦方面出现了缺点。这个问题想在第三集里弄清楚。”(这样说来,难道第一集和第二集对人民大众的描写法

是认识到虚构的局限、接近事实吗？——井上)

总之，山本导演是为了用这部影片借古喻今才来描写日本侵略中国战争的历史真实的。而且正如导演所期待的，看过这部电影的人也似乎相当多。例如上述《周刊朝日》就第二集，就登过观众如下的感想。

一个凡是战争片几乎必看的某公司青年职员（二十五岁）说：“我以为是战争片才去看的，而内容却是一部情节片。不过还是一部好电影。它使我充分了解到日本侵略中国的情况。”

一个大学二年级的女学生说：“一言以蔽之，作为历史教材是相当有用的。它接触到了学校没有教过的昭和史的黑暗面。……使我切身感到战争。看了这部电影后，好象才了解到曾经出征到过南方的父亲为什么绝对不看战争影片的原因。”

她的同伴女大学生说：“如果中国人和朝鲜人看了这部电影，尽管他们嘴上不说，说不定会感到日本人沾染上一种象体臭一般的差别意识。更严重的是，还有反对战争的人们受到拷打的场面，据说这同今天的干法一样。希望演给机动队看看。”

《周刊朝日》的这一特辑，尽管也登了中国方面和在日中国人的批判文章，但总的来说，对这部电影的介绍是肯定的。另外，这部电影还受到在护宪运动方面非常活跃的宪法学家东京艺术大学教授星野安三郎等人的莫大赞许，他说：

“军部和五代财阀搞的损人健康、败坏道德的鸦片走私，利用暴力团和国家权力搞恐怖主义，尤其是特务警察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拷问，还有过激派军人对稳健派政治家的暗杀，等等。通过这一连串的迥非寻常的事件，了解到侵略战争是由谁发动的，是怎样准备、怎样贯彻的，在这一点上，这部电影的意义是很重大的。”

这部电影的重要性还不止这些，它还生动地描写了为抵抗

侵略和压迫，为维护正义和人道主义、自由和民主主义、和平和独立而斗争的人们的痛苦与烦恼，欢乐与悲伤，甚至恋爱也不只是凭个人的爱憎，而是把它放到这样的人、民族、阶级以及人类命运攸关的重大事件和激烈动荡的形势中来处理的。”

积极活动的星野先生看过电影，在感激之余竟说：“为了完成和上映预定摄制的续集，我也感到有一份责任，必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他还说：“说真的，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与推进这部电影的摄制和上映运动的学生们邂逅相逢，并同他们有一个讨论的机会，各自谈出同样的感想，真是太难得了。因为那些创造出新的文化、历史和社会的青年力量是信得过的。”他甚至披沥了对日本的光辉未来的信念。对山本导演来说，恐怕再也没有比这篇文章更使自己得意的了。（《书籍俱乐部情报》杂志8月号）

第五节 文部省及其《昭和史》观

不过，很不幸，不论原著或者电影，我本人压根儿就不赞成，我要强调这是一部反动影片。我在去年12月发行的河原崎长十郎编的戏剧杂志《舞曲扇林》第4月号上就已经把《战争和人》的第一集和《军阀》并列起来进行了批判，那时日本还不知道中国方面的批判。《军阀》里面还有极少一部分不错的场面，但《战争和人》一个好镜头也没有。……我写道：《军阀》，爱知外相推荐过。而这部电影该值得佐藤首相推荐。

接着今年夏天看了第二集《爱和悲的山河》，愈益为它的反动性所惊倒。于是我这才去读原著，对此我也一点不觉得好。但我却了解到影片竟把原著中零散见到的一点进步的东西，完全给弄反了。非常失礼，我不能不怀疑山本导演所谈的用意和星野先生赞不绝口的颂扬是否真地谈出了自己的真心话。

我究竟有什么根据敢这样说呢？仅就电影谈一谈我的论据。

导演说这部电影是描写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战争的历史的。这段历史，只是在解说和字幕的年表里一笔带过地谈了谈，根本没有把它变成画面。影片所表现的是情节片或仿西部剧^①片、流氓片等各种场面的大杂烩。正如一个喜好战争影片的年轻公司职员一语道破的，这不是战争片，而是以战争为背景的情节片。既然如此，那末导演基本上是怎样看待那次战争历史的呢？

在第二集一开头，影片用字幕和解说介绍了第一集时期发生的各次事件的简单年表。“为了维护在甲午和日俄两次战争中日本所获得的权益，关东军驻扎在满洲”，影片是这样开始的。这个解说直截了当地表现出山本导演想教给年轻人的《昭和史》的全部史观。

通过甲午和日俄两次战争，日本夺取了中国的领土台湾，把朝鲜变成殖民地，在“满洲”夺取到名为租借地的殖民地、“满铁”以及其他“权益”。关东军和其前身日本军为了镇压中华民族的反帝斗争，维护日本帝国主义的“权益”，进一步侵略中国，而“驻军”“满洲”，也就是把这里继续占领下去。这是历史的真实情况。而影片的解说却把帝国主义为了使日本从中国夺取的“权益”合法化，为了使关东军驻扎即占领“满洲”合法化，不断向人民灌输的滥言，原封不动地搬上银幕。

影片《战争和人》全面继承和再现了这种立场、观点和感情。例如第一集一开始，在说明“济南事件”时，不提日本武装干涉中国，只说“日中两军在济南发生冲突”。

当时军部决定近期发动战争，于是从1931年春连日大肆宣传和散布日本人在“满洲”受到多么非法的和无理的迫害的谣言。其中之一就是，他们把日本军事间谍中村大尉，在进行间谍活动时被

^① 西部剧：美国以开辟西部大陆的历史为背景的戏剧或电影。——译者

中国军枪杀的事件，歪曲成中国官宪非法地和无理地杀死帝国陆军军官。在电影里，把这一事件说成中村大尉“在绘制兵要地志进行实地调查时”被中国军打死。光这么一说，在观众中会有少数人了解到，这种所谓的实地调查并非别的，正是非法的军事间谍活动。然而多数人，正如当时军部所宣传的，可能会认为中国方面对帝国陆军也太不讲理啦！

比上述情况更严重地伪造历史、美化帝国主义的是，竟然描写得好象当时的日本农民要求夺取“满洲”。

当时的军部和政府日夜宣传：“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但还没有进行一取得满蒙，日本农民就能得救之类的宣传。可是在电影里面，在东京郊外的货摊上，有一个象是外出干活的农民打扮的、岁数挺大的男子，喝着闷酒，大喊大叫地说：“‘满洲’有辽阔的土地，拿到‘满洲’，日本农民就得救了！”

而且这种思想，不仅仅表现在这样一个场面上。在第二集里也有，事情发生在1936年“二·二六”事件以后，轮船从日本开到大连港，出现“满蒙开拓团”的农民下船的场面。一些农民兴高彩烈地叫嚷道：“终于来到‘满洲’啦。以后不会再因给地主缴地租受苦啦！”我身边就有一个参加过开拓团的人，实际上他们在大连一登陆就越发强烈地怀念故乡，深感远离故乡的悲哀，在那陌生的土地上，感到前途茫茫，惶恐不安。但是山本导演描写得与此完全相反，简直就象是这些在日本受苦的农民进了解放区似的，显而易见，这和上述第一集的场面在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

试与原著相比，第一集的上述场面，本来是这样的：一个五十多岁的失业者，这天又因寻找职业而疲惫不堪，虽然没有钱却进了酒店。在先进来的酒客中，有一个三十岁左右仿佛是个右翼的“壮士”，正在兴高彩烈地喝酒。他对那个失业者喋喋不休地说：如果不打倒今天的滨口内阁，不结束币原的软弱外交，失业问题就不能

解决，“只要把满洲一拿到手，什么经济危机啦，不管什么问题，统统都解决了。”那个听了这番话的失业者，回到家里便想那就到“满洲”去吧。

山本导演把这个军国主义打手的煽动，改写成农民自己的大喊大叫，而且在第二集里精心安排了一个开拓团的喧闹场面（原著对开拓团在大连下船一字没提，只写集体旅客都是参观旅顺战绩的修学旅行团^①和县人会^②），虽然电影丝毫没有必要拘泥于小说原著，但山本导演却这样创造出原著里没有的人物和场面，把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写成农民和工人的自发要求，而且把实现这种侵略，写成农民得到解放的喜事，这明显表明他是有意识地想要伪造历史、美化帝国主义的。他对完全没有描写人民大众的批评进行辩解说：关于当时人民大众的情况，调查也搞不太清楚，而且虚构还要有个局限。其实连他自己也根本不懂，却竟然虚构出这样一个赞美帝国主义的农民来。

根据这样的史观根本就不可能阐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真实历史。在第一集里把那次战争描写成是根据关东军的忧国军官们和伍代乔介之类的冒险资本家阴谋发动的。在第二集里，则说日本把侵略扩大到蒙古和华北，是关东军参谋武藤章等人和乔介之流的资本家违背军部中央当局的方针，无视伍代由介那样的深谋远虑的大资本家的反对而蛮干的。

这是战败后的军人、政治家和御用学者的说法，和臭名昭彰的、经文部省的反动审定合格的历史教科书的史观是完全一致的。

真实情况是怎样呢？由于1927年的严重金融危机和继此之后的1929年以来的世界严重经济危机和国内阶级斗争的激化，日

① 修学旅行团：在校学生到国内外去实地参观学习的旅行团。——译者

② 县人会：即县同乡会。——译者

本帝国主义和天皇制濒临危机。而且在同一时期，由于中国的北伐战争和国民革命取得了进展，这样一来，日本早就想完全纳入殖民地的“满洲”，也出现了将被中国中央政府统一起来的可能性。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摆脱内外危机，由军部带头，政府、政党、财界和地主阶级都一致想尽早夺取“满蒙”，于是便发动了“满洲事变”。

这样，就炮制出一个“满洲国”。但是，由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民族斗争日益强大，经略“满洲国”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很快陷入穷途末路。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不仅军部，所有统治者都不约而同地想在扩大对华北的侵略中寻找出路。不过，在作法上有软硬之别，在时机上有缓急之分罢了，用时髦的话说来，只不过是鹰派和鸽派的不同。

影片丝毫没有表明这种基本结构（这在电影上不是作不到的，光描写一下“东方会议”，就能很有分量），如果只是强调关东军军官和领事馆的馆员、武藤章和石原莞尔、蒋介石和由介这些人之间的意见对立，说前者强行发动和扩大了战争，那末它就描写不出“战争是这样爆发的事实”。这样一来便把罪责只归咎于一部分军人和投机资本家，豁免了整个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责；竟然还说什么农民和工人希望夺取“满洲”，甚至还觑着脸说什么这是个“进步的”、暴露帝国主义的影片，简直是瞪着眼睛说瞎话。

而且这部电影就是在描写战争的直接纵火人的阴谋上也只是精心刻画那些军队的走私鸦片啦，伍代蒋介石指使的白色恐怖啦等小事，唯独就是不暴露大事。如前所述，第一集里对“济南事件”和“中村大尉事件”的处理手法是荒唐透顶的，柳条沟事件也只用解说一带而过。尤其严重的是，第二集结尾处竟把1937年7月7日的芦沟桥事变掩盖起来。

众所周知，7月7日夜，日本军在北京郊外芦沟桥附近，竟

然携带实弹,非法地、无理地进行夜间演习。这种演习本身就是对中国方面的严重挑衅。日本的“在华驻军”捏造了一个日本演习部队遭到中国部队非法射击、造成一个士兵失踪的阴谋事件,并以此为借口向中国部队发动进攻,占领了觊觎已久的芦沟桥地区一带。于是当地的日本军基本上达到了当初预定的目的,11日傍晚,便同中国方面签订停战协定,“事件得到解决”。

然而在这次事件发生以前,东京陆军中央当局就已经决定派遣五个师团去占领整个华北,11日内阁会议也同意了这个计划,政府声明暂从日本内地向华北派出三个师。近卫首相特地召见政党、财界和舆论界的代表,要求他们给予合作。大家都发誓表示将积极进行合作。于是以军部中央当局为首,政府、统治阶级一致同意全面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推动这次战争迅速扩大的中心人物并非在中国当地和在东京的军部中央机关的青年军官,而是军事当局的首脑、近卫首相和广田外相等人。

影片《战争和人》,对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完全避而不谈。不仅7月7日夜里的事件一个镜头也没有,就连7月7日这个日子都没有出现。仅仅在字幕和解说中说,“7月8日上午五时三十分”(说得多么准确呀——井上),丰台的日本军进攻中国军,发生了“事变”,在解说里面,只是说:“由于前天晚上正在演习的日本军队遭到中国军队的非法攻击……”日本军队开始了战斗。

为什么要隐瞒日本军的“七·七”谋略呢?为什么要慎重其事地回避说明那个全世界上众所周知的日本开始发动全面侵略中国战争的日子呢?为什么要从7月8日早晨丰台部队的行动说起,给观众一种印象,好象是对中国方面的非法攻击来进行正当自卫呢?对帝国主义拥护到这种程度,简直令人可怕得很。不过,思想起来,这不外是自第二集开头的解说到现在为止所举例子中,贯彻着山本导演的帝国主义史观罢了。

第六节 美化法西斯

这部电影的史观既然同旧军部和今天的文部省的史观完全相同,那末它不去真正暴露战争的真实情况和军部的阴谋,而且积极赞美军人和法西斯,也就一点也不是怪了。

在第一集和第二集里,最主要的男主人公是伍代由纪子的恋爱对象柘植进太郎。他是一个军官,是一个热情而有正义感的人,忠于职守。1930年,因为他作为参谋本部的成员批判了日本方面采用杀光政策镇压台湾雾社的人民暴动而被降职。在第二集里他当上“满洲”特务机关的特务。他对军队通过人体试验杀害中国人来研究化学武器持有疑问,并揭发伍代乔介与军队勾结走私鸦片的罪行。他一点也不作压迫中国人民的事。在为数众多的日本军官中,象柘植这样的人也许有那么一个半个的。可是,一个日本特务机关的军官,只热中于揭发日本军队的罪行,与压制中国人和挑起战争的谋略完全没有关系,这种事是可能的吗?以柘植这样的军人来当主角,是想说明军部里面也有好人和坏人,坏人挑起战争,残忍暴虐,这是在为整个军部进行辩护。这正如在《冲绳决战》中,通过牛岛司令官来美化整个军部的手法是一脉相承的。

这种程度的事还可以厚颜无耻地辩解说,这是为了在柘植的正确主张通不过的地方来暴露军部的丑恶。可是影片竟把杀死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的相泽中校和“二·二六”事件的一些首谋分子都描写得象是为了人民的利益着想似的,这就不论山本导演还是日共文化部都怎么也辩解不了吧。

电影拍出一个原著里根本没有的情节,相泽中校为了杀死永田,在赴京的火车里面,看到一些贫穷的农村姑娘集体被卖掉的场面。接着当他看到孩子们在互相争抢从行驶的火车窗户扔出去的

剩饭的情景，脸上显出一副非常沉痛的神情。紧接着就是刺杀永田的场面。通过这一连串的画面，观众可能会想，相泽是为了拯救贫苦的农民才谋求政治变革的。试看继此之后的“二·二六”事件的描写手法，导演的这种意图就更加露骨了。

这里没有任何说明，便出现了一个身上斜披白布标语的军官，领着兵袭击首相、藏相和侍从武官长的场面。这实际上不是在描写“二·二六”事件，而是在给观众看一部流氓片之类的三个人三种杀法的场面，用来给观众取乐。

这一天，标耕平（一个贫苦学生，在第二集里是日本人中一个有代表性的反战活动家）和他的朋友、也可以说是他的掩护人伍代俊介在下雪后的一个公园里散步，相互谈到了这个事件。俊介谈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看法，说这个事件可能是企图建立军人政权。耕平听了这番话象是沉思了一番，然后说明：“那些军官们认为要想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必须把工农大众从穷困中拯救出来。”山本导演捏造相泽中校同贫苦农民之间的联系的意图，在这里昭然若揭。

必须把“强兵”之本的农民从穷困中拯救出来，事实上这是那些法西斯军官们的口头禅。不过，他们搞政变的目的，和相泽刺杀永田一样，不是为了拯救人民，而是为了建立他们一派的军人独裁政权，以便更积极、更快地加速侵略中国的战争和对苏战争，这一点即使在当时，多少有些阶级观点的人也看得清清楚楚。可是山本导演却让这些反战活动家在这里宣传法西斯的陈词滥调。

接着出现了与电影情节的展开没有任何关系的处死叛乱军官的场面。他们用白布蒙着眼睛，一一高呼：“天皇陛下万岁！”最后壮烈死去。山本导演对他们的同情该有多深呀！

原著是怎样描写这些事情的呢？一看大吃一惊。原著明明不是把“二·二六”事件的叛乱军官们所说的拯救农民之类的谎言作

为一般的历史叙述，而是作为小说来描写的。

在戒严部队中，柘植少校向贫农出身的军官千田少尉问道：“你也许很了解这帮人（叛乱军官）的心情吧！”千田回答说：“我不太了解。”他进一步指出：“在那里的军官”一个贫农出身的也没有。然后接着说：

“据说农民贫穷是闹事的一个原因。不过，（那帮人）只是一些在口头上和文字上知道农民贫困的人。这一事件对农民作出什么保证呢？一点也不明确。连个具体计划都没有，即使搞了军事暴动，农民也是不会得救的。说因为士兵大半是农村出身的，所以为了强化国军，必须巩固国军之本的农村，这种说法是把问题弄颠倒了。因为不是为了军队才有农村的……”

这是对“二·二六”事件的绝好批判。在原著这部很长很长的小说里面，只有这个地方是说了些正经话的段落，可是山本导演却与原著写明的这段完全相反，竟把相泽和叛乱军官们塑造成了农民的救世主。

而且原著里面，在被判处死刑的军官中，最初十五名高呼：“天皇陛下万岁！”而把第二次处刑的北一辉等四名“非军人”写成有意识地拒绝喊“天皇陛下万岁！”这样写是有意义的。而山本导演的电影却只强调了“天皇陛下万岁！”

电影把法西斯军人写成人民的救世主，让人民来要求侵略中国，可见这部电影里没有写出人民真正反战、要求和平的斗争。

在第一集里，标耕平的哥哥、共产党员及其小组的小说家和画家（他对五代俊介产生了影响）出场。耕平的哥哥在“三·一五事件^①”中被捕，很快自首变节而出狱。之后被抓去当兵，死在战场上。他在入伍前教导他唯一的弟弟说：“人也好，思想也好，在自己

^① 三·一五事件：昭和三年（1928）三月十五日对日本共产党员的大检举事件，共逮捕一千六百多名。——译者

还没有搞得十分清楚以前不要相信！”这些话是和一个自首变节者很相称。小说家吹得吓人；画家诚实而软弱无力。当时在侵略中国东北战争开始以前，日本的工人、农民和进步知识分子面对现在无法相比的残酷镇压，还是大力展开了反帝斗争。这种斗争，尽管是在漫长的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期间进行的，今天对我们也是唯一的鞭策，是人民的宝贵遗产。可是山本导演(原作者亦同)对这些情况却不感兴趣。

在第二集里，标耕平拒绝伍代家的资助，他白天劳动，晚上上夜校，是作为一个大学生的左翼运动家而登场的。然而他对“二·二六”事件的看法，如前所述，简直错得没边了。他被捕以后受到严刑拷打。在警察拘留所里，和他同屋的反战活动家以及关在别的牢房里的朝鲜革命家遭到严刑拷打，几乎被打死。但这些人物都经起了这种拷问，确是好样的。

然而滑稽的是，在这个拘留所的一间宽敞的牢房里只关着耕平和另一位反战活动家两个人。而不屈不挠的朝鲜人革命家却在拘留所里当杂工。会有这样不合情理的事吗？当时的东京警察拘留所的实际情况是，一个七到十一平米的牢房里要关押十几个人，不管受了多重的严刑拷打，就是奄奄一息，想要躺下都不可能。即使偶尔关押的人非常少，而一间牢房关两个人，也绝不可能把两个左翼运动家关在一间牢房里。象电影里的朝鲜人革命家这样的人物，怎么会当杂工(这是一种特殊的优待)，是要关到一个特别的单身牢房的。

更令人吃惊的是，在耕平他们两人的牢房墙壁上，清清楚楚用大字写着：“打倒天皇制！”，“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种事也是绝对不可能的。这种字样轻轻用指甲写上去是有的，但一旦被警察发现了，马上就会被涂掉，写的人也要被打个半死。可是在电影里却清清楚楚地挥笔大书，耕平在那间牢房里不遗余力地护理着遭到

严刑拷打已经半死的伙伴。看守对此也不过问。好一个仁慈的看守呀！

也就是说，对这个拘留所的描写，掩盖了甚至毋宁说美化了当时天皇制警察极端残暴的本质。要是那样，那末严刑拷打还意味着什么呢？前面已经介绍过女学生和大学教授的感想，他们看过电影后称赞说，影片充分地描绘出以前一般被掩盖起来的可怕的警察白色恐怖，他们完全搞错了。同拘留所的描写法互相矛盾的那些拷打场面，既不是描写革命家的斗志，也不是暴露天皇制警察的残暴，乃是和流氓片的私刑场面一样，仅仅为了刺激观众的嗜虐性罢了。因此，那些遭到拷打而死亡的朝鲜人革命家，也不太象个革命家，只是让他们说出希望死在故乡朝鲜就完事了。固然希望死在故乡的这种事也许会有，但是仅仅这样能算是描写了一个革命家的光荣就义吗？我认为这是对朝鲜人的侮辱。

另外，还有人会说，这是利用这种拷打的场面来吓唬观众的，说谁要搞反战运动，就要象这样地倒霉呀！向人们灌输失败主义。这也是一种不合情理的错误看法。不用说革命家，就是真正进步的人，也不会因这部电影就被吓倒。

顺便提一下，这位根本没有描写工农反帝斗争的导演，让调查耕平的特务警察问耕平有没有读过宫本显治的书？有没有读过藏原惟人的书？借此若无其事地宣传日共今天的最高领导，表明他对党中央的忠诚。真是费尽了心机！

第七节 反中国和反朝鲜的鼓盪宣传

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自始至终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电影也好象在描述中朝人民的抵抗似的，然而不是正确地去描写它，而是加以歪曲，尤其是把重点放在使中国人和朝鲜人的激烈对立

上,进行了一种罪恶的反中国和反朝鲜的宣传。

在整个第一集和第二集里,在中国的朝鲜人徐在林和中国人白永祥代表了两个民族的革命人民。在朝鲜民族“三·一”大暴动时,徐的父母家属遭到日帝残杀,因此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燃烧起炽烈的仇恨火焰。他是朝中人民联合游击部队的干部,可是民族意识太强,非常粗暴,因而容易感情用事。无论怎么看,也没有描写出来一个代表朝鲜民族的革命家典型。导演在展开故事情节时,非常袒护徐,但却把徐这个人物描写成一个流氓形象。在这里也体现出那个女大学生所说的:“虽然没有说出口,但日本人沾染上一种体臭似的差别意识。”

白永祥,知识分子出身,是中共满洲省委员会地下工作人员,游击队的政治指导员。他是一个很有才干、性情温和而勇敢果断的人物。可是这个人物被企图利用他来充当情报来源的伍代乔介救了出来,让他在自己的公司仓库里工作。这倒还可以,而白却在一个运货车出入频繁、按照常识会布满日本特务的地方,给游击队的秘密联络员发出重要指示,这被伍代的部下偷听到了,向日本宪兵队告密。这该是个多么愚蠢的地下工作人员啊!而且这回他又凭伍代乔介的体贴,并得到伍代的部下高畠正典的人道主义的同情,还从高畠那里拿到逃跑的路费逃跑了。从这里看,仿佛伍代乔介比白永祥高明得多。电影这样来描写中共党员代表,难道不是莫大的侮辱吗?

还有更露骨的反中共、反抗日游击队的宣传。这是在第一集里的故事。伍代运输公司的高畠正典说服“盗匪”,使其同意了从满铁沿线,通过“盗匪”的根据地,向内地运输物资。但是有一个附带条件,就是不能让日本的特务和军人潜藏在里面。可是乔介却答应了关东军参谋的要求,悄悄地让军事侦察员混了进去。发现这件事的“盗匪”,不仅把运输队全部歼灭了,而且乘高畠不在家袭

击了他的住宅，抢走了他美丽的新婚妻子。高阜和白永祥一起到“盗匪”根据地去寻找妻子，他在那里得知妻子已被带到更远的内地共产党地区。两人又进一步进入内地，见到了徐在林。徐用憎恨的口气告诉高阜说：“你的妻子在我不知道的时候，被部下奸污了，最后给杀害了，尸体不知道弄到哪去了。”

原著是，高阜的妻子在徐稍一疏忽的工夫自杀了。如上所述，电影竟让中朝联合抗日游击队的战士去绑架、强奸并惨杀日本人的年轻美貌的妻子。一个日本共产党员山本萨夫导演可真行！竟创作出这样一个反中国和反朝鲜的蛊惑人心的作品。

山本导演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还让徐和白对立起来，让朝鲜人和中国人进行民族对抗。

在第一集里面还有这样一个场面，关于 1930 年 5 月的间岛朝鲜抗日武装起义，徐在敦化首次遇上了白，对白大骂中共。徐对白进行激烈的指责，说：“中共满洲委员会驱使朝鲜人搞极左冒险，让朝鲜人承担一切牺牲，而中共党委员会躲在安全的地方就象若无其事似的。”白说：“党是发出了起义的指示，但却没指示叫去冒险。”这完全跟宫本显治今天对下级党员讲的话一样。如此官僚主义地推脱责任，徐当然越发怒不可抑，他毫不客气地说：“要是不冒险就能起义，我倒想领教领教！”

一看到这种场面，就会使观众觉得徐所说的一一都在理上，而中共该多么狡猾呀！原著里也有白和徐的上述一段对话，但原著中白对极左冒险主义的批判写得更有说服力，还描写了白对当时的中共中央李立三路线的怀疑；徐本身实际上也犯了极左错误。而且双方尽管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但决没有形成敌对。可是，在影片里只是描写得好象中共在利用朝鲜人似的。

在第二集里，徐同白的对立进一步发展起来。

这是在中朝联合抗日游击队的根据地发生的事情。他们被日

本帝国主义及其傀儡“满洲国”军队包围了很久，粮食也吃光了，战士姑且不说，群众中有的忍受不了这种艰苦而逃走了。徐严禁逃走，说发现违抗者马上枪毙。白表示反对，主张应设法让群众逃走，光留战士在这里坚持到底，待机打开局面。徐认为这样下去会一天天地不好办，主张强行突围，另行建立新根据地。争论得很激烈，表决结果，徐的主张被否决了。但他不服从决定，大喊大叫地说：

我一直是最勇敢地进行了战斗，接受了最危险的任务（实际上在这部影片里，一直是徐在指挥战斗，中国干部只是在根据地开会时才登场）。总之，所以不采纳我的正确意见，就是因为我是朝鲜人，你们是中国人的。姓白的胆小鬼摆出一副领导人面孔，也是因为是中国人的。我再也不同你们一起行动了。我要离开这里到金日成将军那里去。“朝鲜人应同朝鲜人一起战斗！”

对此，白竟然说：“要走你就走吧，朝鲜人！你的民族意识既然这么严重，我就叫你一声朝鲜人吧！”

这种漫长的对立场面实在是目不忍睹。徐也好，白也好，根本不象一个国际主义的革命家，被描写成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两人的对立变成了中朝两个民族的对立。原著里面徐和白之间的对立也写得很象上述那样激烈。不过，在原著里面，六个中国人、一个朝鲜人开会，并不总是采纳白的意见，否定徐的意见；有时徐的意见，竟压倒白的激烈反对，以六比一被采纳了。而且总的来说，徐和白之间并不是民族的对立和憎恶。

在原著里面，这种对立情况发展到最后，在白批评徐欺骗和枪杀逃跑者的时候，徐骂白，想打死他。当徐用手指去勾扳机的一瞬间，徐的爱人、尊敬白是领导的朝鲜女革命家全明福，一下子飞跑过去，用自己的身子去掩护白。正在这时徐的枪喷出火来，明福倒下了。徐充满悲痛的哀思抱着明福走向雪原，把她埋葬在

那里。

这是原著中最动人的部分，但影片却不是这样。徐与白等人决裂后，率领全明福及其他朝鲜同志，离开根据地，走向金日成将军的麾下。不久在中途发现傀儡“满洲国”的讨伐队来了。这时徐接受明福的批评，重新回到国际主义革命家的立场，为了营救留在根据地的中国同志，勇敢地进行了佯动牵制战，全明福战死。徐在林抱着她的遗体，从雪原向祖国朝鲜方向走去。不久筋疲力竭，一边抽泣，一边把爱人的遗体埋葬雪下，没完没了地唠叨着。作为一个情节不知应如何评价，但作为一个革命家的行动，它同在东京警察拘留所受刑致死的朝鲜革命家的最后表现是一模一样的，给人一种过于望乡悲叹之感。

在整个第一集和第二集里，原著虽然也有使中朝革命家对立的部分，但山本导演的影片却进一步扩大了原著的这种缺点，一味强调中朝革命家的对立，给人一种感觉好象这种对立是基本的，其政治用意是很明显的。现在中国共产党、政府、人民和朝鲜劳动党、政府、人民的反美帝和反日本军国主义的统一战线是不可动摇的，双方用鲜血凝成的团结，是无比牢固的。可是热中于反中国的日共修正主义集团及其御用电影作家却嫉妒中朝的这种团结，而且怕得要死。因此，他们在电影里使双方对立起来，特意把中国方面描写成只是利用朝鲜人的坏人，尽量使日本观众对中国党留下坏印象。

如果导演想认真描写“昭和史”，就应该清楚地描绘出朝鲜人和中国人在抗日斗争中最根本的事实，双方紧密团结一致，同日本帝国主义战斗到最后，并共同分享胜利的果实。在他们之间有时或许有战术上的争论，也许偶尔有些民族感情上的摩擦。然而这不是本质的，不过是一时的插曲，很快就会解决，本质则是始终团结一致的，是国际主义的革命同志的友爱。而山本导演却把它本

末倒置了。

这种事并不是普通反动作家和军国主义作家轻易能想到的。这正是反对中国的现代修正主义作家的独到之处。他们反对高呼中朝两国人民反对美帝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团结一致万岁！而高呼分裂对立万岁！当然这是美日反动派的口号。

一般说来，对中国人的描写简直太不象话。连对社会漠不关心的女大学生竟然也嗅到影片对中国人和朝鲜人“沾染上体臭似的”差别意识。

在第二集里出现过两三次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入侵华北的游行示威的场面，然而气势不大，而且沿路观看游行的人们脸上毫无表情，这同日共修正主义者今天搞的“秩序井然”的葬仪式的游行如出一辙。实际上，1936年12月9日，从北京的大学生开始，发展成全国范围的游行示威，那些频繁的抗日游行，抗拒着中国卖国武装警察的猛烈的武力镇压，在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下进行了斗争。影片对这种整个民族的崛起连一点暗示都没有。

因此，在“一二·九”运动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后不久发生的“西安事变”，也就成了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崛起毫无关系的、孤立的事件了。这时周恩来等中共代表飞赴西安解决这一事件，迫使蒋介石同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在影片里根本没有表现出这位革命家的伟大形象，而且显得有些庸俗，只出现过胖胖的“周恩来”从飞机上走下来的镜头，这次活动的内容和意义不仅没有用画面表现出来，而且连解说也没有。

还有，从事抗日地下活动的富豪的小姐赵瑞芳，为了摆脱日本宪兵的追查，不是依靠中国同志来进行工作，而是花了大笔金钱求助于一个不伦不类的日本女谍报员（原著也是这样），把这类根本莫须有的事描写得象惊险片似的。这不也是极大地侮蔑了中国革命组织吗？

拿这部影片的战斗场面来说，日本军队一次也没打过败仗。日本军队总是勇敢地冲锋，刹那间就占领了中国军的阵地，简直就象战争时的日本新闻记录片一样。徐在林指挥的抗日游击队，痛快地将散敌军，出现过两三个仿“西部剧”的场面。而被打散的总只是伪满傀儡军。在原著里有日本军败退逃跑的事，但堂堂皇军被朝鲜人和中国人的游击队打败，这种事是日本人山本的帝国主义自尊心不能容许的吧？或者是导演考虑到那样一来会使日本观众不满意呢？

第八节 与亚非人民团结战斗

对《战争和人》的反动性谈得稍微过细了一些。本来这部电影，好也罢，坏也罢，不是战争片和“昭和史”的电影化。如前所述，它是一部过分商业性的情节片。

在第一集里还多少可以看到影片描述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侵略中国东北地区之类的历史性大事件的痕迹。可是到了第二集，正如从原著题名《骷髅的舞蹈》改为《爱与悲的山河》可以推测到的，影片是以由纪子和柘植、俊介和温子、顺子和耕平、徐在林和全明福、赵瑞芳和服部医生这五对恋人为中心的货真价实的情节片。而且还尽量加了很多迎合一般人的低级趣味的场面，如仿“西部剧”的武打、流氓片的残暴场面和刽子手的刀技、色情场面等；并且请来很多当代很红的电影明星，挖空心思地讨好观众。

如果就是这些，也就无需在这里去提它了。但是，它竟这样地把群众引诱过去，伪造历史，美化法西斯和军国主义，使人感到好象人民渴望而且乐意侵略“满洲”，灌输反对朝鲜和反对中国，尤其是反对中国的思想，进而捏造中朝的分裂和对立，向观众灌输最恶劣的军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毒素，因而就必须对它进行彻底

的揭露。

万分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再起的中国领导人和人民谴责这样的影片完全是理所当然的。即使中国人默不作声，我们日本人民也应该彻底进行批判。

今年(1971年)正月，在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新春访问党首脑”的节目里，日本广播协会的解说委员在与日共主席野坂参三对谈时，拿话套野坂说：中国人竟然连日本的反战影片都进行攻击。“日本大多数人认为那样的批判是驴唇不对马嘴的……”野坂觉得这话正中下怀，便说：“据说(谁说的?——井上)，那只是根据听说的，并没有看过电影，就进行了那样的批判。那部电影我也看过。《战争和人》那可是一部很好的影片啊!……”，对中国进行了诽谤(《赤旗报》1971年1月4日)。中国方面可不是野坂那种人，不是连《军阀》和《战争和人》都没有看过就进行谴责的，而是确实看了以后才说那是一部很坏的影片的。

本来，一个修正主义政党的头子，大肆称赞党员摄制的反对中国的电影，攻击中国，这也是无可奈何的。可是以进步自诩，说唯有自己在日本是最了解毛泽东思想，说象自己这样了解中国和中国人的是没有的，如此自负的研究中国的专家，竟然在《周刊朝日》(1971年7月23日)杂志上发表如下的文章，真是令人吃惊。

首先谈谈写过好几本有关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书的新岛淳良教授。他认为日本是侵略的一方，中国是被侵略的一方，“也就是说双方的经验完全不同”，影片《战争和人》“只是从日本人的立场来摄制的”，因此即使中国人把它说成反动影片，“制片人员也完全没有权利去生它的气。……纵然确有其事，也有该写和不该写的问题。”

其次是野村浩一教授。野村教授曾于6月作为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派遣的日本文化界代表团的一员访问中国，刚一回国就说：中

国人和日本人对《战争和人》的评价有分歧，“我们这边有很大责任，”因为我们没有总结，也没有“很好地整理”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

最后是著名的中国文学的研究家竹内好。他说：“这次的《战争和人》，说明双方（日本和中国）的分歧很大。中国方面可能意见很大，总之日本和中国的立场是不同的。要说现在马上就要取得一致，那是办不到的，首先双方要有个一致的立场，这比什么都重要。”

也就是说，三个人都知道中国方面认为这部影片是反动的，是军国主义的，但是似乎一致认为从“日本人的经验”或者“处境”来看，是可以有不同的评价的。三个人都没有明说：从日本人的角度来看，它不是象中国方面所说的那种反动影片。但只能解释他们的话里有这样的想法。

这种说法是对这部极其反动的影片的极其巧妙的辩护。中国人看也好，日本人看也好，反动就是反动。并不是因为日中两国人民的“经验”和“处境”不同，评价才有分歧。即使在同样的日本人中，垄断资本和反动的“立场”则会变成反中国的“立场”；而受本国帝国主义统治者折磨，因而反对本国帝国主义的人民，是同中国人站在共同的“立场”上的。这种日本人内部的“处境”、立场和观点的不同，岂止对影片《战争和人》的评价会带来分歧，还会带来决定性的对立。

听到“处境论”后，我很想引证一下东南亚各国对西村防卫厅长官的自卫队亚洲派遣论的猛烈反击。西村长官曾于10月11日在东京外国记者俱乐部，谈到当亚洲太平洋地区发生天灾的时候，如果受灾国要求援助，就打算派遣自卫队前去进行人道主义的援助。从日本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立场来看，确实会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道主义的建议。然而朝鲜、中国和东南亚各国都一致

强烈反对，认为这正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的表现，从而提高了警惕。

10月18日《每日新闻》进行了详细的报道，说“连对国际问题的反应并不那么敏锐的印尼”也很快提到西村的发言，“在印尼以从来没有过的激烈程度，对日本发起了攻击。”《每日新闻》在这一报道的结尾评论说：“西村的发言好象造成这样一种结果，使大多数日本人无缘无故地受到亚洲人的怀疑”。其实受到无缘无故怀疑的是“大多数日本人”，而对少数垄断着日本的财富和权力的人来说却是有缘有故的怀疑：把电影《战争和人》说成是反战片的，是同西村等人站在同样立场，把派遣自卫队到亚洲各国救灾说成是人道主义的人，如果我们同警惕西村设想的中国、朝鲜、印尼等国站在反帝反军国主义的共同立场上，那末即便是日本人也会把《战争和人》看成是反对中国、反对朝鲜的军国主义的反动影片。

《战争和人》今后还要接着出第三集和第四集。象东宝制片公司1967年以来的《8月15日事件》那样的电影，一定还会在什么地方继续摄制出来。在今天的日本，直截了当地赞扬侵略战争的电影，已经不受群众欢迎了。今后还会出现打着什么反战非战啦，描写什么生活在极其艰苦情况下的人们的苦恼啦，或者说什么“为了救灾而向亚洲派兵”啦等等招牌，实际上是灌输军国主义和修正主义、代替旧帝国主义的新殖民主义的影片。

对诸如此类的货色，我们要培养起明确的批判能力，坚决进行斗争。为此最重要的是应该坚定地站在反帝反军国主义的日本人民的立场上，虚心地向那些曾经遭受日本帝国主义残酷折磨、今天能够最敏锐地看穿、警惕和反对已经复活了的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的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和东南亚人民学习，同那些人们紧密地团结起来进行战斗。

在我们日本人中间总是有这样一种倾向，动不动就盲目崇拜

欧美人的意见，并引用这些意见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这样作谁也不引为奇怪。但是一引用朝鲜人、中国人、东南亚人或者非洲人的意见，则马上轻蔑地说是什么迎合啦，追随啦，经验不一样啦，立场不同啦，等等。这本身就是一种中了蔑视亚非的帝国主义毒素的思想。

然而，对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认识得最锐敏、最深刻的是其最大的受害者亚洲人民和非洲人民。不首先向他们学习，此外还能向谁学习呢？不首先团结他们，此外还能到哪里去寻找我们反帝和反军国主义的战友呢？

我们在文化战线方面，也要向亚非人民学习，团结亚非人民，同已经复活了的日本军国主义进行斗争。

第二篇 结束了什么?是怎样 “结束”的?*

——评影片《战争和人》的终集——

第一节 导演山本的借口

关于影片《战争和人》的第一集和第二集，我在本杂志(《舞曲扇林》)的第4号(1970年12月)、第8号(1971年8月)以及亚非作家协会日本委员会编:《亚非作家丛书》第一号(1971年12月)上，作了相当详尽的批判。结论是这部影片决不象山本导演所吹嘘的、一般资产阶级宣传机器及其变种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等所赞赏的，是什么批判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战争的反战影片，不仅如此，而且影片没有暴露、毋宁说是美化了侵略中国的元凶，并且把日本人民描写成军国主义的赞颂者，歪曲中朝抗日革命家的形象，对其进行诽谤和中伤，煽动中朝的民族对立，应该说是一部最反动的影片。

象我这样一个门外汉，在一个影响不大的杂志上，不管从历史学和思想上怎样进行批评，作者也许不会介意的。但在第二集上演时，日本有广泛影响的宣传工具传来了中国要人的批判，山本导演对此也就似乎不得不说点什么了。

* 这是一篇批判影片《战争和人》终集的文章，曾载在《舞曲扇林》第18号(1973年12月发行)。单独把它拿出来，可能不太好了解它的意思。然而它是前面收录的《最近的日本电影上的军国主义》的续篇，我对影片《战争和人》的批判也到此结束，所以重新收录在这里。——作者

《周刊朝日》杂志 1971 年 7 月 22 日号所归纳的中国批判的要点是，这部影片的本质不是反战的，毋宁说是赞美日本帝国主义的，是复活了的日本军国主义的文化攻击的表现，并列举了具体例子，如这部影片把日本垄断资本家的某一家族作为主人公，没有描写日本人民；没有描写中国和朝鲜人民大众怎样受日本帝国主义折磨，怎样进行抵抗和斗争；中国人民被描写得十分软弱无力；把抗日游击队的朝鲜人和中国人对立起来，企图离间中国和朝鲜，等等。

对此，山本在同一杂志上发表文章说，中国方面的批判不是在很好地看过电影之后进行的；因为中国与日本共产党对立，所以凡是日共称赞的影片，无论如何也要说它不好；同时还说明了作者的“意图”。他说：“第一，始终想简略地介绍一下昭和史（侵略满洲的历史），想让年轻人学习昭和史。同时，……想让人们了解今天的日本几乎和当时一样，又在走同当时一样的道路”；“第二，深深感到今天美军在越南干的，和过去关东军的侵略手法并无二致”；“第三，想让那些认为所谓战争即战场的年轻人了解‘所谓战争实际上就是这样发生的’”。

其次，山本对没有描写人民大众等具体意见反驳如下：

“我深知对人民大众的描写确实不够。然而当时是人民大众被蒙在鼓里的时代，虽然作过调查，可是很多问题怎么也弄不清楚。还有描写得过长、需要压缩的制约和虚构的局限，所以在描写人民大众的生活和痛苦方面出现了缺点。这个问题想在第三集里搞清楚。

“说对朝鲜游击队的描写法是企图离间朝鲜和中国的关系。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中略）此外还有的批判说，为了考虑在营业上要赚钱，拍了妇女的裸体像等，但这决不是为了迎合观众，而是为了强调在战争中妇女是受害者才加上裸体镜头的。”

在《日中》杂志第7号（1972年1月）上，山本在同编辑部人员、原著作者五味川纯平的座谈中，更加详尽地谈到了与此当然完全相同的内容。不管山本是怎么说的，我确信我对第一集和第二集的批判（这与中国的批判基本上是一致的）是正确的。这点在这里就不必重复了。不过，山本的上述发言，在相当于第三集的“终集”里，究竟是不是实现了呢？想对这个问题进行一番分析。

第二节 终集的梗概

首先想介绍一下“终集”的主要梗概。

影片一开始通过解说和画面介绍了第一集和第二集的梗概，即从1928年到1937年12月，日本军攻克南京和当时对市民进行大屠杀等历史事件，以及终集的主要人物在第一集和第二集里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这里所阐述的史观是与当时的军部和今天文部省审定合格的历史教科书完全相同的。其具体例子，这里从略。请参考发表在本杂志（《舞曲扇林》）第8号上的我对第二集的批判文章。

一进入正片，首先出现的是伍代财阀的长女由纪子的华丽而略显孤寂的新娘子的身影。她对同柘植大尉的曲折恋爱（第一集和第二集的主要主题）已经死心，遵从父亲由介的劝告，同东亚银行的经理雨宫的儿子结婚（但不久又决定离婚。一点也没有暗示她为什么要这样结婚的）。

另一方面，与伍代家的最小的女儿顺子相爱的反战活动家标耕平，接到了一周后要到仙台联队入伍的通知。于是顺子在哥哥俊介（耕平的好朋友）的帮助下，瞒着父亲同耕平结婚。在耕平住的一间破旧而狭窄的房间里，只有互相爱慕，互相信赖的耕平、顺

子和俊介三个人，他们那种充满纯洁的爱情和决心冲破前进中的苦难的结婚场面，同披露由纪子政略结婚的虚假豪华的情景形成鲜明的对照。

让妹妹和亲密的朋友结婚之后，俊介去东北地方旅行。在那里，偶然遇上一个贫农的姑娘苦，为了她的一家被迫要去卖身，在他的帮助下，当了伍代家的丫鬟。

在伍代财阀内部，当家的由介抑制“满洲”分公司经理的弟弟乔介和长子英介要大力发展军需工业的强烈主张，认为不能搞那种投机勾当。但是当他从雨宫那里得到最近要制定国家总动员法的机密情报之后，预见到战争将要大规模地长期发展下去，便马上去巴结军事中央当局，转向正式的军需公司。

耕平在内地兵营受到严格训练和下级军官的可怕的私刑制裁的折磨，不久被派到中国山西省战线，顺子坚信耕平一定能够活着回来，在耕平的老伙伴们的贫民救济社做工作。

俊介为了得到免除兵役的特权，到伍代产业满洲分公司去当领导职员。从一开始就热爱上了俊介的苦，随他之后来到海拉尔，在他的住处只尽了一夜的热恋之欢，第二天早晨当俊介尚在睡梦之中，她便从那里溜走，不久便沉沦到烟花巷中。

电影的主题是反映耕平和顺子、俊介和苦这两对年轻人，在激烈的战争下体验了怎样的苦恼、反抗和爱情的。第二集是五对恋人的故事，其中还有朝鲜人的抗日游击队同志的恋爱，日本医学者对一个中国富豪的小姐的倾慕，情节庞杂，外观上显得规模宏大。但终集则集中于上述两对恋人的故事上。在这一点上它比第一集和第二集紧凑了，画面也有很多为低级趣味女青年所喜爱的瑰丽场面，作为情节片比前两集搞得更出色了。

耕平在内地兵营对下级军官的私刑制裁并没有积极反抗，一向在忍耐之中采取不服从的态度。在战场上当命令他用刺刀去刺

杀中国俘虏时，他说什么也不干。不久在部队烧光中国村庄时，严厉命令他打死乱跑的孩子，耕平竟敢不开枪。因而惨遭上司用枪托殴打而失去知觉。在险些被打死的时候，八路军来抢救村民，于是日军撤退，耕平被八路军救了，高高兴兴地进入解放区。

顺子从公报上得悉耕平战死，但几个月后，由于宪兵来搜查顺子的房间，她才知道耕平还活着，在解放区，她自己也高兴得象重又活过来一般（到此，两个人的戏，以团圆告终）。

俊介也反对扩大战争。他与志同道合的前辈、某经济杂志的总编辑田岛一起，在准备发动对苏战争的关东军参谋们的面前，义正词严地指出：按日本的经济力量说来，发动对苏战争无论如何不能取胜，进一步扩大战争是不行的，结果被关进监狱。田岛受到宪兵的拷打；而俊介靠五代家的势力获释，但取消了他的免除兵役权、到海拉尔当地部队入伍去了。

不久，关东军在诺蒙坎发动了对苏战争。在欢送俊介等人的部队出征的日本人中，出现过苦拼命找人的身影，但两人谁也没发现对方。在诺蒙坎，日本军被占压倒优势的苏军歼灭了。在这次战斗中，柘植少校也壮烈战死了（到此，由纪子和柘植的戏“结束”了）。俊介的部队也全部被歼灭，他好不容易幸存下来。当他在战场的废墟上徘徊的时候，遇到了乘挎斗摩托车的参谋军官。军官严厉训斥俊介是胆小鬼，命令他回部队去。俊介拿出枪来对准军官，逼问说：“告诉我，全部被歼灭的我的部队在哪里！”军官仓皇逃去。

惨败的日本兵，溃不成军地“凯旋”回到海拉尔。前来迎接的日本人中有苦。俊介看到了苦。两人面面相觑、互相睨视。俊介喝了苦递过来的茶水，茫然若失地离去。始终谁也没说一句话。过了一会儿，醒悟过来的苦朝着走远了的俊介的背影喊道：“当兵的！到我这儿来玩呀，我会非常爱你的哟！”（于是，两人的戏到此也“结

束”了)。

电影的基本情节到此结束。除此之外，还有乔介同关东军参谋关于战略的议论和交易、中央军事当局会议等场面，但并没有什么意义。在此之后，解说里说，在日本的诺蒙坎战役失败的同时，希特勒出兵占领了波兰，战火从欧洲扩大到全世界。因此，后来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与其说是日本帝国主义主动发动的，莫如说是在世界局势急剧变化的风暴之下被迫干起来的。

第三节 怎样描写了侵略者和抵抗者？

影片《战争和人》的这一部分不是第三集，而被写成是终集。在到拍完第二集时，原作者有一个附带条件，如果要拍成电影，不能半途就停下来，要拍到小说原著结束；山本导演也是这样打算的。这一点在前引《日中》杂志座谈会上已经讲明。可是不知什么原因，使他这次拍完就“结束”了，从而使电影大大脱离了原著。因此，我们作为观众只好认为作者通过这部长篇巨著所要诉说的意图，大致到此业已结束来对它进行评论。

那末这部影片结束了什么？是怎样结束的呢？山本导演试图要说明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就是这样发生的”这点弄清楚了，通过电影画面看到了战争的结局，在这个范围内“结束”了作者所谓的“昭和史”，是这样吗？

不管怎样捧着说，也根本看不出影片是在这种意义上结束的。

在这部影片里，对发动和指挥战争方面，在第一集和第二集里描写了日本的军部、政府和垄断资本家内部的鸽派和鹰派之间的意见分歧，并对鸽派作了肯定的描写，这样一来不仅没有暴露帝国主义的本质，而且美化了鸽派帝国主义。不仅如此，它还把那次侵略战争描写成得到了人民大众的支持，是人民大众所期待的；通过

炮制伪“满洲国”给日本贫农造成仿佛得到解放似的幻想，对此竟然作了肯定的描写。

在继此之后拍成的“终集”里，并没有统治阶级内部的鸽派批判鹰派的镜头，只有那些无知的狂热追求战争的军人随便把战争扩大下去。而且连以前对协助战争持慎重态度的伍代由介也很快利用总动员法，加深同军部的勾结。山本导演也许企图借此暴露鸽派垄断资本家的本性也是帝国主义。可是，在此以后，影片却使由介同乔介、英介的对立进一步发展，甚至让英介攻击他父亲，说他怀有敌对思想。这样一来，由介仍然被美化成仿佛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从而赦免了他对侵略战争的罪责。

影片对被侵略的一方是怎样描写的呢？已经不象第一集和第二集那样，不再让朝鲜人、中国人抗日游击队的活动占电影的相当部分。山西省的八路军和游击队战士只是稍微露了一面。从表面看来，显得象是作了正确的描写。

被日本军绑在树上当作刺杀靶子的被俘游击队战士不让蒙眼睛，瞪着日本军，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场面，和日本军烧毁村庄，屠杀、奸淫老百姓，八路军来救的场面，山本导演拍出这些镜头恐怕是针对对第一集和第二集的批判安排的。他会装腔作势地说：“如果有意见，那就请看了煞尾再说吧！”

但是，这个场面的主人公是标耕平而不是中国人民。这是在突出耕平，描写他不服从日本军的蛮干的，而且正象他同顺子约定的那样，“要活下去为反对侵略战争而斗争。”这一场面是为了使情节剧以团圆收场而安排的，不是从中国人民方面来描写他们的抗日的。这种情况也表现在命令耕平刺杀的那个俘虏，只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如果描写中国人民的抗日，那个俘虏就不会光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且一定还会喊：“中国共产党万岁！”并且不仅光描写那个俘虏不要蒙眼睛，还会把其他一切俘虏也同样写

得很有英雄气概。

其次，那个日本军烧毁村庄，八路军来营救的场面，所描写的主题也不是揭露日本军的残暴和八路军同中国人民浑然结成一体的力量，而是为了给耕平到解放区去制造一个机会，并为了刺激观众的嗜虐性和色情的情趣而安排的。所以八路军一来，日本军就撤退了。没有让八路军去追击和打败日本军。只是救了耕平，导演的目的就达到了。

如果山本真的想描写中国人民的抗日，让观众看到日本侵略中国的末日，也就是说如果真的想预示这次战争“结束”的情景，那末它的结构就会同这部影片完全相反。譬如说，他就必然要把八路军在平型关歼灭板垣兵团等情况拍进去。而在其“终集”的结构中，根本没有描写中国人民抵抗的场面。

这样一来，在影片里尽管日本军没能战胜中国人民，然而也决没有被中国军打败。从第一集起到终集止，不管哪一部分，中国人民的抗日军一次也没有打败日本军。而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军队上起了决定性作用的只是苏联的大坦克群和空军。这就是影片《战争和人》所描写的战争“结束”的模式。

第四节 日本人民的痛苦和裸体镜头等问题

其次一个问题是，山本导演预定说要在第三集里充分描写的、日本人民的痛苦和抵抗又是怎样“结束”的呢？这点只出现在两个地方，一个是苦被迫想卖身；一个是顺子对前来劝她不要再搞贫民救济工作、叫她回家的姐姐由纪子说：伍代产业公司的工人发生了工伤就被惨无人道地赶了出去，而且后者仅仅是顺子的话，并没有用画面表现出来。在苦的卖身问题上，贫农的苦难也是从农民的嘴里说出来的，而对使农民受苦的元凶（地主的剥削和侵略战争

的重压)哪怕一句半句也没有。

这是因为这种场面,它的主题也不是描写贫农,不过是作为俊介与苦相结合的一个机会而安排的。这同安排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场面是为了结束耕平同顺子的恋爱是一脉相承的。

这个场面一开始是俊介正在村道上写生,一个美丽的农村姑娘骑着马迅猛地跑了过来,差一点撞上俊介,她怒斥道:“哪有在道路当间儿画画的笨蛋!”说着驱马跑过。这充分表现出苦的野性奔放、热情和天真。在这里,苦骑在马上,效果非常好。

可是这匹马却使苦这一家变得不象是贫农了。在父母说服俊介不得不把姑娘卖给他时,苦正在刷洗马。哪里会有这样的马棚和极穷的贫农呢?这个时期在东北地方有马的贫农偶尔也许会有。对农民来说,马是仅次于生命的重要生产工具,不管多么穷,马是不能卖掉的,因此可能是不得已才卖女儿。然而画面上没有任何这样的暗示。而且从房子的外观和几个家庭成员的面貌来看,并不特别穷得很惨。

还有百思不解的是,村里的人们对苦被卖去当妓女并没表示任何同情,反而把它当成嘲弄和耍笑苦的材料。这样的贫农是不会有的。其次,一个场面是,苦作为伍代家的丫鬟出现。恐怕连小学都没有很好上过的一个东北极穷的贫农姑娘,被带到伍代家里,不是在厨房打下手,而一开始就在客厅接待客人斟茶倒水,当作一个漂亮的丫鬟来使唤,这怎么可能呢。

如果在厨房里当下手可能没有机会向少爷求爱;如果是一个漂亮的丫鬟,就容易成为情节剧里的女主人公,所以才这样安排的。由于这样一种荒唐的安排,苦及其一家便离帝国主义战争下的苦难人民的典型愈来愈远了。我根本不认为山本导演是想描写人民的痛苦的。这种苦闷的财阀家的少爷同奔放、美丽的贫农姑娘的恋爱,不过是为了博得庸俗人的欢心而已。

从这种迎合观众低级趣味的角度说来，美女的裸体镜头无论如何是少不了的。在第一集和第二集里，这种色情镜头很多；在终集里，也有三处。最初是顺子和耕平的裸体拥抱镜头。导演可能会说，因为是两个人结婚的初夜，所以这是当然的。但是，如果不这样处理，也并不是不能表现两个人相爱的热烈程度的。毋宁说这样一来，反而只能使两人的爱情庸俗化了。十分清楚，不管理由如何，这种镜头是企图把纯洁的形象变成商品，用女明星吉永小百合在床上的裸体镜头来勾引观众的。

其次是苦在海拉尔逼俊介同她共同过夜的场面。这两个人全身裸体厮混的镜头，纯粹是色情电影。这样看来，当耕平所在的部队袭击中国村庄的时候，日本兵把一个妇女的衣服扒下来，赤条条地抱着走的镜头，尽管山本导演会说，这是为了表现在战争中女性被害的情形，不过谁也不会相信这种鬼话。

与此同类的情况是出现过在日本军队内部下级军官虐待新兵或者日本军野蛮地对待中国人的场面。这也并不是暴露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的残暴本质。因为影片拍成一些恶劣的下级军官这样作，好人是不会这样作的。这和第二集里特务警察拷打的场面是一样的，只是为了迎合部分群众的落后心理，挑逗其嗜虐情绪而已。

第五节 修正主义的巧妙的“结束”

不去暴露侵略者的本质，倒去美化侵略者；不去正确地描写中国人民对侵略者的抵抗，也不去描写日本人民的痛苦，竟用色情的和私刑的镜头引诱群众。看来不能不说这部“终集”在结构上也是同第一集和第二集一样的反动影片。

一部分批评家也许会说：“可是……”，“这集同第一集和第二集相比，不是好得多了吗？也没有象以前那样歪曲中国人民的抗

日战争,尽管还不充分,还是暴露了日本军的野蛮行径。尤其是井上,以前不知为什么没有进行具体分析,但耕平的反抗不是很了不起吗?俊介虽然有财阀家少爷的弱点,但他也进行了同他身分很相称的反抗。影片会给现代青年很大鼓励。”

我反对的正是这种观点。这种评价标准,是说“选择危害少的”“总比选择危害多的好些”。这种标准是想要一步一步地承认过去的战争和法西斯年代的现实,并使其合法化。

耕平的反抗,是不能当作现代青年的榜样的。他不服从,只是一味忍耐,一次也没有站出来积极反抗。他也有很好的机会逃到八路军那边去。可是他根本不想这样作。他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合法主义者。说什么在当时的日本军队里,谁能作得超过耕平呢?好象唯有抵抗是忠于历史事实似的。这种说法应该住口!

比方说,他应该看一看根据上等兵奥崎谦三在法庭上的供词编的《山崎,枪毙天皇!》一书,奥崎上等兵不管是高级军官,还是下级军官,对蹂躏自己人权的人进行了彻底的、积极的反抗,并加以惩罚,保护了自己和士兵伙伴们。这不是虚构,而是奥崎本人在中国战线、在运输船内和在新几内亚战线进行斗争的事实。而且就是在中国战线上,逃往解放区的人也不少。现代青年的榜样应该是这样的人而不是耕平。

俊介那套反抗是说应该估计能不能取胜,不应进行不能取胜的战争。这不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原则。而且他的这种估计,也只是根据敌我物质生产力的对比,可是拿关东军参谋们的唯一的最大精神支柱“皇军士气”同八路军和中国人民的士气相比,后者远远压倒前者,而俊介也好,田岛也好,他们根本不可能作出这样的估计。因为他们不了解人民,没有同人民结合在一起。耕平和俊介的那种反抗在当时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但是现代的反抗只是这样就不成了。现代的反抗必须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对

帝国主义进行积极的反击。

在这部影片里，反抗者只有知识分子，在工人和农民以及工农出身的士兵当中，没有一个人进行丝毫的反抗。他们只是戏弄被迫卖身的姑娘；在兵营里净说些下流话；对上级的命令无条件地服从，什么野蛮行径都干得出来。这是把某一方面的历史现象给普遍化了，歪曲了历史的本质。

而且反战活动家耕平，尽管是个知识分子，然而他是穷人的孤儿出身，边劳动边上夜校，在工厂作工，一贯不服从，总是挨上司的整，而财阀家的少爷俊介，用枪对准不讲理的军官，取得了胜利。也就是说，个人的最大反抗性和他的阶级性没有关系，竟成了个性的问题。作为个别现象，这种情况也许会有，然而本质还是阶级性问题。如果没有阶级观点，只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是不会正确地描写反抗问题的。

既不能正确地描写被侵略的中国方面的抗战，而日本人民和士兵对本国帝国主义的反抗也完全没有或者很软弱，因而就根本看不到击中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要害。这样一来，山本萨夫导演的《昭和史》是没法结束的。在《战争和人》里面，“人”的这面被偷换成各种恋爱故事，尽管情节多少有些勉强，总算全都“结束”了。可是“战争”这方面怎么处理的呢？于是拯救山本的神人出现了。这就是苏联大军！“终集”的战争，主题已经不是日本侵略中国，那只不过是两起恋爱故事的部分背景。主要事件是对苏战争的准备、实行及它的惨败。八路军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如前所述，是为了渲染耕平的，而以中国方面为主体的描写根本就没有。在诺蒙坎战役中的苏军是这部影片的主角中的主角。苏军不仅作为日本军的对手，从日本方面进行了描写，也从苏联方面进行了充分描写。如果不是这样，苏军和苏联电影界也不会协助摄制第三集的。

苏军利用各种佯动和谋略麻痹日军，在此期间作了极充分的准备，突然转入总攻击。在无边无际的旷野上，苏联的大坦克群铺天盖地而来，这该是多么压倒优势的气概啊！这在日本电影中是空前宏伟的豪华场面。在这个伟大的苏军面前，日军望风披靡。而与这种情景相比，什么八路军，什么人民游击队，显得多么渺小呀！

中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苏联才是可怕的！

这是导演山本萨夫的《昭和史》和影片《战争和人》的结论。在第一集和第二集里，苏联军队根本没有出现。在那里面一直主张“中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以此为前提，在“终集”里，通过充斥银幕的画面得出“苏联才是可怕的！”结论。山本导演可能不是从拍第一集起就是这样构思的，但是，既然他想以他的基本立场，即反华、亲苏的修正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写《昭和史》，那么结果就无论如何不能不是这样。

修正主义是百分之百的合法主义、非暴力主义、“唯武器”论和“唯生产力”论，它是和性的颓废、残暴情趣，以及除此之外的所有资产阶级的颓废相结合的东西。

由此可见，影片《战争和人》的终集是第一集和第二集的必然展开和结论。这是多么巧妙的修正主义的“结束”和完成啊！